

3 1761 12394244 3

天國·龍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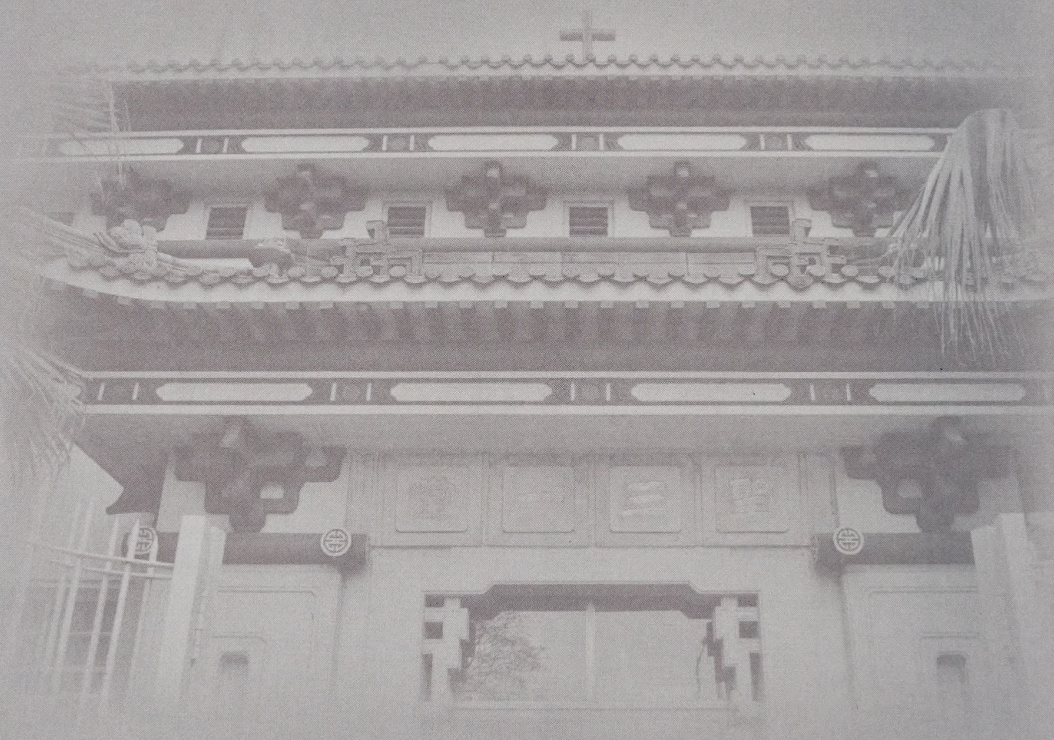
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史 1890-2009

邢福增
劉紹麟 著

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龐萬倫教席），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副社長。研究興趣包括中國基督教歷史、當代中國政教關係及香港基督教史等。專著有《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2008）、《衝突與融合——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集》（2006）、《反帝愛國屬靈人——倪柝聲與基督徒聚會處研究》（2005）、《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2004）及《願你的國降臨——戰後香港「基督教新村」的個案研究》（2002）等。

劉紹麟，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哲學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導師。專研香港基督教會歷史、香港社會等課題。著作包括《香港的殖民地幽靈——從殖民地經驗看今天的香港處境》（2005）、《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一八四二至一八六六年的香港基督教會史》（2003）、《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從一八四三年建基至現代》（2003）、《打倒符碌升級版——做個有料大學生》（2003）、《古樹英華——英華書院校史》（2001）等。





香港教會系列

天國・龍城

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史

（1890–2009）

邢福增、劉紹麟

香港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2010

香港教會系列六

天國・龍城

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史（1890–2009）

邢福增、劉紹麟　著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香港沙田崇基學院神學樓

電話 (852) 2770 3310　網址 www.csccrc.org　傳真 (852) 2603 5224

© 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五月初版。除法例另有規定外，未經
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書面准許，不得複製本書之任何部分。

本書部分圖片轉載自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文件、《香江半島──香港的早期九龍風光》、《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 ──九龍城》、《香港日佔時期，1941 年 12 月–1945 年 8 月》、《聖公會聖三一堂小學五十周年校慶特刊》及《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二十周年校慶特刊，1978–1998》，承蒙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三聯書店、高添強先生、江祝林先生、聖公會聖三一堂小學及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允准轉載。

封面設計：羅米馳

承印、裝釘：海洋印務有限公司

ISBN　978-962-7706-24-3

Studies on Hong Kong Churches 6

IN KOWLOON CITY AS IT IS IN HEAVEN

A HISTORY OF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HOLY TRINITY CHURCH (1890–2009)

by Ying Fuk-tsang & Lau Siu-lun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Theology Building, Chung Chi College, Shatin, Hong Kong

Tel (852) 2770 3310　Website www.csccrc.org　Fax (852) 2603 5224

©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Holy Trinity Cathedral, 2010

Published May 2010. Subject to statutory exception,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take place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Holy Trinity Cathedral.

Sketch of KIL 1116 is from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Used by permission.

Cover design: loMirror

Printing and binding: Ocean Printing Co., Ltd.

利銘澤典底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JUN 01 2026

目錄

香港教會系列總序：盧龍光 xix

鄺序：鄺保羅大主教 xxi

鄺序：鄺廣傑榮休大主教 xxiii

徐序：徐贊生主教 xxv

蘇序：蘇以葆主教 xxix

陳序：陳衍昌牧師 xxxiii

第一章：尋根溯源（1842–1890） 1

聖公會來華宣教 2

香港聖公會的開基 3

九龍半島的開發 4

九龍支站 6

第二章：從宋皇臺到維多利亞山（1890–1904） 15

宋山下：開基與建堂 15

邁出自治與自養的第一步 18

維多利亞山：第二次建堂 20

聖三一堂的奠基者：鄺日修牧師 22

第三章：山上的聖三一（1904–1937） 35

群羊缺牧 35

各盡其職，建立身體 38

JUN 0 1 2026

慈惠與佈道 38
教導、牧養與事奉 41
組織與管理 42
統計數字背後 45
會友面面觀 46
籌建新殿 47
小結：自養與自治 49
第四章：傳天國的福音（1904–1937） 61
城寨的基督 62
死有所歸 66
山上的憐憫 68
本色化建築 71
小結 74
第五章：動盪歲月（1937–1950） 89
風暴前的平靜 89
三年零八個月 92
戰後復堂 95
困乏多情，建立教會 98
教育事業與醫療服務 104
新的開始 109
第六章：植根本土的宣教與牧養（1950–1984） 125
邁向本地化的聖公會 125
聖三一堂主任牧師及助理聖品 127
宣教實踐 129
向學生傳福音 129
向農村傳福音 131
向新區傳福音 133
向鄰舍傳福音 134

向青年人傳福音 136
向聽障人士傳福音 137
按齡牧養 139
成年部 139
少年部 142
青年部 143
婦女部及兒童主日學部 144
事奉部門 145
聖樂部 145
崇拜：音響、侍從與主禮 146
默默的服務 147
小結 149
第七章：植根本土的教育與服務（1950–1984） 171
戰後三十年基督教與香港社會 171
興辦聖三一堂中學 174
青年會英文夜校 179
社會服務新里程 180
小結 186
第八章：迎向挑戰，重尋使命（1984–1997） 207
充滿挑戰的年代 207
迎向百年 211
使命重尋 211
百周年紀念白普理大樓 213
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 218
百年紀念活動 222
跨越千禧 224
宣教與培育 224
重建小學 229
小結 233

第九章：與時俱進，益顯主榮（1998–2009） 251
「九七」後的香港與教會 251
「九七」後的危機 251
從教區到教省 253
宣教、教育與服務 254
使命十年 256
五年計劃（2001–2005） 256
校園福音工作 260
青年事工 265
家庭事工 266
培育事工 266
社會關懷 268
五年牧民計劃（2006–2010） 269
從牧區到座堂 271
東九龍教區主教座堂 271
上行之旅 273
小結 276
結語：天國 · 龍城 301
後記 305
附錄 309
引用書目 311

附表目錄

第三章

表一　1924 年華南教區華籍同工分佈　36

表二　1932 年聖三一堂各部職員　43

表三　1932 年聖三一堂堂會職員　43

表四　聖三一堂洗禮及堅信禮人數（1904–1937）　44

表五　1933 年聖公會在港華人堂會的統計數字　50

第五章

表一　聖三一堂洗禮及堅信禮人數（1936–1941）　90

表二　1946 年聖三一堂日常活動　98

表三　聖三一堂洗禮及堅信禮人數（1946–1950）　102

表四　聖三一堂統計（1945–1950）　103

第六章

表一　1951 年香港聖公會教會　126

表二　1955、1958 及 1962 年香港聖公會發展　126

表三　1955 年聖三一堂新界農村佈道　132

表四　1970 年聖三一堂教友及參與各部、團契人數　147

表五　聖三一堂洗禮及堅信禮人數（1951–1984）　150

第八章

表一　聖三一堂五年計劃主題及口號（1991–1995）　225

表二　聖三一堂洗禮及堅信禮人數（1985–1997）　232

表三　聖三一堂出席主日崇拜及領聖餐平均人數（1985–1997）　234

第九章

表一　聖三一堂五年計劃專責委員會　258

表二　關懷之旅　259

表三　聖三一堂洗禮及堅信禮人數（1998–2009）　278

表四　聖三一堂出席主日崇拜及領聖餐平均人數（1998–2009）　279

表五　聖三一堂 2008 年神學課程大綱　281

表六　聖三一堂 2009 年神學課程大綱　281

表七　聖三一座堂 2010 年神學課程大綱　282

圖片目錄

1　山上之城：聖三一堂第一座教堂　i
2　自 1937 年起啟用的聖三一堂聖堂現貌　ii

序言

1　鄺保羅大主教　xxi
2　鄺廣傑榮休大主教　xxiii
3　徐贊生主教　xxv
4　蘇以葆主教　xxix
5　陳衍昌牧師　xxxiii

第一章

1　史丹頓牧師（Vincent J. Stanton）　11
2　聖約翰座堂　12
3　位於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的主教府　12
4　施美夫主教（George Smith）　13
5　聖保羅書院舊址　13

第二章

1　洗禮名冊記錄了顧啟德全家施洗　29
2　工務局在 1898 年 2 月致聖公會傳道會傳教士班為蘭之覆函（注 1）　29
3　政府檔案手繪草圖顯示的聖堂位置（注 2）　30
4　政府檔案地圖顯示的維多利亞女校新址（注 1）　30
5　維多利亞教區主教霍約瑟（Bishop Joseph C. Hoare）　30
6　山上之城：聖三一堂第一座教堂　31
7　山上之城：聖三一堂第二座聖堂及維多利亞女校　31

8 鄺日修牧師 32
9 鄺日修師母 32
10 鄺日修寫給聖公會差會總部的信件（節錄） 33
11 鄺日修牧師及師母合墓於九龍基督教墳場 34
12 九龍寨城公園內的鄺日修峰及簡介 34

第三章

1 約 1910 年的白鶴山及九龍寨城（注 3） 54
2 約 1910 年的聖三一堂及宋王臺（注 4） 54
3 李求恩牧師 55
4 曾紀岳牧師 55
5 李應標牧師 55
6 何明華主教 55
7 1925 年 5 月 31 日的《基督教培道聯愛會周刊》刊登了港九各堂的講員名字，可見陳乃文先生和曾紀岳牧師分別在聖三一堂和諸聖堂講道 56
8 1925 年 3 月 5 日在九龍城舉行佈道大會時在福音幕下合照 57
9 1933 年政府就新堂址的安排及賠償致函聖公會（注 5） 57
10 政府檔案地圖顯示的聖堂（KIL1156）及學校（KIL1116）位置（注 5） 58
11 陳乃文先生 58
12 吳建中先生 58
13 1920 年代後期馬頭涌一帶，左方已出現一些近代建築物，建築物後方為聖三一堂第二座聖堂（注 4） 59
14 1936 年 11 月 21 日奠基石 59
15 賣物會剪綵禮：何明華會督、李求恩會吏長、黃茂林太平紳士、曾紀岳會吏長、李應標法政牧師 59

第四章

1 寨城內的養老院（1942 年）（注 6、7） 79
2 寨城舊衙門內的老人院（1966 年）（注 7） 79
3 九龍寨城公園內的廣蔭院遺址，正門之上仍有 Almshouse 字眼 80
4 天國學校 80

5　九龍墳場現時仍可見「耶穌教墳場」石刻　80
6　聯合道的基督教墳場及白鶴山（注 3）　81
7　聯合道九龍基督教會墳場　81
8　聖堂正門（2009 年）　81
9　聖堂外貌　82
10　聖堂上的十字架　82
11　瓦頂及中式圖案　83
12　聖堂外中式設計　83
13　垂脊以三隻和平鴿為裝飾　84
14　聖壇　84
15　洗禮盆的木蓋刻有葡萄圖案　85
16　竹樹形燭台　85
17　柱子　86
18　雲彩　86
19　窗花　87

第五章

1　1937 年 12 月 25 日詩班合照：1. 鄺福志先生 2. 朱文偉先生 3. 吳信強先生（聖堂建築師吳建中先生次子）4. 朱恩愛小姐（朱文偉妹妹）5. Ms. Joyce Locok（Jilmmy Arther Locock 妹妹） 6. 蕭英麟先生 7. 李應標牧師 8. 列蒲祜牧師 9. 梁榮耀先生　117
2　1937 年 7 月 4 日啟用新聖堂詩班進堂　117
3　江漢章先生 1937 年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神學院畢業（注 8）　118
4　江漢章先生 1940 年 2 月與湯烈娣小姐結婚（注 8）　118
5　曾貫宜於 1946 年 2 月用英文寫下聖三一堂的日常運作　119
6　涂從芳牧師　120
7　涂從芳牧師封立禮　120
8　列蒲祜牧師　121
9　周夢秋會吏長　121
10　列蒲祜牧師於 1950 年 7 月給何明華主教的書面匯報　121
11　幼稚園首屆畢業生　122
12　1952 年小學校舍首期工程完成　122

13 1955 年聖三一堂副堂、牧師住所及小學校舍（注 9） 123
14 1952 年小學舊校舍奠基石（注 9） 123
15 1955 年小學舊禮堂（聖三一副堂）奠基石 123
16 1950 年 3 月 30 日婦女傳道服務團春季聯歡會團友合照 124

第六章

1 約 1953 年的馬頭涌道與太子道交匯處，右方為聖三一堂（注 3） 158
2 鄺廣傑主教 158
3 彭恩昌牧師 159
4 黃羨雲法政牧師 159
5 謝博文法政牧師 160
6 陳衍昌牧師 160
7 1956 年聖三一堂學校 161
8 十姊妹合照 161
9 1960 年代的福音車 162
10 譚鄺眉珍女士在福音車上佈道 162
11 劉元乂先生在福音車上佈道 163
12 劉元乂先生在青山佈道 163
13 到鄉村佈道 164
14 在新界大埔元洲仔佈道 165
15 圖書車 165
16 以法大團契在崇拜中用手語獻詩 166
17 1975 年少年部職員 166
18 1960 年婦女部團友大會後遊藝會 167
19 兒童樂園 167
20 1975 年 3 月 16 日按手禮後與會督合照 168
21 約 1970 年代的聖三一堂堂址詳圖 168
22 聖三一堂鑽禧特刊（1965 年） 169
23 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1970 年） 169
24 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1980 年） 169

第七章

1 1950 年代的聖堂外貌 195

2 1960 年代的馬頭涌道 195
3 籌建中學委員會 196
4 1978 年 8 月 26 日聖三一堂中學奠基禮 196
5 1978 年 8 月 26 日聖三一堂中學奠基石 197
6 1979 年聖三一堂中學校舍平頂禮（注 10） 197
7 聖三一堂中學 198
8 1982 年 8 月 28 日聖三一堂白普理中心動土禮 199
9 1982 年 12 月 27 日白普理中心百萬行 199
10 1983 年 4 月 3 日白普理中心奠基禮 200
11 白普理中心奠基石 200
12 1983 年 8 月 27 日白普理中心平頂感恩禮 201
13 1984 年 6 月 17 日白普理中心開幕禮 201
14 白普理大樓外貌（2010 年） 202
15 「主賜平安」大壁畫 202
16 十餘個圓拱設計喻表合手祈禱 203
17 大樓入口指示 203
18 大樓外牆三位一體圖案 204
19 聖三一中心幼稚園 204
20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入口指示 205
21 小聖堂 206

第八章

1 1985 年 2 月 2 日陳衍昌牧師派立聖三一堂主任就職禮後與鄺廣傑主教及牧區議員合照 242
2 周伯明牧師家庭 242
3 1989 年 12 月 26 日百萬行籌款開步禮 243
4 1990 年 1 月 7 日百周年紀念白普理大樓奠基禮 243
5 1990 年 1 月 7 日白普理百周年紀念樓奠基石 244
6 1990 年 12 月 16 日百周年紀念白普理大樓奉獻禮紀念碑 245
7 百周年紀念白普理大樓外貌 245
8 1990 年慶祝百周年堂慶期間的聖堂外貌 246
9 百周年堂慶植樹禮 246

10 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中央的柏樹為 1990 年百周年堂慶所種 247
11 小學校舍重建動土禮 247
12 小學新校舍奠基石 248
13 小學新校舍奉獻禮紀念碑 248
14 小學禮堂 249
15 小學圖書館 249
16 徐贊生主教 250
17 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1990 年） 250

第九章

1 110 周年堂慶感恩聚餐（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2000 年） 288
2 聖三一堂一百一十周年堂慶特刊（2000 年） 288
3 鄺保羅主教 289
4 香港聖公會會徽 289
5 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區徽 290
6 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區徽 290
7 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區徽 290
8 家長學堂告示 291
9 兒童合唱團 291
10 兒童合唱團入口指引 292
11 2007 年聖樂藝術培訓基金籌款音樂會 292
12 座堂壁報裝飾 293
13 2009 年 11 月 1 日邁向新紀元感恩聖餐崇拜 293
14 裝修期間的崇拜禮堂設置 294
15 裝修期間的聖堂 295
16 歐陽兆基牧師 296
17 呂利武會吏 296
18 葉慶璇牧師 296
19 裝修後的聖堂：三一主殿 297
20 慕主小堂 298
21 景華小堂 298

22 聖堂裝修完畢後，於2010年5月9日首次舉行崇拜，陳衍昌牧師為洗禮盤聖水祝聖 299

23 早堂崇拜詩班合照 299

承蒙下列人士及機構允准轉載圖片，宗文社謹此致謝：

注 1 **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1) Letter dated 2 Feb 1898,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No. 84; (2) Map of Kowloon Inland Lot No. 1156. 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Hong Kong, HKRS No. 265, D. & S. No. 11B/1792(1).

注 2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Sketch of KIL 1116, Despatch 435, CO 129/316,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注 3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鄭寶鴻：《香江半島——香港的早期九龍風光》（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2007），159、165、171。

注 4 **三聯書店**：趙雨樂、鐘寶賢編：《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 ——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52、86。

注 5 **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1) Letter dated 28 Dec 1933, Reference No. 361/1933, KIL 1156; (2) Map of KIL 1116 (School) and KIL1156 (Church). 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Hong Kong, HKRS No. 265, D. & S. No. 11B/1792(2).

注 6 **三聯書店**：高添強、唐卓敏編著：《香港日佔時期，1941年12月–1945年8月》(香港：三聯書店，2001五刷），120。

注 7 **高添強先生**

注 8 **江漢章先生之子江祝林先生**

注 9 **聖公會聖三一堂小學**：《聖公會聖三一堂小學五十周年校慶特刊》(香港：聖三一堂小學，2002)，71、76。

注 10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二十周年校慶特刊編委會：《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二十周年校慶特刊，1978–1998》(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1998)，23。

香港教會系列總序

自一九八零年以來，香港前途問題引起了整個社會的關注與討論，焦點不只是香港的明天會否更好，更包括了香港的身分與特點、歷史與現狀、優點與缺欠等課題；簡單來説，就是從關心香港的前途，引申到認識香港本身；因此，社會中出現了很多關於香港的書籍，學術界甚至提出了「香港學」的研究。

這種發展對香港非常重要，因為無論在歷史、文化、社會等方面，香港過往皆被視為中國大陸的附庸，沒有獨特的身分。更因為政治上是英國殖民地，社會上是中國大陸難民和移民的集散地，殖民及難民心態使香港人的獨立性格難以建立。九七危機迫使香港人重新檢視自我的身分，當北京政府宣佈以「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的方針政策收回香港時，香港人在問：不變的是甚麼？要變的是甚麼？「香港」又是甚麼？

事實上，香港與中國大陸母體分隔了約五十年後，香港已不自覺地建立起獨特的歷史、文化與社會；與母體重新連結時，勢必面對不少差異、甚至是對立的問題，而解決的起點必須是認識自己和彼此認識。故此，了解香港的歷史、特性、經歷和價值觀等課題，於此時此刻尤其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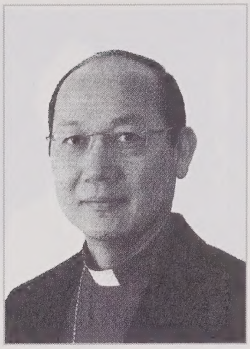
自一八四零年開始，香港教會與香港社會的歷史差不多同步發展。在九七前的殖民地時期，教會在香港具有優越地位，事實上，教會可説是藉此地位對社會作了不少貢獻，獲得社會各階層的欣賞。但九七後，特區政府將佛誕定為公眾假期，其他宗教廟

宇亦獲政府特許舉行婚禮，香港各宗教領袖在政府禮賓名單中位置平等，以上種種措施，都使基督教會（包括天主教會）的優越地位改變。這是香港非殖民化的合理過程，香港教會必須意識到這方面的發展，並且主動尋索更貼近本地社會文化的途徑，從而建立更本土化的香港教會。

在建立本土化教會的過程中，教會必須進深認識香港，另一方面，亦應透過研究，了解教會本身走過的路。然而，當社會中「香港學」的書籍出版得如火如荼之際，教會在這方面的著作卻如鳳毛麟角。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的一個重要使命，乃為促進香港教會本土化，故專設「香港教會系列」，將有關香港教會的研究結集成書，即或市場價值不高，分量各不相同，只期望對香港教會本土化有所貢獻。盼望香港教會及學術界的朋友，能夠積極參與，提供研究成果及資源，使此「香港教會系列」能在香港社會與教會重塑身分的過程中，扮演具意義的角色。

盧龍光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社長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鄺序

聖公會聖三一堂（座堂）一百二十年的歷史對我個人、家族與及整個香港聖公會的人和事，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個人和家族成員的故事雖在該堂悠久的歷史中只佔十分微小的一角，但對本人來說，卻甚光榮和具意義。一九八二至八六年這四年的助理牧師職分（curacy）可說是本人牧職的啟蒙時期，為後來牧會的職分奠定了重要基礎。家族成員在該堂不同時段的事奉，更令本人與該堂歷史扯上了不可分割的關係。

一百二十多年前，九龍城區是邊陲、貧瘠、百廢待舉和治安不靖的地區。當時，主教、牧師和信徒卻對這區充滿宣教的承擔，決定在此興建聖堂，傳揚主恩，牧養坊眾，而且興辦學校，教育年青學子，特別為女孩提供教育和社會服務。同時更辦理老人院和義學，照顧老弱孤幼。因此，聖公會昔日在九龍城區的服侍，可算是聖公會對香港承擔一個具歷史價值和意義的例子。想進一步了解香港聖公會的宣教歷史、辦學理念，和創先河的社會服務模式，就不可不看聖公會聖三一堂的歷史。

鄺保羅大主教

香港聖公會主教長



鄺序

歷史可以幫助我們尋根，令我們明白前人的處境和奮鬥的艱辛，欣賞他們的成就，同情他們的失敗，感謝他們的貢獻；亦可以使我們學習到事物發展盛衰的道理，萬事興亡的因由；更可以因前人創下的成果、以及他們原有的動力和智慧，鼓勵我們努力完成我們應有的使命和責任。基於此，近日很多人喜歡懷舊，提倡保育，編寫各自的歷史。適逢聖三一堂慶祝堂慶，身為教會的一分子，我們不但要向前看，也要從後看，才可以了解上帝在歷史上的作為，建立更健康的社群，活出更豐盛的生命。

最近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聖三一堂為了慶祝一百二十周年堂慶，邀請了邢福增教授撰寫堂史。邢教授的文字記錄，深入淺出，忠於史實，發人深省。他輕描淡寫，便把我們所認識和不認識的長輩，栩栩如生地活現在我們眼前；他們的貢獻，給我們後輩有無限的鼓舞。邢教授所用的資料，包括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一些記錄，也有些是九龍城的發展歷史，亦有聖公會在香港發展的過程。因此，本書並非單單是堂史，所收集的史料相當廣闊豐富，對香港歷史有興趣的人，實在不可錯過。

讀了邢教授的文稿後，才有系統地明白聖三一堂在過去一百二十年所走過的路，是那麼崎嶇、那麼艱辛！可是，那些時代的兄姊卻是充滿信心，學效基督，滿有遠象，披荊斬棘，不惜犧牲小我，推動群體事奉，不斷奮鬥，才有今天的成果。我們欣然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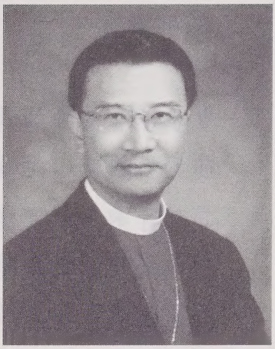
到的，不單是聖三一堂的歷史，還有聖三一堂的特性、信徒的典範。

在此，謹祝賀聖三一堂各位兄姊，在上帝的引領下，有此成就，並希望你們繼續稟承牧區的特性，承前啟後，發展聖工，弘揚真道，實踐福音的教導，榮神益人。

鄺廣傑榮休大主教

香港聖公會首任主教長

徐序



本人欣蒙陳衍昌座堂主任牧師的囑咐為邢福增教授執筆之聖三一堂一百二十年史書寫序，付梓之前，有機會得以先睹，實深感榮幸和快慰。

首先，本人要感謝邢福增教授及陳衍昌座堂主任牧師。感謝陳牧師高瞻遠矚，促成撰寫一百二十年堂史之壯舉，亦感謝邢教授以其精辟之功力，將三一堂百餘年來歷史的零碎片段，收集整理成書，與我們分享，實至難能可貴。

當吾人細讀邢教授的大作，不難感受到邢教授接觸面的廣博，尤其是對聖公會信仰的認識，對聖公宗教會實況的了解，對歷史事件反應的敏銳、分析的坦率真誠，絕無掩飾，以致讀者可從中獲益良多。

再者，當我們細閱內文之時，似乎從中與教會許多先哲前賢，特別是聖三一堂一百二十年來的忠心牧者和信眾，在文字行間靈裏相遇，體認到前人對教會的忠心、對鄰舍的愛眷、對社會的承擔，進而提昇我們自己的信仰情操，與主契合，並向上帝獻上生命的讚美和感謝。

在省覽聖三一堂一百二十年堂史之時，本人嘗試於前人的教會事奉生活中找出屬靈的意義或神學的反思。聖三一堂因經歷了一百二十年而向上主感恩之際，因成立聖三一座堂而邁向新紀元之時，這一百二十年堂史正好是前人在福傳事工上的努力、對教

會忠心和愛眷的最佳見證。同時，也提醒了我們，聖三一座堂邁向未來的方向和指標。這包括以下數點：

首先，本人欲指出：聖三一堂的會眾一百二十年來侍主愛人的熱忱，是該堂能結出豐盛屬靈果子的重要因素。例如該堂屢遭政府收地，引致遷址重建的危機，均能因着眾教友勇於承擔，而迅速化險為夷，獲得解決。聖三一堂於一八九零年開基，一百二十年當中，經歷了不下三次遷址重建。一八九零年創堂之後，一直借用熱心教友顧啟德弟兄之家為聚會點，迄一九零二年，一所可容百餘人的教堂方建成，惜好景不常，於一年後（1903），港府收回原地段，以維多利亞小學側之土地交換。到了一九零五年，換言之，在短短兩年間，重新建立一所可容三百多人的新堂。

於一九三六年，聖三一堂再次面臨遷拆的危機，當時港府撥出現在的堂址交換，感謝上主鴻恩，第三次建堂於兩年後，即一九三八年八月完成。

總言之，正如何明華會督於一九三五年去函布政司的信件提到，該堂是當時五所本地聖公會堂會中人數最多却又最貧困的一所，可是，正如五餅二魚的神蹟，當聖三一堂教友獻上他們寶貴的熱忱，乃成就了上主的旨意。

其次，回顧已逝的一百二十年，聖三一堂在福傳和牧養方面，從沒有離棄過對教育機構的承擔。聖三一堂的兄姊了解到一般正規教育的缺陷和有限性，樂意為常規教育作出補足，甘心諄諄善誘，向學子見證上主的仁慈和大愛，貫徹完成主耶穌基督交付的大使命。

本人相信，一百二十年來曾經受到聖三一堂所屬學校或該堂的教導或牧養，以致能本着基督化精神生活和服務社會的莘莘學子數目之具，或難於统計，然而通過學校而接觸基督教信仰，成為教會精英，對教會和社會貢獻良多的知名人士，亦為數甚多。

可以說，聖三一堂創堂迄今，從未放棄堂校合作的可能性，由二戰之前的維多利亞女校，天國學校、侯王道三一學校、以至戰後的民生書院及六十年代的慈雲山約榮學校等可見一斑。較近期，除了聖三一堂本身主辦的中學、小學及幼稚園外，與座落牧區的銀禧中學、協恩中學、小學暨幼稚園的合作關係亦堪稱緊密無間。

當然，聖三一堂也從沒有忽略到服侍貧困和有需要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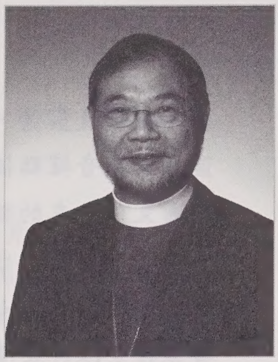
再者，聖三一堂開基至今，從沒有忽視福傳工作的重要性。雖然，邢教授在文中指出在一九八六至八九及九十年代，領洗人數下降可能與全力籌建白普理百年紀念樓等有關，反映出極可能因事工重點的此消彼長，相對而忽視了宣教工作的結果。文中亦指出，即使在二次大戰之前，聖三一堂亦設三所佈道所，分別由陳乃文傳道和何理士姑娘等主理。而在一九六八至七零年代，慈雲山佈道所（慈光堂前身）的設立，聖三一堂的人力、物力和禱告的支持亦屬不少。總的而言，聖三一堂的姊妹們對福傳佈道工作一絲不苟的精神和幹勁，乃是我輩的典範。更是聖三一座堂邁向前路的提醒和參考。無疑，作為東九龍教區的母堂，要在香港如此複雜的城市宣教和服務，樣式需要多元化，可是，福傳大使命的承擔應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最後，本人沒有忘記邢教授提到聖三一堂教友百多年來對服侍貧困有需要鄰舍的承擔。在二十一世紀今日的香港，在社會服務專業化及政府以公帑支援下，一般教友似乎逐漸忽略了對社會服務的承擔。本人有一個夢，是一個怎樣的夢？不是美麗的白日夢，不是不能成真的夢，不是外強中乾的夢，不是與主耶穌基督的要求相距千萬里的夢，是救主基督要求於我們的三位一體、合而為一的夢！讓座堂帶動之下，我們的福傳、教育和社服單位三者能合而為一，向本區居民提供合而為一的德智體群美靈六育融合的服務；這三個單位卻又和而不同、求同存異、互相支援，但又各顯特色。我再說，這三個如手如足的單位，是和而不同、求

同存異、互相支援，但又各顯特色。歲月神偷也許偷走了聖三一堂一百二十年的歲月，可是前人的經驗和典範，卻又帶給了聖三一座堂無限的靈感和提點！願上主垂憐！

徐贊生主教

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主教



蘇序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上帝；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地祈求。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立比書 1:3–6）

哈利路亞，感謝上帝！百多年來，上帝祝福賜恩予聖三一堂，不單作為虔誠崇拜上帝的地方，也在牧養、培育及教育事工上，祝福許多人的一生，更在牧養及社會服務事奉中，為許多人帶來上帝的醫治與引領，結出數不盡的屬靈果子，讓祂得着稱頌與榮耀。

我與聖三一堂有深厚的情緣，我曾擔任牧區的助理聖品，也曾在教堂範圍內之教區輔導服務處及教區九龍辦事處擔任負責人。出入教堂地域十多年，深深感受牧區內外事工的完整性，可算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也感受到上帝的恩澤天天加給這牧區，可說「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上帝興起忠心的先哲先賢奠下深厚的屬靈根基，也差遣充滿靈力的牧者與教友不斷將主之真理與愛傳開，使牧區成為社區的明燈及平安的啟發地，更是交通樞紐的地標、上帝臨在的象徵。

在百多年的歷史巨輪中，社區經歷不斷的重建與更新，特別是附近曾設立與搬遷機場。在風浪、變遷與動盪中，牧區的牧者與信徒銳意忠心地實踐傳主福音的使命，在歲月磨練中，增添信

德、愛德及望德，建立了信仰群體的敬虔傳統。自搶灘頭在九龍區設立福音據點後，雖然初期三次搬遷，最終在現址不單建造有中國文化氣息的教堂，更不斷興建及重建副堂、禮堂、社會服務中心及小學等，也在何文田區開辦了政府資助的中學，使牧區成為照顧坊眾身、心、社及靈的中心，提供一條龍服務，且不斷完善服務資源與裝備。

在已往的日子裏，聖三一堂的牧者與信徒積極回應時代及坊眾的需要，為教會及社會培訓了不少人才。他們重視塑造人的心靈質素，不斷在靈修、教導、訓練、牧養和團契生活中，裝備信徒為基督作精彩的見證，令人鼓舞並歸榮上帝。在百多年的牧區生活中，信徒在各部事工中如何得着造就，特別是青少年、長者、婦女、伉儷、詩班、家庭和幼兒事工，聖三一堂都曾作深層的反省及訂立有效的策略，幫助信徒打好屬靈根基；多年來，聖工不斷擴展及提昇，對其他牧區有不少啟迪。聖三一堂整個信仰群體善用上帝的恩賜，在信心旅程中作了活的見證，充滿靈力地承擔上帝的使命。

早在港澳教區時代，聖三一堂已是五大牧區之一，也是九龍區最「老」的牧區；教區在教堂範圍內設置了教區九龍辦事處，可算是教區在九龍及新界活動的「重點」。自東九龍教區成立後，教區辦事處就在這裏設立，十多年來成為教區活動推展及會議的中心。這裏也是東九龍教區成立崇拜及典禮暨徐主教昇座禮的舉行地點，可見聖三一堂早已有座堂的雛形。教堂範圍面積之大、教堂之特色建築、整全的教育及社會服務單位、交通樞紐的優勢、牧區資源的穩定、可作模範的聖工團隊、深厚的屬靈傳統、同一心意的信眾……等等，都是成為「座堂」的理想條件。回望過去，我要為聖三一堂感謝上帝，上帝像早有安排，將「座堂」應有的元素，在不同時空加給牧區，成為現在完美的「點睛」，在裝修後將主教座位放置於教堂中。我們真的要感謝上帝，歷史的主宰。

讓我代表西九龍教區恭賀聖三一堂奉獻為聖三一座堂，將榮耀歸予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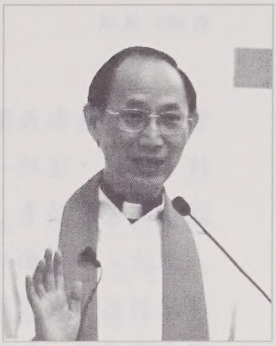
>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並靠着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上帝。（腓立比書 1:9–11）

主僕

以葆

（蘇以葆主教）

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主教



陳序

奇妙帶領
艱辛中見恩典

為撰寫序文，本人除了拜讀劉紹麟先生及邢福增博士的文稿，亦翻閱過不少新舊書刊，並記下多次潮湧於心的靈感，且多次動筆，無奈始終遲遲未能完稿。

為事奉超過四分一世紀、歷經高低起伏的堂會作序，豈能草率為文？再者，從英國海外傳道會九龍佈道支站（佈道所）到牧區，到座堂，「聖三一」作為忠心的基督信徒群體，在建立教會彰顯上主國度的努力既多元又複雜，要避免以偏蓋全，並不易為。另一方面，四位主教亦已不吝為序賜教，珠玉在前，重覆內容，實無必要。本人乃決定集中論述成為主教座堂後，教會應該朝着甚麼方向發展，以期拋磚引玉，為座堂尋索前路，讓上主更得榮耀。

邢博士在後記中有一句話，委實是當頭棒喝，提示了一個教會不容忽視的問題：嚴謹探究信仰，也可以為教會和信徒的靈性成長帶來幫助。他說：「近距離及深入地檢視聖三一牧區的過去與現在……深刻的屬靈之旅……再一次證明，嚴謹的學術研究也可以帶來深邃的靈性經歷。」這一段說話和筆者的牧會優次，不謀而合，也和二十六年前彭榮昌會吏長寫給本人的委任信內容，共鳴相通：「牧師在基督教教育素有心得，希望你在聖三一堂的事奉上得以發揮所長，幫助教會發展事工榮耀上帝。」

無疑，本人深信教會健康成長，實有賴於對於信徒培育的堅持。因此，遠於一九七八年便創立宗教教育中心，並在中心的季訊《傳遞》發表〈信徒培育——教會增長的心臟〉論文，分享個人看法，以鼓勵同工和教友看重教會的培育。直到今天，本人的看法仍然沒有改變。這個看法是逐漸形成的，有趣的是，其中一個重要成因，也和「聖三一」有密切關係。

自從三十年前第一次在英倫進修開始，直到現在，本人每一次作客倫敦，白嘉魯線馬利邦地鐵站（Marybone Station）對面馬路的聖三一堂便成了我必到之處。原因是那裏有一間很大的舊書店，藏書豐富，服務優良，購書太多搬不動時可以代寄回家。更重要的原因是，這是英國聖公會透過學術研究及出版的宣教組織（Missionary Society），簡稱 S.P.C.K.（全名是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在全國不少城市都設有分店，也是牧者、神學生和信徒常到的地方。可惜，聞說近年因為財務危機，該書店已經易手。由於個人對培育重要性的執著，加上常懷着與 S.P.C.K.「戀情」的美好回憶，我便大膽向牧區議會提出設立座堂書室的意念，獲批准籌劃後，曾經和宗教教育中心總幹事彭培剛法政牧師聯絡，邀請合辦，可惜未能調撥資源協助開辦。後來，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對於開設書室一事甚感興趣，並樂意撥出資源，玉成其事，書室「雅善」遂誕生。

書室命名為「雅善」，是取其英文 Ascent 之音譯。二零一零年乃聖三一堂肇基一百二十周年堂慶，更逢本堂成為東九龍教區主教座堂後獻堂之日，堂慶委員會乃選定堂慶主題為「上行之旅」（A Journey of Ascent），藉以提醒教會及教友在靈性上尋求上進，力臻「雅善」。書室的英文與中文含意互補相容，向教會和信徒發出重要的訊息：信仰和靈性生命既要上行，亦需雅善。雅善（Ascent）是上行，上行是雅善。

國人一般務實，基督徒也不例外。因此，華人教會中，願意撥款出版堂史的並不多見。聖三一堂史得以順利出版，有賴於李

琇璘、李育英和李莫冰心三位姊妹慷慨奉獻，以致研究和出版費用一無所缺，本人謹向她們衷心致敬。

出版堂史的構思，在一百一十周年堂慶開始，終能克服種種困難，在一百二十周年堂慶完成出版，我們不能不驚歎主恩奇妙。起初，本人和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牧師和劉紹麟先生接洽，探討聖三一堂史研究和出版計劃的可能性。當時，劉先生已經先為合一堂、英華書院和英華女校撰史，甚獲好評。本人深知中神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挑選研究和出版計劃頗為嚴格，因此，起初只是本着姑且一試的心情提出計劃。誰知，劉先生表示甚感興趣。理由是：基於中神已完成香港教會史研究個案，累積了一些經驗，初步看，與合一堂和公理堂比較，聖三一堂的宣教路向大有不同。他認為，聖三一堂的宣教是多重社會服務、關懷貧乏者、以愛心實踐。因此，中神很快便答允開展我們的研究計劃。計劃進行得頗順利，可惜卻未能於一百一十周年堂慶完成。不久，劉先生便完成資料搜集，迅速寫好文稿，並交付本堂。及後，劉先生來不及洽商出版細節，便離開了中國神學研究院。聖三一堂史的出版計劃便被迫擱置。後來，邢福增博士從建道神學院轉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任教，我們彼此有更多機會接觸。加上聖三一堂一百二十周年堂慶臨近，本人遂向堂慶委員會和牧區重提出版堂史計劃，並獲順利通過。盧龍光牧師和邢博士亦很快答覆，正式接受聖三一堂的委約，進行史料搜集，鎖定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聖三一主日前——出版，並於當日派發。

編撰堂史的艱辛任務，終於完成，劉紹麟先生和邢福增博士自然是功不可沒，謹此向兩位學者致以衷心感謝，深信他們寫作的勞苦必不徒然。鄺保羅大主教、鄺廣傑榮休大主教、蘇以葆主教和本教區徐贊生主教，不吝賜序，叫堂史倍添色彩，本人亦謹代表全堂教友向他們各位，敬表謝忱。

從堂史的研究到出版，雖然艱辛滿途，但困難中仍常見恩典。同樣的經歷，也見諸一百二十年來聖三一堂先聖前賢的信仰見

證。觀乎此，我們便不能不驚歎詩人對上主恩典的描述，是多麼的真實：

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篇 65:11）

深願這些話語，在往後的一百二十年，仍然是我們感謝的心曲，為每一位上主兒女帶來平安與盼望。

陳衍昌牧師

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主任聖品

1

尋根溯源
1842–1890

百多年來，九龍城區經歷了無數變遷。昔日的傳統村落，今天已變為繁華鬧市。區內的地標宋皇臺及九龍寨城，現只餘下兩座公園供遊人思古緬懷。

馬頭圍宋皇臺附近，聖公會聖三一堂巍然聳立，其傳統中國建築風格古意盎然。這座宗教建築是中西文化融合的標誌，於一九三七年落成，距今已有七十多年歷史。然而，聖三一堂的歷史，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末葉。土瓜灣、馬頭圍、九龍城還村煙處處時，聖公會的傳教士與信徒已經在此撒種及默默地為上主作見證。百多年來聖三一堂的故事，篇篇訴說上主的僕人如何在這裏開基立業，頁頁見證九龍城區以至整個香港社會在時代巨輪下的變遷及教會的回應。

一個多世紀以來，聖公會在香港經歷多番變革，從維多利亞教區及華南（港粵）教區，到一九五一年改為港澳教區。一九九八年後，再成立教省，下轄香港島教區、東九龍教區、西九龍教區及澳門傳道地區。這些變革，不僅反映香港聖公會內部體制的

演變，也跟香港（以至中國）社會百多年的變化，關係密切。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第六屆教區議會會議通過以聖三一堂為教區主教座堂，[1] 二零一零年又為聖三一堂成立一百二十周年的大日子，新座堂的身分與悠久的歷史交融，聖三一堂實在任重道遠。

聖三一堂這一百二十年的路是怎樣走過的呢？聖公會何時開始在九龍的事工並播下聖三一堂的種子呢？追本溯源，要了解這段歷史，須從十九世紀中葉聖公會在華宣教的事工談起。

聖公會來華宣教

聖公會在香港的歷史跟香港成為殖民地的歷史關係密切，要認識前者，就要了解十九世紀聖公會在華傳教的背景。

一八零七年，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正式揭開西方近代來華傳教運動的序幕。不過，在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訂前，由於清政府仍然禁教，早期來華傳教士根本無從開展福音工作。最早來華的聖公會傳教士是美國聖公會（American Church Mission）的駱武克（Henry Lockword）及韓森（Francis R. Hanson），他倆在一八三五年到達廣州。因受制於禁教政策，他們轉到波達維亞（Batavia）的華人社群宣教。[2] 英國聖公會傳道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方面，亦於一八三六年一月派出史規爾（E. B. Squire）來華。他因相同困難而轉往新加坡工作，等待進入中國的機會。但他在一八四零年因家人健康關係返英。聖公會在鴉片戰爭結束前再沒有差派傳教士到中國。[3]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開放五個通商口岸並割讓香港島予英國，這是基督教在華宣教的契機。聖公宗（或安立甘宗）方面，英國及美國聖公會先後在香港及上海建立事工，到一九零九年，加拿大聖公會差會（Canadian Church Mission）亦在河南開封開展

事工。三國聖公會的努力，至二十世紀初為聖公會在中國奠下堅實基礎，在全國各地設立教堂、學校及其他社會服務事工，在上海更開辦了全國著名的聖約翰大學。三國聖公會更在一九一二年組成中華聖公會（Chung Hua Sheng Kung Hui, CHSKH），是聖公會在華歷史的新里程。[4]

香港聖公會的開基

香港島在一八四二年成為英國殖民地，史丹頓（Vincent J. Stanton）在一八四三年二月被委任為殖民地牧師（Colonial Chaplain）奉派來港。一八三六年時，史氏仍在劍橋就讀，但已有意到中國宣教。一八三八年冬，他以自由傳教士身分獨自抵澳門，後接任英國領事牧師一職，一八四零年八月，史在早泳時被擄，拘押在廣州，十二月獲釋回澳門。一八四一年六月經紐約回國。[5] 史丹頓作首任殖民地牧師的主要工作，是在香港籌建教區及主教座堂。一八四九年，聖約翰座堂（St. John's Cathedral）及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相繼落成，維多利亞教區（Diocese of Victoria）宣告成立，主教府設在香港，施美夫（George Smith）任首任教區主教。[6] 當時的維多利亞教區範圍廣大，包括整個中國及日本。[7]

早期維多利亞教區工作的重點，是部署在中國內地的宣教工作，至一八五零年，已在上海、寧波及福州等地先後建立傳教站（station）。香港的聖保羅書院更肩負為內地訓練華人傳道的任務。[8] 此外，教區亦要照顧在港的英國人及其他歐洲人士的宗教需要。聖約翰座堂自成立伊始，便成為不少寓港歐籍人士心靈棲息之所。[9] 可以說，殖民地的華人宣教工作，並未提上教區的議事日程。[10]

一八四四至四六年，施美夫尚未履任主教聖職，但奉差會之命到中國考察，他在報告中認為香港不宜作宣教工場。[11] 至一八六二年二月，施美夫給總部的信卻一改昔日對香港的負面評價。

他認為香港「快將成為中國的重要部分」，本地人口日益，特別是國內局勢不穩定，更多富裕人口勢將來港。他甚至相信，香港將成為宣教工作重鎮。[12] 由於施美夫確認香港的價值，差會在一八六二年便派司徒靈芝（Thomas Stringer）來港，成為聖公會傳道會首位駐港傳教士，聖公會在港的華人福音工作於是年開始。[13]

不過，司徒靈芝在一八六五年卻辭任，轉往廣州英領事館任牧師（Government Chaplaincy），由華連（Charles F. Warren）接掌他在港的工作。華氏的最大貢獻，就是籌建聖公會第一座華人教會——聖士提反堂（1866 年落成）。會吏羅深源是這工作的重要協助，[14] 他早年因郭實獵（Karl Gützlaff）福漢會（Chinese Union）關係皈信，並任傳道。一八五零年受聘於聖保羅書院任本地傳道。[15] 一八六三年，施美夫按立他為本地首位華人聖品。[16]

聖公會在香港宣教的新路線與方向，是建立聖士提反堂為里程碑。其後，皮柏（John Piper）、赫真信（Arthur B. Hutchinson）、戴衛士（E. Davys）等相繼奉派在港主理教務。這時，聖公會在香港的事工仍以港島為中心，除聖士提反堂外，後來亦開展學校、孤兒院的工作。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在一八八八年三月成立維多利亞女校（Victoria Home and Orphanage）。[17]

九龍半島的開發

十九世紀中葉以降，香港殖民地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先是中國按一八六零年北京條約把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割讓給英國。[18] 一八九八年，中英又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界限街以北至大鵬灣到深圳灣及多個大小島嶼租借予英國，成為香港殖民地的新界（New Territories）。

早在割讓九龍半島以前，浸信會及倫敦會傳教士已從香港島渡海到對岸九龍地區工作，但這些事工都不持久。九龍半島歸英國管治後，英國軍部把部分地方闢作軍事禁區。[19] 早期九龍的發

展集中在半島的西南面，即紅磡、尖沙咀、油麻地、旺角等地區，至於土瓜灣、馬頭圍、九龍城等地區，則仍只是農村。

一八九八年英國租借新界後，英政府開始在九龍半島推動較大規模的發展。繼紅磡、尖沙咀、油麻地等地外，二十世紀以降，九龍半島東面的九龍城相繼開發，城市建設與道路工程陸續在區內展開。二十年代後期，因機場的興建及擴展，自然地貌多番轉變。當年馬頭涌、馬頭圍村、宋山等地的環境，我們今天就只能從古舊的地圖來認識。[20]

十九世紀聖三一堂座落在山、水、田園、村落及古蹟之中，四周盡是鄉村景緻。山，是指九龍城、馬頭圍一帶的幾座小山，包括宋山、白鶴山及聖三一堂舊址所在的維多利亞山；水，是指當時仍流水淙淙的馬頭涌。馬頭涌原是從山裏伸展到海邊的小河（「涌」是指河流入海一段鹹淡水交匯的水道。）馬頭涌相當於現時巴富街一帶的位置，在當時的馬頭圍村與馬頭涌村之間流過，再經宋山入海。今天，河道已加鋪上蓋成為地下水道。田園、村落，是指馬頭圍、衙前圍等村落。古蹟，是指當時仍屹立海旁的宋山。現時在宋皇臺公園的宋皇臺石，當時是在宋山上的。宋山突出海岸，位置約在現時的馬頭角道、新山道、炮仗街等幾條街。因為興建機場及道路等工程，這座小山被夷平，宋皇臺石亦於二次大戰之後被移放在宋皇臺公園。

步入二十世紀，開發啟德濱是九龍城區發展成都市的序幕，大大改變了該區的面貌。[21] 一九一二年，何啟向香港政府提出在九龍灣填海興建高級華人住宅區的構想，但計劃至何啟去世後兩年（即 1916 年），才由華商組成的商業機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Kai Tack Land Investment Company Ltd.）推動上馬。一九二零年，首期填海工程完成，隨即興建住宅，當時稱為「啟德濱」。開發啟德濱為九龍城區帶來一番新景象，改變了九龍城區的人口結構。啟德濱呈三角形，有四條橫貫東西的道路，由海濱向北相繼有啟德路、啟仁路、長安街和啟義路；由西至東縱連南北的街道

則有一德路、二德路及三德路。區內有不少高尚住宅，還有一些社區設施。一九二六年，華商曹善允更在啟德道興辦民生書院。至三十年代，啟德濱已發展成一個小社區。

如果說世紀之交的馬頭圍是傳統農村社會，那麼興建啟德濱便把一批中產市民引入區內。聖三一堂早年的會友，除了一些低收入人士外，還有不少是城市的中產階級，這與啟德濱的開發關係密切。

啟德營業有限公司的發展並不理想，完成第一期填海計劃後，工程於一九二七年被政府接管，其後新填的土地亦被用作興建機場之用，在九龍灣興建華人住宅區的構想就此告終。啟德濱的壽命只有二十多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淪陷後，日軍在一九四二年清拆啟德濱以擴建啟德機場，從此「啟德濱」便在香港地圖上消失，成為啟德機場的一部分。

從九龍半島的發展，到九龍城區的變遷，聖三一堂所處的環境不斷改變。聖三一堂一方面孕育於鄉村社群，又與新建成的中產階級社區毗鄰。隨着土地規劃改變，聖三一堂經歷多次遷堂重建；區內人口及生活模式的改變，也促使聖三一堂不斷調校自身的發展方向。

九龍支站

聖公會在一八六零年代正式開展在港華人事工後，香港傳道區的重心一直集中在香港島。一八八零年代的聖公會傳道會年報，正式提及在廣東內陸建立傳教支站（out-station）。當時駐港的傳教士龔地（John Grundy）積極部署在廣東省內的傳教計劃。他由本地助手陪同，多次在內陸巡迴佈道，分別到九龍、香山、江門、鶴山、肇慶府等地。[22]

一八八二年六月，龔地在《聖公會傳道通訊》(*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匯報關於九龍支站的情況：

> 我抱歉地述及這支站的傳道員，因其好爭吵的性格及工作上的無能，已被我開除。我曾向他訓示卻沒有明顯的果效。他在同道中間種下不和，教會整體的情況令人可悲。我聘用了曾在 Shek Tan 任傳道員的梁亞添（Leung a-Tim 的音譯）接任。我滿懷感恩地述說梁已成功地邀請同道，現在他們每主日也有崇拜，人數為十二人；平日傍晚也有聚會，有空閒的便來參加。我在數周前探訪該處，得到很好的款待。我更有幸能為一位華人官吏（centurion）施洗，他誠懇又認真，兼且領會到像他這樣崇高地位的基督徒的責任。他具備優良的文化，我毫不懷疑其基督徒的影響力。他受洗後還向我們要了一部小的聖經，有空時閱讀。願上主的聖靈教導他，讓他向其下屬顯出永恆的光，並成為中介，引領更多人進入耶穌的羊欄。[23]

這十多位九龍地區的信徒，是龔地在內陸巡迴佈道時所結的果子。剛發展的九龍支站不僅仰賴本地傳道員的帶領，根基也不甚穩固。龔氏提及的「官吏」相信是指清政府派駐在九龍寨城內的九龍巡檢司衙門內的官員。[24] 龔地在年報中再次提及他，指他是「具影響及文化的人」。[25] 可以想像，這位官員的皈信，確為困難重重的傳教工作帶來一絲曙光。

廣東省內陸工作徐徐開展，差會於是在一八八二年正式闢設「華南傳道區」(South China Mission)，以管轄廣東及福建兩省。香港的傳教事工屬於廣東省的範圍。同年，龔地奉調至廣州，由何思悌（John B. Ost）接任香港的工作。[26]

當時，鄺日修是何思悌在港的得力助手，主要得力於鄺日修。鄺在一八八三年七月受封會吏，再於一八八四年三月晉封牧職，接替年老的羅深源，負責聖士提反堂會務，是聖公會在港第二位華人聖品。[27] 由於九龍已設支站，何氏及鄺氏便定期渡海，探訪對岸信徒。一八八二年，何思悌在聖士提反堂為十三位信徒主持

洗禮，其中三人便來自九龍，[28] 顯示九龍支站的工作已有初熟之果。

在一八八四年四月一封信中，何氏記述他與鄺日修及一位馬先生參與九龍事工的情況。從信的內容可見，鄺日修在九龍已結識一些華人信徒，不少人也很樂意參與聚會，並有華人信徒受洗。現節錄該信部分內容，以了解當時傳教士探訪九龍的情況：

> 在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三，我在鄺日修陪同下前往九龍。旅程只需一小時，到達的時候還是正午不久。見過一群在學堂習聖經，為數約五十五人的學生後，鄺日修、馬先生（Ma Shu Shang 的音譯）等和我一起到附近的基督徒家中，又與他們未信的親屬有很好的交談。不少人也很樂意接受邀請參與我們的聚會，看到他們準時在教堂出現，真使我們高興。幾小時的探訪、傾談之後，我們回到教堂吃晚飯。晚飯由馬先生預備。我們說好七時正有聚會，但六時三十分已經有人來到了，到六時四十五分因有很多人到達，我們想是時候開始了。我先簡單的向他們介紹上帝的憐憫、救贖以及基督耶穌是誰。聽眾非常專心，看來也很感興趣。之後鄺日修便開始他非常有感染力的講道「上帝對我等罪人的恩慈」。他講了個多小時，看來聽眾對他的講道印像很深。房子坐得滿滿的，不少未能進場的人要站在門外的街上。

聚會在晚上九時完結，其後何思悌和鄺日修與當地的信徒談道，一些信徒還跟他們分享近來的領受，他們談至十時才就寢。到第二天，他們再討論在附近地區佈道的策略後，何氏等人才啟程回港。[29]

此後，聖公會差會文件中漸多關於九龍事工的報告。例如在一八八七年三月的一封書信中，何思悌提到已在九龍租賃房子聚會，並以兩個房間作男女學校，分別有四十五位男童及二十位女童。他對此工作寄以厚望，相信不久便要另覓更大的空間。[30] 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間，聖公會先後在土瓜灣及九龍城興辦女子

日校。[31] 可以說，到一八八零年代後期，傳教士及華籍同工的足跡已遍及土瓜灣和九龍城一帶。據差會年報記載，龔地在一八九二年短暫調回香港不久，即在七月於九龍為一對夫婦施洗。[32] 這些都是播在九龍的種子，等待着澆灌成長。

注：

1 〈東九龍教區主教宣告本堂為教區座堂公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2009 年 10 月 25 日。

2 D. MacGillivra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1907), 297.

3 早期聖公會對華宣教的探索，參潘乃昭：〈兩位被忘掉的傳教士——史丹頓與蒙克夫〉，《教聲》1429（2003 年 7 月 27 日）：2。當時不少西方來華的傳教士都以南洋各個殖民地為據點，等待進入中國的機會。參 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1996).

4 G. F. S. Gray, *Anglicans in China: A History of the Zhonghua Shenggong Hui (Chung Hua Sheng Kung Huei)*, with editorial revision by Martha Lund Smalley (Gwynedd, PA: Episcopal China Mission History Project, 1996).

5 潘乃昭：〈兩位被忘掉的傳教士——史丹頓與蒙克夫〉，《教聲》1430（2003 年 8 月 3 日）：6。

6 George B. Endacott and Dorothy E. She,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A Hundred Years of Church History, 1849–1949* (Hong Kong: Standard Press, 1949), 9–14.

7 日後教區的範圍經過多次重組：一八七二年，以北緯二十八度劃分成維多利亞教區及華北教區；一八八三年，日本教區獨立；一九零六年，福建教區獨立；一九零九年，廣西—湖南教區獨立；一九四七年，雲貴教區獨立，維多利亞教區的範圍（包括香港、廣東及廣西南部）即中華聖公會的華南教區（又稱港粵教區）。鍾仁立：《中華聖公會華南教區百年史略》（香港：中華聖公會會督府，1951），5–8。

8 Endacott and She,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20.

9 Doreen King, *St. John's Cathedral Hong Kong* (Hong Kong: St. John's Cathedral, 1987).

10 邢福增：〈一九四九年前香港基督教的發展——宏觀歷史的考察（1842–1949）〉，氏著：《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4），22–24。

11 施美夫指香港有五個嚴重的缺點：一、氣候；二、人口的道德水平；三；方言混雜；四、居民對西方宗教的敵視；五、殖民政府歧視華人的政策。George Smith, *Report on Hong Kong, More Especially in Reference to Missionary Facilities There and in the Contiguous Parts of Canton Province*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House, 1845), 11–17. George Smith,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and the*

Islands of Hong Kong and Chusan in Behalf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Years 1844, 1845, 1846 (London: Seeley, Burnside & Seeley, 1847), 507–14.

12 "Bishop of Victoria to V. Henn," 11 February 1862, Hong Kong, 218, CMS Archive, C CH M3, Reel 213.

13 聖公會傳教士赫真信（A. B. Hutchinson）在一項調查中便以一八六二年為聖公會香港華人福音工作的肇始。A. B. Hutchinson, "Statistics of the Hong Kong Protestant Mission: Historical Sketch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Hong Kong, to January 1875," *Chinese Recorder* 8, no. 1 (January–February 1877): 35.

14 鍾仁立：《中華聖公會華南教區百年史略》，7。另 Hutchinson, "Statistics of the Hong Kong Protestant Mission," 36.

15 潘乃昭對羅深源作出詳細的考證，參氏著：〈羅深源的早年培育〉，《教聲》1425（2003年6月29日）：4。

16 鍾仁立：《中華聖公會華南教區百年史略》，8–9。

17 *Proceeding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889–90*, 196. 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差會首位女傳教士 A. E. Hamper 來港，當時已有二十八名女生。*Proceeding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888–89*, 185–186.

18 九龍半島的情況，參 James Hayes, "Old British Kowloon," *Journal of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 (1966): 120–37.

19 軍事禁區範圍包括今日彌敦道以西的油麻地至九龍公園一帶、今日紅磡黄埔花園一帶及尖沙咀東南岸。另今日京士柏公園至九龍木球會一帶也是當年軍警的練靶場。參龍炳頤：〈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王庚武編：《香港史新編》上册（香港：三聯書店，1997），225。

20 以上關於九龍半島發展的資料，見 T. R. Tregear and L. Berry, *The Development of Hongkong and Kowloon as Told in Map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9).

21 本文關於啟德濱發展的部分，參宋軒麟：〈九龍城地標之二——啟德濱與啟德機場的興建〉，趙雨樂、鍾寶賢編：《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 ——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143–82。

22 *Proceeding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881–82*, 169–70.

23 "From the Rev. J. Grundy, Hong Kong,"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33, no. 6 (June 1882): 370.

24 九龍寨城興建於一八四七年，內建有衙署及兵房，清廷駐兵於此，目的是為了牽制英人。編委會編：《九龍城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24。

25 *Proceeding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881–82*, 169–70.

26 何思悌於一八八一年十月抵港，並於一八八二年一月正式掌管香港傳道站。"From the Rev. J. B. Ost, Hong Kong,"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34, no. 6 (June 1883): 358.

27 *Proceeding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883–84*, 183.

28 "From the Rev. J. B. Ost, Hong Kong," 359.

29 有關事件詳見 No. 120, 7 April 1884, J. B. Ost, CMS Archive.

30 No. 50, 29 March 1887, J. B. Ost, CMS Archive.

31 Fletcher, "Day Schools in and around Hongkong for 1913," n.d., CMS Archive.

32 *Proceeding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892–93*, 179.



史丹頓牧師（Vincent J. Stanton）



聖約翰座堂（Ngckmax攝於2008年）



位於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的主教府



施美夫主教（George Smith）



聖保羅書院舊址

2

從宋皇臺到維多利亞山

1890–1904

宋山下：開基與建堂

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聖公會傳道會開始在九龍半島的土瓜灣、九龍城一帶耕耘。傳教士及華籍同工的努力，為福音工作撒下美好的種子。一八九零年左右，他們在九龍城、馬頭圍區已建立了固定的信徒群體。由於事工漸漸開展，聖公會第一座在九龍地區的聖堂終於在一八九八年正式啟用。

正如上章指出，聖公會早於一八八零年代已成立九龍支站，由常駐港島的差會傳教士及鄺日修牧師兼顧，定期渡海協助事工。一八九五年，差會年報指已有傳道員（catechists）駐在九龍城支站。[1] 這位傳道員，相信便是顧啟德。據聖三一堂的歷史文獻，顧啟德是個退休教員，世居鶴佬村，於一八九零年七月由鄺日修為其全家施洗，[2] 是聖公會早年在九龍的初熟之果。顧氏十分熱心，領洗後即投入傳教工作，並以其家作佈道所。[3] 顧啟德夫人淩

氏每周又開辦婦女聚會。[4] 現時聖三一堂以一八九零年為建堂年份，便是以顧氏的工作為起點。

由於差會傳教士及鄺日修的工作重心仍在港島，顧氏夫婦對九龍支站的發展，實有重大貢獻。[5] 一八九七年，支站事工已漸上軌道，九龍城支站已有十九名領聖餐者（communicants），並有六十五名學生在兩所學校。[6]

傳教工作日見開展，差會決定在九龍半島籌建聖堂。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傳教士班為蘭（William Banister）以「聖公會傳道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名義正式向政府申請在九龍城建堂。工務局在一八九八年二月覆函，表示港督已同意有關申請，信函又列出政府租借土地的四個條件：

一、 具體的租用土地範圍由負責的官員劃定；

二、 聖公會差會需要在土地四周豎立圍欄；

三、 須在簽署租借條款之後的一年內興建好教堂（mission chapel）、宣教師宿舍及有關的建築；

四、 須承諾不會將土地作其他用途，否則將會收回土地。[7]

當時，不論政府或差會的文獻提及這所聖堂時，都只稱其為聖公會傳道會的九龍教堂，仍未見「聖三一堂」之名。至於一八九八年建成的聖堂的具體位置在哪裏呢？政府檔案中存有一幅手繪草圖，是一九零三年教會與政府商討搬遷新堂時的記錄，圖中便有一八九八年聖堂的位置，屬九龍內地段（KIL）七六八號，位於維多利亞山之下，古廟以東的地方，即當時仍在興建中的馬頭涌道旁。[8] 參照九龍城區地圖，估計第一所聖堂約在現時毗鄰聖三一堂足球場對開的一段馬頭涌道之上（位處昔日宋山附近）。

建堂工程迅即展開，新堂於一八九八年八月落成，首次主日崇拜由顧啟德主持。[9] 傳教士、華人宣教師及信徒經多年的耕耘後，至一八九八年已有初步成果，並正式擁有自己的聖堂。一位女傳教士在給母會的書信中，分享對新堂落成的感受：

> ……我們真希望能再有多一位傳教士與范姑娘一起到九龍城這裏來！在這裏，我們建成了內陸的第一所教堂，並已祝聖……我們感到是時候由基督贏得這城了！上周一位曾被鬼附的婦女在這裏受洗，她信主後救主賜給她莫大的平安。在八月〔注：即 1898 年 8 月〕，有六十人在這新堂聚會。在主日的時候，由一位華人宣教師主持崇拜。……他們多希望有一位女傳教士能與他們一起，教導他們的婦女及兒童啊！范姑娘的工作得到很大的祝福，她很受這裏的婦女愛戴。[10]

一八九九年九月，政府憲報把聖公會九龍聖堂列作可舉行婚禮的公共崇拜場地（Place of Public Worship）。[11] 十二月，九名信徒在九龍舉行洗禮，一九零零年三月，差會更派 Hipwell 夫婦駐守該堂。[12] 同時，女傳教士范姑娘（Ada M. Finney）[13] 每逢周五至周二，也會到九龍城及附近村落探訪及在學校任教，事工還伸展到土瓜灣、鶴園及紅磡等地方。[14] 一九零一年九月，班為蘭在九龍城為七位信徒施洗。[15]

這所聖堂由班為蘭及鄺日修主理，能容納八十至一百人。教會的發展教人鼓舞，平均主日崇拜出席人數自建堂起平穩增長。由一八九九年政府出版的《香港藍皮書》（*Hong Kong Blue Book*）紀錄的崇拜出席者四十人，增加至一九零零年的一百人，再至一九零二年的一百二十人。[16]

踏入二十世紀初，聖公會在九龍半島共有三個支站，分別是九龍城、紅磡及油麻地，同時附設學校。毋庸置疑，九龍城支站的發展備受注視，因其擁有可容納一百人聚會的聖堂，並且有七十名受洗的信徒，差會在年報中也肯定其表現。此外，聖公會亦獲政府批出土地（KIL 1116），將原設於港島西區的維多利亞女校（Victoria Home and Orphanage）遷至聖堂附近的小山（維多利亞山）上。與此同時，九龍城支站又成為差會部署到新界宣教的前哨。當時差會已鎖定屏山、龍躍頭及大圍為宣教目標。[17] 顧師奶

也曾聯同女傳教士到新界佈道。[18] 可以說，一個以九龍城聖堂為中心的牧區及宣教基地，已具雛型。

邁出自治與自養的第一步

剛跨過二十世紀的門檻，這所位於九龍的教會便面對各種興革與挑戰。首先，在外在環境方面，香港聖公會在二十世紀開始氣象一新。一九零一年九月，華南教區半年一度的例會在香港聖保羅書院舉行，會議通過關於培植香港華人聖公會的議決，在差會外成立香港教區議會（The Chinese Anglican Church Body），下轄本地華人教會。是項改革的目的，是要為本地教會奠下自養及自治的基礎，並鼓勵華人信徒在財政上支持及承擔華人牧者的薪金。[19] 有關架構如下：

香港教區議會（The Church Body）：由維多利亞主教任主席，另設副主席（由主教委任）。其他成員包括：所有本地華人聖品人員（或署任的外籍傳教士）和由牧區議會（Vestry）選派的代表。若有關堂會的物業權屬差會，或附設有差會支持的教育及其他事工，差會祕書亦當然出席。教區議會設「教會經常基金」（General Church Fund），由各堂捐獻，用於支持華人教牧同工的薪金。[20]

教區議會下轄的本地教會須成立牧區議會（Vestry），主席為主任或署任牧師，另由全體男性會友選出最少三名男性代表。若有關堂會的物業權屬差會，差會祕書亦當然出席。[21]

一九零二年，香港聖公會教區議會法例（Chinese Anglican Church Body Incorporation Bill）正式呈交定例局審議，律政司在闡釋有關法例時，強調本港華人聖公會正為自養及自治而努力，法案將確認其法定地位。[22] 七月，法案獲定例局通過，[23] 香港的華人聖公會正式具法權人地位，可以擁有自己的業物。

早在法例通過前，聖公會於一九零一年已為改革部署，以九龍三個支站（九龍城、紅磡及油麻地）為中心，組成「教會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有四名成員。[24] 正如前述，在三個支站中，九龍城聖堂的發展最快，可說是三個支站的核心。一九零二年一月，教區議會召開會議，通過聖士提反堂及九龍聚會成立委員會，選派代表出席教區議會。同時，兩堂分別捐助九百一十四元及一百元予教區的「常費基金」。會議又通過向主教推薦顧啟德任平信徒宣教師（Lay Reader）。[25] 三月，顧啟德與其他三位華人正式在聖士提反堂接受主教任命。[26] 香港教區議會是本地聖公會歷史的新頁，而九龍城聖堂在新體制下，亦成為實現華人自養及自治的里程碑。

牧區議會繼教區議會成立後正式組成。此時，最迫切的需要，自然是選立牧區主任牧師。一直以來，鄺日修牧師須兼任香港兩所教會（聖士提反及九龍聖堂）的堂主任。一九零二年間，鄺牧師正式調離聖士提反堂，遷居九龍半島，全時間投入九龍聖堂的事奉。[27] 聖士提反堂的主任牧師，到一九零四年六月便由霍靜山接任。[28]

鄺日修牧師調任，意味着教區人手可以重新調配。早期在九龍城耕耘的先賢——顧啟德及范姑娘——也獲分配新的工作。顧啟德受委任為平信徒宣教師後，即調至油麻地支堂，協助聖工。[29] 范姑娘於一九零三年三月調往北海，未幾卻因身體抱恙回港治療，五個月後在香港山頂醫院病逝。[30] 范姑娘於一八九三年來華，派駐香港，一八九八至一九零一年間回國養病，香港是她最主要的工場。聖公會傳道會的通訊報導其死訊時，形容她是一位「可愛開朗，無論在香港及北海均有很多很多華人朋友……她用中文道出臨終遺言，足見她的心如何為基督的緣故而傾向中國人。」[31]

維多利亞山：第二次建堂

鄺日修牧師全力投入九龍城聖堂的工作，沒想到卻遇上重建聖堂的挑戰。原聖堂位於界限街以南，在一八九八年租借新界前，香港政府仍沒有計劃發展這區。接管新界後，地政監督馬上籌建從九龍城至紅磡鶴園的幹道馬頭圍及馬頭涌道，以及通往油麻地水井口的亞皆老街。[32] 一八九八年建成的聖堂就座落在這條將要興建的馬頭涌道上，面對道路規劃，聖堂遷拆的命運已成定局。

由於聖堂的業權屬聖公會差會，故從一九零一年開始，政府與會吏長（Archdeacon）班為蘭便就遷拆與重建問題展開商談。最後政府提供二千五百元作遷拆賠償。同時，原聖堂佔地只有六千二百七十七平方呎，政府額外增撥五千平方呎。抑有進者，班氏向政府反映將有更多人口（包括基督徒）會遷至九龍城，並預見該區的基督徒群體將日益增加，故向政府申請額外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二平方呎的土地給教會使用。有關請求亦獲政府批准。[33]

新聖堂位處宋王臺西北不遠的一座小山丘上，屬九龍內地段（KIL）一一五六號，山上早前已獲政府批地作維多利亞女校新址（關於維多利亞女校的事蹟，詳見第四章）。據悉，這小山上原有一座晉國公主墓塚，以紀念宋帝昺的妹妹。墓塚另建一座大碑，隨着聖堂的重建而湮沒。辛亥革命後移居九龍城的前清遺臣陳伯陶曾著有《宋臺秋唱》，其中曰：「十年前碑址尚存，近因牧師築教堂於上，遺蹟湮沒矣」。[34]

遷址與興建新堂的工作由鄺日修主理，又得任作君及鍾茂豐兩位協助。[35] 蕭壽（蕭英麟的父親）為當時的司庫，新堂落成後，由任作君代其司庫之職。[36] 傳教士描述的鄺日修是一位非常能幹的牧者，鄺日修估計，為數不少的退休基督徒及未信者將遷址至該區居住；此外，當時鄺氏又協助一批從澳洲柏斯（Perth）回港定居的華人基督徒在區內覓地。隨着區內人口增長，一個基督徒

社區亦將建立。因此，新建教堂須有更大的空間。香港教區議會最初計劃興建一座足以容納四百人的教堂，但最後卻修訂為四百五十人。[37]

建堂所需費用為六千至七千元，班為蘭為此向聖公會差會求助，英國的差會總部決定從 William Charles Jones Fund 中撥出一千五百元資助。[38] 另加政府賠償的二千五百元，合共得四千元經費。餘額由教區議會特別成立的「九龍教會基金」(Kowloon Church Fund) [39] 及教友募捐籌措。[40] 聖堂是教區議會首座擁有業權的教產。

舊堂於一九零三年拆卸，崇拜乃借用新落成的維多利亞女校舉行。建堂工程的進度十分理想，一九零三年底，新堂即將竣工。[41] 新堂正式命名為「聖三一堂」，並於一九零四年四月五日舉行獻堂禮，由維多利亞教區主教霍約瑟 (Bishop Joseph C. Hoare) 主禮。[42] 傳教士文明理 (G. A. Bunbury) 記述當日獻堂禮的盛況：

> 獻堂禮在四月五日舉行，全用中文，以詩歌〈教會獨一的根基〉(The Church's One Foundation) 開始，英籍與華人聖品人員隨着歌聲從西門列隊進入，唱詩後由鄺日修牧師及會眾以啟應方式讀出詩篇第 26 篇。主教講道的經文記載在出埃及記 29 章 43 節，「與神相遇的會幕」，主教強調這將是全能的上帝與祂的敬拜者相遇的地方。講道之後是祈禱。[43]

從政府所存的舊地圖所見，聖三一堂所在的小山丘，就在現時聖三一堂旁的足球場上。聖三一堂與維多利亞女校為鄰，兩所建築在當時可說是「山上之城」。當時九龍城、馬頭圍附近全是農田，中間錯錯落落聳立着幾間村屋，聖三一堂及維多利亞女校盤踞小山丘上，聖堂的十字架即使從遠處，仍可眺望。這座小山至二次大戰時還沒有被夷平，還有老教友憶述兒時曾把小山坡當作滑梯的頑皮事。[44] 戰後，政府擴建啟德機場，為免影響飛機升降，才把這座小山削平，改建成今天的足球場。

為誌念范姑娘對九龍城宣教工作的貢獻，一九零六年范姑娘在蘭開夏郡（Lancashire）的兄弟所屬的教堂送贈一個白色大理石的洗禮盤給聖三一堂，由班為蘭主持奉獻禮。[45] 可惜這個洗禮盤後來被賊人盜去。[46] 新堂啟用時尚未有椅子，只有從各方找來臨時座椅替代。[47] 初期聖堂內沒有電風扇，只有幾把用人手拉動的大扇。[48] 有會友憶述「山上」教堂的外觀：

> 它的顯著特點，是整個堂都以整齊美觀的石塊砌成，上部覆以瓦片。也許是石砌的〔緣〕故，罅隙中鳥巢甚多，鳥語啁啾，喧鬧不休，往往將講道與禱告之寧靜氣氛打破，給人印象十分深刻。堂的方向與現時相反，朝西，通過一個小鐘樓……另有一條山徑落到法國醫院旁邊「上帝古廟」前。山下阡陌相連，水田處處，或是散佈着碎石的海灘，風景甚美。
>
> 堂的內部亦與現時相似，至聖所旁為牧師更衣室。其後成立了詩班，座位亦與現在相同。所不同者，是採用男女分坐這一古老的規〔矩〕，男教友坐左邊，女教友坐右邊……[49]

年長會友慣常稱呼這階段的聖三一堂為「山上時期的聖三一堂」，「山上的教堂」由一九零四年開始啟用，至一九三七年現在的堂址建成為止，正好是聖三一堂鞏固及發展的階段。

聖三一堂的奠基者：鄺日修牧師[50]

毋庸置疑，鄺日修牧師是聖三一堂的重要奠基人及開拓者。讓我們在此重溫這位教會先賢的生平事蹟。

鄺日修（Matthew A-Jet）祖籍台山縣三夾墟石蓮塘村，生於一八四零年九月三日。當時，許多台山青年人都會到海外謀生，鄺日修也不例外。他於早年遠赴澳洲礦場工作，以他自己的說法是「以求金寶」。一八六八年間在悉梨信主，後任傳道。一八七四年鄺日修回國，曾隨同聖公會傳教士於增城、北海等地巡迴佈道。鄺日修對中國醫學頗有心得，巡迴佈道之時又贈醫施藥。後來鄺

氏到香港後，向當時聖公會的包爾騰主教（John S. Burdon）陳述心志，乃進入聖保羅書院神道班學道。當時香港倫敦會因缺乏華人傳道，適逢鄺氏畢業，乃向聖公會商借聘請他為宣教師。兩位主理倫敦會在港事務的傳教士歐德理（E. J. Eitel）及湛約翰（John Chalmers）對鄺日修評價甚高。[51]

在一封寫給聖公會差會總部的書信中，鄺日修介紹他到澳洲工作、信主、宣教及回華的始末，這篇自述很有歷史價值，茲將全文引述如下：

書奉

監督暨教會諸董事大人 臺座 敬啟者 僕 深荷

青垂感

恩靡既 僕 本當早以修書馳

候緣以俗冗未遑　故遲之於今　懶慢之愆　伏乞

原宥 僕 久矣雅慕

瞻韓　親聆

教益　奈隔天涯　難以如願　惟以

主道相知相親

聖神相契耳　遙想

列位大人賢勞

主事　諒獲多福　固所願也　竊 僕 生長中華陰翳之地　行年十九

遠遊澳大利以求金寶　始習英語　無何

基督之光 射入死所 自此出死入生 棄闊門而就窄路 立志學道

自食己力　以

基督之光照乎人　如是者數年　後為華教友薦舉　本

教會又恩助口糧　任為傳道之職　濫歷四年有半　從此旋

華到港　復蒙華教友賜顧　延以傳道　約有九年餘　其

後蒙

包監督恩授為教之職　派在
聖士提反堂　至今有十月　現今本堂男婦入教者　大
小百有三十同人　傳道者日夜輪值講　經每禮拜日夜
計來聽道者　約有二千餘人　但聽道者多　入教
者寡　以目前而論　播種雖有機會　然而工多穡少
宜求穡
主遣工力穡焉　肅此布臆　敬請
列位大人道安　並問
眾教友均好

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三月初二 教末鄺日修 宇稟[52]

鄺日修在倫敦會任宣教師七年後，於一八八三年加入聖公會任宣教師。一八八三年七月八日，他受按立為會吏，是聖公會在港按立的第二位華人聖品人員。一八八四年三月九日，他再受按立為牧師，接替當時已經年邁的羅深源，主理聖士提反堂的事工。鄺日修於一九零二年遷居九龍後，積極參與教會事工，大力推動九龍城及附近地區的宣教及慈惠事業。聖三一堂由顧啟德、范姑娘等人開基，但早期教會根基的建立，鄺日修牧師實功不可沒。在聖三一堂事奉時，鄺日修牧師還開辦了廣蔭院。

除致力於教會工作，鄺日修還有其他專長，一位教會史家這樣形容鄺日修：

> 鄺公辦事精明能幹，而國學尤深，曾於工作之際，著作《真道明辨》一書，內容以中國歷史為背景，力斥迷信之謬……鄺公長文學，尤擅丹青，所畫圖畫，以聖經故事設題，刻畫盡致，形容肖妙，可為提倡基督化圖畫之祖……[53]

鄺牧師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日安息，享年八十一歲。當其彌留之時，囑咐其夫人將僅有的遺產——值一千七百多元的一項

物業——捐予教會。其妻在世之日，該屋之租息仍由其妻取用，待她也離世後便全歸教會。他的遺願是：

> 弟鄺日修年老多病，倘一旦蒙召，懇請兄姊勿以花圈相贈；惟中國賻儀極為合宜，一可助葬，二可濟貧。弟逝世時有贈賻儀者，盡作濟貧之用，因弟葬費早已備足，無所缺欠。[54]

鄺牧師妻林氏，育一子一女。鄺牧師及師母合墓於九龍基督教墳場。

一九六五年，聖公會在九龍黃大仙開辦小學，特命名「日修小學」，以紀念鄺日修牧師對教會的貢獻。一九八七年，香港政府與中國政府達成清拆寨城的協議，並於原址興建公園，公園將盡量保留寨城一些原有的建築物及特色。清拆工程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完成。整個公園佔地三萬一千平方米，內有一座「鄺日修峰」，前有紀念牌曰：

> 自一八九零年起，聖公會聖三一的鄺日修牧師陸續在城寨內辦學、贈醫施藥、設立「窮人院」(Alms House；即日後的「廣蔭老人院」)。鄺牧師並節衣縮食照顧老少貧民的食宿康樂需要。鄺牧師為居民鞠躬盡粹至一九二一年離世。

鄺日修牧師安息已近九十年，但他對貧窮人的關懷，以及對教會的忠心與委身，顯彰了基督崇高的德行，他對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香港聖公會的開拓與發展，更是功不可沒。遺憾的是，我們無法找到他著述的《真道明辨》及其他創作。即或如此，其生命所樹立的種種典範佳模，足供我們自省學習。

注：

1 *Proceeding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894–95*, 250.

2 「歷史圖片：保留迄今之洗禮名冊」，《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1890–1965》(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65)，25。

[3] 鄭家民：〈聖三一堂七十五年〉，《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1890–1965》，32。

[4] "Holy Trinity Church: Laying of Corner Stone By Bishop of Cant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3 November 1936.

[5] 差會年報也曾提及顧啟德一次拆除「偶像」的情況，稱他為顧先生（Ku Sin Shang），*Proceeding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901–02*, 349.

[6] *Proceeding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896–97*, 325.

[7]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to Rev. W. Banister," 2 February 1898, HKRS 265–11b–1792 (1), HKPRO.

[8] "Apply of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Further Grant of Land," CO 129/136, 435.

[9] "Holy Trinity Church: Laying of Corner Stone by Bishop of Canton." 這篇報導只提及新堂首次崇拜由顧主持，沒有提及建成年份。另一篇一九零四年的教會文獻，指這新堂於一八九八年建立。參"Dedication of Holy Trinity Church, Kowloon," *From Month to Month* 48 (May 1904): 2.

[10] No. 222, "Mrs Hipwell (Hong Kong) to Baring Gould," 30 May 1899, Original Papers, CMS Archive.

[11] "Government Notification No. 523,"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30 Sept 1899, 1. 根據一八七五年通過的婚姻條例（Marriage Ordinance）第六條及二十一條，規定公共崇拜場地必須獲政府批准，才可舉行婚禮。一八九零年的憲報，刊登了十所獲批的基督教及天主教堂的名字，基督教方面是：聖約翰座堂、聖伯多祿堂、巴色差會聖堂、聖保羅書院聖堂、道濟會堂、惠斯禮聖堂、聖士提反堂。"Marriage Ordinance of 1875," "Government Notification No. 422,"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1 November 1899, 1016.

[12] *Proceeding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899–1900*, 364.

[13] 范姑娘為曼徹斯特人士，於曼徹書特女書院（Lady College of Manchester）受教育，一八九三年七月四日獲聖公會差會接納為傳教士，於同年十月二十七日來華，主要的工場是香港。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Register of Missionaries: Clerical, Lay and Female and Native Clergy from 1804 to 1904* (N.p.,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905), 289.

[14] "Holy Trinity Church: Laying of Corner Stone By Bishop of Canton."

[15] *From Month to Month* 19 (October 1901): 2. *From Month to Month* 是一八九九年在維多利亞教區成立的 Hong Kong Church Missionary Association 的刊物。

[16] "Ecclesiastical Return," *Hong Kong Blue Book*, 1899, 1900, 1901, 1902.

[17] *Proceeding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900–01*, 405.

[18] 一九零零年十月，Miss Jones 與顧師奶從九龍城出發，到田心、大圍及坑口佈道。*From Month to Month* 13 (December 1900): 5.

[19] *From Month to Month* 19 (October 1901): 1–3. 至於在港的英語聖公會，則另立教區議會，華人及歐籍人士的教區議會同屬聖公宗的團契（Anglican Communion）。*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53 (January 1902): 66–67.

[20] 一九零四年聖士提反堂及聖三一堂分別捐助八百元及一百元予基金，用來支持兩堂的主任（霍靜山及鄺日修）、一位聖三一堂的傳道及兩堂的堂役薪金。*From Month to Month* 47 (April 1904): 1.

[21] 鍾仁立：《中華聖公會華南教區百年史略》（香港：中華聖公會會督府，1951），19。*From Month to Month* 19 (October 1901): 1–3.

22 "Report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23 June 1902," *Hong Kong Hansard 1902*, 26.

23 "No. 18 of 1902, An Ordinance to Provide for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hurch Body of the Chinese Anglican Church in Hongkong," 4 July 1902. Hong Kong Government.

24 *Proceeding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900–01*, 405.

25 *From Month to Month* 21 (February 1902): 1.

26 "Lay Readers," *From Month to Month* 23 (April 1902): 2.

27 "The Hong Kong Church Council," *From Month to Month* 39 (August 1903): 1. 鍾仁立：〈鄺日修牧師傳略，1840–1921〉，收劉瑞滔編：《港粵澳名牧生平》（香港：中華基督徒送書會，1975），1:8。另有一説是指鄺牧師自聖士提反堂退休，但從差會文獻，並沒有提及退休。

28 *From Month to Month* 50 (July 1904): 1. 霍在一九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在聖士提反堂由維多利亞教區主教按立為牧師，是華南教區第三位華人牧師。*From Month to Month* 49 (June 1904): 1.

29 油麻地支站在一九零二年十二月建成教堂（後命名諸聖堂），一九零三年，顧啟德調至油麻地，至一九一二年離職。參〈諸聖堂史略，1890–2001〉，《諸聖堂一百一十周年堂慶紀念特刊，1891–2001》(香港：諸聖堂，2001)，17。另 "Yaumati," *From Month to Month* 20 (January 1902): 2.

30 "Holy Trinity Church: Laying of Corner Stone by Bishop of Canton." 范姑娘的悼文，參 *From Month to Month* 42 (November 1903): 1。

31 "South China,"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55, no. 1 (January 1904): 52.

32 鄭寶鴻、佟寶銘編著：《九龍街道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0），78。

33 雙方的往來書信見 HKRS 58–1–17(36)，HKPRO。

34 編委會編：《九龍城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112。「九龍宋皇台遺址碑記」內有碑文：「其北有金夫人墓，相傳為楊太后女，晉國公主，先溺於水，至是鑄金身以葬者。」

35 小兵：〈本堂元老〉，《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80），65。

36 鄭家民：〈聖三一堂七十五年〉《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32–37。

37 "Banister to Baring Gould," 17 October 1902, Hong Kong, CMS Archive.

38 同上注。William Charles Jones Fund 是聖公會海外傳道會用以支持建立本地教會的基金。

39 "A Year's Work in Hong Kong," *From Month to Month* 44 (January 1904): 2.

40 一九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九龍城新堂的信徒奉獻了港幣二百二十九元二分。*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56, no. 3 (March 1904): 215.

41 *Proceeding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903–04*, 331.

42 霍約瑟是維多利亞教區第四任主教，任期從一八九八年至一九零六年。"Dedication of Holy Trinity Church, Kowloon," *From Month to Month* 48 (May 1904): 2.

43 "South China,"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56, no. 9 (September 1904): 702.

44 梁寶靈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45] W. Banister, "Tens Years in South China,"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58, no. 10 (October 1907): 608.

[46] "Holy Trinity Church: Laying of Corner Stone by Bishop of Canton."

[47] "Hamper to Baring Gould," 8 May 1904, Kowloon, CMS Archive。

[48] 汪玉娟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49] 鄭家民：〈聖三一堂七十五年〉，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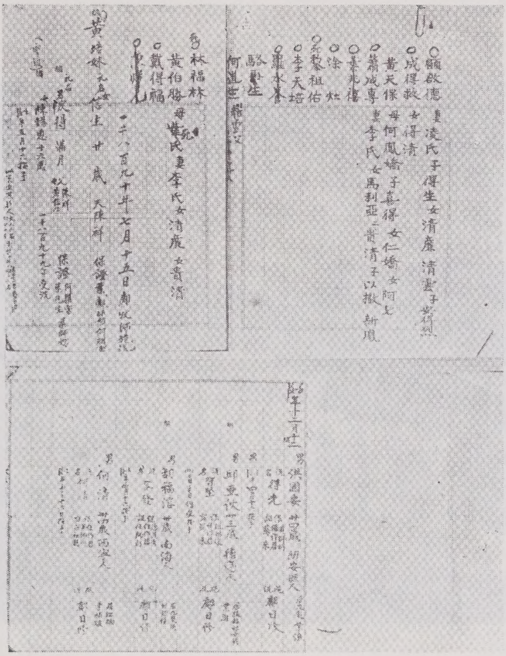
[50] 以下關於鄺日修牧師的生平，除特別注明外，主要參鍾仁立：〈鄺日修牧師傳略，1840–1921〉，7–11。另見〈鄺日修牧師〉，劉粵聲編：《香港基督教會史》（香港：香港基督教聯會，1941）。

[51] Chalmers,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District from 1870 to 1880," [n.d.], LMS Archive; "Chalmers to Thompson," 17 December 1883, LMS Arch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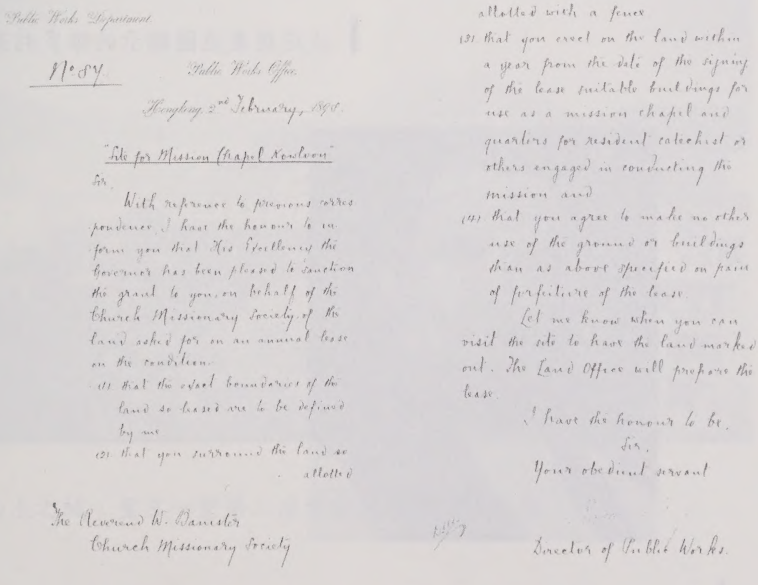
[52] No. 48, Fong Yat San 2 March 1885, Original Paper, CMS Archive。標點由筆者所加。

[53] 劉粵聲編：《香港基督教會史》，272。

[54]〈鄺日修〉，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上海：中華基督教會，1921），6:269。



洗禮名冊記錄了顧啟德全家施洗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No 84　　Public Works Office.

Hongkong, 2nd February, 1898.

"Site for Mission Chapel Kowloon"

Sir,

With reference to previous correspondence, I have the honour to inform you that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has been pleased to sanction the grant to you, on behalf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land asked for on an annual lease on the condition

(1) that the exact boundaries of the land so leased are to be defined by me

(2) that you surround the land so allotted with a fence

(3) that you erect on the land within a year from the date of the signing of the lease suitable buildings for use as a mission chapel and quarters for resident catechist or others engaged in conducting the mission and

(4) that you agree to make no other use of the ground or buildings than as above specified on pain of forfeiture of the le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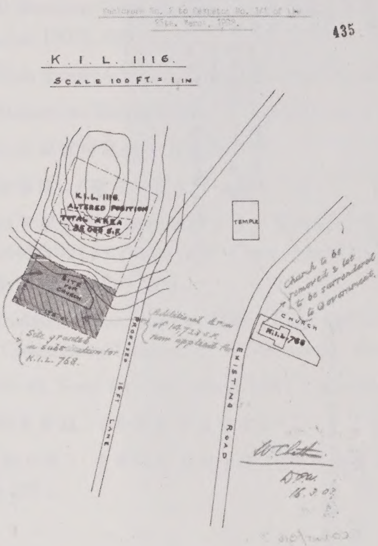
Let me know when you can visit the site to have the land marked out. The Land Office will prepare the lease.

I have the honour to be,
Sir,
Your obedient serva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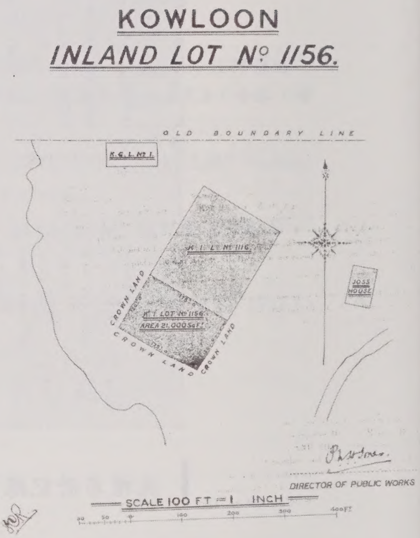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The Reverend W. Banister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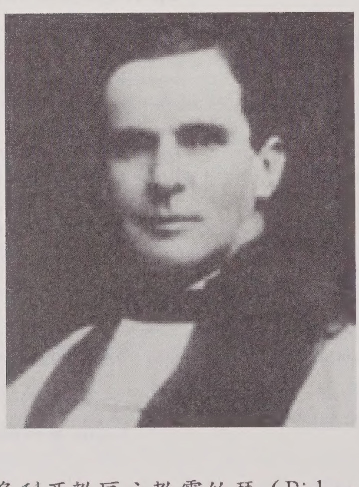
工務局在1898年2月致聖公會傳道會傳教士班為蘭之覆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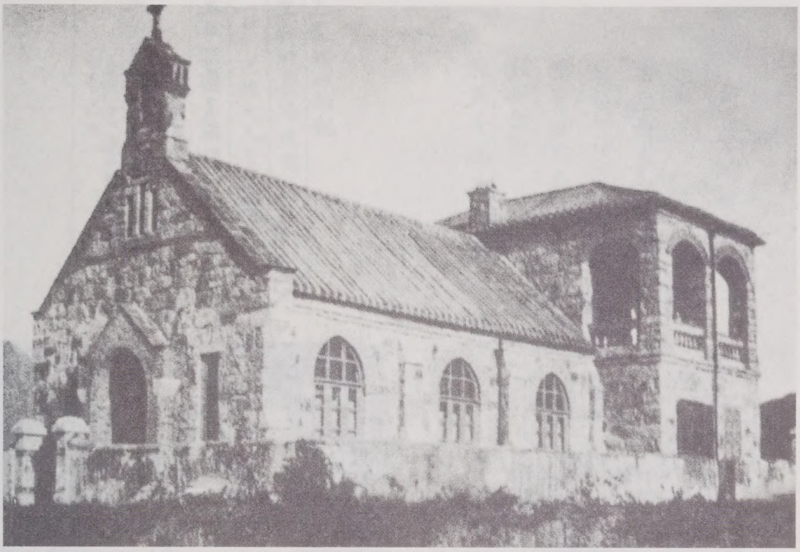
政府檔案手繪草圖顯示的聖堂位置



政府檔案地圖顯示的維多利亞女校新址



維多利亞教區主教霍約瑟（Bishop Joseph C. Hoare）



山上之城：聖三一堂第一座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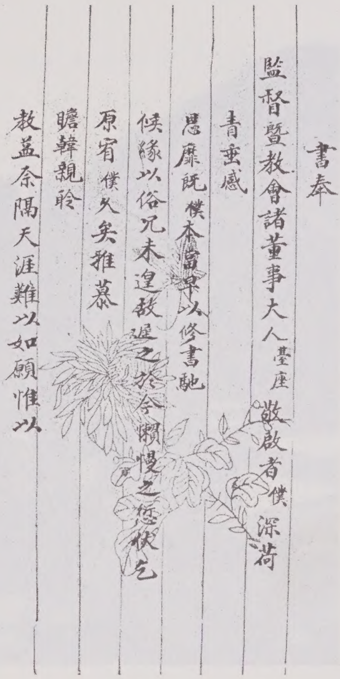
山上之城：聖三一堂第二座聖堂及維多利亞女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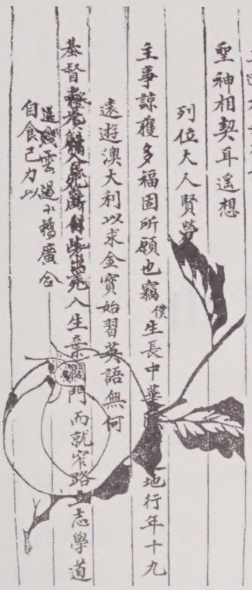
鄺日修牧師



鄺日修師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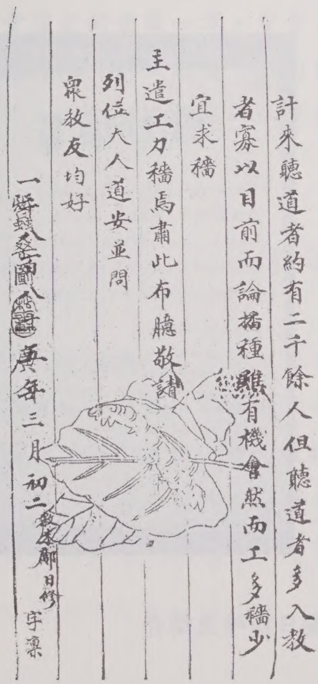


書奉
監督暨教會諸董事大人臺座 敬啟者僕深荷
青垂感
愚靡既僕本當早以修書馳
候緣以俗冗未遑敬遲之於今懶慢之愆伏乞
原宥僕久矣雅慕
瞻韓親聆
教益奈隔天涯難以如願惟以



主道相知相親
聖神相契耳遙想
列位大人賢勞
主事諒獲多福固所願也竊僕生長中華[illegible]地行年十九
遠遊澳大利以求金寶始習英語無何
基督[illegible]入生[illegible]門而就窄路[illegible]志學道
[illegible]遇[illegible]廣合
自食己力以

鄺日修寫給聖公會差會總部的信件 (節錄)



計來聽道者約有二千餘人但聽道者多入教
者寡以目前而論播種雖有機會然而工多穡少
宜求穡
主遣工力穡焉肅此布臆敬請
列位大人道安並問
衆教友均好
[illegible]庚年三月初二 教末鄺日修 字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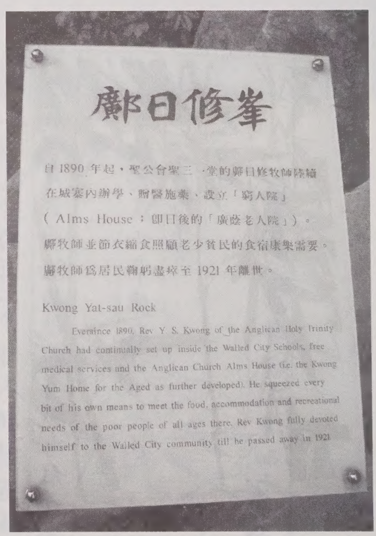


大英國[illegible]
監督暨教會[illegible]大人[illegible]
江南[illegible]有
聊寄一枝春
[illegible]鄺日修緘



鄺日修牧師及師母合墓於九龍基督教墳場





九龍寨城公園內的鄺日修峰及簡介

3

山上的聖三一

1904–1937

「山上」時期指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的歷史。「山上」的經驗是許多老會友津津樂道的故事。可以說，這三十多年是聖三一堂歷史的重要一章。堂會不論在人數、組織及事工上，均取得長足發展，為戰後奠下穩固根基。可惜由於年代久遠，文獻散失關係，我們只能從零碎的資料，一點一滴重構戰前聖三一堂的面貌。

群羊缺牧

山上時期的聖三一堂，見證着中華聖公會的成立。一九一二年在華聖公宗改制，各個原由英、美及加拿大聖公會管轄的教區成為新成立的中華聖公會的成員。[1] 與此同時，維多利亞教區（又名華南教區或港粵教區）經多番重劃後，到一九二零年代的轄境包括香港、廣東、廣西南部、雲南及貴州。由於歷史背景獨特，

香港分別設有華人及歐人聖公會的教區議會，接受同一位主教管治。

這時聖三一堂面對的挑戰是華籍聖品人員短缺。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間，鄺日修牧師以七十八歲高齡退下聖三一堂的牧職，由李求恩牧師（1882–1962）[2] 接任。據李求恩的長子李守正回憶，李牧師與師母朱尚柔抵港後，住在名為樂園宅的石屋。不過，李求恩只在聖三一堂事奉了數個月，便被調至聖士提反堂，接替剛去世的霍靜山牧師。雖然李牧師調至聖士提反堂，但他每星期仍到加林邊道汪玉娟家舉行聖經班，並協助聖三一堂組織堂會。[3] 從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五年間，聖三一堂的會務，一直由油麻地諸聖堂的曾紀岳牧師兼理。到一九三五年，教區始派來李應標牧師主理堂務，至淪陷期間日軍徵用聖三一堂作馬廐，教堂被迫關閉。

山上時期的聖三一堂缺乏專責及穩定的教牧領導，原因跟教區的華籍聖品同工不足有關。據一九二四年的教區記錄，全教區共有十二位華籍聖品，其工作分配如下：[4]

姓名	工作範圍	姓名	工作範圍
夏步雲	增城仙村	黎其壯	北海聖路加堂
慕容賢	香山石岐	莫壽增	廣州救主堂
俞恩嗣	雲南府	黃登伍	廣州協和神學校
李求恩	香港聖士提反堂	曾紀岳	香港諸聖堂
曹思楷	香港聖保羅堂	黃福平	不詳，一九二五年起調至香港聖保羅堂
李應標	海外服務（紐西蘭）[5]	T'so Fong	海外服務

表一：1924 年華南教區華籍同工分佈

從表一可見，華南教區的十二位華籍聖品除兩位在海外服務外，其餘十位在教區服事者，只有三位派駐香港。當時，中華聖公會

在香港共有聖士提反堂(1865)、聖三一堂(1890)、諸聖堂(1891)、聖保羅堂(1911)、聖馬利亞堂(1912)五所教會，但卻只有三位聖品人員，因而出現一人兼理兩堂的情況。抑有進者，在一九二零年，教區因南寧聖公會缺乏牧師，一度把曾紀岳借調至南寧，為期一年半之久，原諸聖堂的工作則由李應標會吏兼理。[6] 當時曾紀岳已同時兼顧諸聖堂及聖三一堂，尚要外調至南寧，教區華籍聖品人手之短缺，可見一斑。何明華主教(Ronald O. Hall)[7] 指，每當聖三一堂舉行聖餐崇拜時，會友須守候至中午十二時始有一位聖品自諸聖堂行抵聖三一堂。[8] 何氏所言，相信是指曾紀岳一人兼理諸聖堂及聖三一堂的情況。

面對華籍聖品人員的短缺，傳道同工的角色便更形重要。山上時期的聖三一堂的男傳道主要有三位：林懷光(任期 1915–1918)、吳錦堂(任期 1918–1922)及陳乃文(任期 1922–1935)。上述三位傳道，以陳乃文的事奉期最長，共十四年。陳乃文原籍南海，曾在北海教書，後獻身教會傳道，曾在江門、石岐及廣州等地教會事奉。來港後，從一九二二至三五年間任職聖三一堂。鄭家民在鑽禧堂史中這樣形容陳氏：

> 當時教友對於處理堂務並不熟悉，陳先生幾乎負擔了大部分責任，如主日講道、街頭佈道、晚禱會、家庭祈禱會、研經班等日常事務都屬他。[9]

其中主日講道方面，現存一九二五年二月至六月間不完整的《基督教培道聯愛會周刊》上，刊有其間每周主日崇拜時港九各堂的講員名字，可見十三個主日中，陳乃文負責了聖三一堂的七次講道，比兼任的堂主任曾紀岳還多(兩次)，[10] 是聖三一堂講壇的重要宣講者。

可以說，在陳乃文任傳道前，聖三一堂的傳道的流動性頗高，在相對缺乏駐堂牧師的情況下，陳氏的委身事奉，對整體堂務的發展至為重要，其功不可沒。

聖三一堂的婦女信徒比男信徒多，[11] 故女傳道的角色十分重要。據一九三四年召開的《十三屆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該年聖三一堂共有女傳道四名。其中錢四姑及袁大姑分別由西差會及個人供給。[12] 其餘的由婦女服務支團聘請。

各盡其職，建立身體

聖三一堂雖然面對教牧不足的挑戰，但是傳道同工及信徒上下一心，努力拓展聖工，並漸次建立不同部門，凝聚信眾，各盡其職，共建基督的身體。

慈惠與佈道

各部的工作，大致可分為對外及對內兩方面。對外工作最重要者，莫過於慈惠及佈道事工。慈善部是歷史最悠久的部門。聖三一堂現存最早的一九二九年牧區議會記錄中，已有慈善部的工作。[13] 慈惠工作離不開關顧社會的弱者（特別是老弱婦孺），為病者贈醫施藥，甚至生養死葬。其實，慈惠工作在香港教會發展過程中一直佔重要位置，不僅對有需要者表達關愛，更成為服事社區的重要途徑。

回顧歷史，在維多利亞山聖堂建立後，鄺日修牧師便積極回應社會需要。他在一九零三年向政府申領墳地，設立了九龍半島第一個華人基督教墳場。一九零六年在城寨內創辦廣蔭院，為年長教友休養之所。另方面，聖三一堂毗鄰，又有聖公會傳道會專門收容被苦虐女孩及「妹仔」（婢女）的維多利亞女校（參下章）。再者，由於鄺日修牧師略懂醫術，故在九龍城又開辦小型醫藥局，為周圍的貧苦病人服務。[14]

可以說，山上時期的聖三一堂，已發展出一個以堂會為中心，並附設各式各樣社會慈惠工作的牧區。毋庸置疑，慈惠工作成為聖三一堂的重要事工。

除慈善部外，佈道是另一個重要的外展事工。於一九一三年領洗的陳英乾憶述他參加一九二零年的新春佈道，每天到鄉村及市內傳道，他任助理手風琴師。教他最難忘的，是遭人擲石及辱罵：「進教佬有病無好，每日幫襯棺材佬」。[15] 除新春佈道會外，二十世紀初期，香港教會頗流行户外佈道，其中又以福音帳幕廣受教會歡迎。所謂「福音帳幕」即在露天處搭建帳棚，然後一連多天作佈道聚會。[16] 一九二五年三月，陳乃文亦曾與其他教會人士合作，在九龍城街市附近，搭起了大帳幕，上書「福音幕」，舉行一連七天的佈道會。據悉，每次聽眾達數百人，成為本港早期具規模的佈道工作。[17]

一九三零年代，聖三一堂一群熱心的信徒，又自發成立佈道隊。事緣於一九三二年三月，著名佈道家宋尚節的伯特利佈道團來到香港。其中一次佈道會在九龍城啟德濱的民生書院舉行，有十位聖三一堂的女信徒日夜聽道，深受感動。她們包括王銀卿四姑、胡五姑、朱蕭佩玉師太、陳煒元師太、陳劉桂生師太、顏二姑、馮得真大姑、胡陳慕貞師太、溫羅得真七姑、鄺眉珍三姑（即譚柏蕃夫人）。她們聽到宋尚節勉勵會眾為主傳福音的時候，立即走到台前，自願投身事主，並由陳煒元師太代表領取一支佈道團的小旗回堂。從那時開始，她們組成佈道團，逢星期一上午出發佈道，步行至下午五時才回家。所到的地方包括沙埔仔、上下元嶺、牛頭角、茶果嶺等鄉村，約相當於現時的鑽石山的山坡至牛頭角一帶。除此以外，她們又辦新春佈道會，乘火車往新界農村佈道。她們更有靈修聚會、研經班等。[18]

一九三二年夏秋間，聖三一堂又與浸信會及九龍城基督徒會合辦大型福音幕佈道會，會期長達一個月。港粵教區的報告記述當時的盛況：

> 到會聽過福音者數達一萬二千餘，並有音樂家數位及詩班數隊。如聖三一青年部詩班、浸信會詩班、街坊男女兒童詩班、維多利亞女校詩班、天國學校詩班、民生書院詩班、慧貞女校詩班，均有參加。內有七晚佈道，聽道者千三百餘人，在此日內決志慕道者有二百四十餘名。[19]

戰前共有三所福音堂隸屬聖三一堂。一個是位於九龍城外的聚會點，有主日學女教員兩位，男女主日學生分別為十及二十位。另一是在九龍城內的天道堂，有主日學女教員兩位，及女主日學生七十五位。這兩個福音堂均由陳乃文負責。此外，又在土瓜灣設福音堂，有主日學女教員一人，男女生分別為八及六位，由何理士（S. L. Hollis）主理。[20] 兩位聖三一堂年長會友（張磐生及汪玉娟）在憶述三十年代教會事蹟時，分別提及佈道所的情況：

> 聖三一堂還有街頭佈道會，我們在九龍城啟德濱租一間屋，夜晚做佈道會，當時在長安街有一間福音堂。早期在民生書院那邊，之後遷到侯皇廟。[21]

> 當時在山仔以外，在打鼓嶺道還有一個福音堂，那裏還有一位女傳道朱師奶。那裏有佈道，晚上朱師奶便會搖起鼓來，邀請人進來聽福音。[22]

除福音堂外，聖公會在九龍城侯王道亦辦有一所小學，於一九三零至三一年間開設，校長是何理士姑娘。聖三一堂的教友王恩光在三十年代中為學校的主任，其中一位就讀的學生是岑美智，她在戰後六十年代任聖三一堂的幹事。她憶述，每主日她和同學都回小學上主日學，然後由老師帶隊到聖三一堂參加主日崇拜。[23] 這些學校，由於鄰近聖三一堂，又跟教會有密切關係，又稱聖三一學校（Holy Trinity School）。[24]

教導、牧養與事奉

接着，讓我們了解一下聖三一堂其他部門的歷史：主日學、詩班、少年團及婦女團。婦女團的歷史最悠久。戰前的婦女團屬教區婦女總團分支。婦女工作在聖公會傳道會事工發展中，一直舉足輕重。一九零七年，首次婦女工作會議更在香港召開，進一步確認婦女在個人佈道工作方面的貢獻。到一九二零年代，婦女已正式出任牧區議會代表。[25] 一九三三年的教區報告中曾提及婦女的工作：

> 本區所屬各堂，均有婦女服務支團，其工作於每年舉行賣物會一次，所得款項，以助陝西傳道工作及本教區傳道經費，另自聘女宣教師擔任傳道，其餘探訪問病，舉行家庭祈禱會與設手工部製造織品以供賣物會之用，均屬該團工作。[26]

聊聊數字，已充分說明婦女部熱心事奉的榜樣。

踏入三十年代，主日學、詩班及少年團亦漸次開展。[27] 一九三零年正式有成人主日學，負責人為何理士（Miss S. L. Hollis）姑娘，蕭佩玉亦曾帶領此項工作一段時期。主日學的教材並不充足，只是由各教員憑其聖經知識而發揮成。有時候，老師甚至要教導學員認識生字。要到新堂建成後，少年人及兒童之主日學才逐漸成形。一九三三年，聖三一堂登記的主日學生有一百四十人，教員方面，女教員有二十名，遠多於男教員三人。[28]

詩班的設立最早可追溯至一九一五年，那時主要由維多利亞女校的女生組成。初期的詩班沒有詩班袍，也不是在至聖所唱詩，而是在會眾座位的前排。詩班因成員多為維多利亞女校學生，夜間不能練詩。一九三零年間，曾紀岳會吏長及陳乃文發起邀請男子參加詩班，但後來男班員也逐漸流失。據一九三二年的資料，詩班主任為溫雪卿，有二十五名女班員，無男性。[29] 後來再接再

屬，有張田生、張磐生、黃馬太、黃馬可、梁耀榮、陳天佑、黃磐光、涂從芳等參加，各人在鍾茂豐的領導下苦練，終能與女聲和唱。[30] 張磐生及汪玉娟在戰前已是聖三一堂的詩班員，其憶述可以管窺當時的詩班情況：

> 早期的詩班沒有詩班袍，穿西裝便可以了。到建成新堂之後，才有詩班袍。[31]

> 當時詩班有二十多人，指揮是很有名的林聲翕先生。聖三一堂的詩班很有水準，分四步，很能帶領崇拜氣氛。詩班員年紀不大，最年長的也只是三十來歲，都是很敬虔的會友。[32]

少年團成立於一九三一年，聚會地點設在城寨內的天國救道堂（參下章），當時的少年團有經常性的周會及各項活動，如乒乓球，團長為吳又啟，後因人數不足一度停辦。重組後，少年團領導者包括蕭英麟、林球光、曾貫穀、霍永楷等，團務日漸蓬勃，各項適合少年人的工作亦告展開。許多當時少年團員長大後都成為熱心會友。聖三一堂新堂落成以後，聖三一堂的少年團更與聖士提反堂、諸聖堂、聖保羅堂及聖馬利亞堂的少年團成立少年團總部。

組織與管理

港粵教區的會議紀錄，刊載了一九三二年聖三一堂各部職員的名稱，可見當時聖三一堂的內部分工：

一九三二年聖三一堂各部職員名單：[33]

牧師	曾紀岳
男宣教師	陳乃文
女傳道	錢四嬸、袁大姑
庶務	鄧光
常備值理	陳偉元、陳昌福、黃盤光、李才太、鄺師太、李戴氏、黃瑋如、四姑、陳偉元師奶
當年值理	梁榮耀、陳世光、蕭英麟、黃賴求、甄庭耀、劉滔、黃歡蓮姑娘、胡五姑、彭佐卿師奶、譚恩保姑娘、翁師奶、周威全師奶、石奕操師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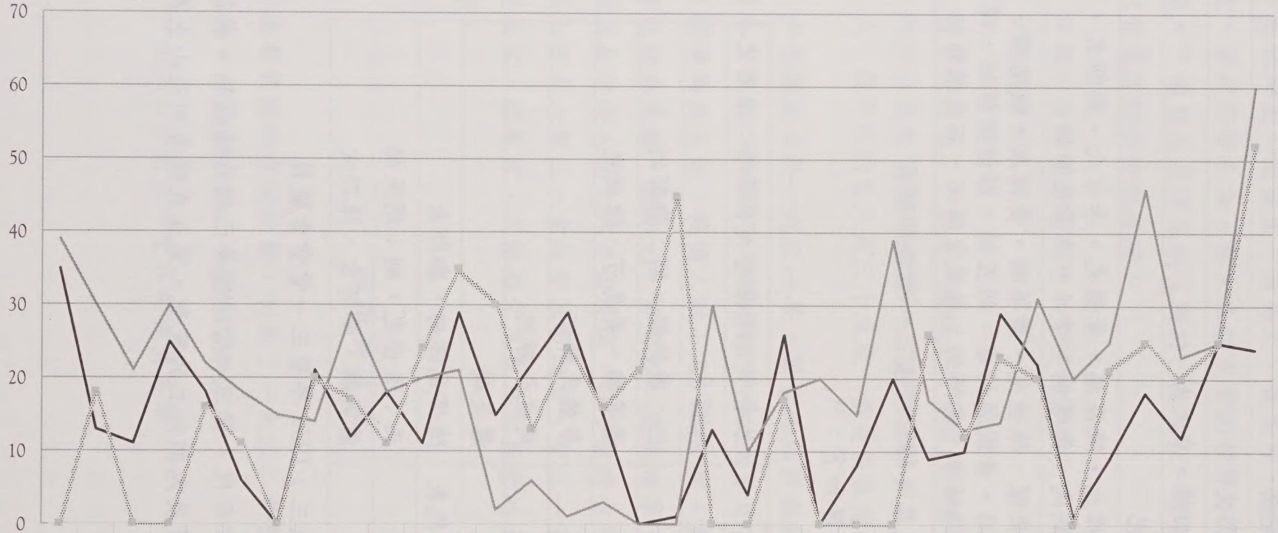
表二：1932 年聖三一堂各部職員

堂會職員的名單如下：[34]

書記	上半年：陳世光，下半年：陳乃文
司庫	陳偉元
財務部長	正：蕭英麟，副：鄺師奶
區議會代表	蕭英麟、黃馬可、陳世光
慈善部長	李戴氏師奶
主日學部	周威全師奶
交際部長	蕭英麟
國內佈道會代表	陳偉元師奶、鄺師太
招佈部長	正：陳世光，副：胡五姑
教區代表	蕭英麟、鄺師太、陳乃文

表三：1932 年聖三一堂堂會職員

可見，到一九三零年代，聖三一堂的發展已經日臻成熟，成為一所有完善管理制度及內部分工的教會，聳立在維多利亞山上為上主作見證。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成人洗禮	35	13	11	25	18	6	0	21	12	18	11	29	15	22	29	15	0	1	13	4	26	0	8	20	9	10	29	22	1	9	18	12	25	24
孩童洗禮	39	30	21	30	22	18	15	14	29	18	20	21	2	6	1	3	0	0	30	10	18	20	15	39	17	13	14	31	20	25	46	23	25	60
堅信禮	0	18	0	0	16	11	0	20	17	11	24	35	30	13	24	16	21	45	0	0	17	0	0	0	26	12	23	20	0	21	25	20	25	52

表四：聖三一堂洗禮及堅信禮人數（1904–1937）

統計數字背後

香港政府的《藍皮書》紀錄了本港各年教會出席聚會的人數。[35]由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一二年，聖三一堂的聚會人數維持在一百二十人左右。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年則微降至一百人。但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二零年則上升至一百五十至二百二十人。一九二一年起至一九三六年則在二百五十至二百七十之間。[36] 由於聚會人數只反映大約的數目，要真正了解山上時期聖三一堂的發展，便得從洗禮及堅信禮的人數入手。

一九八零年聖三一堂出版的《九十周年堂慶特刊》，整理了歷年聖三一堂的重要數據。在一九零四至一九三七年間洗禮（成人及兒童）及堅信禮方面的情況，可由以左頁表四反映。此圖表有兩方面的現象及問題值得留意：

一、除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一年，一九二八至一九三零年外，兒童洗禮的人數，一般高於成人洗禮。其中女童受洗者的總數亦高於男童（453:309），這相信與維多利亞女校的工作有關。不過，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一年間兒童洗禮人數呈現不正常的低點，原因何在？是否反映女校的某些問題？這有待進一步探討。

二、山上時期聖三一堂的發展，從洗禮及堅信人數的角度觀之，整體走勢較反覆，但在反覆之中，仍可看到幾個較特別的年份：一九一五年、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三七年。統計數字反映出，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一年間，各組數字（洗禮及堅信禮）均呈現極低水平。不過，一九二二年各組人數出現反彈，其後再呈現反覆，先後於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及一九三四出現高點，而在一九三七後更躍進急升。

結合本章的歷史，我們可對上述數字作如下解釋：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一年間堂務的低潮，正是鄺日修牧師高齡退休後，聖三一堂短期內數番更換牧者、領導流動及真空的結果。特別是一九

二零至一九二一年間，連兼任的曾紀岳牧師也被教區借調至南寧，出現群羊缺牧的危機。而一九二二年的反彈，正好是陳乃文就任傳道之時，陳氏長期委身，熱心事奉，對堂務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而一九三三及一九三四年的高位，相信與上文提及一群婦女參加宋尚節奮興會後，成立佈道團，積極佈道，以及一九三三年的大型福音幕佈道有關。至於一九三七年的躍升，則跟抗日戰爭爆發，戰事逐漸波及華南地區，大量難民南下香港避難有關（詳參第五章）。

會友面面觀

有人説，山上時期的聖三一堂是所「平民化的教會」。我們可從其會友的背景窺探一二。早於一九一六年四月，聖公會傳教士文明理(G. A. Bunbury)曾在其日誌記下他對聖三一堂會友的觀感：

> 鄺牧主領祈禱，我在其邀請下證道。我真希望英國的朋友能夠看見這裏的會友，九十位男士，四十六位婦女。一位男士在意外中失去一條腿，由另一位先生攙扶下跪。一位近乎失明者被領到扶手。另一位會友是香港一間英國企業的要員。一位蛋家老婦，十分貧窮，赤腳走上前來。另一位婦女，把嬰孩束在背部。另一位婦女帶着兩歲大的孩子，孩子不願獨自留在座位上，要跟着母親一道走來。整個崇拜有紀律而莊嚴，沒有人會懷疑崇拜者的虔敬。[37]

文氏所見的會友，來自社會不同階層，又以基層人士為主。這跟當時聖三一堂所處的社區生態相符。

隨着一九二零年代以後九龍城區的發展，會友的背景亦較先前多元。除了原有服務及慈惠工作的受眾（如廣蔭院、安居舍的院友，或是維多利亞女校學生）外，來自城市的中、低級文職人員比例上升。我們曾訪問多位年長會友，包括黃志誠、張磐生、蘇民治、汪玉娟、梁寶靈等。在三十年代，他們正值少年、青年

時期，其父輩大多是教師、政府或大機構的文職人員等。當時積極參與教會事務的會友，也多屬這個階層。

就以一九三二年香港教區議會代表黃馬可為例，他是駐港英軍軍需處的職員。經他引薦，其子黃志誠及另一位會友張磐生也在軍需處工作。又三十年代的司庫蕭英麟在海軍部服務；蘇文治在一九二零年代末已在聖三一堂聚會，任職九廣鐵路文員。當時兩位積極參與教會事務的會友梁榮耀及劉頌基，都是船廠的則師。黃偉基的先父黃伯元，是中華電燈公司文員。他們住在附近的侯王道、啟仁路（啟德濱內）等地。在當時的生活環境下，他們並非富貴人家，卻屬中等收入階層，生活大致安定。一九三零年代，這群城市的文職及專業人士成為教會的骨幹成員。

籌建新殿

一九三三年，聖三一堂面對另一次遷拆的命運。當時政府因為城市發展的緣故，決定把維多利亞山夷平，山上的聖三一堂及維多利亞女校均受影響。政府及聖公會雙方就賠償及新堂址的安排作多番交涉，最後在一九三三年底達成協議。政府賠償一萬二千五百四十八元，並在山下批出九龍內地段三三四四號一幅約三萬多平方呎的土地作交換。香港教區須在收到正式的換地通知後十八個月內拆去舊堂。[38]

香港教區議會隨即組成建堂委員會，由曾紀岳會吏長任主席，並委託吳建中建設新堂。[39] 由於政府的賠償只佔新堂籌建預算（約三萬元）的四成，教區主教何明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特別致函布政司（Colonial Secretary），希望政府能額外增加五千元賠償。何強調，香港的經濟情況並不理想，抑且聖三一堂是本地聖公會五所堂會中「人數最多卻又最窮」（the largest and the poorest）的一間。七月，他再致函工務局，表示由於財政關係，希望能把

工程延期一年。[40] 對於第一個要求，政府並沒有答允，但卻批准新堂可延期九個月落成而無須罰款。[41]

誠如何明華所言，籌建新堂最大的困難是財政緊絀。[42] 除政府的賠償外，教區亦有提供經濟協助。建堂委員會又直接向教友募捐，甚至向教友借貸。為購置新堂設備，建堂委員會先後舉辦了三次音樂籌款晚會，首次在利舞台舉行，籌得七千元，其餘兩次在民生書院舉行，共籌到二千元。[43]

一九三六年三月，何明華再致函工務局，表示新堂的設計已成完，籌款也即將達標，估計可在短期內動工興建新堂。他希望在動工前，政府批准聚會繼續在原有聖堂進行。[44] 一九三六年六月，新堂正式動土，並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周六下午，由莫壽增主教 [45] 主持奠基禮。出席奠基禮者還有當時諸聖堂的主任牧師曾紀岳、聖馬利亞堂的主任牧師李求恩、聖三一堂的司庫蕭英麟，及幾位任教於維多利亞女校的女傳教士，如何理士姑娘（Miss S. L. Hollis）、珍姑娘（Miss A. Jennings）、蘭哲士夫人（Miss Blanchett）等。基石下有一個玻璃瓶，裝有蕭英麟撰寫的堂史、當日奠基禮的講辭，和報章刊載有關聖三一堂的新聞。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記載奠基禮的情況：

> 典禮以唱詩開始，李牧師將小銀鏟交予主教手中，接着便是祈禱。維多利亞女校的詩班獻詩以後，便由主教行奠基禮。之後主教祝禱，祈求上主保佑聖三一堂。[46]

奠基石上寫着：

> 願　上主之目晝夜垂顧此屋　歷代志下六章廿節

奠基後由莫壽增主教致詞，簡單介紹聖三一堂建堂及遷拆經過，他邀請會友及各方友好繼續支持工程。最後他感謝上帝為教會預備這美好的地方。[47]

舊堂拆卸後，位於九龍寨城的天國救道堂權充聖三一堂的臨時會堂。一九三七年夏天，新堂建成，並於七月四日正式啟用。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晚上舉行祝聖禮，由何明華主教、莫壽增主教主禮。適逢港粵教區會議在協恩學校召開，港粵兩地代表於會議後一同出席祝聖禮，冠蓋雲集，盛極一時。[48]

新堂建成後，分別在新堂及聖安得烈堂舉辦三次賣物會，為購置家俬、聖經及聖詩集籌款。總計整個新堂從建築到各項設置，開支達四萬元。[49] 仰賴教區及牧區上下一心，終能克服財政困難。新堂的設計富中國文化特色（參下章），別樹一格。一九三七年的新堂標誌着山上時代的結束，也為聖三一堂的歷史揭開嶄新的一頁，迎向新的挑戰。

小結：自養與自治

一九零三聖公會在香港率先成立教區議會，目的是要推動本地華人教會實現自治及自養的目標，開啟華南教區的典範。至一九三零年代，香港華人聖公會的堂會數目從兩所增至五所，在整個華南教區中，發展可謂不俗。據統計，一九三四年教區信徒有五千六百零八人，[50] 香港地區的信徒為二千九百一十一人，約佔教區的一半。同時，在教育工作方面，聖公會在港興辦的學校數目，亦遠超其他地區。早年施美夫主教對香港工作有所保留，聖公會因而到一八六零年代才正式開展本地華人事工，但在四分三個世紀後，香港地區的工作已成為港粵地區的重心。

那麼，香港聖公會在自治及自養方面的果效如何？相比其他各堂，聖三一堂的情況又怎樣？

現存一九三四年的《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51] 有助我們了解香港五所華人聖公會的基本情況，從而解答上述問題。

	聖士提反堂（1866）	聖三一堂（1890）	諸聖堂（1891）	聖保羅堂（1911）	聖馬利亞堂（1912）	總數
牧師	1	1	1	2	1	6
男宣教師		1			1	2
女宣教師	1	4	1	2	1	9
售經員						1
主日學生	100	140	132	140	120	632
主日學男教員	5	3	4	8	2	22
主日學女教員	6	20	5	16	10	57
嬰兒受洗者	43	30	33	23	16	149
壯年受洗者	40	24	19	43	14	140
現年領堅信者	25	22	20	39	9	115
學道者	40	20	12	50	25	147
婚姻者	5	4	8	18	1	36
逝世者	13	20	8		2	43
現已受堅信者	259	230	250	290	140	1169
現未領堅信者	530	299	252	363	298	1742
現教友總數	789	529	502	653	438	2911
經濟收入	3800	1000	3328	6000	1850	15978

表五：1933 年聖公會在港華人堂會的統計數字

從上表可見，在一九三三至三四年，香港聖公會教牧短缺的情況已有改善，每堂平均已有一位聖品：李求恩（聖馬利亞）、曾紀岳（諸聖堂）、鍾仁立（聖士提反堂）、曹思晃（聖保羅堂）、李應標（聖三一堂）。十多年前人手緊絀的情況，至今大致紓緩。

經濟方面，聖三一堂是聖公會港粵教區五間華人教堂中最匱乏的，全年總收入僅一千元。聖士提反堂教友人數為七百八十九人，較聖三一堂多二百多人，但總經濟收入卻是聖三一堂的三倍；聖保羅堂會友人數（653 人）比聖三一堂多近百人，但經濟收入卻是其六倍；即使人數比聖三一堂要少的聖馬利亞堂及諸聖堂，其經濟收入也遠較前者為高。以諸聖堂為例，此堂與聖三一堂同期

成立，人數與聖三一堂相若，均為五百人左右，但經濟收入卻是後者的三倍多。

由於入不敷支，聖三一堂需要接受港粵教區的經濟補助，一九三二年及一九三三年的補助額分別為五百元及六百元。[52] 當時，除聖三一堂外，聖馬利亞堂同樣面對財政困難，需教區施以援手。相對而言，聖士提反堂，聖保羅堂及諸聖堂在教區內的財政較穩健。聖三一堂在實現自養方面，面對資源短缺的挑戰。聖三一堂雖然在自養上有所欠缺，但這亦成了教區各堂互為肢體、彼此分享和共建基督身體的合一見證。

聖三一堂在經濟方面的匱乏，當然跟其所處的環境及會友的背景有關。不過，我們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匱乏卻見證了聖三一堂對社會弱者的承擔，把福音傳給貧窮人，照顧他們。換言之，這是聖三一堂努力實踐天國福音的見證。

注：

1 一八九七年，各國在華的聖公會主教召開首次主教會議，改變以往缺乏聯繫的情況。又在一九零九年與一九一二年先後召開主教、教士、教友聯合會，統一全國聖公會組織的氛圍漸漸形成。一九一二年四月在上海舉行的總議會，正式通過中華聖公會之總憲綱和憲章規例，且於會期末後一日，成立聖公會總議會，管轄十一個教區。自此大會，總議會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至一九一五年第二屆全國議會，又成立中華聖公會傳道部，以作為中華聖公會自身的傳道機關。吳德施：〈中華聖公會〉，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上海：中華基督教會，1931)，11上：13。

2 李求恩，一八八二年生於中山石岐，十二歲到檀香山，後於一九一一年回國，入讀聖公會廣州聖三一神學院。一九一四年及一九一五年被封立為會吏及牧師。

3 關於李求恩何年來港接任聖三一堂主任，有兩個不同的說法，一是一九一五年，另一是一九一八年。前者參黃國仁：《服務教會半世紀——李求恩會吏長生平》(香港：諸聖先導出版委員會，1964)，30、62。後者則見李求恩的長子李守正法政牧師，李守正當時只有兩歲，但從其母親口中得知，李求恩任聖三一堂牧師只數個月。見李守正：〈聖三一堂逸事〉，《教聲》1548 (2005 年 11 月 6 日)：3。筆者翻查當時《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的教會職員名錄，可見一九一六年李求恩仍任職香山石岐聖公會。見中華續行委續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上海：中華基督教會，1916)，3:13。但一九一七年底出版的《中華基督教會年鑑》，李求恩的名字已附在鄺日修的九龍三一堂後。參中華續行委續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上海：中華基督教會，1917)，4:262。

至於聖三一堂的記錄，據其在一九九八年設的善牧堂內列出各主任牧師的簡介及任期，李求恩牧師的任期是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這個說法與《中華基督教會

年鑑》較接近。筆者暫時以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作為李牧師抵港的年份，留待日後有機會再查核。

4 *Handbook to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924* (London / Hong Kong: Victoria Diocese Association, n.d.), 44. 中文姓名參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上海：中華基督教會，1924)，7:192、194。

5 一九二一年，紐西蘭聖公會華人傳道會請倫義華主教（Gerald H. Lander）派人往該處傳道，倫主教乃派李應標到當地服事。李應標：〈一九二零年的諸聖堂〉，《諸聖堂七十周年紀念專刊》，香港聖公會諸聖堂網頁，http://www.allsaintschurch.org.hk/b70p05.htm。

6 〈諸聖堂史略，1890–2001〉，《諸聖堂一百一十周年堂慶紀念特刊，1891–2001》(香港：諸聖堂，2001)，17。

7 何明華是維多利亞教區（華南 / 港粵教區）第七任主教，任期從一九三二至一九六六年。

8 何明華：〈序〉，《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1890–1965》(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65)，6。

9 鄭家民：〈聖三一堂七十五年〉，《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1890–1965》，35。

10 〈本港各會堂主日演講一覽表〉，《基督教培道聯愛會周刊》第 1 至 9 期（1925 年 2 月 8 日至 4 月 5 日），第 15 至 18 期（1925 年 5 月 17 日至 6 月 7 日）。

11 以一九三二年為例，領聖餐的男女教友分別為三十人及一百八十人。而已受洗的成年（廿一歲以上）教友，也是女教友（122 人）遠多於男教友（28 人）。〈各堂教友人數及守餐人數統計表〉，《中華聖公會第十二屆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香港：中華聖公會，1933)，110–11。

12 《中華聖公會第十二屆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92、99；另《中華聖公會第十三屆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香港：中華聖公會，1934)，82。

13 黃林瑞娥：〈慈善部的今昔〉，《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1890–1965》，78。

14 鄭家民：〈聖三一堂七十五年〉，33–34。

15 陳守道：〈聖三一堂最年長的教友——陳英乾先生〉，《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80)，64。

16 〈福音幕〉，《基督教培道聯愛會周刊》1（1925 年 2 月 8 日）：14。

17 鄭家民：〈聖三一堂七十五年〉，35。

18 劉元乂：〈本堂傳道部中堅——佈道團的創立〉，於《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70)，18。劉氏指宋尚節於一九三三年來港，有誤，應為一九三二年。參宋尚節：《靈歷集光——主僕宋尚節日記摘抄》(香港：恩雨，1995)，110。

19 《中華聖公會第十二屆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101。

20 同上書，112–13。

21 張磐生等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22 汪玉娟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23 鄧慶年：〈寓傳道於教育〉，《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110–11。

24 劉粵聲編：《香港基督教會史》(香港：香港基督教聯會，1941)。

25 *Handbook to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924*, 39–40.

26 《中華聖公會第十二屆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91。

27 下文主要參鄭家民：〈聖三一堂七十五年〉，35。

28 《中華聖公會第十二屆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91。

29 同上書，112。

30 鄭嘉德：〈聖樂部的過去與現在〉，《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1890–1965》，63。

31 張磐生等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32 汪玉娟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33 《中華聖公會第十二屆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99–100。

34 同上書，100。

35 關於如何評估《藍皮書》中涉及教會聚會人數的統計價值及限制，參邢福增：〈一九四九年前香港基督教的發展——宏觀歷史的考察（1842–1949）〉，氏著：《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4），1–7。

36 "Ecclesiastical Return," *Hong Kong Blue Book*, 1904–1936.

37 G. A. Bunbury, "Two Days from my Journal,"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57, no. 8 (August 1906): 601.

38 "Land Officer to Bishop of Victoria," 28 December 1933, HKRS 265–11B–1792(2), HKPRO.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to Bishop of Victoria," 30 December 1933, HKRS 58–1–15(58), HKPRO.

39 其他成員包括：李求恩會吏長、曹思晃牧師、李應標牧師、陳乃文（書記）、張榮舉、黃茂林、胡爾楝（正司庫）、蕭英麟（副司庫）、梁榮耀、李蔚蘆、馬永燦夫人、吳建中、陳劉桂生、黃馬可。另有數位在外埠委員：莫壽增會督、白烈士會吏長、江之永牧師、疏吉蓮姑娘、何理士姑娘等。鄭家民：〈聖三一堂七十五年〉，36。

40 "Bishop Hall to the Colonial Secretary," 19 March 1935, "Bishop Hall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4 July 1935, HKRS 58–1–15(58), HKPRO.

41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to the C.S.," 30 July 1935, HKRS 58–1–15(58), HKPRO.

42 "Letter from the Bishop," *The Outpost: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kong* (April 1934): 3.

43 鄭家民：〈聖三一堂七十五年〉，36。

44 "Bishop Hall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30 March 1936, HKRS 58–1–15(58), HKPRO.

45 一九三五年一月，莫壽增在香港被祝聖為聖公會華南教區副會督，是華南教區首位被封立的華人主教。當時香港亦稱主教為會督，本文為統一起見，一律稱主教。鍾仁立：《莫壽增傳》（香港：聖公會出版社，1972），55。

46 "Holy Trinity Church: Laying of Corner Stone By Bishop of Canton."

47 同上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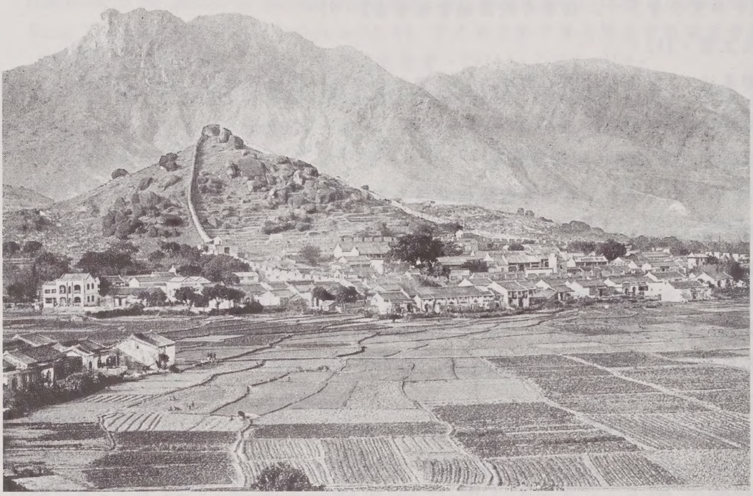
48 郭書謙：〈聖三一堂史略〉，《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62。

49 鄭家民：〈聖三一堂七十五年〉，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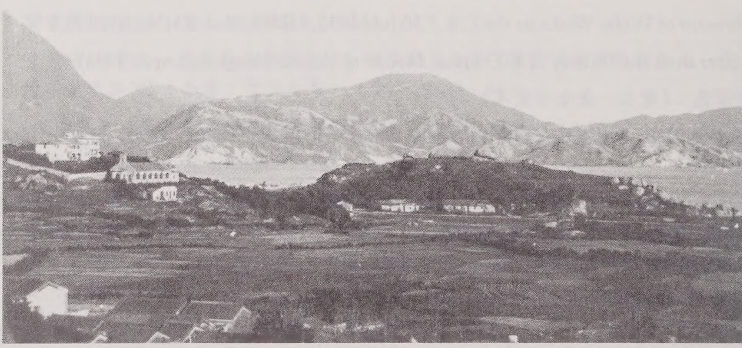
50 鍾仁立：《中華聖公會華南教區百年史略》（香港：中華聖公會會督府，1951），29。

51 《中華聖公會第十三屆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82。

52 《中華聖公會第十二屆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88；《中華聖公會第十三屆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82。



約1910年的白鶴山及九龍寨城



約1910年的聖三一堂（左方的小丘上）
及宋王臺（中右方）



李求恩牧師



曾紀岳牧師



李應標牧師



何明華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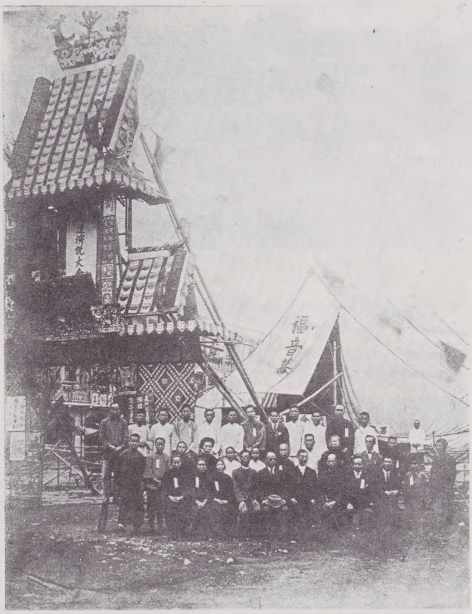
本港各會堂主日演講一覽表

會名	演講題	講員	開會時間
中華聖公會	申命記十六章十八節	李求恩牧師	十一時
道濟會	聖神之能力	葉啓芳先生	二時
公理會	未詳	慕徐法先生	十一時
循道會	未詳	譚儒之先生	十一時
浸信會	論聖靈詩篇一百零四篇節	張文照牧師	十二時
巴色會	須虔心接聖神	沈天福牧師	十一時
聖三一會	申命記十六章十八節	陳乃文先生	十一時
禮賢會	論聖神降臨使徒二章一至十三節	王堂愛牧師	十一時
聖保羅堂	申命記十六章十八節	黃福平會吏	十一時
聖馬利亞堂	申命記十六章十八節	李森葆先生	十一時
燈籠洲道濟支堂	眞理之神至約翰十六章十三節	麥榮泉先生	十一時
灣仔倫敦支堂	未詳	麥邑山先生	十一時
灣仔循道支堂	未詳	羅日新牧師	夜八時
紅磡浸信支堂	未詳	未詳	十二時
香港仔浸信會堂	聖靈降臨與主道之關係	羅守仁先生	十二時
油蔴地諸聖堂	申命記十六章十八節	曾紀岳牧師	十二時
油蔴地基督徒會	未詳	雷惠和牧師	二時
海面傳道會	道德與人有何關係	黃載恩先生	十一時
旺角公理支堂	未詳	未詳	十一時
潮州教會	未詳	未詳	十一時
[illegible]詳	未詳	未詳	十一時

十五

1925年5月31日的《基督教培道聯愛會周刊》刊登了港九各堂的講員名字，可見陳乃文先生和曾紀岳牧師分別在聖三一堂和諸聖堂講道。

1925年3月5日在九龍城舉行佈道大會時在福音幕下合照



1933年政府就新堂址的安排及賠償致函聖公會

361/1933.

KIL 1156

Awaiting old deeds from the Bishop

5.I.34

28th December, 1933.

Sir,

<u>Holy Trinity Church</u>.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having approved of the exchange of the site on which the above church stands for a new site in the vicinity, I now send a deed of surrender of the old site for execution by you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5 of Ordinance No.18 of 1902, as indicated in pencil. I also send a Memorial thereof for signature by you.

In due course you will receive a copy of the terms upon which the new site is to be held and a 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placing you in possession of the new site. The buildings on the old site should be removed by you within eighteen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the letter giving you possession of the new site.

I enclose a cheque for $12,548 as agreed, and shall be obliged by your signing the receipt on page 2 of the accompanying Treasury Voucher No.484 over a receipt stamp.

I have the honour to be,

Sir,

Your obedient servant,

Sd Philip Jacks

Land Officer.

The Rt. Rev.
The Bishop of Victoria,
The Bishop's House,
Hong Kong.

When returning these papers kindly send the old title deeds which are now obsolete



政府檔案地圖顯示的聖堂（K.I.L.1156）及學校（K.I.L.1116）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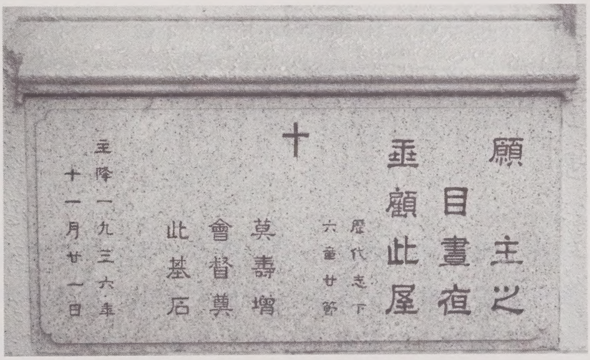
陳乃文先生



吳建中先生



1920年代後期馬頭涌一帶，左方已出現一些近代建築物，建築物後方為聖三一堂第二座聖堂



1936年11月21日奠基石



賣物會剪綵禮：右起何明華會督、李求恩會吏長、黃茂林太平紳士（中立剪綵者）、曾紀岳會吏長、李應標法政牧師

4

傳天國的福音

1904–1937

山上時期聖三一堂的歷史，跟廣蔭院、天國學校及維多利亞女校的發展是不可分割的。在不少會友心目中，這些名字壓根兒就是教會集體回憶的一部分，成為聖三一牧區宣講天國福音的見證。

昔日耶穌基督在拿撒勒的會堂，用以賽亞書 61 章來闡釋其召命（路加福音 4:16–19）：

>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

毋庸置疑，聖公會及聖三一堂藉着廣蔭院、天國學校、基督教墳場及維多利亞女校的服事，在在述說及見證着上主的恩典，臨護九龍城區內的一眾老弱孤幼。

城寨的基督

我們在上一章指出，慈惠工作在戰前的聖三一堂歷史中，佔有獨特的位置，其意義不僅在於這些工作果效如何，更重要的，是當時中外教會先賢以關顧社會中的弱者（特別是老弱婦孺）為己命。

聖公會九龍聖堂在一八九八年建立教堂，及後這個牧區如何發展？這是宗派內外不少教牧同工都密切關注的。當時聖堂四周仍是一片農田，但鄰近已有若干村落社群；在九龍寨城附近，更有商業市集，並以九龍街為中心。[1] 一八九八年，英國租借新界時，本同意清廷保留九龍寨城的主權，城內駐紮的官員可以各司其事。但不久，英國即派兵攻佔城寨。總理衙門雖然向英國交涉，但一九零零年爆發義和團之亂，清廷再無力兼顧此事，交涉就此告終。[2] 其時清廷在城內有五至六間駐九龍官員的衙門，中國官員被逐後，便一直空置。

當時，傳教士已發現，在福音傳播上，九龍寨城據戰略位置。一九零零年底，華南教區書記班為蘭（William Banister）致函政府，希望把城寨內原有的官署（即九龍司巡檢衙署）改建成學校。[3] 我們未有發現政府的正式回函，相信這個建議並沒有落實。

一九零二年，鄺日修遷居九龍城後，看到區內貧苦階層的需要，乃謀興建一所救濟院舍，供孤寡無依者棲身。於是，鄺日修與班為蘭商議，班氏非常贊同這項計劃，遂向香港政府申請，以九龍寨城內的舊衙署為院舍。[4] 結果，申請獲准，政府把數所衙門房子租予聖公會，並訂下條款：「政府每年發出許可證租出此建築物，並可於三個月前停止租約。每所建築物將收取象徵式租金一元正」。此外，租用者須管理該等建築物，以供人居住。[5]

一九零二年，廣蔭院（Almshouse）正式啟用。廣蔭院包括幾所建築物，正院供女性及兒童居住，正院以外還有三所院舍，分

別為平安房、安居舍和廣愛院。成立初期，各房舍共收容八十八人。[6] 正院正門之上書有兩行中英文：「安立間教會貧窮院」、"Anglican Church Alms House"。[7] 在數年間，又新增天國救道堂及天國學校。

聖公會傳道會又開辦了雅士居留院（Eyre Refuge）(「安居舍」可能就是居留院的名字，待查)。居留院由婦女教育協會（Female Education Society）的雅士女士（Miss Eyre）主持，該會不是聖公會差會組織，卻跟差會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係，與不少差會女傳教士共同開展婦女事工。雅士居留院的性質類似保良局，主要收留孤兒寡婦，提供工作機會。居留院的經濟開支，大部分由差會供給。[8]

廣蔭院的宗旨是服務貧、病及孤苦無助的華人基督徒。廣蔭院的規章訂明起居生活守則，最後一條特別強調：

> 本院乃宗教性質之組織，雖為肉身而設，但〔培〕養靈性之事工，實不可少，故每日宜定時開宗教敍集一次，唱詩祈禱，由掌院主理其事。[9]

初期的宗教聚會，就在正院內舉行。主日又設崇拜，開放予鄰近人士參加。不過，鄺日修後來發現主日崇拜時有男性來到女性居住的正院，於禮不合。於是，他再跟班為蘭商討，希望在城寨內覓地作佈道所。一九零七年三月班氏再致函政府，希望以聖公會傳道會名義，租用城寨內空置的廟宇作佈道所。政府接納有關申請，沿用廣蔭院的條款租予聖公會傳道會。[10] 租出的空置廟宇，即二聖廟及武帝廟，後改建成為天國救道堂。[11] 天國救道堂可容百多人聚會，每星期三晚有祈禱會，以佈道形式，歡迎外人參加。每逢農曆正月初一至初八，每天均舉行佈道會。[12] 一九三六年聖三一堂拆卸重建時，會友便在天國救道堂聚會。

除廣蔭院及天國救道堂外，一九零六年，鄺日修又在城寨內興辦聖保羅小學校。這所學校也是通過聖公會傳道會向政府租用

原九龍司其中一間衙門舊址，舊官衙內沒有設備，連學生的桌椅也是臨時湊集的。[13] 多年後擔任聖公會會吏長的鍾仁立，幼時居於新界青山，也曾在這所小學就讀。他憶述，當時學生人數也不少，除了有九龍城區的兒童，也有他這些來自新界的學童在校寄宿。他說：「鄺牧師和藹可親，朝夕與少年兒童學生會面，耳提面命，猶如家人。」[14]

至李求恩主理聖三一堂時，學校易名「天國學校」，[15] 專門收容貧苦少年，教授他們普通科及工藝知識。[16] 在李求恩會吏長的傳記中，對天國學校有這樣的描述：

> 天國學校並不是和普通的學校一樣，只要能負擔起學費，就可以入讀；而是還包含有救濟性質的。因為在天國學校的學生，都是如果並非家境清貧就是無所依靠的兒童。所以，不止不收任何費用，必要時還可以獲得補貼。而課程方面，除了一般的之外，更特別設立各項工藝的教習。希望他們離校之後，既有普通知識，更有一技之長，以為謀求生活的準備。這樣的一間學校，自為社會所必需；而基督教會辦理這樣的一間學校，更是饒有意義。[17]

當時，天國學校有一位青年人，他的右手在意外中折斷，後來從鄉間來港，輾轉加入教會，就在天國學校讀了兩年小學，然後再轉到聖保羅中學讀英文。這位獨臂少年有畫畫的天分，深得校長史釗活（Arthur Dudley Stewart）牧師 [18] 欣賞，並介紹他到 Leigh & Orange 則師樓作學徒，其後成為則師樓的繪圖員。他的名字叫吳建中，一九三七年落成的聖三一堂，就是由他設計。[19] 其他曾於天國學校就讀者包括江之永牧師、梁葵及蕭英麟等。[20]

天國學校開設主日學，一九三二年有主日學男老師兩人、男生七十名及女生三名。[21] 這所學校一直服務至一九三六年才停辦，[22] 部分學生轉至聖公會在大埔新設的孤兒院。[23]

聖公會傳道會成立了管理廣蔭院的委員會，特別委任了四位勸捐委辦員，為院舍籌募經費。不過，所有院務基本上均由鄺牧師主理，差會方面甚至沒有委員會召開會議的記錄。為了廣蔭院的經費，鄺日修「不惜心思耗盡，腦汁絞乾」，特意撰寫傳道小冊子《真道明辨》及自製福音月份牌，將出售所得收益悉數用作院舍的經費。據統計，從一九零二年至一九一八年間，院舍的開支合共一萬零七百元，除部分由公眾捐助外，大部分均仰賴鄺日修牧師籌得。[24]

廣蔭院由創立至一九一七年，入院者共有三百零二人，辭世者五十一人，住院一段時間後因家人環境改善而離院者一百三十二人，於一九一七年留院者計有一百一十九人。[25] 在一九一八年度，住院者有一百零九人。住院者當中，十八歲以下、十八至五十歲、五十歲以上者，各佔約三分之一；各種身體殘障者共十一人。[26] 由此可見，當時的廣蔭院真是名副其實，「廣蔭」天下之士。

聖三一堂的年長會友中，不少人也曾與廣蔭院結緣。例如張磐生及其親屬、梁榮耀的親屬等，都曾受廣蔭院之「蔭」。每逢聖誕、復活節時，不少院友也會到聖三一堂參加特別崇拜。

鄺日修牧師畢竟年邁，難以一己之力支持全院事工，遂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邀請香港中華基督教聯會磋商廣蔭院的發展與交接問題，當時會上代表均支持是項安排。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七日，他們再於港島聖保羅書院聚會，選舉廣蔭院的管理委員會及擬定規章。廣蔭院正式易名為「廣蔭老人院」，隸屬香港基督教聯會慈善部。

廣蔭老人院第一任職員包括了當時香港各宗派的領袖。主席由聖公會維多利亞教區主教倫治華（Gerald H. Lander）[27] 擔任，副主席為鄺日修、翁挺生（公理會牧師），書記李求恩，司庫鍾茂豐。董事包括唐穗田（堅道浸信會牧師）、王國璇（堅道浸信會執事）、王愛棠（禮賢會牧師）、張祝齡（倫敦會道濟會堂牧師）、黃詠德（倫敦會道濟會堂會友）、何麗臣（倫敦會道濟會堂會友、香

港中華基督教會青年會的幹事)、蘇佩球(香港循道公會牧師)、張吉盛(香港循道公會會友)、沈天福及鄭幹生。正院長為鍾茂豐,副院長為潘建廷。[28] 廣蔭院原是由鄺日修牧師及聖公會傳道會合力創辦,後來在本港各宗派、機構領袖支持下,演變成香港基督教會合作的事業。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統治香港達三年零八個月。香港淪陷期間,日軍拆毀城寨內部分建築,作為擴建機場物料,廣蔭院也逃不過被毀的命運,只留下廣蔭院主樓,其他建築物均被拆毀。在艱難歲月中,廣蔭院歸入香港基督教總會 [29] 慈善部負責,仍有數十位老人居住院內,直至香港重光。一九五零年二月,九龍城大火,老人院大部分院舍亦被波及。當時,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30] 特籌款十餘萬重建廣蔭院,得胡文虎捐贈九萬元,新院舍乃命名為「文虎樓」,至一九六零年收容了一百七十多名老人。[31] 一九六五年,華人基督教聯會增建鑽石山廣蔭老人院。一九六九年,九龍城寨的廣蔭院因建築陳舊、環境惡劣,聯會遂放棄該院舍,將院友全遷往鑽石山廣蔭老人院。

死有所歸

自聖三一堂創立以來,堂會本身不斷發展,加上在九龍寨城開展的慈惠及宗教事工,三一牧區漸漸孕育出一個基督徒社群。同時,鄺日修牧師曾旅居澳洲,跟當地華僑仍維持聯繫,部分華僑信徒移居香港後,便在九龍城置業安居。[32] 除澳洲外,會友中也有來自南洋和美洲的。[33]

在三一牧區的信眾中,老弱人士佔一定比例。鄺日修因而意識到要為華人基督徒提供安葬之所,乃聯合本港其他教會人士,向政府申請領地建華人基督教墳場。這裏,我們需要略略交代香港華人及基督徒的殯葬問題。[34]

香港是個移民社會，許多華人均從華南來港謀生及尋找機會。移民在港一旦去世，便出現「客死異鄉」的問題。在死亡觀念上，中國人重視入土為安，也強調死有所歸，死後必須「歸」葬故鄉。當時，在港有經濟條件的華人知道自己生命快將完結，都會選擇回鄉下葬。[35] 可是，大部分低下階層的華人移民多為單身勞工，經濟條件不足，不能歸鄉落葬。於是，在港島上環一帶有一處名為太平山區，就成為早年逝世華人埋葬的地方。[36]

一八五六年，定例局通過法例規範華人安葬，正式授權政府設立華人墳場及管制華人的葬儀。[37] 同年，政府根據法例著手管理華人墳場，把摩星嶺及黃泥涌谷兩地規定為法定的華人墳場。[38] 因墳地需求日增，政府在港九各地闢建了多個華人墳場。[39] 不過，上述墓地，只能滿足一般華人的殯葬需要。華人殯葬的儀式，特別是焚香及燒紙等習俗，都跟基督教信仰衝突。有見及此，倫敦傳道會、聖公會傳道會及巴色傳道會（Basel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的傳教士便要求政府特別關注華人基督徒的殯葬需要，爭取劃出專用墓地。一八五八年，政府同意在香港島西區（Western District）設立專供華人基督徒安葬的墓地。[40] 墓地位於上環一帶，鄰近太平山區，可說是第一塊華人基督徒墓地。[41]

一八八零年代，殖民地政府因着城市發展需要，決定收回原有太平山區附近的華人基督徒墓地，居港信徒因而「有『死無葬身之地』之慮」。於是，三個差會的傳教士再次聯名請求政府撥地，以應付太平山墳場關閉後的安葬需要。[42] 一八八二年九月二日，政府刊憲，公佈批出薄扶林路以下西面山坡，專供華人基督徒安葬。[43] 其範圍由五塊界石示明，北界線接摩星嶺、南界線接官地、東界線接薄扶林道、西界線接海邊（沙灣）的高潮線，佔地四十三英畝。據悉，當時在墳場四面均刻有「耶穌聖教墳場」六字，塗以紅硃，頂上刻有英文，塗以金色，豎立地界中。[44]

十九世紀末，九龍半島開始發展，個別差會亦於此建立據點，傳播福音。薄扶林基督教墳場位於香港島，頗不利便居住於九龍

的信徒，遂有在九龍設基督徒墳場之議。一九零三年八月，鄺日修聯同 Pun King-hang、Wong Ki-hing（倫敦會）和李鼎新（浸信會）四人聯名上書，指當時居住於土瓜灣、紅磡、油麻地一帶的信徒，苦無墳地安葬祖先，希望政府批出馬頭圍村附近的地方作華人基督教墳場。[45] 華人基督徒的申請，獲得維多利亞教區主教霍約瑟（Joseph C. Hoare）支持，他在致政府的薦函中，形容當時九龍城正在匯聚一個基督徒社群，對墳地的需求殷切。[46]

一九零四年三月，政府刊憲，公佈把新九龍內地段五號（New Kowloon Inland Lot. No. 5），即九龍寨城以北約二百呎山坡（北界 208 呎 9 吋，南界 208 呎 9 吋，東界 208 呎 9 吋，西界 208 呎 9 吋）闢為華人基督徒墳場，這個墳場又稱為「晒魚石基督教墳場」（Shai Yu Shek Christian Cemetery），[47] 墳場佔地十點零五英畝。[48] 一九一九年，維多利亞教區主教再致函政府，要求擴大墳場面積，政府批准加增五萬七千五百八十五平方呎。[49] 一九二一年鄺日修牧師離世，即安葬於此。

一九三二年，九龍墳場正式移交香港基督教聯會管理。一九二五年七月，政府在九龍城設「新九龍一號墳場」，佔地面積增至二十萬五千三百二十平方呎。[50] 有關地區，即九龍城白鶴山頭。現時，在九龍墳場內仍可見到「耶穌教墳場」的石刻。據統計，從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三八年間，共有一千四百八十六人在九龍華人基督徒墳場安葬。[51]

山上的憐憫

維多利亞女校（Victoria Home and Orphanage）與聖三一堂向來關係密切，一九零四年建成的新聖堂所在的小山丘，名叫維多利亞山，就是以山上的維多利亞女校命名。一九零二年舊堂拆卸，新堂尚未啟用時，維多利亞女校便權充聚會地方。

維多利亞女校創辦於一八八八年三月，由聖公會傳道會駐港的傳教士何思悌牧師夫婦（Rev. and Mrs. John B. Ost）創立。學校為紀念維多利亞女皇登基銀禧而命名，院舍建於港島西環。女校設有管理委員會，正副主席分別由港督夫人、駐港英軍總司令夫人及主教夫人擔任。[52] 女校創立的目的，是要為「華人女子提供教育與住宿，不論是否孤兒，並收容及拯救幾近淪落的女子」。[53] 其中一位協助女校的傳教士 Miss Hipwell 曾在信中提及中國女性的不同遭遇：女嬰被殺並棄屍、纏足、未成年訂婚等。她特別關心販賣女童的問題：

> 在中國，每一位女子都有其市場價值（market value），可以被販賣作妻妾或奴僕。教會傳道會女校成了許多不同年紀的女子的避難所。她們從凶惡的女主人那裏逃脫，並在英國旗下尋求保護，身體的傷痕及破碎的心靈述說着其悲痛的故事。[54]

可以說，維多利亞女校是一所類似保良局 [55] 的女童收容所及寄宿學校。成立初期已加入政府教育署的「補助」計劃（Grant in Aid Scheme），按照政府的本地學校（vernacular schools）模式運作。一八八八年有二十六名女生，但到一八九九年即增至四十人。[56] 一八九一年至一九零零年間，共收容了八十名女生，其中三十五名是從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及華民政務司（Registrar-General）通過保良局轉介過來的。[57] 華民政務司每年亦會從慈善基金中撥款予女校。[58]

一九零零年三月，霍約瑟主教致函總督卜力（Sir Henry A. Blakes），表示女校在西環的校址將用作其他教育用途（原址改作女子聖經學校 [59]），希望政府可以在九龍城宋山附近（鄰近聖公會教會）批出土地作女校新址。[60] 駐港英軍總司令加斯覺（Major-General Sir William Julius Gascoigne）也致函予英國殖民地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支持申請並建議只收取象徵式年租一元。[61] 七月十六日，張伯倫指示香港總督，同意以年租一元及七十五年期批出有關地段。[62]

一九零二年十二月，新院舍建成，地點就在舊聖堂以北的山上。負責女校的 Miss Hamper 在遷校後說：

> 我們在此已六個月，直至今日，毋庸置疑，這確是個好的轉變。鄉間的自由生活更適合我們在班上要照顧的女生。[63]

據學校的紀錄，「半鄉村生活」(semi country life) 很適合開辦這類院舍。一九零七年時，在院女生已達七十八人。女校因人數增加而擴建，新翼在一九一三年完成。一九一四年，政府再批准把鄰近的土地改作女校的運動場。這時，由於學校兼收了很多低收入基督徒家庭的女兒，學生人數進一步增加。到一九二六年時，在校女生達一百四十六人。此時，學校爆發傳染病，校方藉此機會向政府反映，希望能原地擴建，增加空間。但因當時港府已有意夷平維多利亞山，擴建只得擱置。[64]

學校由聖公會傳道會的女傳教士主理，但一直得鄺日修夫婦協助，而鄺師母更曾擔任校長（head mistress），是女生的良師益友。[65] 一九二四年，華籍老師人數（6 名）曾多於女傳教士（2 名）。學校經費除了來自政府的資助外，亦有英國、澳洲及本地的捐助。[66] 女校又設主日學，一九三二年時有九名女教員，負責教導二十名男學員及一百三十名女學員。[67]

維多利亞女校的學生，除部分來自基督徒家庭外，入讀時均非信徒。其中部分因在基督教氛圍下認識信仰，就在聖三一堂接受聖洗禮。Miss E. S. Houlder 曾記述，一九零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有七名女生在新落成的聖三一堂領洗，除了一人外，其餘均曾為「妹仔」(婢女)，她們逐一宣認願作基督精兵，一生為祂的僕人。至一九零四年底，在校五十一名女生中，三十三人已受洗。[68] 當她們長大後，部分留校擔任老師。而這些女基督徒，往往成為男傳道及信徒的婚配對象。[69] 其中一位「書館女」名楊德貞，後來便與天國學校的學生吳建中結婚。[70]

一九三六年，因為政府要夷平維多利亞山，聖三一堂及維多利亞女校都要覓地重建。最後，教區決定把維多利亞女校與聖公會在港島的飛利女校(Fairlea School)[71] 合併，易名協恩女子中學，校址位於九龍城。[72] 按當時預計，協恩女校在一九三七年九月開學時，約有二百五十名女生，其中五十人來自維多利亞女校。[73] 合併以後，協恩的學生仍常常到聖三一堂參加聚會。至於維多利亞女校其餘三十一名較年幼的孤兒，便轉到一九三五年聖公會在大埔新設的農化孤兒院（Taipo Orphanage)。[74] 同時，天國學校的六位男生亦轉至那裏。[75] 因着聖三一堂與大埔孤兒院的關係，早期住院兒童也是到聖三一堂接受洗禮的。[76]

本色化建築

一九三二年，何明華(Ronald O. Hall)就任維多利亞教區(港粵教區）第七任主教。何明華一直關心中國，對基督教及中國問題多有反省。一九三三年港粵教區第十二屆議會於廣州聖三一學校舉行，他在會上發表兩大政綱：一為教區幅員廣大，應有華人副主教（會督)，以促進華人教會之自治。其次是以後中國教會禮拜堂之建築款式，外面宜用中國建築形式，裏面可採用外國設計。[77] 未幾，他便按立莫壽增為教區副主教，實現了第一個目標。

一九三三年，當港府通知聖公會教區議會須收回聖三一堂地段，以便夷平維多利亞山後，何明華即支持以中國建築風格興建新聖三一堂。[78] 新堂由吳建中設計，可說是他的心血結晶。這所具傳統中國建築特色的教堂，也由他監督工程進展。有學者指出，這類建築可視作「中國的文藝復興」，而充當這次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先鋒，主要是西方的傳教士和建築師。[79] 就聖三一堂的例子而言，這運動可說是中西合作的成果。

富中國傳統建築特色的教堂，跟二十世紀基督教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運動有密切關係。誠如香港大學建築系龍炳頤教授指出：

> 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國內產生了「非基」運動或「反教」運動，對西方傳入的宗教思想作出全面抗拒，而三十年代建立的中國人自己的教會，卻帶有濃厚的愛國宗教思想，它不只是在禮儀上、神學上有所改變，甚至在行政上、經濟上也要獨立，於是教堂的建築形式也實行中國化，以配合「自養、自傳、自治」的路向。
>
> 適逢中國第一批唸建築的英美留學生如梁思成（梁啟超之子）和夫人、楊廷寶、朱彬、周頌聲、呂彥直、范文照等人也在二十年代學成返國，他們的腦子帶着西方建築方法和思想，但也熱愛中國文化，如何將西方建築方法和中國建築思想互相結合而產生出一種「現代的中國建築」就是他們當前的急務，自此，這批留學生分道揚鑣，梁思成和夫人組織「中國營造學社」，專門研究中國傳統建築營造法，而另一批則為執業建築師。在這種中西結合的建築潮流下，遇上「本色神學」的推動，於是產生了中國式的西洋教堂建築，而香港的教堂也受到這種風氣影響。[80]

何明華正是這種「中國化」教堂的主要推手。作為英國傳教士，如何融合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是他的宿願。一九三零年，挪威籍的道友會（Christian Mission to Buddhists）傳教士艾香德（Karl Ludvig Reicheld）在沙田道風山創辦基督教叢林，便完全採取佛教寺院的設計，希望可以為基督教與佛教營造對話空間，進而引領僧侶皈信。[81] 何明華十分欣賞艾氏的異象與努力，甚至邀請艾氏為主教府的小禮堂提供設計意念，並採納其建議，將之命名為「靈蔭臺」，意思是在上主聖靈的蔭庇之下，期望能吸引佛道背景人士在此認識基督教信仰。[82] 這樣看來，何氏主張把中國建築風格與基督教聖堂結合，可能是受了艾香德的啟迪。在他任內，香港聖

公會兩所同期重建的聖堂（聖三一堂及聖馬利亞堂），均由吳建中以中國特色的建築風格來設計。[83]

聖三一堂吸收了中國傳統的建築特色，同時又融合了基督教信仰的原素。[84] 從整體佈局觀之，聖三一堂坐南向北，左右對稱，除了正面橫向部分外，又加上會眾座直向部分。在閣樓左面，又仿中國寺廟內左鐘右鼓的設計，安有銅鐘。

中國傳統建築由台基、屋身及屋頂三部分組成。聖三一堂門前有三級石階，表徵三位一體之意。教堂的屋身由四排柱子配以樑架支撐，樑架是五檁懸山式。至於屋頂則像許多清代寺廟一樣，採歇山形式，屋頂下有斗拱。整個屋頂用黑色和瓦綠色的瓦簷，坡度較陡峻，氣氛莊嚴。正脊中央有十字架，垂脊以三隻和平白鴿為獸頭，取代傳統的龍、鳳、獅等，靈巧地表達了基督教的象徵。

聖堂內部亦採用中國傳統圖案裝飾，充滿民族色彩。左右兩邊牆壁上有雷紋和雲紋，代表宇宙與自然界之莊嚴。兩邊的旁柱上，有傳統中國的鳳紋配合基督教聖誕樹的圖案。四周窗子除中國窗櫺的特色外，中間又鑲嵌了十字架，使中國傳統與基督教信仰的內容巧妙地結合起來。

聖堂的內部陳設也結合了中國文化與基督教。聖餐桌旁的兩對燭台雕成竹樹一樣，象徵正直公義和節氣。洗禮盆的木蓋則雕有果實纍纍的葡萄，代表聖靈的果子，也象徵信徒在基督裏互相連結。聖壇圍欄是中國式的雷紋圖案，警惕信徒需懺悔認罪才能領餐。

值得一書的是聖壇的擺設。在一九七七年以前，聖三一堂的聖壇是向牆的，牧師主領聖禮之時要面向十字架，背向會眾。這個安排的意義，是牧師與會眾一起，面向上主，省察自己的罪及上帝的救恩。到一九七六年的時候，謝博文牧師提議將聖壇設在

較前位置，不再靠牆，在聖禮的時候牧師面向會眾。這安排象徵牧師與會眾一起，慶祝上主賜下的恩典，加強其中團契的意義。

按原本的建築計劃，在正堂落成之後還會再興建一座塔形的牧師樓，可惜因二次大戰爆發而告吹。[85]

小結

耶穌曾在加利利各會堂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馬太福音 4:23)。從本章可見，聖公會及聖三一堂在戰前的九龍城區，也致力實踐天國的召命，透過服務及其他工作，在地上拓展天國。

一方面，聖公會及聖三一堂沒有忘記關愛窮人及弱者，而是針對老弱孤幼的需要，先後在九龍城區開設廣蔭院、天國學校及維多利亞女校。同時又聯同本港教會申領墳地，讓離世信徒入土為安，死有所歸。二十世紀前期的九龍城區，主要仍是個鄉村社會，各種社會問題仰賴傳統鄉治善社處理。[86] 聖三一堂是區內最早成立的教會，但並沒有在維多利亞山上獨善其身，反倒與其所屬宗派聖公會攜手，帶着基督的愛提供各種服務，廣蔭天下，用行動實證天國的福音。

另方面，天國的福音亦有其文化融合的向度。聖三一堂在一九三七年落成的新堂，既能融合傳統中國風格，又不失基督教的主體，為香港基督教教堂建築史寫下重要的一頁。這樣的教堂雖然在中國基督教史上仍屬少數，卻充分反映中西方教會人士結合信仰與本地文化的關懷，成為基督教本色化的重要典範。[87]

注：

1 James Hayes, "Kowloon City and Kowloon Street: The Community Institutions of a Yamen, Market, and Rural Subdistrict," in James Hayes, *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Hamden, CT: Archon Books, 1977), 163–80.

2 高添強：〈二十世紀前九龍城地區史略〉，趙雨樂、鍾寶賢編：《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59–65。另編委會編：《九龍城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30–31。

3 "Yamen Buildings Kowloon City," HKRS 58–1–15(36), HKPRO.

4 "A Short History: Kowloon Almshouse," *Bishop Scrapbook*, Bishop Joseph Charles Hoare (1898–1906), 67, HKMS 94 1/5, HKPRO.

5 "Term of Lease of the Buildings Used as Almshouses," n.d., CMS Archive.

6 〈廣蔭老人院〉，《聖公會港澳教區一九六零年募捐運動報告》（香港：聖公會港澳教區，1960），166。

7 老教友：〈聖三一堂初期大事年紀，1890–1935〉，《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80），560。

8 *Handbook to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924* (London / Hong Kong: Victoria Diocese Association, n.d.), 42. 另鄭家民：〈聖三一堂七十五年〉，《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1890–1965》（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65〕），34。

9 《香港九龍城中華基督教廣蔭院史略，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徵信錄》，CMS Archive。

10 "W. Banister to D.P.W," 18 March 1907,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to the Colonial Secretary," 26 March 1907, HKRS 58–1–39(66), HKPRO.

11 編委會：《九龍城風物志》，108。《九龍城風物志》指租予聖公會的是三聖廟。不過，據一九零二年的城寨平面圖，鄰近九龍司巡檢衙署的，分別有二聖廟及武帝廟，兩廟並排而建。有關平面圖參高添強：〈二十世紀前九龍城地區史略〉，54。「三聖」指劉備、關羽及張飛，其中關羽即關武帝。估計「三聖廟」應為二聖廟及武帝廟的統稱。

12 鄭家民：〈聖三一堂七十五年〉，34。

13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to the Colonial Secretary," 26 March 1907, HKRS 58–1–39(66), HKPRO.

14 鍾仁立：〈鄺日修牧師傳略，1840–1921〉，收劉瑞滔編：《港粵澳名牧生平》（香港：中華基督徒送書會，1975），1:9。

15 天國學校的名字從何時開始？一說是一九零五年鄺日修創辦時已沿用此名，參鄧慶年：〈寓傳道於教育〉，《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110。另一說是李求恩在一九一五年創辦，參黃國仁：《服務教會半世紀——李求恩會吏長生平》（香港：諸聖先導出版委員會，1964），31。筆者相信，鄺日修時期學校的名字應是聖保羅小學校，天國學校是李求恩時改的名。

16 黃國仁：《服務教會半世紀》，30。

17 同上書，62。

18 史釗活牧師自一九零九至一九三三年任校長。參"History"，聖保羅書院網頁，http://www.spc.edu.hk/profile/history.php#1909。

19 KZER：〈我所認識的吳建中先生〉，《聖公會聖三一堂一百一十周年堂慶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2000），38。

20 郭書謙：〈聖三一堂史略〉，《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90），29。

21 《中華聖公會第十二屆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香港：中華聖公會，1933），113。

22 鄧慶年：〈寓傳道於教育〉，110。

23 〈六十年大事紀要〉,《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鑽禧紀念特刊,1935–1995》(香港: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1995),39。

24 "A Short History: Kowloon Almshouse."《香港九龍城中華基督教廣蔭院史略,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徵信錄》,CMS Archive。

25 "A Short History: Kowloon Almshouse."

26 《香港九龍城中華基督教廣蔭院史略》,CMS Archive。

27 倫治華是維多利亞教區第五任主教,任期從一九零七至一九二零年。

28 《香港九龍城中華基督教廣蔭院史略》,CMS Archive。

29 一九四三年,香港中華基督教聯會停止運作,在日本軍方壓力下,成立香港基督教總會。參陳智衡:《太陽旗下的十架——香港日治時期基督教會史,1941–1945》(香港:建道神學院,2009),第5章。

30 一九四八年,香港中華基督教聯會易名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31 〈廣蔭老人院〉,166。

32 梁榮耀便是最佳例子,他的父親從澳洲回國時已信主,其後在香港居住。梁夫人的家人也是自海外回國。梁榮耀的兒子梁恩靈是聖三一堂會友,梁寶靈原也是會友,因遷居而到元朗聖馬提亞堂聚會。另一位兒子梁熾靈後成為聖公會牧師,曾任聖公會聖保羅堂主任。

33 黃志誠由祖父一代已是基督徒,從山打根回國,父親黃馬可是戰前聖三一堂熱心堂務的會友。

34 有關香港基督教墳場的歷史,參邢福增:《此世與他世之間——香港基督教墳場的歷史與文化》(未刊稿)。

35 高添強:〈開埠初期的華人喪葬〉,冼玉儀、劉潤和編:《益善行道——東華三院一百三十五周年紀念專題文集》(香港:三聯書店,2006),83。高氏引述一八五五年的《遐邇貫珍》,提及「大抵於歲中帶病回鄉西歸故里者亦復不少」。

36 高添強:〈開埠初期的華人喪葬〉,83。

37 "No.12 of 1856, An Ordinance to Regulate Chinese Burials, and to Prevent Certain Nuisances, within the Colony of Hong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4 June 1856, 5–6.

38 "No.71: Government Notification,"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21 June 1856, 1.

39 高添強:〈香港墳場發展史略 1841–1950〉,收梁美儀、張燦輝合編:《凝視死亡——死與人間的多元省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224–26。

40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01–202.

41 早於一九四一年出版的《香港基督教會史》指,早期信徒均葬於太平山。劉粵聲編:《香港基督教會史》(香港:香港浸信教會,1996重排版),187。

42 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會史》,187。

43 "No. 354: Chinese Burial Ground,"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2 September 1882, 728.

44 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會史》,188。

45 "The Humble Petition," August 1903, in Cemetery for Christian Chinese, Petition for–at Pa Mui Shan, PRO, HKRS 203–1–25–63.

46 "Bishop's Letter," 7 September 1903, HKRS 203–1–25–63, HKPRO.

47 "No. 234: Government Notification,"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31 March 1904, 634. 晒魚石基督教墳場的名稱，參"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1908," *Administrative Report*, 1908, P9.

48 工務局年報指墳場佔地一點零零五英畝，應為十點零五英畝。按一英畝等於四千零四十七平方呎，一點零零五英畝即四千零六十七點二平方呎。據華人基督教聯會九龍墳場原面積四萬三千八百五十平方呎，故筆者相信應為十點零五英畝。"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1904," *Administrative Report*, 1905, 218. 另陳國煌：〈公墳部事工回顧與展望〉，《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七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15–1990》（香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1990），21。

49 "No. 420: Government Notification,"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2 September 1919, 390. "Protestant Chinese Cemetery Kowloon City, Grant of Land, Proposed Extension," HKRS 58–1–90–28, HKPRO.

50 "No. 410: Government Notification,"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0 July 1925, 370. 工務局的年報指墳場面積為三十萬五千三百二十平方呎。"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1925," *Administrative Report*, 1925, Q26.

51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ve Report*, 1905–1939.

52 "The Victoria Home of Orphanage, Reminiscences by M. J. Ost," *Bishop Scrapbook*, J. S. Burdon, 73, HKPRO.

53 "Victoria Home and Orphanage, Annual Report, 1888," n.d., CMS Archive.

54 *Proceeding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904–05*, 337.

55 保良局於一八七八年成立，主要工作是拯救被拐帶、被迫良為娼的婦女和被虐待的婢女，或將她們遣回原籍，或為她們擇偶配婚，或待領育。期間由保良局安置，供給衣食。參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1997），171。

56 "The Victoria Home of Orphanage, Reminiscences by M. J. Ost.," "The Educational Report for 1888," *Sessional Papers*, 1889, 108.

57 "Gascoigne to Chamberlain," 16 May 1900, CO 129/299, 172.

58 一九零四年的資助額是全校二十五元。參"Report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for the Year 1904," *Sessional Papers*, 1905, 130.

59 "A Peep into the Past, Victoria Home, Kowloon," *Bishop Scrapbook*, Joseph C. Hoare, 17, HKMS 94 1/5, HKPRO.

60 "J. C. Victoria to Governor," 17 March 1900, CO 129/299, 174.

61 "Gascoigne to Chamberlain."

62 "Chamberlain to Blake," 16 July 1900, HKRS 58–1–15(30), HKPRO.

63 "Victor Home, Kowloon City," *From Month to Month* 39 (August 1903): 2.

64 "A Peep into the Past, Victoria Home, Kowloon."

65 "The Victoria Home of Orphanage, Reminiscences by M. J. Ost."

66 *Handbook to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924*, 37.

67 《中華聖公會第十二屆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112。

68 "South China,"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56, no. 4 (April 1905): 298.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時，一位女舍監及八位女生接受水禮。*Proceeding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911–12*, 168.

69 *Handbook to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924, 37.

70 KZER：〈我所認識的吳建中先生〉，38。

71 飛利女校於一八九二年由婦女教育協會（Female Education Society）創立，在一八九八年移交給聖公會傳道會，校址位於港島般含道城西公園（West End Park）附近。*Handbook to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924, 36.

72 "Home News and Notes," *The Outpost: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July–September 1937): 16. 協恩的意思，即協作的恩典（united grace），寓意兩所學校的協作，益顯上主的恩典。

73 "Letters from the Bishop," *The Outpost: Interim Newsletter,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Kong, South China)* (October–November 1937): 6.

74 "Rescue Work in South China," *The Outpost: Interim Newsletter,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Kong, South China)* (October 1934): 4–8.

75 "Minute 615: Taipo Orphanage Scheme," 31 October 1935, G1 CH 1e11, Reel 396, CMS Archive. 這所大埔孤兒院，在一九五四年易名為聖基道化院（St. Christopher's Home）。〈六十年大事紀要〉，39。

76 張紹培題字，《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15。

77 鍾仁立：《中華聖公會華南教區百年史略》（香港：中華聖公會會督府，1951），26。

78 "Bishop Ronald Hall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9 April 1937, HKRS 58–1–15(58), HKPRO.

79 吳志華：〈香港文藝復興的三十年代〉，《明報》，2005 年 3 月 27 日。

80 龍炳頤：《香港古今建築》（香港：三聯書店，1992），129。

81 參 Eric J. Sharpe, *Karl Ludvig Reichelt: Missionary, Scholar and Pilgrim* (Hong Kong: Tao Fong Shan Ecumenical Centre, 1984).

82 "Letter from the Bishop," *The Outpost: Interim Newsletter,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Kong, South China)* (April 1934): 5. 靈蔭臺的改建工程，預算為一萬一千元。

83 KZER：〈我所認識的吳建中先生〉，38–39。

84 本部分主要參考郭佩蘭：〈古色古香的聖三一堂〉，《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66–68。另謝博文：〈從建築及設計角度去看聖三一堂的生命〉，《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83。

85 小兵：〈本堂元老〉，《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65。

86 九龍城區歷史最悠久的慈善組織是樂善堂。參趙雨樂、鐘寶賢：《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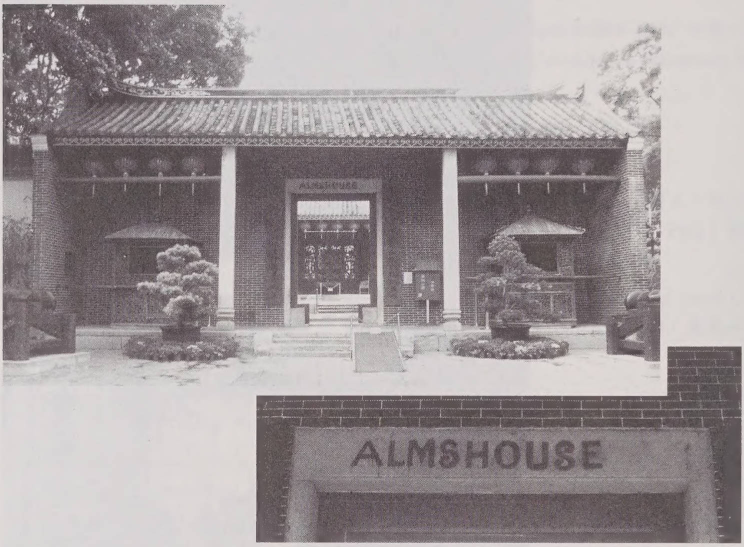
87 Paul P. Wiant, "An Architect Looks at Chinese Churches," *Chinese Recorder* 72, no. 4 (April 1941): 189–93.



寨城內的養老院 (194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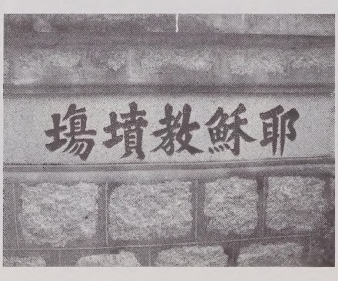
寨城舊衙門內的老人院 (1966年)



九龍寨城公園內的廣蔭院遺址，正門之上仍有Almshouse字眼



天國學校



九龍墳場現時仍可見
「耶穌教墳場」石刻



聯合道的基督教墳場及白鶴山



聯合道九龍基督教會墳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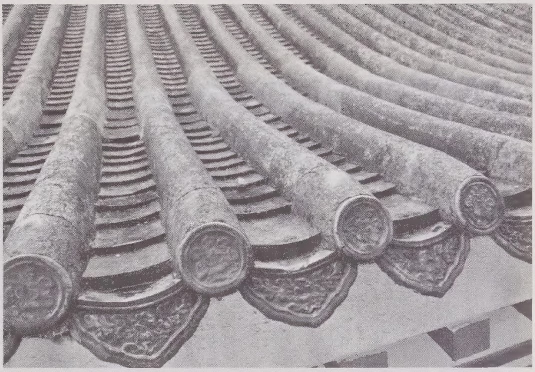
聖堂正門（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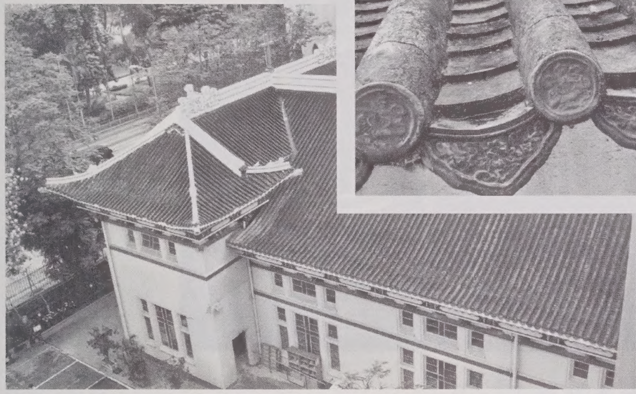


聖堂外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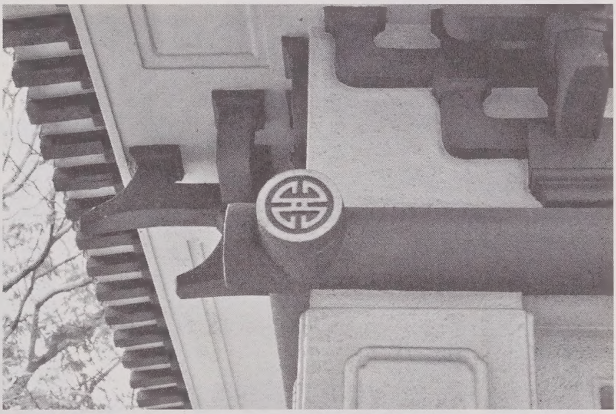


聖堂上的十字架





瓦頂及中式圖案



聖堂外中式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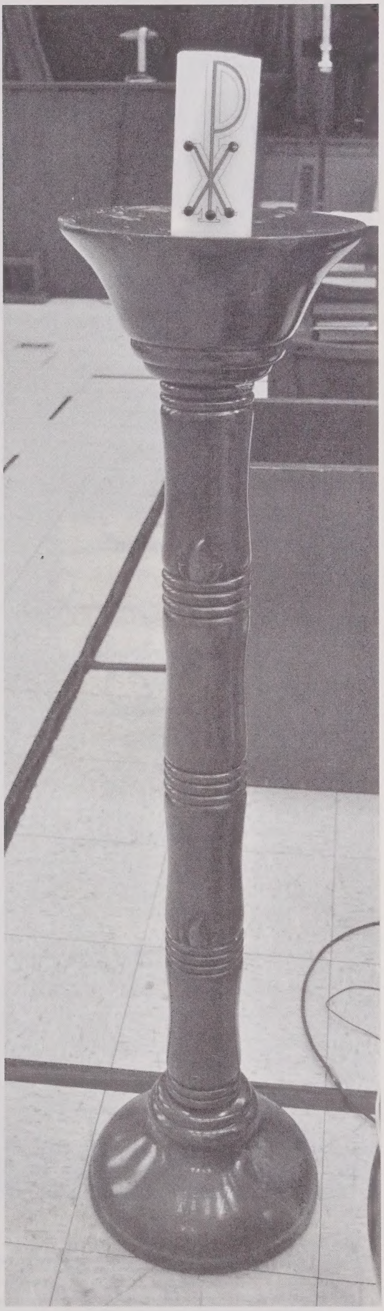
垂脊以三隻和平鴿為裝飾



聖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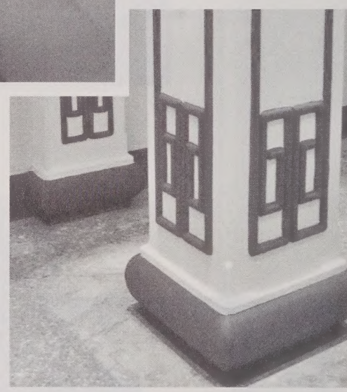


洗禮盆的木蓋刻有葡萄圖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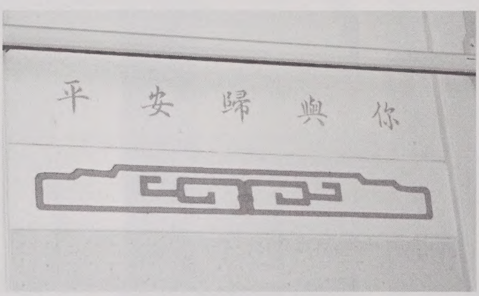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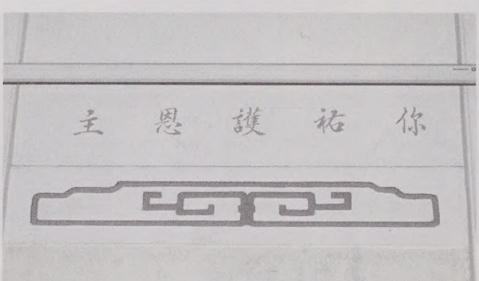
竹樹形燭台





柱子





雲彩



窗花

5

動盪歲月

1938–1950

風暴前的平靜

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聖三一堂新堂正式啟用，沒料到三天後即發生「蘆溝橋事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國人八年抗戰的序幕於焉揭開。

抗日戰爭對香港最直接的影響，是大量內地難民湧到這個英國殖民地避難。據統計，單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三八年七月間，香港人口便增加近二十五萬。一九三八年十月，廣東戰事加劇，引發新一輪難民潮。港府為收容難民，更興建了不少難民營。[1] 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淪陷前，香港人口達一百六十三萬，其中超過六十萬是在日本侵華後來港避難的，增幅達六成三。[2] 面對大量難民，香港各界迅速反應，以種種行動救助難民。基督教方面，除各宗派自行籌劃接濟難民外，基督教聯會亦擴大其慈善部，與廣州基督教聯會國難服務委員會磋商合併，於一九三九年一月成立粵港基督教國難籌賑會，其服務地區遍及粵港兩地。[3]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成人洗禮	25	24	55	33	32	32
孩童洗禮	25	60	67	89	55	61
堅信禮	25	52	21	63	37	31

表一：聖三一堂洗禮及堅信禮人數（1936–1941）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何明華主教以「災難中的勝利」（Victory in Disaster）為題在聖約翰座堂主日崇拜中證道。他指出，整個華南地區當前處於歷史的黑暗時刻，信徒更應仰望上主的真理之光。他形容香港是一塊「黑暗時期中安全的綠洲」（an oasis of safety in these dark times），得以接待國內信眾。他呼籲在港信徒要從上主支取力量，幫助那些身處災難的弟兄姊妹。[4]

何明華所指的「災難中的勝利」，實際上只是風暴來臨前的平靜。香港由於是殖民地，得享短暫的和平，並在不同層面發揮支援抗戰的重要角色。香港相對穩定的局勢，也促成教會的增長。從政府出版的《香港藍皮書》（*Hong Kong Blue Book*）可見，一九三六年時，各主要教會崇拜聚會人數約四千三百七十五人，到一九三七年，即增至五千零三十五人，而一九三八年，更上升至五千八百二十三人。換言之，對比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三六年，崇拜聚會人數的增幅達三成三。[5] 而據一九三九年香港基督教聯會的統計，香港島及九龍合共三十三所教會（名冊）共有會友一萬七千六百七十三人，其中聖公會佔三千七百三十七人。[6]

聖三一堂新堂落成後，剛好遇上內地難民潮，令教會人數急速增長。左頁表一整理了一九三六至四一年間聖三一堂的洗禮及堅信禮人數，可見從一九三七年開始，人數顯著增長，其中又以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年最突出。此外，不少內地聖公會會友逃難來香港後，也參加聖三一堂的聚會。據年長會友梁寶靈憶述，在這段時期，聖三一堂接待了許多來自廣州的聖公會會友：

> 在一九三七、三八年的時候，教會相當興旺。就以我家為例，日本佔領廣州之後，很多在廣州的親戚也來港避難，就住在西頭村（即現時九龍城賈炳達道以下的地方）我們家裏。他們當中不少是聖公會會友，廣州救主堂、沙面基督堂的也有，來到香港便參加聖三一堂的聚會。當時教堂可說是非常擠迫。[7]

在這情況下，每個主日聚會人數多達七百人，教堂上下層皆告滿座。[8]

一九三九年，何明華派江漢章來港，協助聖三一堂工作，並任侯王道聖三一學校之校牧和英文科主任。江是廣東大埔人，一九一一年十二月生於香港。一九三七年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神學院畢業。[9]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聖馬太日（St. Matthew's Day）在聖約翰座堂由何明華按立為會吏。[10] 一九四零年二月，他與湯烈娣在聖三一堂舉行婚禮，湯也是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協助聖三一堂的青年工作。[11] 一九四一年，江被調至貴陽。[12]

三年零八個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並策動侵略香港的戰爭。駐港英軍與日軍的戰鬥初時只在新界和九龍半島進行。十二月十一日，英軍撤出九龍半島退守港島，日軍對香港島發動猛烈炮轟，最後日軍在十二月十八日登陸港島，港督楊慕琦（Sir Mark Aitchison Young）在聖誕日宣告投降。「黑色聖誕」的哀鐘響遍港九，香港開始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歲月。[13] 由於英軍在開戰不久已撤至港島，九龍的戰事只持續很短時間，破壞相對較少。聖三一堂得以保持完整，沒受戰火摧毀，與此不無關係。

日軍佔領香港後，成立香港佔領地總督部。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一日，日軍下令要求各社會組織向當局登記，否則會被取締。[14] 當日，九龍區的日本主管官員要查清各教會的會址及召見區內教會負責人。[15] 六月十七日，七十一個宗教團體申請登記，其中包括中華聖公會聖三一堂。[16] 可見，在淪陷初期，聖三一堂仍維持聚會，即使在日治下仍堅守使命。記錄顯示教會在一九四二年仍舉行成人洗禮，為兩名女子施洗。[17]

不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開始，聖三一堂便面臨重大挑戰。首先，總督部於六月二十日宣布開闢啟德機場的計劃，並要求機場附近的居民要在限期內遷出。受影響的地區，包括原屬啟德濱及位於九龍寨城以南的一些民居，附近二十條村落亦需拆卸。[18] 結

果，九龍城區有二萬多居民被迫遷，同時九龍寨城的城牆及宋皇臺大石亦因此被拆毀及炸毀。[19] 換言之，聖三一堂附近的社區因機場擴建工程而蕩然無存。

其次，更直接衝擊聖三一堂命運者，是日軍下令徵用教堂。打從佔領香港後，日軍便急需覓地安置六萬多名士兵及七千多匹馬，不少規模較大的教堂及學校均被日軍強佔。聖三一堂亦無幸免，被徵用作馬廄。[20] 根據梁寶靈憶述，日軍命令教會在限期內遷出，其父親梁榮耀及其他會友趕緊把教堂一些重要物資收藏起來。當時藏在其家裏的，包括教堂一張紅地氈、兩個銀製的大花瓶及十字架等。同時，也有部分教堂物資儲存於其他會友家裏及廣蔭院內。[21] 至於詩班袍及聖經，則存放在城寨內的廣蔭院。[22] 這個由梁氏守護的十字架，戰後一直在聖三一堂崇拜使用，直至二零零一年中才更換。

據年長會友憶述，啟德機場及聖三一堂附近均列為禁區，以長木柵圍封，由日軍駐紮看守，其他人一概不能進入。因此，當時會友無法回教堂，對淪陷期間教堂的情況，始終一無所知。從日本來港的牧師和基督徒看見港九教會的情況，也不禁搖頭嘆息：

> 有的華人教會禮拜堂的座椅、講壇，都被拆搬一空，改成軍隊的馬廄。我與平岡先生訪問那教會，心想「如此殘酷不講理」，二人相視長歎。[23]

環顧當時香港教會的情況，除被日軍徵用外，其餘教堂仍堅守使命，在艱難的環境下維持聚會。不過，由於總督部推出歸鄉政策，港人被迫回鄉，加上局勢不穩，不少人也回內地避難。短短數年間，接近一百萬人離港，各教會也面對信徒大量流失的情況。[24] 一九四三年開始，總督部為加強控制基督教，乃組成香港基督教總會，命令各宗派的教會組織統一加入，又從日本派來鮫島盛隆牧師任顧問。[25]

日治時期，除德國及意大利籍外，在港外籍人士（包括傳教士），皆被日軍拘禁在集中營內。由於何明華主教於一九四一年九月應邀到美國紐約聖公會神學院講學，得免此難。何主教離港期間，由莫壽增主持教務。淪陷後，莫壽增一直留港，並有曾紀岳及鍾仁立等協助教會事工。後來莫於一九四三年往曲江及北海巡視教務，不幸在北海染上痢疾，於四月離世。而何明華則於一九四二年十月經緬甸進入中國，於昆明主持教區事務。[26]

香港聖公會方面，除聖三一堂被徵用外，諸聖堂的正堂及副堂亦先後被徵用，教會一度改在聖安德烈堂聚會。一九四五年，連聖安德烈堂也被徵用，但很快日軍便投降，會友回到何文田原址聚會。其餘聖士提反堂、聖保羅堂、聖馬利亞堂及青山聖彼得堂，則仍能勉強維持聚會。[27] 換言之，聖三一堂成為淪陷期間惟一被封堂的聖公會華人堂會。

由於聖三一堂在淪陷期間無法維持聚會，部分該會信徒轉到龍崗道一號的崇真堂聚會。[28] 也有信徒（如汪玉娟）參加了士他令道浸信會。另一些信徒則在家中崇拜，梁寶靈憶述其父親梁榮耀戰時在家崇拜的情況：

> 我父親很熱心愛主，日佔時期也在西頭村的住處舉行晚禱崇拜，與幾位親戚、會友聚會。晚上一燈如豆，我們依聖公會的禮儀，誦公禱書。有時候唱詩之時還聽到遠方飛機轟炸，我們就在飛機聲與爆炸聲中崇拜。當時區內只有士他令道的浸信會及播道會有聚會，父親堅持要到聖公會教堂聚會，有時在家中崇拜，有時到諸聖堂聚會。[29]

教堂關閉，信徒星散，各人遭遇，也不相同。張磐生回內地參與抗戰，曾任軍方要職。涂從芳在元嶺擁有一些土地，淪陷時便僱用一些聖三一堂及其他教會的會友種植蔬菜，黃志誠與父親黃馬可便與涂從芳一起耕作土地，總算能夠維生。另一些會友便沒那麼幸運。梁榮耀繼續在船塢任繪圖員，但收入根本不足糊口，一

家生活艱苦。王偉基的父親在日軍佔領香港後不久即辭世，靠兄弟數人工作來支撐家庭。

淪陷前聖三一堂的主任李應標牧師，在日軍徵用教堂後，仍留在香港。一九四四年一月，香港基督教總會成立教務部，李應標是其中一位部員。[30]

戰後復堂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香港在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後重光。當時，何明華主教正在英國休假，得悉停戰，便馬上安排回港。由於交通剛恢復，他至十月九日才能抵港。[31]

香港重光後，社會秩序一度非常混亂，搶掠事件時常發生。當時，聖三一堂教友梁榮耀居住在教堂附近的西頭村，在日軍投降後，受曾紀岳所託，迅速與兒子梁寶靈遷入教堂閣樓的小室居住，以防有人乘亂搶劫。梁寶靈憶述：

> 家父早看到形勢不妙，那時治安差，普普通通的桌椅也會給人搶走作燃料。如果教堂沒有人留守，勢必被人搶劫一空。我們當時住在教堂閣樓的一個小室，相信是日久失修之故，小室當時有很多老鼠，附近也未通電，晚上伸手不見五指。我們留守的初期，在教堂後面的屋宇裏還有一些被囚的日本官兵，晚上又有英軍巡邏，不時還會聽到駐在不遠處的印度官兵唱歌。[32]

何明華主教返抵香港後，馬上部署重建教區的工作。首先，他回應聖公會傳道會提出「十年奮進運動」(Ten Year Forward Movement)的呼籲，發起組織「神國運動」，提出在各堂招收會員，凡加入者，每周至少帶一人赴聖堂聽道，每日須為學道親友禱告，期望在十年內把教區的信徒倍增。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神國運動正式開始，並在聖約翰座堂舉行授旗典禮，各堂獲授一面

聖安得烈的十字架旗，勉勵信徒以聖安得烈為模範引人歸主。[33] 十一月，何明華在聖安得烈日為神國運動一周年作總結時，重申希望在十年內，各堂可以自立自養，並在香港及九龍各增加三個堂會。[34]

其次，何明華亦急謀分配聖品到區內各堂。他在通訊中提及初步的構想，就是委任李求恩會吏長為諸聖堂主任，負責港澳地區教務，並調曾紀岳為北海地區的會吏長。[35] 當時，他對聖三一堂主任牧師一職，仍沒有明確的人選。到一九四六年，何明華才委任列蒲祜為聖三一堂主任牧師。[36]

由於教會重建工作迫在眉睫，在列蒲祜就任前，何明華決定邀請曾貫宜醫生暫行義務代理聖三一堂堂務，從事善後修葺工作。至於主日聖餐則由曾紀岳會吏長及李求恩會吏長主持。曾醫生是曾紀岳會吏長之子，自幼便參與聖三一堂聚會。香港淪陷期間，他回到國內。戰後，他應香港政府之聘從昆明回港，從事醫療救濟工作。在某次參加聖約翰座堂的特別崇拜後，何明華邀請他到聖三一堂協助重組堂務，重建教會，他欣然接受。曾貫宜在籌組董事會後，在朱文偉的母親協助下，四處探訪教友，恢復聚集。[37] 當時探訪隊在招聚信徒方面，發揮了重大貢獻，成員包括陳乃文師太、夏約翰夫人、梁榮耀夫人、譚柏蕃夫人、陳英乾夫人等，探訪範圍遍及整個九龍。[38]

汪玉娟也親身參與重建堂務工作，深切體會到其中的艱辛：

> 當時有曾紀岳會吏長、曾貫宜醫生，和幾位在港的會友，像鄺三姑、容冠威師太、黃恩光師奶、梁榮耀太太，還有我自己。當時打聽得有那幾位教友回來了，便請他返聖三一堂。當時禮拜堂沒有錢，我們就在路上採摘野花野草，作為聖壇的插花。其後回來的人漸多，當中有一些人需要幫助，也有好些事工要恢復，但教堂實在很窮，那怎麼辦呢？我們便收集牛奶罐，在罐上貼上聖經金句，請教友們每人認領一個，每天蓄儲，五仙也可，一毫也可，再每月交給禮拜堂。我們便是靠這些熱心教

友的儲蓄來幫助教會和一些有需要的教友。當時人太少了，每一個人要負責多個部門的工作，像我吧，要照顧婦女部、主日學部、交際部等。[39]

在一九四五、四六年間，教會相當困難。那時候是由李應標牧師主領聖餐，李求恩會吏長也常來照顧。當時禮拜堂還未有電力，照明也沒有，但又要恢復詩班、按手班，怎麼辦呢？當時我住在嘉林邊道，於是詩班便在周六來我那裏練詩。按手班、洗禮班也在我家處進行。當時環境很困難，現在回望，上帝的恩典真是數說不盡。[40]

另一位教友王偉基憶述戰後重回聖三一堂的經歷，雖是輕描淡寫聊聊數語，卻是戰亂時許多辛酸小市民的寫照：

戰時我只有十一歲，也沒有像其他人返大陸。淪陷時與聖三一堂斷絕了聯繫，幸而當時多得禮賢會的女宣教師龐三姑，每月都來探望我家，沒有甚麼物質支持，但在這困難環境能有人探望，已是心靈上很大的安慰。到一九四五年左右，從工友處得知聖三一堂重開，便即時回來，還得列蒲祜牧師允准，很快便上了按手班，並行了按手禮。[41]

戰後香港百廢待舉，聖三一堂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向電話公司申請安裝電話，一直沒有回音。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何明華以主教身分查詢安裝進度，俾能便利教會事工發展。結果，電話公司覆函，表示由於輪候者眾，無法確定安裝日期。[42] 到一九五零年十月，何明華直接致函電話公司的主席 D. H. Blake，向他表達不滿聖三一堂仍未獲裝置電話。[43] 今天，我們很難想像當時申請安裝電話，竟會拖延四年多仍未成事。戰後資源緊絀，可見一斑。不過，客觀環境並沒有成為重建聖堂的攔阻，牧者信徒上下一心，胼手胝足，艱苦奮進，困乏多情，復加上主賜予力量，堂務仍得以穩步拓展。

一九四六年二月四日，曾貫宜用英文寫下當時聖三一堂的日常運作：[44]

1	主日學	上午 10 時	60 名孩童 5 位老師
2	主日崇拜	上午 11 時	90–140 名信眾
3	主日黃昏探訪祈禱聚會 由詩班負責，每次探訪三個家庭	黃昏	10–15 人
4	周一探訪及佈道工作	早上 9 時 30 分	4–6 名義工
5	周一黃昏聖經班	晚上 7 時 30 分	5 人
6	周三家庭祈禱聚會	早上 10 時 30 分	6–15 人
7	周五詩班練習 祈禱及討論	晚上 7 時 15 分 晚上 8 時 15 分	19 人
8	周六家庭祈禱聚會	下午 2 時 30 分	10–20 人
9	聖餐（每月第一主日）		45–65 人

表二：1946 年聖三一堂日常活動

可見，經過半年努力，聖三一堂的主日崇拜出席人數已有一百多人，同時亦開展了主日學、詩班、探訪、聖經班、祈禱會等事工。聖三一堂在廢墟中的重建工作，有很好的開始。

困乏多情，建立教會

列蒲祜牧師就任後，積極拓展堂務。我們從期間出版的《港粵教聲》中，看到三則關於聖三一堂的報導，從中可管窺教會的情況：

第一，是在列牧師推動下，聖三一堂每月第四主日派兩名信徒到元朗堂協助聖工，主領聚會。[45] 元朗堂的歷史可追溯至一九三八至三九年，當時大量國內難民來港，不少居於新界。有見及此，莫壽增乃在元朗租屋作福音堂，由葉日青任傳道。一九三九

年六月，正式在元朗墟設禮拜堂，定名聖馬提亞堂。[46] 淪陷期間，堂務大受影響。重光後，由於經濟關係，堂會無法聘請傳道人。當時元朗堂的信徒形容：

> 復員的時間，雖然大家在聞着新生的開始，而復員這兩字卻未能加在本堂身上。那時本堂遭遇的一切和在淪陷期間沒有分別，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和一個住堂的幹事，談不上甚麼建設和發展，只保存了幾張不像樣的長櫈，一個長期呻吟着的風琴。[47]

職是之故，李求恩會吏長乃商請諸聖堂及聖三一堂伸出援手，兩堂的支援對聖馬提亞堂而言，無疑是荒漠中的甘泉：

> 感謝主！祂要在荊棘裏長出美麗的花，聖三一堂和諸聖堂的婦女團契相繼來堂講道，李會吏長和本堂熱心兄姊擔起了一切人事和經濟的責任，堂務得以日漸發展。[48]

聖三一堂才剛在戰後殘破的局面中重建，自身仍面對各種需要，卻仍願意抽調資源，來跟其他堂會分享，充分體現了肢體彼此關顧的團契精神。

第二，聖三一堂董事會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正式通過成立青年部（後易名少年部），隸屬於聖三一堂的董事會。青年部的宗旨是「聯絡青年培養其信仰熱誠及德智體群各美德，以服務教會」，每周日下午七時半舉行例會，每年舉行部大會。青年部部長由堂董事會選定，其餘職員則由部員互選。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青年部舉行成立禮。[49] 有人形容青年部為「本堂破題兒的第一聲」，成立初期，已招收了四十多位部員，分為德智體群美五組，每組設組長，各組負責每周例會。[50] 列牧師更為青（少）年部歌填詞：[51]

> 聖三一少年，氣象萬千；三德鼎立，一神中堅；
>
> 手牽手兮肩並肩，大家親愛樂無邊，一心一德建設天國；

我要精誠總動員，我要奮鬥障百川，我要為主把軀捐；

三一少年，以道相研；三一少年，以愛相聯；三一少年，以主為先；

高舉基督，復興教會，一往無前。

青年部的首任部長是涂從芳。涂氏是聖三一堂會友，在一九三零年代於九龍城民生書院畢業，品學兼優。[52] 何明華在一封信中，肯定了涂投身牧職的心志，並予鼓勵。[53] 涂在明華學院深造後，一九五四年受封會吏，後再晉封牧職。隨即舉家到非洲毛里裘斯（Mauritius）宣教，於一九五九年五月回港出席東南亞聖公會華人聖品大會時猝逝，享年三十七歲。[54]

第三，是作出辦學的決定。一九四八年五月，《港粵教聲》有如下一則消息：

聖三一堂自復堂以來，得神恩領導、各位兄姊的協助，一切事工，進行頗為順利，在事工上，需要牧師室、副堂、學校等。聞在經常費運動結束後，即由何會督領銜發動大募捐，牧師室與學校雙方並進，該堂教友，已準備旗鼓，期一鼓作氣，以完成其事云。[55]

有關辦學的情況，我們將在下節詳細交代。總的而言，上述三則消息，反映出聖三一堂的復員與重建工作均有良好進展，既願意支援同宗資源不足的元朗堂，亦藉青年部的成立，牧養及關顧青年人，更積極籌劃辦學，蓄勢待發，為拓展聖工而努力。

順帶一提，列蒲祐牧師也是一位甚具文采的詩人，一九四八年教區出版的《港粵教聲》主編鍾仁立牧師率團赴美考察，一月至九月號的主編工作便由列牧師暫代，聖三一堂也權充聯絡處。[56]

列牧師主編《港粵教聲》期間，留下不少詩文。有幾首是跟九龍城有關的：

〈雨夜望皇臺〉　調寄東風第一枝

漫漫迷迷，瀟瀟瑟瑟，帳〔悵〕皇臺殘石，半壁河山已碎，一坵荒土成陳迹，空見遊客絡繹，勢如辟易，如華此奔來鐵騎，冀東逃避難客。

夜冪冪，炊烟遠隔，影幢幢，貧寤重柵，閉門謝了凡心，憑壇靜聽神跡，依稀夢裏，記國是民生崩析，何時得夜盡天光，重睹〔睹〕東風改白。[57]

〈望宋皇臺〉　憶宋皇（調笑令）

落魄，落魄。

天涯盡處蹙額，

痛懷眼底璽壁，

璽壁！璽壁！

從此冤沉化石！[58]

從對宋皇臺歷史的追思，對照當前中國社會的變局，在在反映出列牧師憂國憂民的情懷。另一首也訴說了他對時局的感懷：

〈觀木頭戲〉感時　復員後正月初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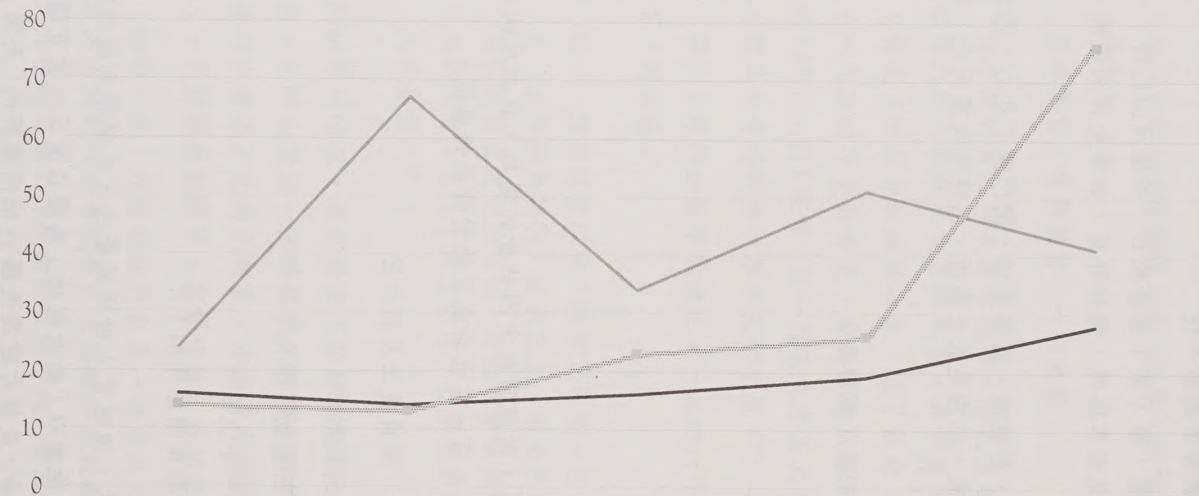
時局如戲場，挑演全面糾紛，

爭地位，爭政權，四圍動了眼火？

老倌皆傀儡，做出一手上下，

弄機關，弄線索，那角噴出牙烟！[59]

戰後時局雖然動盪依然，但現實人世間的憂患，反倒讓列牧師堅信要建設天國於人間。他曾以「新天新地」為題在聖三一堂宣講，強調「基督徒最大的使命，是努力建設天國」。他所理解的「天國」，並不是抽象的、屬將來的，而是「現實的人生社會」。門徒在世，就要背起十字架，為天國運動而努力。他最後勸勉聖三一堂信徒：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成人洗禮	16	14	16	19	28
孩童洗禮	24	67	34	51	41
堅信禮	14	13	23	26	76

表三：聖三一堂洗禮及堅信禮人數（1946–1950）

> 我們環視我們的環境，我們的聖堂，有甚麼現實的不滿，是需要我們去建設的，靈性有甚麼欠缺，需要我們去和惡勢力——魔鬼權能，來打仗的，靈性上的奮興，和物質上的建設，是隨時隨地要我們去發見新天新地，我們聽着主的呼聲，肯不肯負起主的十字架，把一切的新天新地，成為現實？[60]

正是這份艱苦奮進，困乏多情的心志，以及在不理想的現實人間中，仍不放棄建設天國的精神，感召聖三一堂上下，在戰後艱難的處境中，願意委身重建教會。

一九五零年，列蒲祐牧師接受廣州華南教區慕容賢主教邀請，向何主教請辭回國，教區調派周夢秋接任聖三一堂主任。[61] 七月，列蒲祐牧師向何明華匯報聖三一堂的情況，相信是他離任前的工作報告：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至 7 月
會友	318				440 [62]	
受洗人數		41	81	50	70	39
財政收入		$9,284.00	$18,378.00	$35,384.66	$63,126.72	
上繳教區 [63]		$2,640.60	$4,417.05	$5,107.40	$6,598.38	

表四：聖三一堂統計（1945–1950）

總結這幾年的發展，列牧師認為：

> 四年來，會友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也有足夠金錢做必須的事情。這完全是上帝的祝福，讓我們緊記，靠着上帝凡事都能作。[64]

左頁表三整理了一九四六至五零年間聖三一堂的領洗及堅信人數。可以說，聖三一堂在復員期間，在上主的恩典及眾教牧信眾的努力下，取得穩步的增長。

教育事業與醫療服務

毋庸置疑，一九四八年的辦學計劃，是戰後聖三一堂的重要發展項目，前後經歷了三年多時間，遇上不同的困難，最後在一九五二年興工。

回顧聖三一堂的歷史，堂會跟教育事業一直關係密切。戰前的維多利亞女校、天國學校，侯王道學校、協恩女校等，成為跟堂史不可分割的集體回憶。不過，嚴格來説，這些學校並非直接隸屬堂會。因此，聖三一堂辦學的決定，標誌着堂會的發展已臻成熟，有能力興辦面向整個香港社會的事工。從當時社會環境來看，香港人口因戰後嬰兒潮和大量難民湧至而大幅增加，對社會服務設施構成極大壓力。聖三一堂在這時興辦小學，正好配合當時的社會需求。

一九四八年，聖三一堂牧區議會因鑑於九龍城區內學額不足，失學兒童甚多，遂通過辦學議案。同時，又決定興建牧師宿舍。當時牧區的財政狀況，並不足以應付有關工程開支。所以，牧區議會代表黃茂林及彭約榮乃向何明華主教提請，由主教致函政府申請領地辦學。另方面，亦希望獲得教區的借款。何明華亦同意從杜培義基金（Duppuy Fund）借款四萬元，須於一九五八年六月還清。[65]

同年十二月，地政署原則上同意把九龍內地段（KIL）三三四三號約九千七百五十平方呎土地批出，供聖三一堂興辦小學，但須等待倫敦方面的最後批准。而政府提出的條件，包括以二十五呎為高度限制、土地只可作小學用途、須於十八個月內興建一座價值三十萬元的建築，土地以七十五年為期，每年地税三百五十八元。[66]

十二月二十六日，聖三一堂召開會議，認為政府訂出的條件難以達到，特別是三十萬元的建築費過高，他們認為十五萬元也

足以建校。[67] 一九四九年三月，聖三一堂方與建築師商討後，建議把費用調整為二十六萬八千元，並希望把建築期從十八個月延長至二十四個月。經與有關部門幾番商討，堂會終於在同年十月五日與政府訂立契約，先前的一些條件得以放寬，校舍的高度限制由二十五呎改為二十八呎。[68]

另方面，建校計劃獲熱心人士支持，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四月獲謝梁安利奉獻四萬元。[69]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聖三一堂假尖沙咀聖安得烈堂舉辦賣物會，由堂內信徒每人捐獻禮物二件，並呼籲其他人認獻禮物及捐款。為了這次賣物會，聖三一堂動員全體會友，分別組成總務部、財政部、招待部、玩具部、雜貨部、罐頭及糖果部、雜糧部、茶點部、舊貨部、文房部、遊藝部、攝影部、衣物部等，可謂上下一心，群策群力。[70] 結果，賣物會順利舉行，籌得款項萬餘元。[71]

汪玉娟憶述跟一批婦女趕工辦籌款賣物會的片段，反映當時眾人不辭勞苦、眾志成城的熱心：

> 那時候辦賣物會是一件很好玩的事。一群婦女自己動手編織咕臣套，在賣物會發售；此外便是請四大公司、四大商場等捐出物資，供我們售賣籌款。我們親身到公司取貨，會友又願意自籌費用，安排貨源，在賣物會承接攤位。賣物會前一段時間，我們每晚也忙至差不多半夜至凌晨二時才回家。當時建學校、建副堂，就是憑會友的這股投入支持才能成事。[72]

為應付龐大的建校費用，堂會特成立籌建聖三一堂副堂學校募捐委員會，由黃茂林擔任主席，劉元乂、彭約榮分擔書記及司庫。委員會又在一九五零年元月一日早上舉行募捐運動崇拜，由何明華主教主禮，正式啟動建校募捐運動。[73]

籌款工作如火如荼地進行時，聖三一堂又決定在一九五零年秋開辦幼稚園，目的是使將來幼稚園畢業生成為小學基本新生。[74]

幼稚園暫借教堂的閣樓開辦，曾參與創辦幼稚園的汪玉娟女士憶述：

> 聖三一堂建小學前已辦幼稚園，當時我也參與其事。每周主日崇拜後，我們將閣樓的椅子搬到一邊，再用屏風作間隔，劃出一些班房，這便是我們最早期的幼稚園。星期一至五上完課後，到星期六便要把屏風移走，再放好崇拜用的椅子，好作主日崇拜用。當時是由我策劃，本堂幼稚園的第一位學生，就是我們的陳衍昌師母呢。[75]

幼稚園的發展，穩步向前，到五十年代中，每年均有百多位畢業生。[76]

一九五一年三月，聖三一堂主任周夢秋及黃茂林、彭約榮致函教育署，表示計劃把籌建的小學學額從五百五十人增至五百八十一人，以上下午校形式開辦的話，將可提供接近一千二百個學額，以應付當前學位不足的需要。經費方面，當時已籌到的款項僅十萬元，他們估計尚可籌措五萬元，距離約三十萬的預算，尚欠十五萬元。因此，他們建議向教署申請免息貸款十五萬元。他們強調，聖三一堂以非牟利形式辦學，其中約一成的貧窮學生，更可獲減免學費，希望教署能慎重考慮其申請。與此同時，何明華主教又致函教育署，極力推薦有關申請。[77] 現存聖三一堂的文件，未見教育署就此申請的回覆。

一九五一年九月，政府正式批出九龍內地段六二四三號（即原來的 3343 號）一幅九千七百五十平方呎的土地作為聖三一堂小學之用。政府要求在兩年內興建價值二十六萬八千元的物業。[78] 不過，建校經費的籌募進度仍距目標很遠，於是，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彭約榮乃聯同何明華主教向教育署申請十五萬元的免息貸款，但到三月時教育署覆函拒絕。[79]

由於經費不足，聖三一堂獲政府批准修改圖則，分兩期建校。首期工程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展開，以一半面積建一所有八個課室

的校舍。當時從賣物會籌款及其他教友推售建校公債籌得十萬元，距離首階段的建築費十七萬五千元仍有一段距離，幸得杜培義基金借款補足餘額。[80]

首期工程於一九五二年八月完成，課室數目僅足夠開辦低年級，還需要暫借教堂的會議室上課。故第二期工程必須盡快開始，否則便沒有足夠課室供高年級學生上課。第二期工程計劃興建的新翼有七間課室，預算約十二萬元。但因經濟環境因素，當時估計只能籌得三萬元，距目標甚遠，幸得工務司准予再延期限，否則政府可收回有關地段。[81] 聖三一堂曾構思多個應變方案，包括申請香港賽馬會貸款及轉為津貼學校等，但最後均無法成事。最後到一九五四年底，香港政府考慮到學校管理完善，又得何明華主教協助，終願意提供十萬元免息貸款興建餘下工程，事件才得以解決。[82] 同時，聖三一堂從一九五三至五五年間，先後舉辦賣物會及募捐，為建校籌款。[83]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聖三一堂學校第二期（包括副堂及牧師住宅）舉行奠基禮。[84]

聖三一堂在籌辦學校之初，曾擬把學校命名為「日修學校」，以誌念鄺日修牧師對聖三一堂的貢獻。一九四八年一月的《港粵教聲》嘗謂：

> 鄺日修牧師，是港粵第一任華牧，披荊斬棘，創立教會於九龍城，緬懷前勳，殊深景仰，聖三一堂同人，在復員以來，推展聖工的第一聲，乃籌備紀念鄺公學校，可謂意深切而知尊事了。聞已通函教會和社會聞人共勷其事，其規模頗大，擬籌三四十萬港幣之建築費，而完成其盛舉云。[85]

不過，學校最終卻以「聖三一堂小學」命名，原因待查。[86] 新校以私立小學名義註冊及運作，由聖三一堂牧區議會直接管轄。[87] 一九五四年時，約三十三名學生（約百分之十）因家境貧窮，獲豁免全部學費，當中三分之二不是聖三一堂會友。學校開辦初期因須繳清欠款，所以學費較政府津貼小學為高（卻較私立小學低）。[88]

一九六零年，聖三一堂學校清還所有債務後，即以非牟利方式運作。

戰後，除籌建小學外，聖三一堂沒有忘記區內的貧苦大眾，因而著手策劃醫療服務。

一九五零年時，婦女部部長林莫如恩和慈善部召開大會，希望回應區內貧困者的醫療需求，探討教會興辦醫藥救濟事工的可行性。不少與會代表感到是項服務需款甚多，擔心聖三一堂難以承擔。當時，婦女總團團長曹何玉瑛亦認為此乃極具意義的服務，但對經濟力量薄弱的聖三一堂，實太艱巨。[89] 事實上，當時舉堂上下仍為籌建小學經費而費神，醫療救濟工作雖有意義，卻似不可行。結果，有關建議最終擱置。

對於興辦診所一事，剛到任不久的堂主任周夢秋牧師也表支持，但是，由於當時籌建小學一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牧區內有議員主張應集中全力建校，結果，醫療服務計劃不獲通過。[90] 未幾，華南教區慕容賢主教到聖三一堂講道，林莫如恩向他分享醫療救濟的計劃，得到他正面的回應：「此舉普及大眾，與主耶穌基督之救世宗旨符合，何須考慮，吾當為你等衷誠贊助之！」在慕容主教的鼓勵下，聖三一堂上下決定探討事工可行性，並隨即展開籌備工作。

醫療救濟工作需要經費及人才。經費方面，由各值理持捐冊向會內及海外募捐，同時又鼓勵信徒按月捐款支持。當時只募得數千元，不足以興建診所，僅能用作慈善基金。人才方面，在慈善部長黃恩光夫人及黃恩光醫生推動下，得多位醫生（李應猷、林球璋、林志緯、馮蕙熹、許志昌、曾貫宜等）願意參與贈醫服務。同時，永寧藥房又願意以廉價出售藥物支持。於是，聖三一堂的醫療事工在不必興建診所、不必聘請醫生的情況下順利開展。接受服務者除教友外，九龍城附近貧病居民亦聞風而至，他們甚至可領得車費。信徒亦樂意捐助，結果除開支外，尚有盈餘。有關服務由一九五零至六五年間從無間斷。[91] 據統計，一九五五

年一月至十月間，共為九十二名成年男性、一百六十名成年女性、一百一十五名男童及七十五名女童提供醫療服務，其中四百三十四人獲贈藥。[92]

戰後，聖三一堂的發展不僅關注堂務，更藉興辦小學及醫療事工，體現教會對社會的承擔。這不僅承繼了戰前聖三一堂的優良傳統，也為日後進一步拓展教育及社會服務，作出美好的見證。聖三一堂堂董區煒森在一九五四年，回顧這段歷史時説道：

> 回憶在香港重光後，聖三一堂猶如其他事業一般，百敗待舉，我們憑着一股勇氣〔、〕神的鼓勵，恢復堂事，我們雖經濟乾涸，然目睹全港學校缺少，兒童失學者眾，我們藉着神恩典，來辦學校，領地建校，近數年來，雖堂事校務理應興革者甚多，但我們回顧已往，以一個可謂一貧如洗之教堂，而能僅憑一點信心，藉我主的靈與光而有些少成就，堪已告慰。[93]

在戰後負責教區復員工作的曾紀岳，多年後總結聖三一堂的發展：

> 回顧光復之初，物力、財力、人力俱極缺乏，真是瘡痍滿目，百廢待舉。幸賴天父鴻恩庇佑，諸牧長領導有方，及各兄姊之熱心支持，在艱苦環境中仍能竭誠為教會服務，關心失學兒童，籌資與建新校舍及副堂，並努力傳播救贖真理，使認識基督〔、〕悔改受洗而加入聖教會者年年增多，並且獻其財力與智能，使教會日益興盛。吾等為此特別感謝主恩。[94]

新的開始

最後，我們了解一下戰後聖公會在體制上的重要變革，及其與香港聖公會的關係。一九四五年，中華聖公會在陪都重慶成立中央辦事處，並於抗戰勝利後遷至南京，到一九四九年再遷至上海。中央辦事處是在總議會及總議會常務委員會指導下，為全國聖公會的中央執行總機構。[95]

一九四七年八月，第十屆總議會在上海召開，距離上屆會議，相距十年之久。在全國總議會上，港粵教區提出兩個議案，其一是中華聖公會應按立女會吏為會長；其二是雲貴區從華南教區獨立成新教區。結果第二條獲通過，第一條則被擱置。[96]

全國總議會另一個重要成果，就是河南鄭和甫主教被選為主教院主席，成為首位華人主席主教，領導全國聖公會。[97] 與此同時，英國聖公會方面，坎特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亦決定賦予中國主席主教「最後轄治權」(final authority)。一直以來，由於香港地區的主教具雙重身分——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維多利亞教區主教及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主教，其任命權屬於坎特伯里大主教。但由於上述憲政的改變，香港主教的任命權，亦將移交中華聖公會主教院。換言之，何明華將中止「殖民地主教」(colonial bishop)的身分。[98]

上述變革，標誌着中華聖公會進一步邁向自立。不過，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隨着三自革新運動的開展，內地各宗派紛紛宣布割斷與帝國主義的各種關係。[99] 香港聖公會與中華聖公會的關係，進入嶄新的階段。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廣州慕容賢主教致函香港的港粵教區常務委員會祕書長鍾仁立牧師，表示在國家政策下，希望何明華能辭去中華主教院主教之職務，並謂中華聖公會勢必要與香港聖公會斷絕關係。[100] 五月十七日，華南教區常務委員會舉行會議，決議：

一、華南教區現因種種關係，港澳教會與廣東教會應即分離，港澳為一教區，廣東成立一新教區；

二、港澳教區即日起與全國中華聖公會機關組織上完全脱離關係；

三、港澳教區自動仍保持中華聖公會之信仰與禮儀。

上述三項決議，於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三日在上海召開的全國中華聖公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中得到接納。[101]

同年七月七日，全國中華聖公會常務委員會正式照會港澳地區聖公會，表明已通過議案接受華南教區提出與港澳二地斷絕關係的要求，以及不再承認何明華為中華聖公會主教。自七月八日起，聖公會港澳教區由何明華出任教區主教，專注發展香港和澳門兩地聖工。[102] 自一九五一年七月至一九九八年成立香港教省，港澳教區從未隸屬於任何教省，卻由坎特伯里大主教，以全世界聖公會主席之職權，擁教區的轄治權。[103]

從港粵（華南）教區到港澳教區，標誌着香港聖公會的發展，在獨特的歷史背景及政治因素下，進入新的階段。[104] 一九四九年，維多利亞教區成立一百年，意味着香港聖公會在第二個百年的開始，要尋索新的方向與使命。

其實，踏入一九五零年代，香港社會及教會均經歷重大變革。[105]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大量難民南下，香港一方面因其殖民地身分，免於國內動盪政局。但另方面，大量難民湧入，又衍生了各種社會問題，急待解決。香港社會、經濟的轉變，為教會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與機遇。時代在變，環境在變，使命也在變，聖三一堂踏入五十年代，也在上主的帥領下，繼續尋找她要走的路。

注：

1 張麗：〈抗戰時期的香港與內地〉，余繩武、劉蜀永編：《二十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1995），135–37。

2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4.

3 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會史》，266–67。〈粵港基督教國難籌賑會近訊〉，《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月刊》不定期特刊 4（1939 年 3 月）：14。譚洲齡：〈粵港基督教國難籌賑會澳門分站概況〉，《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月刊》不定期特刊 13（1940 年 8 月）：9–10。

4 Bishop Hall, "Victory in Disaster," *The Outpost: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Kong) and South China* (January–March 1939): 16.

5 "Ecclesiastical Return," *Hong Kong Blue Book*, 1936–1938. 另邢福增：〈一九四九年前香港基督教的發展——宏觀歷史的考察（1842–1949）〉，氏著：《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4），40–41。

6 "Bishop's Survey, 1939–1940," *The Outpost* (April–June 1940): 9.

7 梁寶靈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8 鄭家民：〈聖三一堂七十五年〉，《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1890–1965》（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65），36。

9 關於江漢章奉調至香港一事，乃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幹事陳劍光博士提供。陳博士指出，雲南省檔案館藏有關於江牧師的檔案（11–8–330）。筆者在此向陳博士表示謝意。

10 "Letter from the Bishop," October 1939, *The Outpost* (October–December 1939): 5–6.

11 陳劍光博士提供資料。

12 "Newsletter No.1—From Bishop Tsu, Kunming, Yunnan, 31 October 1940," *The Outpost* (January–March 1941): 7. 一九四七年，江調至雲南，後任昆明惠滇堂主任。參中華聖公會中央辦事處編：《中華聖公會年鑑，1949》（上海：中華聖公會中央辦事處，1949），102。

13 Tony Banham,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 陳智衡：《太陽旗下的十架——香港日治時期基督教會史，1941–1945》（香港：建道神學院，2009），176。

15 藍如溪、胡美林：《日治下香港的一隅》（香港：伯特利教會，2000），71。

16 陳智衡：《太陽旗下的十架》，177，注 83。

17 〈本堂重要統計〉，《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80），41。

18 高添強：〈二次大戰與啟德機場〉，趙雨樂、鍾寶賢編：《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197–98。另吳邦謀編著：《再看啟德——從日佔時期說起》（香港：ZKOOB，2009），41–48。

19 陳智衡：《太陽旗下的十架》，173–74。

20 鍾仁立，〈莫壽增會督生平摘錄，1866–1943〉，收劉瑞滔編：《港粵澳名牧生平》（香港：中華基督徒送書會，1975），1:43。

21 梁寶靈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22 〈終身事主的汪姑娘〉，《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90），39。

23 鮫島盛隆（Moritaka Samejima）：《香港回想記——日軍佔領下的香港教會》，龔書森譯（香港：基督教文藝，1971），96。

24 陳智衡：《太陽旗下的十架》，179–82。

25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57–63。

26 鍾仁立：《莫壽增傳》（香港：聖公會出版社，1972），68–69。另鍾仁立：《中華聖公會華南教區百年史略》（香港：中華聖公會會督府，1951），30–32。

27 李志剛：〈香港日據時期基督教會遭受苦難的探討〉，胡春惠主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1996)，303–305。

28 許光蔭、余偉雄：〈九龍城崇真堂簡史〉，余偉雄主編：《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史略》(香港：香港崇真會出版社，1974)，69。

29 梁寶靈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30 《執行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紀錄(昭和十九年一月份常會)》(香港：香港基督教總會，昭和19年1月3日)。

31 鍾仁立：《中華聖公會華南教區百年史略》，33。"News from Hong Kong," *The Outpost* (January 1946): 6.

32 梁寶靈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33 鍾仁立：《中華聖公會華南教區百年史略》，33。"News from Hong Kong," *The Outpost* (January 1946): 5–6.

34 〈神國運動一周年紀念〉，《港粵教聲》復刊1卷1期(1946年11月)：1–2。

35 "Letter from the Bishop," 19 October 1945, *The Outpost* (January 1946): 4.

36 列蒲祜牧師為何明華會督在廣州按立之聖品，一九三零年受按立為會吏，翌年晉封牧師。〈九十年來歷任傳道幹事及助理聖品〉，《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43；另〈本堂第五任主任牧師(一九四六至五零)列蒲祜〉，《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65–66。

37 〈喜研教義的曾貫宜〉，《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38。

38 鄭家民：〈聖三一堂七十五年〉，37。

39 汪玉娟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40 同上。

41 張磐生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42 "Holy Trinity Church to the Secretary, HK Telephone," 22 October 1946, "Bishop Hall to the Secretary, HK Telephone," 12 November 1947, "Acting Manager, HK Telephone to Bishop Hall," 6 October 1947, 聖三一堂文件。

43 "Bishop Hall to D. H. Blake," 3 October 1950, 聖三一堂文件。

44 K. Y. Tsang, "Holy Trinity Church Regular Services," 4 February 1946, 聖三一堂文件。

45 夏步雲：〈元朗堂現況〉，《港粵教聲》復刊1卷5期(1947年3月)：11。

46 鍾仁立：《莫壽增傳》，64–65。

47 〈聖馬提亞堂〉，《聖公會港澳教區一九六零年募捐運動報告》(香港：聖公會港澳教區，1960)，74。

48 同上。

49 〈教會新聞〉、〈中華聖公會九龍聖三一堂青年部臨時簡章〉，《港粵教聲》復刊2卷4期(1948年2月)：8。

50 〈聖三一堂青年部動態〉，《港粵教聲》復刊2卷5期(1948年3月)：8。

51 〈聖三一堂少年部部歌〉，《中華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少年部年刊，1955》(香港：港澳教區聖三一堂少年部，1955)，5。

52 張榮基：〈憶涂從芳牧師〉，《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1890–1965》，39。另寶興懌(Beatrice M. Pope)：〈海外來鴻〉，《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1890–1965》，59。

53 "Bishop Hall to To Chung Fong," 日期不詳，聖三一堂文件。

54 張榮基：〈憶涂從芳牧師〉，39。小兵：〈聖三一堂教友委身聖職工作不甘後人〉，《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46。另〈涂從芳牧師息勞歸主〉，《港澳教聲》70（1959年6月）：4。

55 〈教區消息〉，《港粵教聲》復刊2卷7期（1948年5月）：8。

56 〈啟事〉，《港粵教聲》復刊2卷3期（1948年1月）：1。

57 列蒲祐：〈雨夜望皇臺〉，《港粵教聲》復刊2卷7期（1948年5月）：4。

58 列蒲祐：〈望宋皇臺〉，《港粵教聲》復刊2卷9期（1948年7月）：6。

59 列蒲祐：〈觀木頭戲〉，《港粵教聲》復刊2卷9期（1948年7月）：6。

60 列蒲祐：〈新天新地〉，《港粵教聲》復刊1卷3期（1947年1月）：2–3。

61 〈列浦祐牧師息勞歸主〉，《教聲》894（1993年4月25日）：1。另劉國藩輯：〈聖三一堂大事年譜，1890–1970〉，《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70），12。列牧師回國後，先後任廣州沙面堂及救主堂主任牧師，一直留在內地。一九八零年來港，後移居北美。

62 一九四九年的教友人數，是從《中華聖公會年鑑》中找到的。這項並不是列牧師的報告，但也有助我們了解戰後堂務的發展，故筆者加入列內。中華聖公會中央辦事處：《中華聖公會年鑑，1949》，36。

63 復員後，何明華重訂教區聖品的薪俸制及規定各堂繳納教區財政捐款的辦法，規定各堂將總收入百分之六十繳交財政部，而教區的聖品薪金由教區統一發給。這又稱為「六成攤款」及「中央支薪」。鍾仁立：《中華聖公會華南教區百年史略》，33。另〈港粵教區主教致教友書〉，《港粵教聲》復刊2卷7期（1948年5月）：1。

64 "Lit Po-woo to R. O. Hall," 23 July 1950, 聖三一堂文件。

65 "J. M. Wong & Y. W. Penn to Bishop Hall," 19 May 1948, "Bishop Hall to Mr. J. M. Wong & Mr. Y. W. Penn," 22 May 1948, 聖三一堂文件。現時聖三一堂的其他文獻指杜培義基金的貸款額為五萬元，參資料小組：〈本堂建校經過〉，《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1890–1965》，40。筆者估計後來增加了一萬。

66 "Superintendent of Crown Lands and Surveys to Bishop," 15 December 1948, 聖三一堂文件。

67 "Committee of the H.T.C. (J. M. Wong and Y. W. Penn) to Bishop," 28 December 1948, 聖三一堂文件。

68 彭約榮：〈建校史略〉，《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114；另參"Committee of the H.T.C. (J. M. Wong and Y. W. Penn) to Bishop," 12 March 1949, 聖三一堂文件。

69 彭約榮：〈建校史略〉，114。

70 〈九龍聖三一堂賣物會預告〉，《港粵教聲》復刊2卷9期（1948年7月）：8。

71 〈各堂賣物會成績美滿〉，《港粵教聲》復刊2卷12期（1948年10月）：9。

72 汪玉娟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73 〈籌建聖三一堂副堂學校募捐委員會通啟〉，1949年12月23日，聖三一堂文件。

74 彭約榮：〈建校史略〉，114。

75 汪玉娟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76 〈聖三一堂幼稚園畢業生共百餘人〉,《港澳教聲》38(1956年7月):4;〈聖三一堂幼稚園畢業禮〉,《港澳教聲》49(1957年7月):2。

77 "Rev. John M. C. Chou, Mr. J. M. Wong & Mr. Y. M. Penn to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17 March 1951, "Bishop Hall to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22 March 1951, 聖三一堂文件。

78 "Grown Lands & Survey Offic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to Bishop Hall," 7 September 1951, 聖三一堂文件。

79 "Bishop Hall & Y. W. Penn to Director of Education," 9 January 1952, "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Bishop Hall," 5 March 1952, 聖三一堂文件。

80 彭約榮:〈建校史略〉,114;"Y. W. Penn to Major H. Misa, M.C. Sec. HK Jockey Club, HK," 27 April 1954, 聖三一堂文件。

81 同上二文。

82 彭約榮:〈建校史略〉,114;另見"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Rt. Rev. R. O. Hall," 6 September 1954, 聖三一堂文件。

83 〈聖三一堂舉行賣物會〉,《港澳教聲》7(1953年9月):4;〈聖三一堂發動募捐,擴建學校臨時副堂〉,《港澳教聲》20(1954年11月):4;〈聖三一堂賣物會〉,《港澳教聲》23(1955年4月):1。

84 〈副堂及牧師屋舉行奠基典禮〉,《港澳教聲》31(1955年12月):1。

85 〈九龍聖三一堂籌備紀念鄺日修牧師學校〉,《港粵教聲》復刊2卷3期(1948年1月):8。

86 到一九六五年,聖公會在黃大仙開辦的學校,始命名日修小學。

87 "Dean and Bishop's Commissary to Director of Education," 9 June 1952, 聖三一堂文件。

88 "Y. W. Peng to Major H. Misa, M.C. Sec. HK, Jockey Club, HK," 27 April 1954, 聖三一堂文件。

89 林莫如恩:〈慈善部舉辦醫藥救濟事工之經過〉,《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79。

90 周夢秋:《牧者心聲》(香港:基督教文藝,1970),12–13。

91 林莫如恩:〈慈善部舉辦醫藥救濟事工之經過〉,79。另黃林瑞娥:〈慈善部的今昔〉,《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78。另周夢秋:《牧者心聲》,13。

92 〈慈善部工作概況〉,《中華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少年部年刊,1955》,43。

93 〈聖三一堂發動募捐,擴建學校臨時副堂〉,4。

94 曾紀岳:〈把福音興旺起來而且結實增長〉,《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1890–1965》,51。

95 〈中華聖公會中央辦事處組織條例〉,收中華聖公會中央辦事處:《中華聖公會年鑑,1949》,63、116。

96 鍾仁立:《中華聖公會華南教區百年史略》,35。

97 鍾仁立:〈出席中華聖公會第十屆全國總議會的經過〉,《港粵教聲》復刊1卷11期(1947年9月):1。

98 "Hong Kong Diocese—New Status," *The Outpost* (October 1947); 4.

99 參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香港:道風書社,2008)。

100 Deborah Ann Brown, *Turmoil in Hong Kong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Rule: The Fate of the Territory and Its Anglican Church* (San Francisco: Mellen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s, 1993), 91–92.

101 〈聖公會港澳教區常務委員會通啟〉，《港澳聖公會月刊》創刊 1 卷 3 期（1951 年 7 月）：1。

102 同上。〈聖公會退出世界協進會〉，《天風》275（1951 年 8 月 4 日）：11。

103 一九六二年，東南亞各教區組成東南亞教區議會（後稱東亞議會）港澳教區是成員之一。一九六五年，坎特伯里大主教以為該議會將發展成為一個獨立教省，便宣布放棄對港澳教區的轄治權。坎特伯里大主教的原意為將此權交給期望日後成立的東亞教省，可是由於東南亞各地區皆有其獨特的種族及文化背景，故東亞議會亦難以統一所有教區而組成權力較高的教省，結果東亞議會只成為中華聖公會憲章規條信託人。自此以後，港澳教區便不屬於任何聖公會教省，而是獨立而游離的個體。參〈發展簡史〉，香港聖公會網頁，http://www.hkskh.org/articleDetail.php?art_ id=120。

104 "Editorial," *The Outpost* (February 1952): 4. 這期開始，華南（South China）兩字亦從 Outpost 的封面消失，只餘下"Victoria–Hong Kong and Diocesan Association"。

105 邢福增：〈延續與斷裂——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香港〉，氏著：《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第 2 章。



1937年12月25日詩班合照：
1. 鄺福志先生
2. 朱文偉先生
3. 吳信強先生（聖堂建築師吳建中先生次子）
4. 朱恩愛小姐（朱文偉妹妹）
5. Ms. Joyce Locok（Jilmmy Arther Locock妹妹）
6. 蕭英麟先生
7. 李應標牧師
8. 列蒲祜牧師
9. 梁榮耀先生



1937年7月4日啟用新聖堂詩班進堂



江漢章先生1937年自上海
聖約翰大學神學院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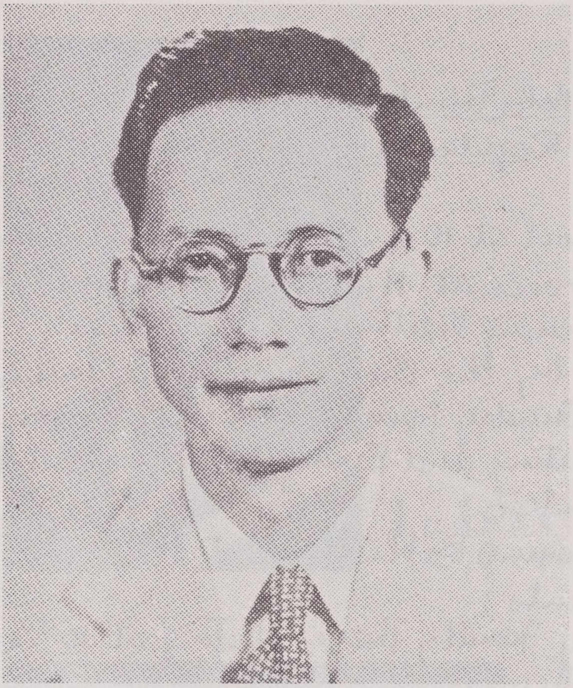
江漢章先生1940年2月
與湯烈娣小姐結婚

Holy Trinity Church
Regular Services

1. Sunday School at 10 am. (60 children, 5 teachers)
2. Sunday Service at 11 am. (90-140 congregation)
3. Sunday Evening Visiting Prayer Meetings (Managed by the Choir, visiting 3 families in each Sunday Evening) (10-15 gatherers)
4. Monday Visiting and Evangelistic work at 9.30 am. (4-6 volunteers)
5. Monday Evening Bible Class at 7.30 pm. (5 attendants)
6. Wednesday Family Prayer Meeting at 10.30 am. (6-15 gatherers)
7. Friday Choir Practice at 7.15 pm. Prayers and Discussion at 8.15 pm. (19 members)
8. Saturday Family Prayer Meeting at 2.30 pm. (10-20 gatherers)
9. Holy Communion every 1st Sunday of the month. (45-65 attendants)

V. Y. Tsang
4th Feb., 19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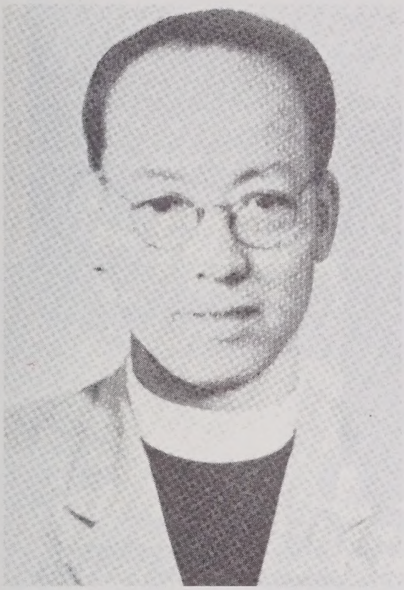
曾貫宜於1946年2月用英文寫下聖三一堂的日常運作



涂從芳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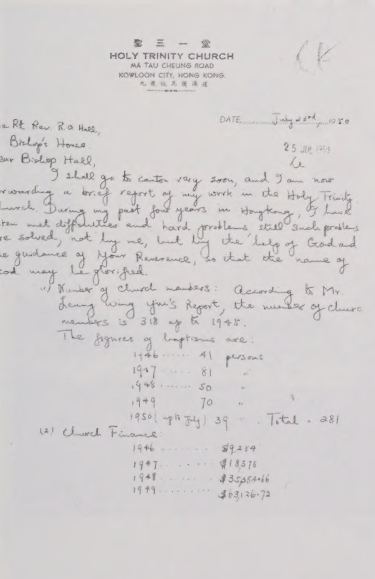
涂從芳牧師（左三）封立禮



列蒲祜牧師



周夢秋會吏長



聖 三 一 堂
HOLY TRINITY CHURCH
MA TAU CHEUNG ROAD
KOWLOON CITY, HONG KONG.
九龍城馬頭涌道

DATE July 23rd 1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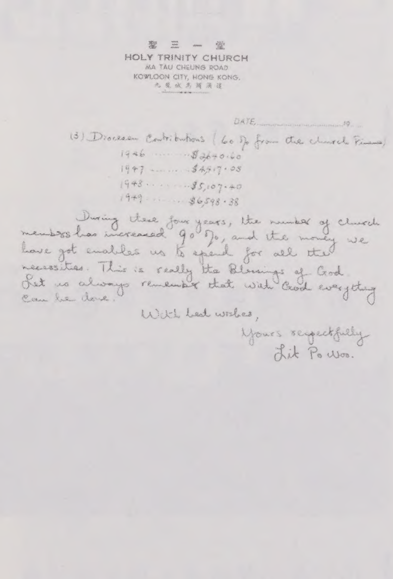
The Rt Rev. R.O. Hall,
Bishop's House
25 JUL 1950

Dear Bishop Hall,

I shall go to Canton very soon, and I am now forwarding a brief report of my work in the Holy Trinity Church. During my past four years in Hongkong, I have often met difficulties and hard problems still such problems are solved, not by me, but by the help of God and the guidance of Your Reverence, so that the name of God may be glorified.

(1) Number of church members: According to Mr Leung Wing Yue's Report, the number of church members is 318 up to 1945.
The figures of baptisms are:
1946 ...... 41 persons
1947 ...... 81 "
1948 ...... 50 "
1949 70 "
1950 (up to July) 39 " Total - 281

(2) Church Finance:
1946 .... $9,254
1947 ...... $18,376
1948 ...... $35,584.66
1949 .... $63,126.72



聖 三 一 堂
HOLY TRINITY CHURCH
MA TAU CHEUNG ROAD
KOWLOON CITY, HONG KONG.
九龍城馬頭涌道

DATE .... 19...

(3) Diocesan Contributions (60 % from the church Finance)
1946 .... $2,640.60
1947 .... $4,517.05
1948 .... $5,107.40
1949 .... $6,598.38

During these four years, the number of church members has increased 90 %, and the money we have got enables us to spend for all the necessities. This is really the Blessings of God. Let us always remember that with God everything can be d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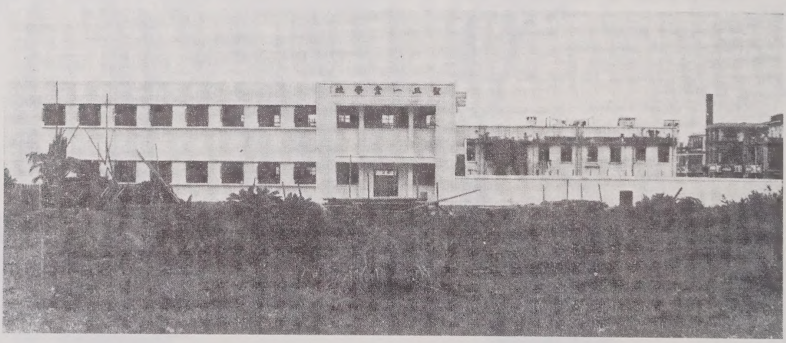
With best wishes,

Yours respectfully
Lit Po Woo.

列蒲祜牧師於1950年7月給何明華主教的書面匯報



幼稚園首屆畢業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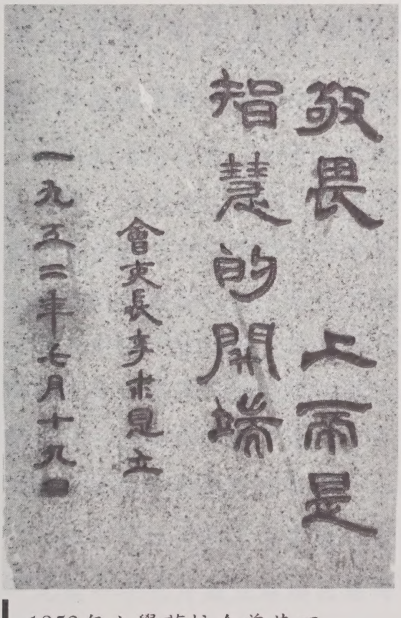


1952年小學校舍首期工程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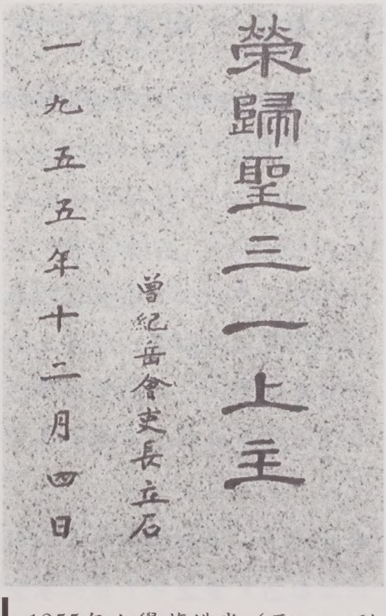




1955年聖三一堂副堂、牧師住所及小學校舍



1952年小學舊校舍奠基石



1955年小學舊禮堂（聖三一副堂）奠基石



1950年3月30日婦女傳道服務團春季
聯歡會團友合照

6

植根本土的宣教與牧養

1950–1984

邁向本地化的聖公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僅改寫了中國的歷史，也根本地重塑了香港社會的面貌。香港基督教在這背景下亦循新方向發展。

一九四九年前，基督教在香港無法擺脱「中國—華南—香港」的格局，各主要宗派均在華南教區的脈絡下發展。[1] 一九四九年後，由於政治環境改變，香港教會從「華南格局」中分割出來，並積極回應因難民湧入而衍生的各樣社會問題，逐漸確立其本土身分。六十年代開始，隨着戰後土生土長的一代成長，本地意識開始在香港這個難民社會滋長，這種本地意識到七十年代後更為顯著。一九五零至七零年代，基督教在香港本土日漸增長，並在公共領域積極參與不同事務。

五十年代以後，香港聖公會亦循着上述軌跡發展。聖公會在一九五一年七月成立港澳教區時，全港共有十所堂會（包括三所英語教會及七所華人教會）：

	英語教會	華人教會
香港島	聖約翰座堂	聖士提反堂、聖保羅堂 聖馬利亞堂
九龍半島	聖安得烈堂、基督堂	聖三一堂、諸聖堂
新界		青山堂、元朗堂

表一：1951 年香港聖公會教會

五十至六十年代，香港聖公會積極拓展，不論在堂會數目或會友人數方面，均取得穩健增長。現綜合一九五五、五八及六二年三項香港教會的調查，把聖公會的發展整理如下：[2]

	年份	堂會數目	會友人數	堂會增長	會友增長
香港島	1955	6	4860		
	1958	7	5291	16%	8%
	1962	9	8971	29%	69%
九龍	1955	6	2350		
	1958	7	3960	16%	54%
	1962	11	4501	57%	11%
新界	1955	3	857		
	1958	3	809	0%	–5%
	1962	3	225		
合共	1955	15	8097		
	1958	17	10060	13%	24%
	1962	23	13697	35%	36%

表二：1955、1958 及 1962 年香港聖公會發展

一九七零年，教區發展委員會發表五年計劃書（1970–1975），指出教會若要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首五年向前邁進，必須重新思考教會的策略，藉傳福音、教育及社會福利，回應香港的發展需要。[3] 一九七四年四月，教區檢討首個五年計劃後，白主教在一九七五年四月發表教區未來五年的發展方針，交發展委員會分組研究，並制訂為第二個五年計劃（1977–1981）。[4]

一九七四年，當香港聖公會慶祝教區成立一百二十五周年時，全港共有堂會二十八所。其中香港島十所、九龍半島十四所及新界四所。[5] 與一九五一年比較，二十四年間，香港聖公會教堂的數目從十所增至二十八所，增幅達一倍八。七十年代後，香港聖公會的發展開始放緩，到一九八四年的十年間，僅增加了一所教會。[6] 即使如此，經過五、六十年代的發展，聖公會已成為本港主流宗派之一。

從一九五零至八零年代，港澳教區先後經歷三任主教的領導：何明華（任期 1932–1966）、白約翰（Gilbert Baker, 任期 1966–1981）及鄺廣傑（任期 1981–2006）。其中，選立鄺廣傑為首位華人教區主教，是聖公會本地化的重要一步。

聖三一堂主任牧師及助理聖品

一九五零至一九八四年間的聖三一堂，先後由多位牧者主理。一九五零年周夢秋牧師 [7] 接替列蒲祐牧師。他任內主要的工作，是籌建聖三一堂小學。一九五五年四月，他因健康理由獲主教批准在復活節後休假半年，其間由曾紀岳會吏長暫掌堂務，另安排張紹桂牧師每月協助主日講道一次。[8] 八月，周牧師正式向教區請辭，並獲何明華批准，自九月一日起生效，並由李應標法政牧師暫理堂務。[9] 其後教區正式委任李應標主理聖三一堂。

一九六零年七月彭恩昌 [10] 接替李應標擔任主任牧師，在他赴英進修期間（1964 年 8 月–1965 年 5 月），堂務由劉允牧師署理。[11] 一九六七年五月，彭牧師辭職離港，出任加拿大聖公會新西敏寺教區溫哥華牧愛堂主任，由劉堅持牧師暫署堂務。[12] 後教區委派黃羨雲會吏 [13] 接任。一九六八年牧區議會決定籌辦聖三一堂中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黃羨雲與班佐時（Joyce M. Bennett）由白約翰主教按立為牧師，成為普世聖公宗首批依法規按立的女牧師。

一九七六年，黃牧師調任聖多馬堂，教區委派謝博文牧師[14]接任。謝牧師一方面加強聖堂建設，另方面則完成建校。籌建多年的中學於一九七八年創校，並在一九八零年舉行奉獻禮。聖三一堂由是在教育方面，建立了由幼稚園、小學到中學的完整體系。一九八一年，牧區議會通過籌建福利中心，一九八四年六月，聖三一堂白普理中心落成啟用。同年八月，謝博文法政牧師舉家遷往加拿大，出任多倫多聖約翰堂主任牧師，堂務由周伯明牧師暫代。一九八四年九月，陳衍昌牧師[15]到任，開始在聖三一堂事奉。

聖三一堂在戰後三十多年間，除暫時署任及暫理情況外，基本上由五位牧師主理堂務，人手尚算充裕。值得留意的是，戰後首三任牧師（列蒲祐、周夢秋及彭恩昌）在華南教區有豐富的事奉經驗，反映出港澳教區的「華南」根源。即使黃羨雲牧師在一九五零年抵港前，亦先後在香港、廣州及武漢學習與生活。華南教區與港澳教區的傳承，可見一斑。

除主任牧師外，教區自六十年代末開始，相繼差派十多位助理聖品到聖三一堂：曾繼才（1968–1971, 1972–1973）、張紹培（1971–1972）、佘德信（1973–1974）、林彼得（1974–1975）、區玉君（1974–1977）、陳衍昌（1976–1977, 1981–1982）、招練俊（1977–1978）、周榮富（1978–1980）、蘇以葆（1978–1980）、黃德榮（1978–1980）、劉周勝（1980–1982）、范尚謀（1982）、鄺保羅（1982–1986）、周伯明（1983–1984）。[16] 不過，在一九六八至八四年這十六年間，共十四位助理聖品曾在聖三一堂事奉，其頻繁調動，亦引起堂會的關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牧區主任黃羨雲便致函白約翰主教，反映牧區議會對助理聖品駐堂年期的意見。[17]

宣教實踐

聖三一堂在一九五零至八零年代雖致力參與教育及社會服務，但一直沒有忘記傳福音的使命，並在不同階段，尋索如何針對不同群體宣講福音。

向學生傳福音

聖三一堂小學第一期於一九五二年落成後，學校以私校的模式運作，由聖三一堂設學校委員會負責管理。一九六八年前，聖三一堂的主任牧師同時兼任校監及校長的職務（除 1950 至 1955 年由彭約榮任義務校長外），堂校關係異常密切。聖三一堂舉行職員退修會，學校的全體職員也會參加。[18]

創校初期，學校仍未開辦學生團契，但當時不少老師均為熱心信徒，部分更是聖三一堂的會友。[19] 這些基督徒老師不僅傳授知識，也關心學生，與學生分享信仰，在學生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鄧慶年牧師於一九五九年自廣州抵港，入讀聖三一堂學校。當時由於家境困難，鄧的母親無法繳付學費，結果得到一位老師及黃羨雲會吏在經濟上支持，才能完成學業。黃會吏告訴鄧：上帝的愛才是最偉大的，她們如是作，只因是祂所喜悅的，並且為了把上帝的愛與更多人分享。[20] 後來，鄧在李智梅主任帶領下參加聖三一堂主日學。李主任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 李智梅主任可算是改變我一生的老師及教母……她帶領我第一次參加聖三一堂主日學，並為我們特別開設一班，而這班主日學學生，也是聖三一堂畢業班的學生……由於李智梅主任的帶領，以主日學學生的身分，第一次接觸聖三一堂教會生活，並從此與聖三一堂及聖公會結下不解緣。[21]

在六年級那年，鄧在李智梅主任的鼓勵下參加少年部。一九六二年鄧畢業時，他參與了教區在聖士提反女校為小六畢業生及初中學生舉辦的青年夏令會，在信仰及對教區的認識上越益長進。[22] 大學畢業後，他承繼了教育與福傳的異象，成為一位中學教師。聖三一堂中學創辦後，鄧慶年是其中一位創校元老，並身兼校牧。後來更走上全時間事奉的道路，受聖公會封為牧師。

聖三一堂學校的學生及校友，都是教會接觸的對象。例如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少年部舉辦校友聯歡會，招待第十屆（即 1966 年畢業）的校友，共有八十多人出席。但後來繼續出席者為數不多。一九六九年六月，小學應屆畢業生約六十人參加了聖三一堂的安德烈團契（即中級少年部）。[23]

李智梅主任憶述，六十年代的學生大多家境貧困，她的書桌上總有一盒餅乾，給那些因沒有用早餐而暈倒的同學補充體力。同時，她又向校長彭恩昌牧師建議成立周會，由老師輪流主講。一九六八年，李主任提出小學應設立學生團契。學生團契主要為五年級學生而設，旨在帶領同學認識基督，培養其靈性生命。[24] 到七十年代中，團契已開放給四至六年級學生，每逢長周的星期六舉行聚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為加強聯繫及培育教職員工的靈性，聖三一堂學校成立教職員團契，由戴郇瑾校長任團長，黃羨雲牧師任團牧。[25]

一九七八年，聖三一堂中學落成後，設有「宗教教育處」，藉着雙周會、崇拜、早禱、靈修資料、學生團契、信仰生活周及夏令營等活動，發揮基督精神，讓同學有機會反思生活與信仰的關係。[26] 學校頂樓有一所裝備齊全的小聖堂，名「聖三一愛民堂」，用以紀念李兆強教憲牧師。創校初期，每日早上七時五十五分，師生在小聖堂舉行早禱崇拜，平均有三十餘人參加。同時，每月又有一次教師團契，名為分享聚會，由堂主任到校主持。校方又大力鼓勵學生參加牧區活動，有學生三十人參加主日學或少年

部，並有十位同學在創校首三年在聖三一堂領洗。[27] 一九八四年二月舉辦的信仰生活周，有七十多位同學決志信主。[28]

向農村傳福音

早在三十年代，山上時期的聖三一堂已建立良好的佈道傳統，「十姊妹團」留下的佳美腳蹤，至今仍傳為佳話。不過，到四十年代，因各人遷居，傳道團不得不暫停下來。戰後，聖三一堂重整佈道工作，福音廣播車便是當時的重點。

福音車佈道源於福音廣播團，由九龍城浸信會教友吳世安於一九四六至四七年間發起。吳曾是林子豐的司機，熱心佈道，發起「基督徒福音廣播團」，以福音車到新界各地佈道。當時，傳道部銳意振興，決定參加廣播團的工作，每月到新界各鄉村佈道一次。初期經常參加者有：陳伯蘭、譚鄺眉珍、陳英乾、劉元乂、夏駱忠信、容黃瑞麟、歐陽澤坤等。後來，又有夏麥恩明、馮李靜芳、汪玉娟、陳黃瑤仙、談秀婉、陸梁寶蓮等加入。[29] 汪玉娟至今仍津津樂道：

> 我們幾位聖三一堂的姊妹組織了一個「十姊妹團」，請吳世安先生讓我們加入，於是每個星期六便由吳先生當司機，載着我們幾個人到元朗、大埔等地派單張，做街頭佈道。每次清早出發，天黑了才回來。此外，福音車還辦過佈道會。[30]

一九五零年，香港基督教聯會加強農村佈道，受福音廣播團啟發，委任吳世安為傳道部農村股長，召集九龍地區二十四個堂會，並選定荃灣、青山、屏山、廈村、元朗、錦田、上水、粉嶺、大埔、沙田、西貢等十一區，從九月開始有系統地佈道。[31] 聖三一堂由於一直參與福音廣播團的新界佈道，故亦支持聯會農村佈道。從一九五零年十月至五一年二月間，共參與了三次佈道。[32] 每次佈

道均由福音車運載輪值堂會的教牧及信徒到目的地，佈道工作包括派單張、唱聖詩、講道和放映畫等。[33]

《聯會月刊》記述聖三一堂參與的其中一次農村佈道的情況：日期在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七日，由於天氣寒冷，佈道改在白天進行。當日參與的堂會有聖三一堂及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由聯會傳道部長張吉盛領隊。江師奶是聖三一堂的代表，眾人早上在諸聖堂集合後，分乘張吉盛的私家車及福音車出發。第一站是荃灣，眾人在街上佈置幾分鐘後，即開始佈道。江師奶負責派發單張，有七十至八十位聽眾。午後，他們轉到元朗墟，有五十至六十位聽眾。午膳後，眾人再在附近佈道，至夕陽西下才結隊離開。全日共有聽眾數百人，舉手信主領介紹書者有三十多人。其中一位參加者憶述：「回來時福音車充滿着嘹亮得勝的歌聲，手鼓和着汽車馬達齊響伴奏，一拍一拍的奏着，好像唱着戰勝的凱旋，回到九龍已是萬家燈火了！」。[34]

據一九五五年的記錄顯示，聖三一堂增至每月一次參與新界農村佈道，固定在每月聖餐主日後的星期一出發，並在農村佈道日晚間舉行影音佈道。當年的佈道地點及聽眾人數如下：[35]

地點	大埔墟	粉嶺	荃灣	青山	元朗	錦田
每次聽眾	30–90	30–150	30–130	80–90		
總人數	400	300	330	200	100	60

表三：1955 年聖三一堂新界農村佈道

新春期間，婦女團又到新界佈道。例如在一九五六年春節的初五及初六兩天，在部長陳伯蘭帶領下，共十多人乘福音車先後到大埔及深井佈道。由於正值假期，聽眾甚多。[36] 當時，新界佈道基本上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撒種工作，但聖三一堂上下各部仍積極參與。在一九五九年及六五年的《港澳教聲》，仍有關於鄉村佈道的報導，其中一九六五年三月的佈道地點包括沙田、元洲仔、錦田、泥圍等地。[37]

一九六七年暴動後，因社會治安問題，聖三一堂停止了福音車的工作，改為在教堂內舉辦佈道會，每年一至兩次，集中火力把福音傳給在教會附近居住的居民。[38]

向新區傳福音[39]

聖三一堂不僅面向九龍城區，更積極參與慈雲山新區的福音事工，以約榮小學為中心的佈道區，後來發展成聖公會慈光堂。

約榮小學創校於一九六八年，位於慈雲山邨，是六十年代開發的新區。約榮小學與聖三一堂關係密切，一方面，學校的命名，是紀念聖三一堂已故的常備值理彭約榮。另方面，聖三一堂主任黃羨雲會吏，亦身兼約榮小學校長一職。

初期約榮小學只開設主日學，到一九七一年，黃羨雲獲白約翰批准，在小學開始晚堂主日崇拜。黃羨雲乃召集聖三一堂的青年人，聯同小學老師、銀禧中學學生及聖十架堂青少年部同工，定期到約榮小學帶領學生團契，並向家長傳福音。時稱聖三一堂慈雲山佈道區。

當時，聖三一堂參與約榮小學服事的青年人，隸屬聖三一服務團契。這是少年部新成立的團契，源於少年部高級組部友因年齡關係，先後離開或參與其他部門工作。其中部友李志冰與前部長鄭家民聯手，成立服務團契，讓這批年青人學習承擔責任，成為教會內外一支服務隊伍。

約榮小學團契的負責人是徐贊生，他既是該校教師，又是聖三一堂高級少年部副部長，承擔服務團的聯絡工作。學生團契分成信、望、愛三「家」，每家約有四十名團友，由聖三一堂服務團契團友擔任導師，周會在主日下午三時至五時舉行。例行的周會首先是分家聚談，然後一起崇拜。活動包括各類型比賽、常識問答、歌唱、話劇、棋類等，假期時也會舉辦旅行或參觀等活動。

這項事工除得到聖三一堂及聖十架堂的青年會友充任導師外，更獲得聖三一堂、諸聖堂及教區婦女總團的經濟支持。除少年部部友的支持外，聖三一堂傳道部鍾嘉樂、劉元乂、汪玉娟、黃志芳、鄭嘉德及郭慧梅等皆協助佈道工作。

隨着約榮小學事工日趨成熟，一九七三年聖誕，白約翰主教正式將佈道區命名為聖公會慈光堂，有一批聖三一堂的會友轉到慈光堂，成為該堂會友。同時，黃羨雲委派專職主理聖三一堂，由徐贊生任慈光堂主理牧師。一九七七年初，教區調派聖三一堂助理聖品區玉君牧師主理慈光堂。

慈光堂是聖公會在慈雲山新區建立的首個據點，回顧這段歷史，可見聖三一堂在其中積極參與，服務精神可嘉。當時，聖三一堂正為中學建校的延誤而周章，又正躊躇滿志地商討興建社會福利中心（參第七章），但仍願在人力及財政上支援新區佈道事工，盡上一己綿力。[40]

向鄰舍傳福音

一九五零年代，聖三一堂已有影音佈道之舉，先後曾在聖堂、基督教墳場、提摩太小學及聖三一堂學校舉行。又辦街頭佈道，[41]例如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二日，傳道部經過一整天新界鄉村佈道後，晚上在官塘新區政府球場舉行影音佈道。[42]

六十年代開始，聖三一堂鄰近社區出現重大變化。工業化的步伐，推動了新蒲崗、觀塘等工業區的開發，也改變了九龍城及土瓜灣的面貌。由房屋協會及私人發展興建的廉租大廈及住宅單位（如真善美邨[43]、馬頭圍邨[44]、盛德街等）相繼落成，聖三一堂牧區從昔日半鄉郊地區，蛻變成人煙稠密的社區。新的社區儼然是一片廣大禾場，向聖三一堂發出召喚。謝博文牧師當時仍是聖馬提亞堂主任牧師，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八至十日，應邀擔任聖

三一堂鑽禧佈道會講員時，便指在聖三一堂後的真善美邨，正是上帝給聖三一堂的工場及等候收成的莊稼。[45]

謝牧師的挑戰，到一九七零年聖三一堂慶祝八十年堂慶時得到回應。是年傳道部在協恩中學舉行首次職員退修會，明確提出「踏向社區」的新路向。當時，傳道部梁榮耀組長曾與組員到鄰區巡視，發起招待鄰區教友的茶會，商討工作的可行性，後來又舉行分組探訪。[46]

傳道部為加強與鄰近社區的關係，開展了三方面的工作。其一，是以兒童流動圖書車，試行文字傳教。圖書車由堂會議員李賢堯捐贈，在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日剪綵後啟用。每周六下午二時卅分停在聖三一堂小學校內，開放給馬頭圍邨及真善美邨小朋友前來閱讀圖書。由於部分兒童未有閱讀能力，教會方面預備了兒童佈道組工作人員來協助，每次跟孩子一同看書，並簡單地講解故事。除通過圖書來向小朋友傳遞福音訊息外，又邀請他們到主日學。[47] 後來，政府增加青少年服務資源，並且有更多青少年中心設有圖書館，圖書車便功成身退。

其二，是強化成長輔導事工。傳道部在星期六下午，特別針對青少年的人生及信仰疑難，舉辦「信仰與人生輔導」，以小組或個別商談方式進行。不過，舉辦初期反應並不理想。傳道部另構思舉辦「基督教信仰」專題講座，希望能爭取接觸更多未信主的青少年。[48]

其三，是醫院探訪佈道。譚鄺眉珍長期投入佈道工作，她任傳道部顧問時，更兼靈修組組長，每星期三下午主持部祈禱會，又帶領部員到醫院探訪佈道，每周分三組進行。

為配合上述事工，傳道部在一九七零年起強化組織職能，除部牧、顧問、正副部長、書記、司庫、探訪、招待及佈置外，增設了音樂、靈修、郊外聯誼佈道、醫院探訪傳道、鄰居聯誼傳道、文字佈道及青少年佈道等組別。[49] 上述職能分工，反映出傳道部

嘗試從不同的關係（鄰居、朋友、病人）入手，並採取多元的媒介（音樂、文字、郊遊、探訪）來開拓福傳工作。此外，除熱心婦女信徒外，傳道部亦吸納了十多位青年人承擔職員工作。[50]

向青年人傳福音

一九八零年，傳道部部長郭始基分享佈道工作方面的困難：

> 去年我們與主日學部及青年部合辦了兩次佈道會，可惜成效不大，所以我們要嘗試舉辦新穎的傳道〔活動〕，如主日學部最近迎新會一類，以便將中小學生大規模帶進教會的羊欄中。[51]

郭氏針對宣教工作的困難，提出兩個探索方向。其一，是強化學生福音工作。其二，是尋求突破，探索「新穎」的傳道方法。一九七九年十月六至七日一連兩天的「想飛」佈道會，可說是一次重要的嘗試。

「想飛」佈道會的對象是青年人，由傳道部與青年部及聖公會大專團契聯合主辦。當時的宣傳單張頗具特色，一反單向的傳福音模式，以青年關心的問題作切入點：

> 你是否已經進入高中階段？
>
> 你是否感到家庭關係冷漠？
>
> 你是否站在學業指標旁，不知何所適從？
>
> 充塞你底腦海裏的，是否孤寂、沒有朋友、不滿現實？
>
> 對這一切，你是否想來一個「突破」呢？

為吸引青年人，佈道會亦加入了音樂、幻燈、話劇的元素，主耶穌成為幫助青年人「衝破現實、冷漠和自私的朋友」。[52]

「想飛」佈道會集合各部部友，動員近百人參與，堪稱全堂總動員的大型事工。雖然帶領歸主的人數不多，這事工卻喚醒各

部關心教會事工。其中值得留意的，是孕育了傳播團契的成立。[53]顧名思義，傳播團契由一群青年信徒發起，旨在推動「將視聽傳福音形式普及化」，並培育更多有志藉傳播媒介傳福音的青年。有關構想在一九八零年一月得到謝博文牧師的支持，再呈牧區議會討論，團契最後在三月正式成立。傳播團契隸屬傳道部，成立初期有二十多位團友。成立首年，團契已製作了兩部錄音劇及幻燈劇，一個宗教性專輯。其中音樂劇《仁心仁術》更獲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錄音劇作展公開組的優異獎。其他製作包括《復甦的廣州教會》、《海倫凱勒》大型話劇、《轉機》錄音劇及《往日好時光》堂慶懷舊喜劇。[54]

一九八二年六月，傳播團契又主辦「傳播危機」研討會，探討各種傳媒（如電視、電影、電台廣播、雜誌報刊等）對基督徒的影響，並反省如何使用傳播媒介傳揚福音，主講者分別是梁偉賢（浸會學院傳理系副主任）、翁偉微（視播團契團長及電視編導）、李玉全（基道書樓負責人），出席者約百餘人。[55]

向聽障人士傳福音

一九七九年，聖三一堂開拓了嶄新的聽障人士宣教工作——以法大團契。環顧當時香港教會，非常缺乏聽障信徒事工，只有天主教設有聽障人士聚會。「以法大」出自聖經馬可福音 7 章 31 至 37 節，提及耶穌醫治一名「耳聾舌結」的人時，

> 用指頭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頭，望天歎息，對他說：「以法大」，就是說：「開了吧」。他的耳朵就開了，舌結也解了，說話也清楚了。

聖三一堂積極參與此事，跟高俊鎮的推動有密切關係。高俊鎮（聖三一堂小學及幼稚園的總校長，1988 年迄今）於一九七五年在台灣升學時副修特殊教育（主修健康教育），其間因認識謝博

文牧師而信主，學成回港後在鑽石山真鐸啟喑學校[56]任教。他與真鐸的校長鮑瑞美同感本港教會忽略了向聽障人士傳福音的需要，希望有教會作承擔。這個構想得到聖三一堂主任謝博文牧師大力支持，以法大團契便正式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聖三一堂成立。

團契隸屬傳道部，由高俊鎮任團長，副團長是翁秀妍。團契以提摩太前書 4 章 12 節作團訓：「不可叫人少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每主日早上九時卅分至十一時在副堂舉行聚會。團契分「團友」和「益友」兩類，團友是真鐸啟喑學校的學生及舊生，他們與高俊鎮已認識多年；益友是聖三一堂教友，成立初期有十八人，包括教師、文員、公務員及家庭主婦等。同時又得聖三一堂青少年部部員輔助，協助日常團契活動。開辦初期（至 1980 年 7 月），共有七十多位聽障人士參加，經常出席者也有十餘人。初期構想是，在成立一年後能加入中堂崇拜，但需要在程序及儀式上作相應配合及修改，以適合聽障人士的需要。[57]

毋庸置疑，開辦這類服務特殊群體的事工殊不容易。首先，益友需要學習手語，否則便無法跟團友溝通。此外，既有手語不一定能充分表達聖經的關鍵詞彙，團契須建立一套溝通方法。團友參與崇拜要由導師們譯出崇拜過程，團友雖然積極參與教會活動，但難免有一點隔膜，未能完全投入。由於溝通上的問題，傳遞信息較困難，故三、四年後，團契人數逐漸減少，乃改為不定期聚會。[58] 從教會的角度而言，如何在團友的關顧與自主間取得平衡，也是很大的考驗。高俊鎮反省多年來參與聽障人士事奉時，不斷反問教會對聽障人士團契的照顧應該有多強？他體會到對團友的關懷要拿捏得恰當，適可而止，否則照顧得太周到，反成團友發展的障礙。

後來，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及路德會（主臨聾人堂）也試辦聽障人士事工。一九八七年，為集中資源及節省人力物力，各教

會的聽障信徒聯合組成香港聾人福音團契，並於聖三一堂白普理社會服務中心舉行聚會，由聖三一堂陳衍昌牧師及高俊鎮任顧問。每主日上午有崇拜，下午有聯誼活動，第四主日商得一位專責聽障人士事工的台灣牧師協助聖餐，聚會以手語進行。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聾人福音團契正式註册成香港聾人基督教會，自建會堂於九龍城衙前圍道。聖三一堂的聽障人士事工可説是功成身退。[59]

一九八九年，一批在以法大團契中對話劇有興趣的團友，受到一九八六年來港交流的美國國家聾劇團啟發，決定成立香港聾劇團，旨在啟發聽障人士以默劇及形體動作來表達思想與感受。劇團的成立獲觀塘獅子會資助，借用聖三一堂的地方排練。聖三一堂會友陳桂芬（亦是佚名劇團成員）及演藝學院講師何慶豐在訓練、組織及行政方面，提供了極大的幫助。[60]

按齡牧養

一九六零年代前，聖三一堂的內部體制跟戰前並無明顯分別，少年團、婦女部、青年部、慈善部、詩班、主日學部等，扮演較重要的角色。到五十年代以後，這些團契及部門各有不同發展。與此同時，聖三一堂會友日見增加，為針對不同年齡群體的獨特牧養需要，教會不得不變革體制，去回應各種訴求。自六十年代開始，教會逐步發展出不同年齡的牧養團契，建立起完善的牧養系統及事奉部門。這發展除讓信徒得到適切培育外，更能凝聚力量，推動聖工。

成年部

成年部是六十年代聖三一堂新設的部門。一九六四年，牧區議會因鑑於「姊妹們比弟兄們在服務教會聖工上的熱誠和貢獻更

大更多。為鼓勵弟兄們急起直追，使能集中精神服務教會」，在三月通過增設成年部。經過數次籌備會議，彭恩昌牧師委任曾貫宜為部長，並於七月二十二日舉行成立典禮。

劉元乂記述成年部成立時，有過這一段記述：

> 成立典禮於是日下午八時在聖堂舉行，在彭恩昌牧師及曾貫宜部長主持下，儀式簡單隆重。在座的數十位部友，平日參加婦女部不行，參加少年部又自悲老大，現在有了一個溫暖的家，無不感到快慰。[61]

成年部每月舉行一次例會，活動包括各項聚會、靈修、專題演講與討論等。一九六五年，夏觀長任新部長，劉元乂仍為副部長，惟以成年男性為對象的目標則改了，變成歡迎女教友加入為部員。[62] 自成立至今，成年部成為推動教會事工的一股重要力量。由於部員資歷深，主任牧師會跟部員共同研究未成熟的計劃，修改後再呈交牧區議會。例如一九七七年的擴建聖壇及更換擴音機、裝設冷氣系統及隔音設備，一九八零年九十周年的大裝修及社會服務計劃等，成年部職員會均有參與。[63]

「成年」具較廣泛涵義，內裏包含着不同群體的特定需要。七十年代後，伉儷團及松柏團契相繼成立，其後由牧區議會將之納入成年部的管轄範圍。

伉儷團是黃羨雲牧師針對成年部未能對小家庭及新婚夫婦給予適切關顧而創辦的。團契在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日舉行首次會議，並推選關柏楷為團長。從一九七五年起，伉儷團契正式歸入成年部，希望能夠強化關顧，並培養基督化家庭。[64]

伉儷團的主要對象是青年夫婦，希望加強牧養這些已離開青少年團的已婚青年。不過，團契實際上仍面對不少困難。其中一位團長坦然指出：

> 伉儷團成立之初，有五對伉儷參加，有孩的三對，曾出席例會的伉儷約有十一對，每次出席伉儷由三至六對不等，參加並不踴躍，有些在參加一次後並沒有再參加，有些基本團友隨着出席率降低而影響了士氣。[65]

雖然如此，但歷任團長均沒有氣餒：

> 我覺得伉儷團一個更貼切的名稱是「擴勵團」，團長、職員和團友之間不斷地擴展提昇愛心、關懷、服務和靈性。當然，相信沒有人願意伉儷團目前的困難會變為她的另一個名稱「吭厲團」——任憑團友和職員怎樣淒厲地引吭高呼，也只能獲得冷淡的反應。[66]

謝博文牧師十分重視對青年夫婦的牧養，故編訂〈婚前輔導班課程大綱〉，為預備婚配的信徒，提供適切的關顧及引導。課程內容不僅包括聖經教導，更針對現實婚姻生活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及挑戰。[67] 他又要求凡「在本堂結婚者應接受本堂牧師之婚前輔導」，[68] 可以說，在引入婚前輔導方面，聖三一堂成為了本港教會的先驅。

另一個在一九七四年成立的團契是松柏團契。顧名思義，松柏團契團員是聖三一堂各部門中成員年紀最大的一群。部分成員在戰前已在聖三一堂聚會，不少更是教會的中堅。惟隨着年歲增長，特別是體力衰退及身體抱恙，他們除主日崇拜外，已很少機會參與其他聚會。劉元乂多年來積極參與聖三一堂事奉，並於一九八零年任松柏團契團長，他道出了年長教友的心聲：

> 一生忠實信仰基督的人，難道真的到了年老進入晚境的時候，就這樣軟弱無能地坐以待斃麼？對於教會一切聖工都袖手旁觀，任由年青力壯的後輩單獨去肩負拓展之責麼？[69]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牧區議會通過成立松柏團契，團契的創始人是黃羨雲牧師、容冠威夫人、梁榮耀、夏約翰賢伉儷與首

任團長李賢堯等。初期也是獨立部門，後來經牧區議會通過，改為隸屬成年部。[70]

少年部[71]

另一個在六十年代經歷變革重組的是少年部。正如前述，聖三一堂在三十年代已有少年團，負責培育青少年，是教會牧養的重要一環。戰後聖三一堂成立青年部(後改稱少年部)，在涂從芳、鄭家民兩人帶領下，有很好的發展。一九五四年，由鍾榮斌任部長，並把組長制改為委員制，由部友選出八個委員（其中最少有兩位姊妹)。[72] 少年部同時更參與新界傳道工作，更一度有成立少年佈道團之議，但最終未能成事。[73] 教會亦積極推動少年部事工，在一九五六年二月首次舉辦「少年部日」崇拜大會，由李應標牧師主講，鼓勵更多青年人（包括教友子弟）參加少年部。[74] 到一九六四年，「少年部日」仍有舉行。[75]

六十年代中葉，少年部考慮到小學生與高中生同屬一部，年齡差別較大，活動多有不便，遂有「分部」的討論。經數次會議後，決定按年齡和程度，分為高級、中級及初級三部，各有部主任分掌，再接受少年部部長和職員的領導。

高級部由十八歲以上，靈性修養和知識程度較高的人組成。內容主要以靈修及學習服務技能為主，文娛性的活動排在正式周會時間外。高級少年部後來更孕育服務團契，參與慈雲山約榮小學的佈道事工。

十三至十七歲的年青人被編入中級部，周會在星期六晚上舉行，內容是半靈修，半文娛。因應少年人的特性，崇拜以較自由方式進行，祈禱、讀經、唱詩外，兼有靈修短講及查經等。文娛活動則為集體遊戲及球類比賽、音樂晚會及旅行等。中級部按每組三十多人再分成若干組，由兩位組長領導，另設輔導員，若組

員眾多，則再分出更小的單位。一九六九年，中級少年部改組為安德烈團契，並把團友分成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四隊。

初級部是年紀最少的一群，周會內容以講故事及遊戲為主。一九六八年夏天，初級組改組為撒母耳團契，團友多是聖三一堂小學畢業生。撒母耳團契分成智、仁、勇三家。每家由導師委任兩位家長，另由部長委任六位職員。團契的聚會時間是星期六下午。

青年部[76]

在少年與成年間，是一群剛踏足社會的青年人。一九七二年，黃羨雲牧師及區玉君助理倡導、組織了青年團契，聖三一堂的青年事工步入了新紀元。這群青年信徒每月聚會一次，人數穩步上升。為更有力推行青年福音工作，堂會遂於一九七五年正式成立青年部。

青年部每月聚會一次，每次出席人數達六十至七十人，主要以輕鬆形式進行。每兩星期又有研經聚會，加強部員對信仰的探索並培育靈性。青年部亦舉辦公開講座，主題為青年人關心的課題，期望在教導之餘，能接觸更多教會外的青年人。例如一九七七年，便主辦以「聖與性」為主題的講座，反應熱烈，吸引了二百多人參加。一九七九年，青年部聯同傳道部合辦大型多媒體佈道劇《想飛》，並生出影音團契。當時部長馮智活以「火車」來形容青年部的發展：

> 青年部……像一列火車，來回不停地跑，不少青年上車，被載到目的地。……偶爾這列火車尋覓新軌道，探索新境地。……我們這列火車不滿足於現有的速度，漸漸加快。……車上擠擁着各方面的人材……車開得這麼快會產生甚麼問題呢？我們還未完全清楚，但願意嘗試，探索。……現在我們的火車有很多座位，寄望有更多新乘客和車上服務員。我們對這列跑了六年

的火車十分有信心，因為掌管開車的是眷愛我們最深切、最足信賴、最使我們能安全前進的天父上帝！

一九七八年開始，青年部聚會增加至每月兩次，後來又在一九七九年改為每星期一次，聚會時間則從周日下午改為周六晚上。

婦女部及兒童主日學部

我們在上文整理了成人部、少年部及青年部的發展與演變，當然不可遺忘在聖三一堂歷史扮演重要角色的婦女部及主日學部。

一如既往，婦女積極參與聖三一堂各項事工，不論在佈道、探訪及其他服侍方面，均貢獻良多、影響深遠。[77] 堂務一步步發展，各項事工紛紛成立專職部門，婦女信徒卻始終是教會重要的推動力量。誠如八十年代擔任婦女部部長的陳王幸然所言：

> 今天本堂有幾個已成長的部門便是從婦女部的事工增長而影響產生，就是探訪部、聖壇服務部和慈惠部，這些部門的熱心部員都是婦女的成員……[78]

聖三一堂的婦女部每月第三主日崇拜後舉行例會，成員人數有百多人，經常出席例會者約六十人。部員又在周六參與聖壇清潔服務，每周又有祈禱會、研經班，並協助牧區探訪工作。[79] 部員長期忠心委身，樹立了佳美典範。

聖三一堂婦女部同時也是聖公會教區婦女傳道服務團的支團，在一九七零年時，婦女部不僅把重點放在服務及團契方面，亦曾就教會及社會的個別重大議題，向總團表達關注。這包括：建議教區議會通過封立女牧師案、關心社會上的「墮落婦女」、關注兒童及婦女受不良讀物及制度傷害等。[80] 一九七一年底，港澳教區議會正式按立黃羨雲及班佐時為牧師。

主日學部是聖三一堂另一個歷史悠久的部門，為不同年齡組別的兒童提供宗教教育。除主日學外，又有兒童樂園。樂園成立於一九五四年六月，是為保持崇拜安靜，免受孩童吵聲干擾而設，對象是三至八歲的孩童。初期人數有三十至四十人，一年後即增至五十多人。[81] 早期兒童樂園只有簡單的內容，導師也缺乏經驗，後來得到從事幼兒教育的容潔芝協助，把兒童按齡分班，並成立職員會，內容方面盡量兼顧遊玩與教導。[82]

後來，兒童樂園正式併入主日學部。[83] 六十至七十年代，每主日平均上課人數為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人左右。自聖三一堂小學落成後，主日學部一直在學校的課室上課，具備十分良好的環境。[84]

可以說，至七十年代中葉，聖三一堂基本上已針對不同年齡群體開辦相應的團契及事工：幼童有主日學，接着是少年部、青年部；婚後可加入伉儷團；另外又有婦女部及成年部，加上松柏團契。聖三一堂對會友的牧養可說是照顧到各個年齡群體的需要了。

事奉部門

聖樂部

聖三一堂詩班歷史悠久，早在戰前已負責在崇拜中獻唱。戰後初期，百廢待舉，參與聚會人數不多，但詩班行列甚長，可見信徒對聖樂事奉的投入。一九五零年後，在吳信強帶領下，常舉辦聖樂演唱會。同時，涂從芳更發起組織兒童主日學詩班。[85]

一九六一年一月開始，聖三一堂增設早堂聖餐崇拜，初期除主禮人彭牧師外，只有一位聖壇侍從在旁協助，出席會友約三十至四十人。同年冬天，人數增至六十多人，教會決定組織小詩班獻詩。成立初期，並無組織及名稱，由詩班員互相督導。一九六四年，小詩班有感人數增加，乃籌組職員會，由班員選出正、副

詩班長、司庫、文書、靈修組長、總務組長、智育組長及康樂組長，並正式名為早堂詩班。[86]

早堂及午堂的詩班，合組為聖樂部，各自有其職員會，而聖樂部又會舉行聖樂崇拜。[87] 七十年代初共有詩班員七十餘人。除練詩外，詩班又有靈修聚會、退修會、夏令會及其他康樂活動，儼然一個團契。聖誕前夕，聖樂部又會到老人院及兒童院報佳音及分發禮物。[88]

一九七五年開始，聖樂部訂下每年聖誕節前一主日為「聖樂部日」，舉行聖樂崇拜，由兩堂詩班聯合獻唱。而在每年的堂慶、聖誕節及復活節，亦會組成聯合詩班獻唱。[89]

崇拜：音響、侍從與主禮

一九七六年，謝博文牧師就任後，致力聖堂建設。硬件方面，聖堂進行了大修葺工程，費用高達十萬元，主要用來安裝隔聲設備，及添置全堂及小學課室的冷氣裝置。工程於一九七八年完成，教友得以在寧靜舒適的環境中敬拜上主。為配合新聖壇啟用，教會更換了全新的音響系統，新系統除處理堂內擴音外，還能向堂外播放崇拜鐘聲。音響部因應新系統之使用而成立，由受訓教友專責操作新系統。[90]

軟件方面，謝牧師極重視聖公會的禮儀傳統，及其在崇拜的實踐，遂有聖壇侍從部及司禱員團契的設立。早於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堂主任黃會吏曾舉辦侍從訓練班，由曾繼才牧師主講，參加者都是弟兄，到一九七三年才有姊妹加入。一九七七年，聖壇侍從部正式成立，每兩年舉辦一次訓練班。侍從分四級：見習侍從（第一年）、受職侍從（第二至六年）、資深侍從（滿六年）及榮譽侍從（滿十年）。[91] 訓練班的內容包括：「聖經中的侍從員及聖殿工作」、「聖公會的歷史傳統及崇拜」、「教會年曆顏色、聖袍、聖殿設備」、「侍從工作實習」等。實習的內容十分全面，以一對

一教授方式，讓侍從學習十字員、書信員、福音員、聖燭員、敲鐘員、獻禮員等不同崗位，以及早晚禱、聖餐禮、聖洗禮及堅信禮的特別安排。[92]

此外，為培訓司禱員，謝牧師又在一九七九年成立司禱員團契。按聖公會傳統，司禱即主禮人或主席，是崇拜中的重要事奉人員。司禱由主教委任，其中部分曾受神學訓練，可以講道和教授洗禮班，也有部分資深的司禱可協助施聖餐。謝博文牧師更編訂〈司禱員——平信徒領袖之工作〉一文，供司禱員學習。[93]

默默的服務

教會的日常運作，當然還少不了一群在背後默默事奉的會友，他們沒有在崇拜及聖禮中擔當甚麼崗位的工作，但卻在不同層面，對堂務發展起關鍵作用。

其一是探訪部。許多教會均面對會友因各種原因，無法參與聚會的情況，聖三一堂也不例外。我們先看以下在一九七零年的統計數字：[94]

成年教友	2,489	青年教友	1,338	兒童及少年	617
少年部	120	成年部	150	婦女部	80
傳道部	39	聖樂部	80	主日學部	120

表四：1970 年聖三一堂教友及參與各部、團契人數

可見，聖三一堂會友總數約四千四百多人，但其中參與各部、團契及事奉者約五百八十九人。如何加強聯繫及關顧教友，成為堂會重大的挑戰。探訪工作雖然意義重大，但卻困難重重。一九六零年代曾任探訪部長的夏麥恩明道出探訪工作的「苦」：

> 探訪人員既要奉獻大量的時間，還須要吃得苦。參加探訪工作的兄姊，在編定的日期，晨早出發，傍晚收隊，整天的時間都

奉獻給教會，一切家務都得拋開；兼以備受日晒、雨淋，舟車勞頓。近年來本港建築多向高空發展，探訪教友，經常要從地下登上七八層樓，沒有充足的精神、強健的體力，實在吃不消。如果登上層樓，不幸又逢教友外出，不得其門而入，那種悵惘之情，更難以言喻。所以，從事探訪工作，無論是精神、體力、愛心、忍耐，缺一都是不行的。

六十年代，聖三一堂探訪部主要由姊妹組成，她們分成兩隊，分別在星期二及五出發。如果沒有特殊事務，牧師必定參加。從一九六三年起，教會更聘請女幹事專責探訪。[95] 教會的探訪工作，即使在一九六六及六七年的兩次暴動期間，也沒有中斷。當時容師奶（黃瑞麟）是全職探訪幹事，除了周二及五的探訪外，她在平日也單獨一人外出探訪。「當時滿地『波蘿』，內心實在很驚，但感謝神一直保守」。容師奶在一九六八年後，即使不再受薪，仍繼續任義務探訪員。[96]

到一九八零年代，出席崇拜人數約佔註冊教友的四分之一，加強聯繫另外四分三教友，也是探訪部的任務。考慮到教友住所的分佈，探訪部實行分區制度，每區設區長，並互選三人委員會，協助區長。區長會議每三個月舉行一次。一九八零年一至六月，三十七位探訪員共出動九十次，探訪了五百户教友。[97] 除藉探訪工作關顧教友外，亦可通過舉辦不同的康體活動，加強會友的聯繫。一九八零年，康樂體育部正式成立，主辦各種球類訓練，增進主內友誼團契，並期望能接觸教會外人士，達到傳福音的目的。[98]

聖壇服務部及聖馬太團契同樣默默地服侍教會。聖壇服務部員每周負責清潔聖餐用具、銅十架、刷蠟、插花、換蠟燭等，不計辛勞，讓聖禮得以順利進行。[99] 而聖馬太團契則成立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由十多名從事文員、會計及秘書工作的會友組成，旨在支援及協助教會幹事及職員，特別是每年七月及十二月計算會友的常月捐及各項奉獻，並發信給教友等的繁忙日子。[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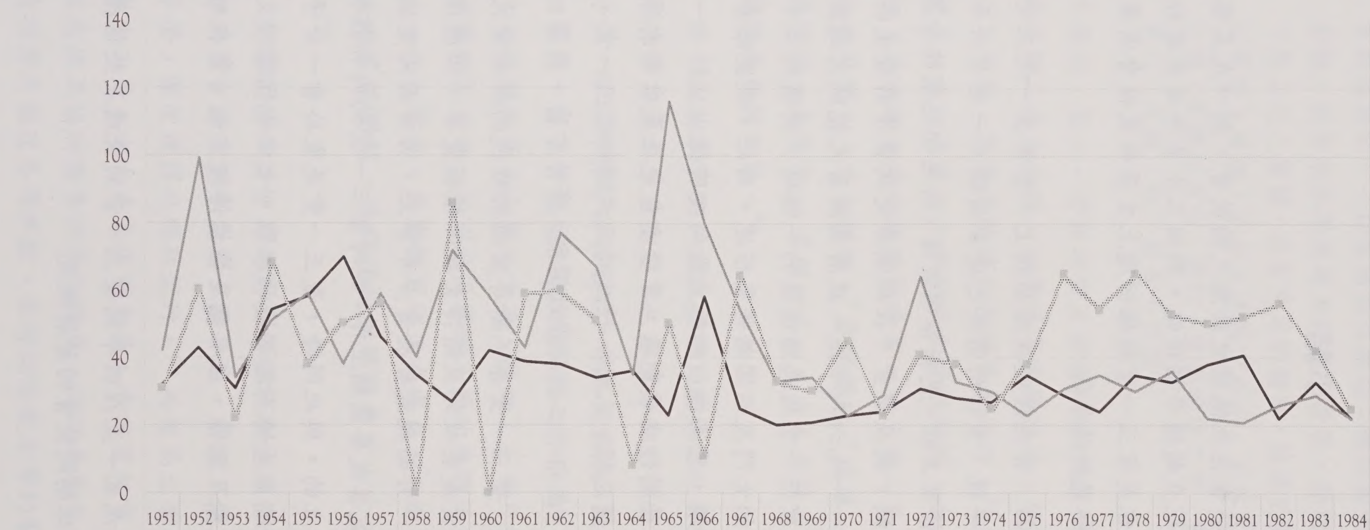
小結

聖三一堂是聖公會在九龍歷史最悠久的教會，到一九五零年代，已在九龍城區屹立超過半個世紀。戰後三十多年是香港社會急劇變遷的年代，也是聖三一堂積極回應上主召命及社會需要，逐步完善自身，不斷更新的年代。

聖三一堂的更新，首先體現在建築物上，聖堂在一九三七年落成，在使用四十年後，重修的需要已迫在眉睫。一九七六年，聖堂進行大規模的修葺工程，更新各項設備，好適切地服務會眾，成為敬拜上主的聖殿。提及聖堂，在此順帶交代重修前發生的一段有驚無險的插曲。一九六八年底，政府為改善九龍城大迴旋處交通體系，擬收回聖三一堂近馬頭涌道的一幅地，面積約二千餘平方呎。聖三一堂的大門及石圍牆將要移建。為此，牧區議會委派代表與工務局交涉，並函請白約翰主教向政府提出反對。一九六九年六月，港督召開行政局會議，曾繼才會吏及夏永豪出席，並呈交致行政局的備忘錄。八月，行政局正式通知聖三一堂，接納教會方面的意見，並指示工務局修改圖則，事件才告一段落。[101]

除更新聖堂外，聖三一堂亦不斷尋索適切時代的牧養模式。六十至七十年代，黃羨雲牧師及謝博文牧師積極變革，回應信徒群體的不同需要。一方面銳意發展青少年事工，另方面又重組教會各部門及團契，完善牧養關顧工作。現時聖三一堂的內部體制，便是在這段時期確立的。與此同時，聖三一堂是聖公會一分子，如何發揚聖公會傳統自是她不能迴避的挑戰。七十年代謝博文牧師在禮儀方面的培育及教導，在承繼及發揚傳統方面，實在功不可沒。

表五整理了一九五一至八四年間聖三一堂的洗禮及堅信禮人數，有助我們了解此期間教會的發展概況：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成人洗禮	32	43	31	54	58	70	46	35	27	42	39	38	34	36	23	58	25	20	21	23	24	31	28	27	35	29	24	35	33	38	41	22	33	22
孩童洗禮	42	99	34	51	59	38	59	40	72	58	43	77	67	35	116	80	54	33	34	23	29	64	33	30	23	31	35	30	36	22	21	26	29	22
堅信禮	31	60	22	68	38	50	56	0	86	0	59	60	51	8	50	11	64	33	30	45	23	41	38	25	38	65	54	65	53	50	52	56	42	25

表五：聖三一堂洗禮及堅信禮人數（1951–1984）

從表五可見，一九六零年代中（1965 及 1966 年）可視作聖三一堂發展的分水嶺。在此前階段（1951 至 1966 年），成人洗禮以一九五六年為高峰，其後即逐步下調。兒童洗禮則在反覆中向上攀升。兒童受洗人數高於成人，相信是受惠於聖三一堂學校與教會間的密切關係，也跟教友的生育繁衍有關。到後期（1966 至 1984 年），整體成人及兒童洗禮的人數較前期少，多年來一直維持平穩走勢，反映出佈道工作正面對困難。這種放緩的情況，其實跟香港教會整體發展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堅信禮的人數卻明顯高於洗禮，這是否反映早階段接受兒童洗禮的孩童，在教會接受較佳的培育，得以在教會成長？

數位信徒的經歷，頗能印證這點。例如鄒小華一九六八年在聖三一堂小學畢業後即參加少年部，一九七一年受洗，其後任職少年部、青年部和傳道部。一九八七年任青年團契團長，一九八九年是康體部部長。[102] 一九四九年還是小學生的關伯愷，在聖誕節時由同學引領到聖三一堂，接着參加主日學。一九五二年受洗，一九五七年按手。後來任主日學部教員、少年部職員及詩班員。一九七四年更被選為首屆伉儷團團長。[103] 徐自強嘗自述其經歷：

> 我加入聖三一堂前，愛在街上流連。下課後及禮拜六、日沒有地方去，有一次跟朋友溜到了聖三一堂那裏。推開了禮拜堂的門，傳來詩歌的聲音。那時候看到有人在裏面唱詩，我剛把門推開，已給裏面一位先生留了我下去唱詩，後來知道他就是涂從芳先生。只我一個進了去，其他朋友都溜了。涂從芳先生邀請我下周六再去，由此開始踏足聖三一堂。結果我參加了主日學聚會，之後洗禮、按手，更擔任少年部的職員。就這樣開始了幾十年在聖三一堂聚會。[104]

除教會條件外，社會整體氣氛及環境因素也不容忽視。當時生活較簡樸，年輕人參與教會活動已是一項上佳的活動，這有助人留在教會。鄧慶年回想當時教會生活，有這樣的看法：

> 在五十至六十年代，教會外的個人生活不比現在的豐富，返教會已經是上好活動。那時候我們星期六上午到教會參與各式活動，有時候到晚上十一至十二時才回家。我們那年代的信徒，少年時已參與聖樂部、少年部的活動，一直在教會成長，自能培養出對教會很深的感情及委身。[105]

可以這樣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少年人，通過不同途徑接觸聖三一堂，在聖品人員關顧及培育下，投入教會生活，並在不同團契得到牧養及栽培。到七十年代，他們漸漸長大成人，並且熱心參與教會事奉。更值得指出的是，戰後三十多年間，聖三一堂先後有多位會友投身聖品行列，[106] 這也是上主給聖三一堂的祝福。

及後香港經濟起飛，社會富裕，人的生活也有了更多選擇，這對教會的發展有不少影響。黃羡雲牧師在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時，便指陳八十年代對聖三一堂的挑戰：

> 八十年代的聖三一堂，正站在十字街頭，我們如要得着上帝的喜悅去作工，則我們目前的工作，不僅不敢自滿，而且還深感不足。所以我們當怎樣行，就要藉賴上帝的啟示和教友們不斷的努力，善用上帝賜予我們各種工作的機會，我們慶幸有服務社會的機會和組織，我們有中、小學、幼稚園、夜校等教育機構，我們有福利工作。更可喜的是我們有傳福音的自由和機會。但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今日，是物質生活沖激精神生活的極端的危險時代，也是世俗情慾向道德靈性不斷進攻的時代。……我們深知道在今天，惟一要追求的是增長對上帝和教會的認識，脫離了神恩的照拂，我們恐將無所作為。我們深願建立小組研究的團契，靜聽神的啟示，了解神的旨意。更要特別注意的，就是天國的建立，是要求我們進入社會，不是要求我們獨善其身。……我們是處在人口眾多、地方遼闊、工作不斷增加的九龍城區，更深感責任的重大，如今正是我們積極行動的時候，要回應上帝的呼召和交託，我們先得充實自己的靈命，才能在一切事主的工作上，有所成就而彰顯主的榮耀。[107]

踏入八十年代，聖三一堂必須繼續尋索自己要走的路向。

注：

1 邢福增：〈一九四九年前香港基督教的發展——宏觀歷史的考察（1842–1949）〉，參氏著：《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4）。

2 Earl H. Cressy, *City Churches in Hong Kong: With a Supplementary Survey of All Churches in the Colony* (Hong Kong: Earl H. Cressy, 1956), 14–15; Earl H. Cressy and Loren E. Noren, *Urban Church Growth in Hong Kong 1955–1958, Second Hong Kong Study* (Hong Kong, Earl H. Cressy and Loren E. Noren, 1960), 12, 17, 23; Loren E. Noren, *Urban Church Growth in Hong Kong 1958–1962, Third Hong Kong Study* (Hong Kong: Loren E. Noren, 1964), 4–5, 16, 20, 26.

3 龐德明：〈港澳教區發展委員會五年計劃書（續）〉，廖翼顯譯，《港澳教聲》201（1970年6月）：6。Diocese of Hong Kong & Macao, *The Five-Year Plan, 1970–1975: Report of the Bishop's Commission on Diocesan Development Presented October 1969* (Hong Kong: Diocesan Office, 1969), 1.

4 〈教區特別議會月底舉行，五年計劃意見書為討論重點〉，《港澳教聲》282（1977年3月）：1。

5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 Macao 1849–1974: A Brief History and the 1974 List of Church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ocial Welfare Centres* (Hong Kong: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1974), 11–15.

6 《聖公會港澳教區一百三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849–1984》（香港：聖公會一三五周年慶典中央籌備委員會，1984），25。

7 周夢秋於一九四三年在雲南接受按立為會吏，翌年封牧。

8 "Bishop Hall to the Hon. Secretary, Holy Trinity Church Vestry," 12 April 1955，聖三一堂文件。

9 "Bishop Hall to the Ven. Archdeacon Tsang Kei Ngok, Holy Trinity Church," 1 September 1955，聖三一堂文件。

周夢秋牧師事後憶述這次事件：「牧者被封立任聖職，原屬上主的美意。如果我們把這美意視為千斤重擔，難以負荷，則不難出諸逃避一途，以冀卸卻仔肩，但事實上我們能逃到那裏去？我必得承認，我亦嘗犯此錯誤。為了某些事，在十多年中，我一直祈求上主，如果要用我的話，則勿使我負那些重擔。然而我的禱告，似乎未上達天意。結果我設法逃避，甚至預備毀棄了前途，亦在所不惜，但我始終未能逃避上主的任命。」周夢秋：《牧者心聲》（香港：基督教文藝，1970），76–77。

10 彭恩昌於一九五零年十月在香港聖保羅堂按立會吏，一九五零至五三年間在華南教區事奉，其間在一九五三年在廣州救主堂按立牧師。一九五七年來港後，在諸聖堂任助理牧師，一九八八年退休。

11 "Bishop Hall to Rev. Peter Peng," 11 March 1964，聖三一堂文件。

12 "Bishop Gilbert Bak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Vestry, Holy Trinity Church," 3 March 1967，聖三一堂文件。

13 黃羨雲生於一九一七年二月，先後於廣州真光中學及香港聖保羅女校就讀，一九三一年在聖保羅堂受洗。中學畢業後分別就讀於武漢華中大學、廣州協和神學院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五零年二月由湖北武昌回香港就職於九龍真光中學任教導主任，開始到聖三一堂參加主日崇拜。一九五七年秋受何明華主教委任為聖多馬堂主任及聖多馬小學校長，翌年按立為會吏。一九八六年封立為法政牧師，一九九七年七月息勞歸主。參黃羨雲：〈聖三一堂與我〉，《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80），15。〈黃羨雲法政牧師生平簡歷〉，《教聲》1117（1997年8月3日）：4。

14 謝博文一九三六年生於香港，在一九五零年代參與諸聖堂小童晚堂詩班。一九五五年到台灣升大學，後獻身。一九六一年在美國西維珍尼亞州受按立為會吏，翌年在港封牧。曾於元朗聖馬提亞堂及台北牧愛堂事奉。

15 陳衍昌先後畢業於聖保羅書院、葛量洪教育學院、香港協和神學院。一九七零年按立會吏，七一年封牧。曾任聖馬利亞堂助理牧師及教育宗教教育幹事。其間赴英攻讀宗教教育。

16〈傳道幹事及助理聖品〉，《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90），26。

17 "Jane Hwang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4 November 1974，聖三一堂文件。

18〈牧區動態——聖三一堂〉，《港澳教聲》128（1964年4月）：3。

19 據高俊鎮校長在一九九零年指出，全校八成老師是基督徒。高俊鎮：〈聖三一堂學校〉，《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71。

20 鄧翊匡：〈小伙子的「神」「奇」遭遇〉，《聖三一堂周刊》，2005年8月28日，9。

21 鄧慶年：〈在聖三一堂的第一次〉，《聖公會聖三一堂一百一十周年堂慶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2001），26。

22 同上書，27。

23 鄧慶年：〈少年部概況〉，《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70），20。

24 李智梅：〈生命之糧〉，《聖公會聖三一堂小學五十周年校慶特刊》（香港：聖三一堂小學，2003），32。另蔡秀顏：〈回顧聖三一堂小學〉，《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40。

25《聖三一堂學校校訊》，1976年3月15日，聖三一堂文件。

26〈宗教教育處〉，《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二十周年校慶特刊，1978–1998》（香港：聖三一堂中學，1998），46。

27 鄧慶年：〈寓傳道於教育〉，《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111–12。

28〈聖三一堂中學信仰周〉，《教聲》419（1984年3月18日）：4。

29 歐陽澤坤、譚鄺眉珍：〈傳道部小史及近況報告〉，《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1890–1965》（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65），77。另汪玉娟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30 汪玉娟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31 羅嘯川：〈大時代轉進中的三個加強〉，《聯會月刊》30（1950年6–7月）：2。

32 〈傳道部農村股工作輪值表〉,《聯會月刊》30（1950年6–7月）: 10;〈傳道部農村股「春季」佈道工作輪值表〉,《聯會月刊》34（1950年6–7月）: 9。

33 吳世安:〈農村佈道的呼籲〉,《聯會月刊》31（1950年8月）: 5。

34 李大衛:〈農村佈道工作報告〉,《聯會月刊》34（1950年6–7月）: 6–7。

35 〈傳道部部務概況〉,《中華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少年部年刊，1955》（香港：港澳教區聖三一堂少年部，1955）, 41。

36 〈聖三一堂婦女團新春在新界佈道〉,《港澳教聲》33（1956年2月）: 4。

37 〈牧區動態——聖三一堂〉,《港澳教聲》67（1959年3月）: 2。〈牧區動態——聖三一堂〉,《港澳教聲》140（1965年4月）: 3。

38 郭始基:〈傳道部需要你的支持與代禱〉,《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 71。

39 本部分關於約榮小學的事工，主要參鄧慶年:〈少年部概況〉,《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 19；另鄧慶年:〈少年部之服務團契〉、陳守真:〈慈光堂——傳道的果實〉,《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 81。

40 "Jane Hwang, Chairman of Vestry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19 July 1972，聖三一堂文件。

41 〈傳道部部務概況〉,《中華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少年部年刊，1955》, 41。

42 〈牧區動態——聖三一堂〉,《港澳教聲》140（1965年4月）: 3。

43 真善美邨於一九六五年落成，位於馬頭圍富寧街，由香港房屋協會負責管理。

44 馬頭圍邨於一九六二年落成，由香港房屋協會負責管理。

45 謝博文:〈事奉與侍奉〉,《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 14。

46 傳道部:〈本年來的傳道概況〉,《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 34。

47 同上；另陳美顏:〈兒童流動圖書閱覽車〉,《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 31–32。

48 傳道部:〈本年來的傳道概況〉, 34。

49 同上書, 33。

50 同上。

51 郭始基:〈傳道部需要你的支持與代禱〉,《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 71。

52 〈想飛佈道會〉,《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 72。

53 〈九十周年新生之傳播團契〉,《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 77。

54 同上。

55 〈「傳播危機」研討會〉,《聖三一堂周刊》, 1982年5月30日。有關是次研討會的詳情，參〈傳播危機座談會綜合報導〉,《港澳教聲》346（1982年7月4日）: 2、4。

56 真鐸啟喑學校於一九三五年由三位基督教傳教士（竇興懌女士 Ms. M. Pope、龍福英女士 Ms. W. Griffin 及黎理悅女士 Ms. Elliott）創辦，校址初設於港島巴丙頓道。一九四八年遷到九龍鑽石山。參 http://www.cts.edu.hk/index.php?part=whole&st_page=chun_tok_school/a2-history。

57 高俊鎮:〈向聾人傳福音的以法大團契〉,《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 76。

58 高俊鎮：〈聖三一堂的聾人服務〉，《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78。

59 同上書，79。

60 同上。另〈香港聾劇團簡介〉，香港聾劇團網誌，http://hk.myblog.yahoo.com/hktd1989/article?mid=28。

61 劉元乂：〈成年部的成立與現況〉，《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68。

62 鄺福志：〈成年部的回顧與展望〉，《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16。

63 成年部：〈寫在九十周年堂慶大典〉，《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97。

64 梁雁群：〈伉儷團〉，《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102。

65 李鍾甜英：〈伉儷團呼籲，等待您的回應〉，《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54。

66 〈伉儷團、擴勵團、吭厲團〉，《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55。

67 謝博文編：〈聖三一堂婚前輔導班課程大綱〉，《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93。

68 〈聖三一堂結婚則例〉，《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92。

69 劉元乂：〈我們的松柏團契〉，《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130。

70 同上。

71 少年部一節主要參鄭家民：〈少年部近年部務概述〉，《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70；鄧慶年：〈少年部概況〉，《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19–20。

72 〈聖三一堂少年部上半年工作報告〉，《港澳教聲》19（1954 年 10 月）：3。

73 漂：〈佈道在新界〉，《中華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少年部年刊，1955》，56。

74 〈聖三一堂少年部「少年部日」〉，《港澳教聲》19（1954 年 10 月）：3。

75 〈牧區動態——聖三一堂〉，《港澳教聲》128（1964 年 4 月）：3。

76 馮智活：〈青年部——我們是一列火車〉，《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103。

77 談秀婉：〈婦女團工作概況〉，《中華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少年部年刊，1955》，40。

78 陳王幸然：〈我們的婦女部〉，《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99。

79 汪玉娟：〈婦女部的組織與工作簡介〉，《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36。

80 同上。

81 〈兒童樂園〉，《中華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少年部年刊，1955》，51。

82 黃志芳：〈「兒童樂園」報告〉，《港澳教聲》34（1956 年 3 月）：3。

83 關艷萍：〈我們的主日學部〉，《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23。

84 夏永豪：〈主日學部工作報告〉，《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65；關艷萍：〈我們的主日學部〉，23。

85 鄭嘉德：〈聖樂部的過去與現在〉，《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64。

86 李信傑：〈早堂詩班成立四周年的感想〉，《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66。

87 〈聖三一堂舉行聖樂崇拜〉，《港澳教聲》94（1961 年 6 月）：3。

88 容潔芝：〈我們的聖樂部〉，《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25–26。

89 伍德賢：〈我們的聖樂部〉，《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87。

90 李有斌：〈音響部〉：《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63。

91 梁恩靈：〈聖壇侍從部〉，《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62。

92〈一九八零年聖壇侍從訓練班〉，《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90。

93 梁德威：〈司禱員團契〉，《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84–85。

94 黃羨雲：〈主啊！我當何為？〉，《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48。

95 夏麥恩明：〈從事探訪工作的一點感想〉，《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76。

96〈慈祥長者容師奶〉，《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40。

97 鄺國富：〈探訪一二三〉，《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127–28。

98 李慶富：〈九十周年新誕生的康樂體育部〉，《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109。

99 鄧黃曼玲：〈聖壇服務〉，《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94。

100 祝伊娜：〈聖馬太團契〉，《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53。

101 夏永豪：〈與政府交涉收回堂地始末〉，《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29–30。

102 鄒小華：〈我的經歷〉，《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43。

103 關伯愷：〈年輕的伯伯〉，《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41。

104 徐自強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105 鄧慶年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106 聖三一堂會友獻身及進修神學者包括：彭榮昌、李靈光、葉西山、涂從芳、梁彼得、梁熾靈、馮家亮、林彼得、區玉君、鍾嘉樂、葉敬熙、徐贊生、鄧慶年、郭佩蘭、郁德芬、劉周勝、馮智活、盧君灝、黃文佳、彭培剛、區文正、陳守道、劉子睿等。麥小兵：〈聖三一堂教友委身聖職工作不甘後人〉，《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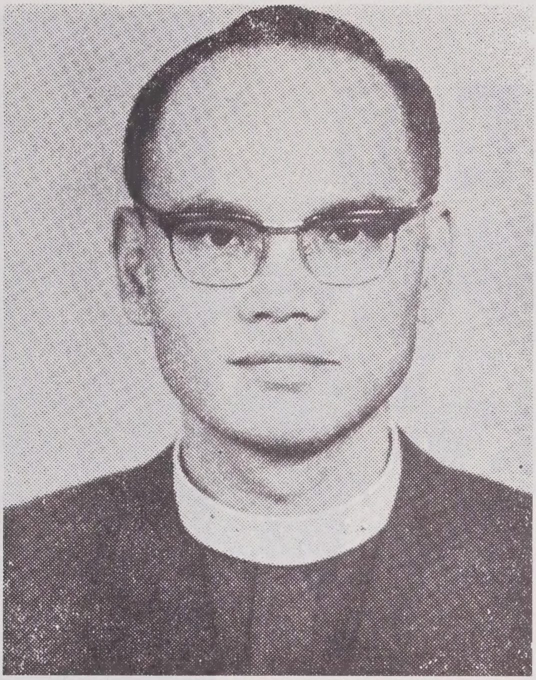
107 黃羨雲：〈主啊！我當何為？〉，48。



約1953年的馬頭涌道與太子道交匯處，
右方為聖三一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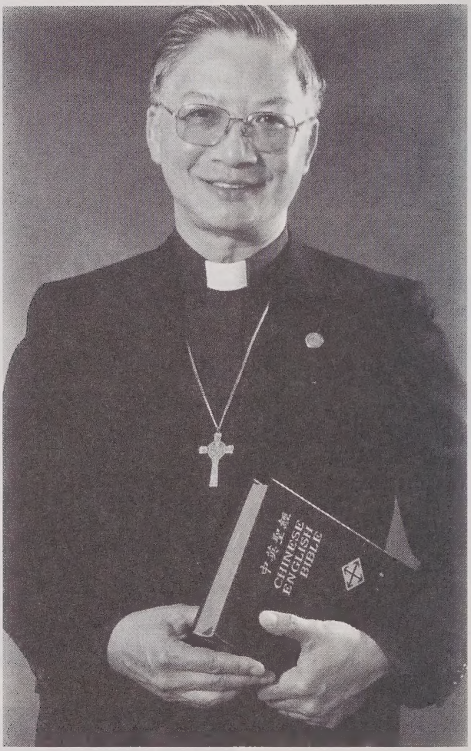
鄺廣傑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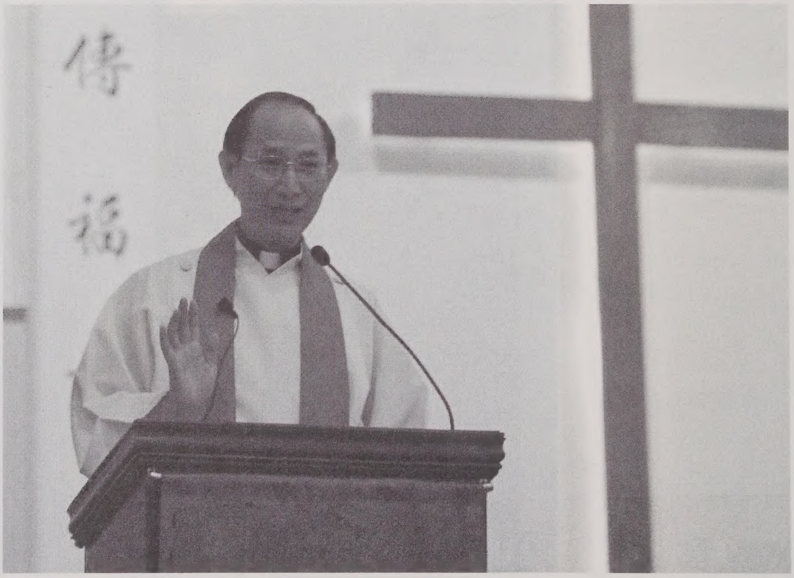
彭恩昌牧師



黃羨雲法政牧師



謝博文法政牧師



陳衍昌牧師



1956年聖三一堂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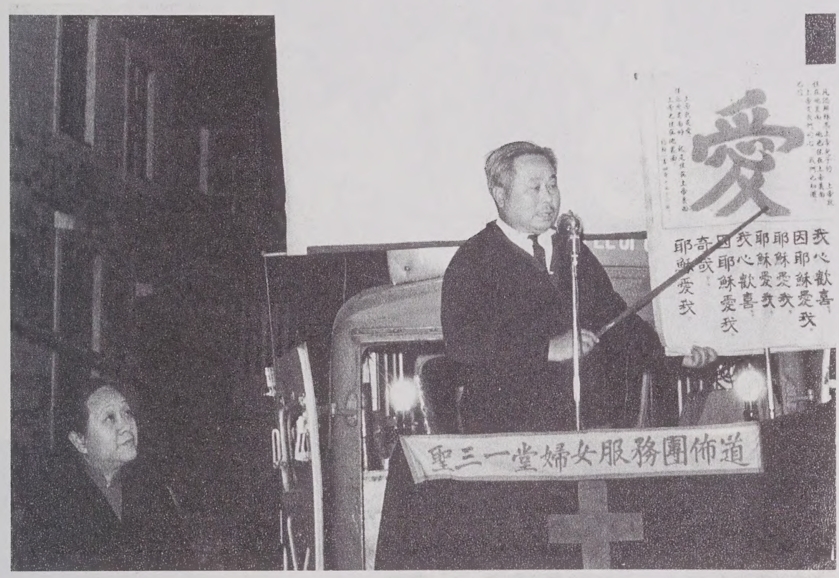
十姊妹合照



1960年代的福音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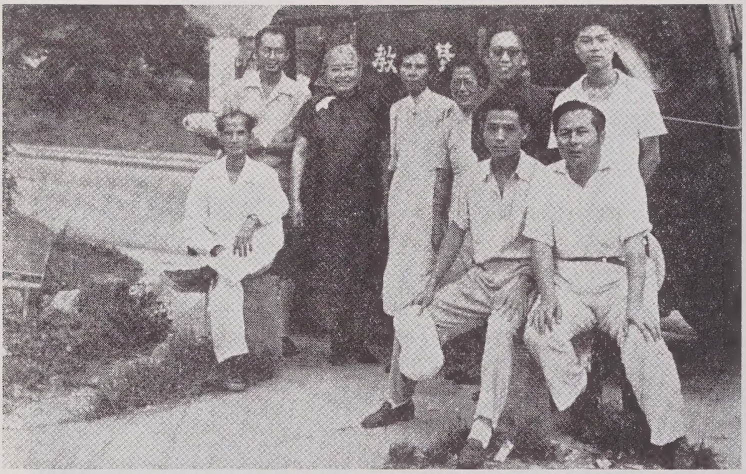
譚鄺眉珍女士在福音車上佈道



劉元义先生在福音車上佈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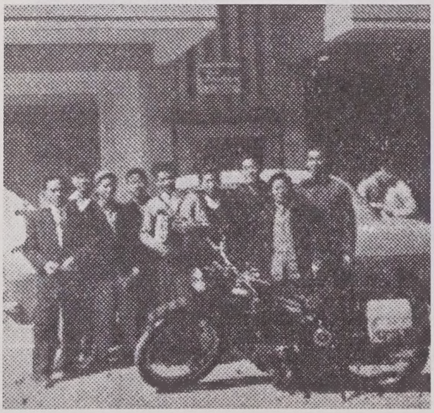
劉元义先生在青山佈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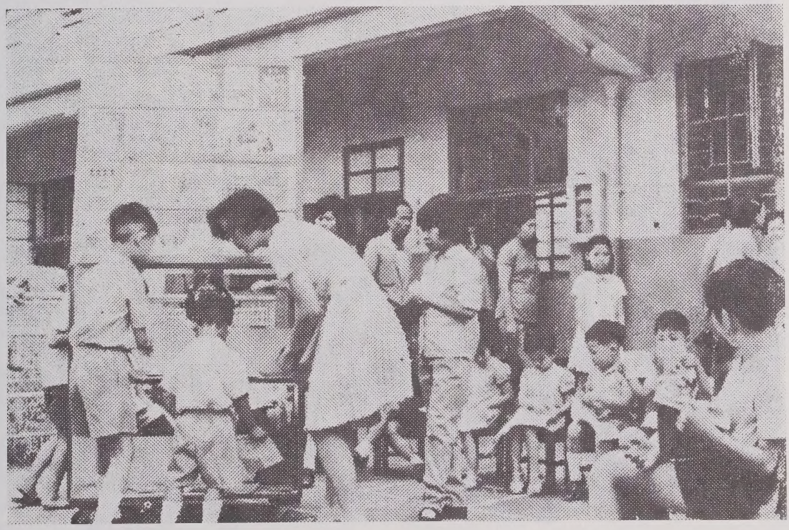
到鄉村佈道







在新界大埔元洲仔佈道



圖書車



以法大團契在崇拜中用手語獻詩



1975年少年部職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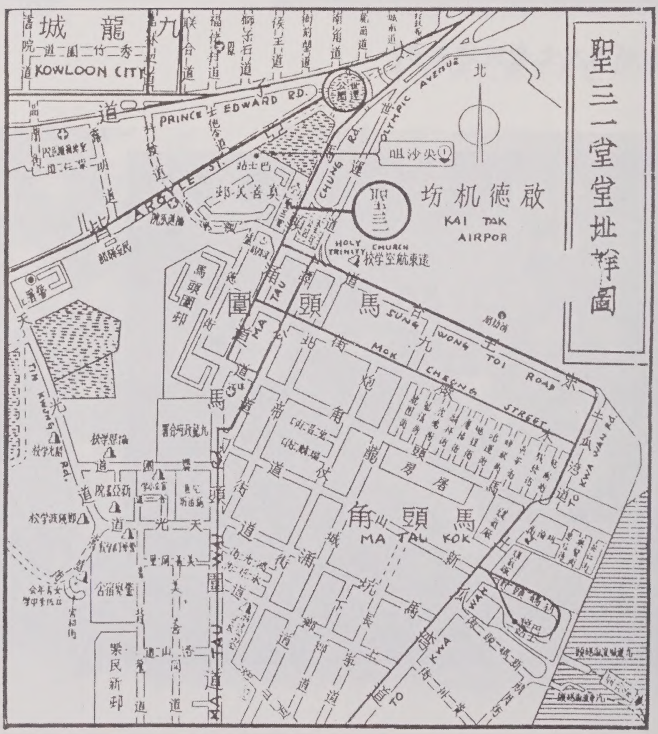
1960年婦女部團友大會後遊藝會



兒童樂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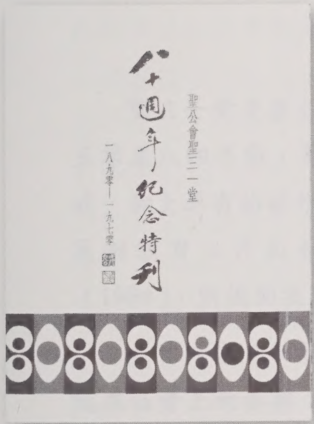
1975年3月16日按手禮後與會督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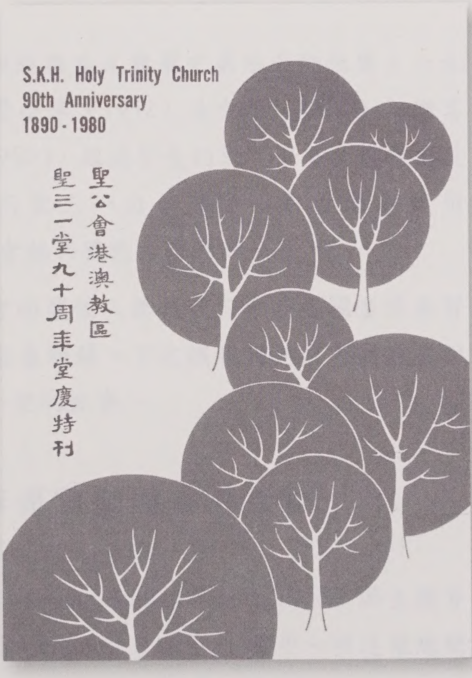
約1970年代的聖三一堂堂址詳圖



聖三一堂鑽禧特刊
（1965年）



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
（1970年）



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
（1980年）

7

植根本土的教育與服務

1950–1984

聖三一堂是聖公會港澳教區在九龍歷史最悠久的牧區。一九五零至八四年間，聖三一堂小學（1952）及中學（1980）相繼落成，加上原有的幼稚園（1950），組成整全的教育事業，體現出牧區對教育工作的承擔。而聖三一白普理中心的籌建與啟用（1984），則揭開牧區在社會福利服務方面的新一頁。

其實，聖三一堂對社會的關懷，跟戰後三十多年間香港基督教在社會上的參與，可謂息息相關。下文讓我們先從宏觀角度回顧這段歷史，再探討聖三一堂的故事。

戰後三十年基督教與香港社會

《香港年報 1956》（*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6*）的主題專文為〈一個人口問題〉（A Problem of People），其中一段這樣總結香港社會在戰後的狀況：

> 回顧這段日子，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個問題，我們所作的大部分事情都會不同。財政、教育、醫療及衛生服務、社會福利、監獄、公安、工業、商業、勞資關係、土地政策、房屋、漁農業、政治關係——甚至法律本身——全都因這單一問題明顯受到拖累（在某些情況下，拖累更是摧毀性的）。這就是大量移民入境的問題……[1]

戰後香港社會深受難民問題困擾，人口從一九五零年的二百三十六萬增至一九五六年的二百五十萬，估計其中一百萬是來自國內的難民。[2] 有社會學家指出，大量難民留在香港，「使本來以為是流動人口的問題，變成了對社會構成實質壓力的社會問題」。[3] 人口增加，加劇了社會原來在居住、衛生、教育、治安方面潛存的種種問題。[4]

由此可見，救濟工作對當時社會急不容緩，各類志願團體因而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單在一九五一年，在港服務的志願團體便多達七十八個，承擔了大量的救濟福利工作。[5] 這些工作主要仰賴大量海外撥款，特別是龐大的國際救援網絡。[6] 其中以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Church World Service）香港分會和香港基督教福利與救濟協會（Hong Kong Christian Welfare & Relief Council）等國際性基督教福利組織的貢獻最大。個別歐美差會及本地教會，也參與不同層面（如住屋、醫療、救濟、衛生、教育、青少年、職業培訓）的救濟及福利工作。[7] 難怪香港社會服務聯會（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總幹事華元博（Paul R. Webb）牧師形容，五十到六十年代，是香港社會福利服務的黃金時期（golden decade）。[8] 世界信義宗社會服務處（Lutheran World Service）的主任施同福（L. Stumpf）牧師在六十年代末也指出，香港政府沒有推行全面的社會保障計劃，許多在西方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及必須的社會福利服務，在香港並不存在，甚至尚未在望。相反，志願機構對社會福利的理解，已突破純粹的物質救濟工作，轉向強

調與受助者建立密切關係，找出防患於未然的做法，在整個社會福利觀念上，發揮了範式轉移的作用。[9]

六十年代中期是香港社會發展的分水嶺，[10] 也促使志願福利服務轉型。這時，香港經濟持續發展，走上以出口為主導、以勞動密集形式生產的工業化道路。社會出現了一個較富裕的階層，他們是在經濟發展的環境或找到創業機會、或穩定就業的一群。[11] 同時，由於難民問題趨向穩定，海外捐款亦漸趨減縮。據社聯調查，六十年代中期，志願機構的所有基金有五成九是來自海外的。但從一九六九年開始，海外基金的比例一直減少，一九六九至七零年度海外基金減至只佔三成八，七零至七一年度則為三成三，到七一至七二再下調至三成。[12] 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大部分志願及宗教團體對政府津貼及公益金的依賴日重，本地資助業已取代海外捐款的主導地位。[13]

與此同時，國際背景的基督教服務組織也開始部署撤離香港。一九六七年五月，香港基督教福利與救濟協會與香港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合併成為香港基督教服務委員會（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成為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附屬機構。[14] 一九七三年，世界信義宗總部調整對香港的政策，決定自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起，世界信義宗社會服務處與香港基督教服務委員會合併，易名為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經費主要依靠政府社會福利署及公益金的支持。[15]

踏入七十年代，香港政府因應新形勢調整社會福利政策。一九七三年，港府推出社會福利白皮書，正式提出社會福利署與志願機構是伙伴（partnership）的概念，應允承擔大部分的福利開支。[16] 政府願意資助志願團體，對正轉型的基督教福利及服務工作，意義重大。一九七九年，港府再發表《進入八十年代的社會福利》白皮書，確立由志願機構提供服務，政府提供資助，把大部分的志願機構納入政府福利服務體制內。港府在社會福利方面

的承擔越益增加，志願機構的角色與貢獻亦相應調整，好與政府建立密切的伙伴關係。[17]

香港聖公會方面，何明華（Ronald O. Hall）主教及白約翰（Gilbert Baker）主教帶領宗派，從五十至七十年代積極回應本港社會需要，參與福利救濟、房屋及教育工作。一九七零年，教區發展委員會擬定五年計劃（1970–1975），除傳福音及教堂發展外，同時著重教育及社會福利方面的企劃。[18]

一九七四年，港澳教區成立一百二十五周年時，聖公會在香港的教育及福利服務工作已頗具規模：興辦四十六所小學（其中40所為政府津貼小學），就讀學生人數五萬七千八百零三人；辦有二十二所中學（其中十所為政府津貼中學，七所為政府補助學校〔grant school〕），學生人數一萬九千一百零三人。社會福利方面，教區轄下有十四個服務單位。其中一九六六年成立的教區福利協會（Diocesan Welfare Council），更是教區重視有關工作的標記。[19] 一九八四年，聖公會屬下的學校，再增至三十二所中學及四十九所小學，另有二十九個社會服務單位。[20] 踏入八十年代，聖公會在香港教育及社會服務工作方面，角色吃重。

興辦聖三一堂中學

聖三一牧區在一九五零至八零年代的發展，充分體現聖公會對教育及社會服務方面的承擔精神。堂董區煒森嘗言：

> 傳道有多方面的，有形與無形之別，有形的，係在教堂裏宣傳福音，虔守禮拜等等。無形的，是興辦學校、孤兒院、養老院等等。我們基督徒並不是貪功慕名，而求一時之逞，基督教以博愛為主，同道們固須立身，將基督精神廣為推進，因此，我們對於老弱，那有不援之以手，對童孩，又即是將來我們的主人翁，那有不設法教導，使他們將來一本基督精神，為國家服務，故此我們不論在豐都大邑，或是窮鄉僻壤，凡有教堂的地

方，多有基督教學校，我們明乎此，則可知本堂為甚麼要辦學……[21]

我們在第五章已回顧了聖三一堂小學及幼稚園的成立經過，現在分別再就中學及社會服務方面的情況，作一論述。

聖三一堂籌建中學經歷了漫長且曲折的過程，最早建校的念頭始於一九六二年，但學校最後要到一九七八年才建成，前後經歷十多年。

一九六二年四月，彭約榮代表聖三一堂向地政署申請更改地契條款，希望在教會地段的空置土地上，興建幼稚園及中學。他指出，馬頭涌一帶人口因房屋協會的廉租屋及其他私人樓宇相繼落成而大量增加，對區內教育設施需求甚殷。聖三一堂希望加強對教育的承擔，在區內開辦中學，這不僅可為牧區的小學畢業生提供中學學額，亦有助紓緩香港當時中學學位緊張的問題。[22]

一九六三年二月，何明華主教致函工務局，指建校計劃已獲教育署批准，並等待消防部門的意見後，再呈交工務局最後審批。他希望工務局能早日落實有關工程。[23]

不過，建校一事未幾即出現變數。何明華在訪問聖三一堂期間，向彭恩昌牧師提及，有關中學的計劃需要擱置，主要原因是難以獲到政府資助。與此同時，教區又計劃在紅磡開辦中學，應可吸納聖三一堂小學的學生。他請彭牧師盡快向牧區議會說明此事。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彭恩昌覆函何明華，表示將在下一次會議向眾委員解釋。[24] 興辦中學的計劃隨即擱置下來。

一九六八年，建校之議再起，並於三月組成建校委員會，由區煒森任主席。在〈籌建聖三一堂中學序言〉中，說明有關辦學的理由：

教會主要任務為宣傳福音；傳道有效的方法為從事教育。

本堂在戰後復員即開辦幼稚園及小學，可謂洞燭機先。二十年來，成果具見，當年就讀於本堂小學者，均已成長，踴躍參加本堂及各部事工活動，足為顯明之實證。

時代巨輪不斷推進，香港教育已達發展中學階段。因此，無論為利便本堂小學畢業生升中學，或為適應時代環境迫切需要，或為協助社會輔導問題青年，對於籌建中學已屬急不及待之事。[25]

當時，整個建校工程預算為二百五十萬元，政府津貼二百萬元，由聖三一堂籌募五十萬元。[26]

計劃建校初期，有意見認為可考慮開辦一所工業中學，但考慮到興辦費用較一般文法學校為高，特別是為各式工場購置器材及其後的維修保養支出等，堂會難以負擔。復加技術學校的老師較難招聘，而學生的來源也不穩定。經牧區議會討論後，正式決定興辦英文津貼中學。[27]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黃羨雲牧師以牧區議會主席名義向教育署申請一幅土地，用作興辦一所有二十四間課室的英文津貼中學。當時，聖三一堂可動用的資金有二十萬元，預期在往後兩年可籌得五萬元。[28] 政府官員回覆鄰近惟一可動用的土地位於馬頭角道五十二號，預期現有的屠房可在兩至三年內遷出。政府雖然憂慮聖三一堂是否能達至辦學團體負責兩成建校經費的要求，但亦願意暫時編配該地段予聖三一堂建校，但卻重申這並不保證政府可提供貸款。[29]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白約翰主教致函黃牧師，指從教育署方面獲得消息，建校批地可能需要再等三年，而政府的免息貸款也沒有把握。換言之，牧區須自籌建校經費的兩成，即合共五十萬元。白主教亦提醒牧區，作為政府津貼學校，辦學團體並不能擁有絕對的收生權。也就是說，原來建校以提供聖三一堂小學畢業生升中學位的構想，並不符合實際。因此，主教請牧區慎重考慮是繼續建校，還是投放資源在社會福利工作方面。[30] 雖然如此，

白主教在一九六九年一月正式向政府提出辦學申請。[31] 同年八月三十一日，牧區發動建校募捐運動，目標為五十萬元。[32]

按政府一九六八年的計劃，馬頭角道五十二號的舊屠房在兩至三年內遷離後，即可將地段交給聖三一堂建校。但一九七零年中，政府突然將舊屠房改為臨時牛隻檢疫站，預計至少再過兩年，待葵涌的永久檢疫站落成後，才能移交有關地段。[33] 這個消息，意味着聖三一堂的建校計劃須再延擱。一九七一年底，建校委員會從其他途徑得知，檢疫站的選址最後在青衣島，但除非連接荃灣及青衣的大橋落成，否則政府不會考慮把檢疫站遷離。種種跡象顯示，兩年後交地只是相當樂觀的估計，甚至有消息指，聖三一堂如能在一九七五年得到這幅土地，已屬非常幸運。馬頭角「臨時」檢疫站的搬遷，看來遙遙無期。[34]

有關消息對聖三一堂而言，無疑是個極大打擊。經過兩年多的努力，籌款的進度已取得一定成果，其中新加坡的李氏基金會更承諾提供四十萬元捐款。現在，政府勢將延期交地，把通脹及建築成本上升的因素計算在內，建校預算難免大幅增加。同時，聖三一堂亦須向李氏基金會解釋，建校進度一再延誤，完全超出他們的控制範圍。[35]

有見及此，建校委員會認為與其等待馬頭角道地段，不如另覓合適校址。經多方查探，發現新蒲崗李求恩中學隔鄰、九龍塘延文禮士道，及黃大仙竹園三地也有合適土地。後考慮到黃大仙地段位處斜坡，建築成本過高，決定申請新蒲崗地段。[36]

一九七二年，建堂委員會主席區煒森辭任，由朱文偉接任。同時，建校委員會因申請新蒲崗地段沒有進展，再向政府申請延文禮士道地段。[37] 一九七三年一月政府批准延文禮士道地段建校，但預算已增至三百八十萬元。[38] 未幾，政府通知建校委員會，延文禮士道地段因收地及清拆問題，預期最少要兩年時間才能使用。幾經交涉，政府終於在六月同意批出何文田忠孝街九龍內地段一零三三三號（即現時聖三一堂中學位置）建校。[39] 建校委員

會自一九六八年成立，向政府申領土地，到一九七三年才正式落實校址，其間幾經轉折，耗時竟達五年之久。抑有進者，時間的延擱導致建校成本大增，至一九七三年時，建築費已增至六百二十五萬之鉅，聖三一堂不得不發起第二次建校募捐運動。[40]

一九七五年初，聖三一堂的建校計劃已經到了商討合約階段，未料又橫生枝節：政府因財政問題決定擱置建校計劃。建校委員會及聖三一堂會友多方努力，據理力爭，新校終在一九七八年中施工，但建校費用已增至八百萬元。新校奠基禮於聖三一堂八十八周年堂慶日（8 月 26 日）舉行，由黃羨雲牧師主禮。十一月十七日動工。[41] 奠基禮當日，香港懸掛三號風球，但仍無減參與者眾人的熱切期盼。畢竟，等待多年的校舍，終於可以動工興建。

關於新校的命名，建校委員會成員鄺耀雅主張仿效外國的學院、中學，以「聖公會聖三一中學」為名，以榮耀三一上主，而不是標榜聖三一堂。經過熱烈的討論後，大部分牧區議員認為校名應體現中學與聖三一堂的聯繫，故決定為學校起名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42] 學校開辦初年，郵務人員間或將寶血會上智中學（Holy Trinity College）的郵件，誤送到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學校雖然尚未建成，但因應區內學額嚴重不足，政府請求聖三一堂中學盡早開辦。學校在一九七八年九月正式開辦，暫借聖三一堂小學六個課室為臨時校址，先開六班中一，收容學生二百四十人，由八位老師負責。

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聖三一堂中學校舍平頂，由白約翰主教主禮。九月十七日，學校獲發臨時使用證書，師生正式遷入新校舍。新校樓高七層，有二十四個課室，特別室十二個，另有大禮堂及小聖堂（音樂室）。學校除文法中學的科目外，又增設工商、家政、工藝、美術、金工及木工等實用學科以適應香港工商社會的需要。當時班數已由首年的六班增至十四班，共學生五百七十餘名。[43]

由首次申請土地至新校落成，前後用了十二年時間，首任建校委員會主席區煒森及成員李賢堯均已離世，無法親睹新校落成。一九八零年六月一日，由白主教主持校舍奉獻禮，教育司陶建（Kenneth W. J. Topley）主持啟幕禮。陶氏在致詞時對教育署在五年前不能撥款給該校一事，特別用廣府話向該校師生致歉：「五年前不能撥款給你們建校，請原諒！」[44]

新校成為聖三一堂的重要宣教點，在第一批聖三一堂中學的老師中，只有一位不是聖三一堂的會友，學校與教會建立起緊密的聯繫。校內宗教氣氛濃厚，堂主任謝博文牧師（兼校監）及助理聖品劉周勝會吏每月到校一次，主持教師團契聚會。每周五為No-Lunch-Box Day，謝博文牧師、蘇以韜校長、朱文偉校董到酒樓與八位老師共晉團契午膳，風雨不改。校牧又編訂每月靈修主題，安排老師輪流編撰靈修參考資料以供老師們交流分享，這份資料也會分發給學生，每天上課前由班主任帶領學生誦讀及講解。自一九七九年起，謝牧師又建議安排學生參加聖三一堂主日崇拜，並由當時的校牧鄧慶年負起學校與牧區的聯繫工作，讓每班學生均有機會出席聖三一堂崇拜。經過堂會及老師們的努力，創校三年，已有十位同學領洗，加入聖三一堂。[45] 到八十年代，聖三一堂中學學生仍有出席主日崇拜。[46] 聖三一堂中學樹立了以牧區為中心的堂校合作傳福音的典範。[47]

青年會英文夜校

一九六九年底，聖三一堂仍待政府落實中學校址，便又提出利用當時小學校舍開辦非牟利英文夜校（English evening school）之申請，並先後獲教育署長及註冊總署長（Registrar General）批准。[48]

這所英文夜校是由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主理的。女青年會早於一九四七年在九龍城獅子石道如心學校開辦第四夜校，一九六

一年時租用聖三一堂作校舍，改名馬頭涌夜校。[49] 一九六五年八月，女青年會亦在馬頭涌富寧街真善美邨低座開辦社會服務處，[50] 就在聖三一堂小學旁。一九六九年，夜校改到聖三一堂小學校舍上課，聖三一堂遂向政府提出申請。

夜校主要對象是在職女工，除英文外，亦有其他興趣小組。女工對香港的工業及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然而，她們自童年輟學後，便失卻接受教育的機會。因此，六十至七十年代，不少志願團體開辦英文夜校，讓她們在晚上進修，充實自己。[51]

雖然夜校由女青年會主理，與聖三一堂並無組織上的聯繫，牧區並沒有忽視這群女工。鄧慶年指出，當時汪玉娟及青年部每星期六為夜校同學設團契聚會，教她們唱詩歌，部分女工因此參加青年部。同時，傳道部在復活節及聖誕節亦會為女工安排慶祝聚會。[52] 一九八九年，聖三一堂小學收回校舍，夜校遷至土瓜灣農圃道東莞同鄉會學校續辦，易名土瓜灣夜校。[53]

社會服務新里程

前述一九六八年底，白約翰主教曾建議牧區開展社會福利工作。[54] 當時，牧區仍以辦學為首選工作，但校址卻一直未能落實。一九七一年，聖三一堂牧區議會若干成員向黃羨雲牧師表達興辦社會福利服務的異象，以延展聖三一堂對社區的服務。

初步的構想是在聖堂旁的空地興建多層式大樓，提供各項社會服務。四月二十日，黃羨雲牧師首次向白約翰主教提及有關想法。[55] 經過近一年的商討，聖三一堂方面開始有更詳細的計劃，並擬定〈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大廈芻議〉供牧區議會及教區討論。初步計劃是興建六層高的大樓，每層面積為三千平方呎，地下是社區中心、鄰舍輔導、心理輔導室、食堂及停車場，二樓是配合幼稚園發展的托兒所及幼兒班，三樓是辦事處、診療所及牙醫服務，四樓是學生自修圖書館、會議室、牧師辦公室及小教堂，

五樓是職業訓練班課室及家政室等，六樓是牧師及職員宿舍、迎賓館，最後是天台。整個計劃，待牧區議會通過後，再呈交民政事務署、社會福利署，並與教區福利協會（Diocesan Welfare Council）及香港基督教服務委員會商討。[56] 未幾，黃牧師正式致函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 A. P. Bennett，就初步的構想徵詢其意見，初步估計，整項工程預算為七十萬元。[57]

白約翰主教對整個構想，亦感興趣及表示關注，[58] 並把計劃寫在教區五年擴展計劃書內。只是到了一九七三年，政府落實在何文田撥地建中學後，牧區無力同時兼顧兩項大型建設及籌款，故不得不擱置社會福利計劃，把資源集中在興建中學。[59]

聖三一堂在社會福利服務方面的未竟之志，到一九八零年中學校舍落成後，即在牧區議會內重新燃點，成為牧區八十年代的新目標。

一九八一年九月，謝博文牧師向鄺廣傑主教呈交聖三一堂擴建社會服務新廈的研究計劃書，供教區常備委員會討論。計劃書指「為配合事工擴展及社區之需要」，急需「小聖堂、副牧宅、中、小型活動室及幼稚園教室」，「又鑑於本堂老人眾多，亟需興建自費之老人宿舍，以繼承前賢曾於本世紀初葉興辦廣蔭老人院之熱誠。」因此，提出籌建「多用途之新廈」。計劃書初步估計新廈預算為八百萬元，當時牧區的儲備金約有六十萬元，部分經費擬向各大基金會募捐。[60] 十月二十五日，牧區議會通過有關計劃，並於十二月成立聖三一中心（Holy Trinity Centre）籌建委員會，由朱文偉任主席。[61]

經過數月的討論後，聖三一堂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把修訂計劃呈交白普理信託基金（Trustee of Bradbury Trust）[62] 申請資助。計劃包括四項主要內容：[63]

一、 幼稚園一所，共九個課室，並可供傷殘幼兒使用。原有聖三一堂幼稚園待中心落成後，將遷至新廈。校舍設施

將便利傷殘人士使用，計劃招收上下午班，合共可提供五百四十至六百個學額。日常運作及主要設備的經費將由學費收入來支付。建築費總計二百萬元，預計於一九八三年完工。

二、聾啞團契活動室，供以法大團契活動之用。以法大團契於一九七九年成立，是聖三一堂牧養聽障者的團契。成立以來，共有一百名會員，平均每主日有四十至五十人出席聚會。活動室有一千一百二十平方呎，預算為三十萬元。

三、供九龍城區青年溫習的青年閱覽室。據估計，真善美邨及馬頭圍邨有五萬多人居住，鄰近地區約有五十多萬人居住，當中的青少年學生需要寧靜的環境溫習。自修室及閱覽室共一千平方呎，青少年只需繳付少量會費，便可申請會籍，預計可招收一百五十名會員。自修室每日開放十四小時，可容納六十五人。自修室的建築及裝修費為二十萬。

四、可容納七十人的小聖堂，共七百五十五平方呎，供崇拜及祈禱之用。

聖三一中心樓高四層，地下及一樓為幼稚園，二樓為聾啞團契活動室、小聖堂及青年閱覽室，三樓及四樓則包括活動室、教牧中心及聖品宿舍。總預算為五百萬元。

聖三一中心的計劃，很快得到各方的正面回應。先是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教育署回覆聖三一堂，原則上同意幼稚園計劃，但考慮到現有各特殊學校已收錄四歲及以上的學生，故建議聖三一堂無須為殘障兒童開辦幼稚園。[64] 數天後（1 月 9 日），白普理信託基金同意撥出四百萬元支持興建聖三一白普理中心（Holy Trinity Bradbury Center）。[65] 不過，由於中心的總預算已上調至五百三十萬元，扣除白普理基金的四百萬及聖三一堂可動用的五十

萬，尚須籌措八十萬元。再加上通脹及其他開支，聖三一堂決定向教區申請一百二十萬免息貸款，分六年攤還，並同意在新建大樓加建三層作教區辦公室。[66] 最後，中心落實興建八層（包括地下），其中兩層為教區使用（由教區負責 240 萬元），全部費用達八百五十萬元。[67]

聖三一堂各部全力推動籌款，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傳播團契在副堂公演古裝宗教劇《武陵人》，全部台前幕後工作人員均由團員出任，結果籌得一萬元。[68] 七月，少年部又舉辦小義賣、攤位遊戲、食物檔等。[69] 此外，一九八三年六月，聖三一堂為中心外牆的壁畫作募捐。壁畫原作者是劉耀明，面積為二十四呎乘三十呎，由建築小組邀請藝術家文庭承造，參照教會的意見，以不鏽鋼及紙皮石雕塑而成。募捐以認股形式進行，每股五十元，共三千股，每人可認捐一股至五十股。預計可籌得十五萬元。[70] 另一大規模活動，即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何文田愛民邨舉辦的「百萬行」步行籌款，由鄺廣傑主教、政務司鍾逸傑（David Akers-Jones）及匯豐銀行文思（Dennis Minns）剪綵開步，共五百人參與，結果籌得二十萬元。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正值聖三一堂九十二周年堂慶之際，社會服務中心舉行動土禮。翌年四月三日奠基，並在九十三周年堂慶日（8 月 27 日）平頂。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七日，鄺廣傑主教主持聖三一堂白普理中心的開幕及奉獻禮，小聖堂（寶坤堂）亦於同日祝聖。中心在面向馬頭涌道的一面，用紙皮石砌成「主賜平安」的大壁畫，用意是向途人闡明中心負有傳揚基督福音的使命。另中心外牆共有十餘個合手祈禱之圓拱設計，象徵日夜向天父祈禱之意。[71]

一九八四年九月，聖三一中心幼稚園正式開學，這是一所全日制的幼稚園，在當時是個創舉。[72] 一九八六年七月，教育署通知聖三一中心幼稚園，指該校一年級部分學生年齡低於三歲八個月，按一九八三年修訂的教育條例，三歲八個月以下者應入讀幼

兒學校（nursery），故建議校方把低、中高三班重組為幼兒班、低及高班。[73] 同時，據教署規定，幼兒班應維持半日制模式。故此，聖三一堂決定把兩班幼兒班改為幼兒中心（child care centre），並向社會福利署申請。[74]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牧區議會通過提案，把聖三一中心幼稚園的幼兒班正式向社會福利署註冊為聖三一中心幼兒院，開辦日期為一九九零年九月一日。原來的中班及高班仍在教育署註冊為幼稚園的低班及高班。[75] 一九九一年增設兩歲預備班，全園擴展至十班，學生人數增至二百六十名。

除幼稚園外，聖三一堂亦決定在白普理中心開設青少年中心。中心將接受社會福利署資助，並配合社署政策運作，提供優良的社會服務。[76] 牧區助理周伯明牧師期望，日後牧區的工作人員可以與中心工作人員攜手訓練義工青年領袖，並且推展至學校方面。他說：「我們的遠景，其實是一九零七年鄺日修牧師的開墾者精神復活，他在當時已建立了天國學校、青年中心、老人院和基督教墳場呢！」[77] 不過，由於社署撥款關係，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到一九八九年八月才投入服務。[78]

另方面，教區新九龍辦事處亦於一九八五年初啟用，辦事處位於中心的五、六樓，佔地八千餘平方呎，包括青年事工委員會的聯絡處、牧區青年幹事辦公室、圖書館、教區輔導處等。[79] 可以說，白普理中心的建成，對牧區、教區及社區均有莫大貢獻。

白普理中心開幕前，教區與聖三一堂曾對社會服務中心的管理權持不同見解。教區常備委員會認為中心應統一隸屬教區福利協會，但聖三一堂則認為應容許牧區有更大自主。謝博文牧師與當時正要上任的陳衍昌牧師積極向教區方面爭取，[80] 經商討後，教區與聖三一堂達成共識，並擬定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Holy Trinity Church Social Service Centre）章程，成立管理委員會，由牧區主任為當然主席，成員包括主教代表、中心主任，以及教區福利協會和聖三一堂代表等。[81]

聖三一白普理中心開幕後，牧區即面臨相當嚴峻的考驗。一九八四年十月，地政署向聖三一堂發信，要求聖三一堂就白普理中心七字樓牧師宿舍繳付六十九萬元地稅。[82] 聖三一堂在興建白普理中心後，已無力支付這筆開支。新到任的陳衍昌牧師多年後憶述：

> 本人於一九八四年奉派到堂，當時財政狀況極之惡劣。聖三一白普理中心剛剛建成，戶口沒有任何餘款，還須向當時的港澳教區財務委員會舉債三十萬，開辦聖三一中心幼稚園。[83]

堂會經討論後，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函教區常備委員會主席鄺廣傑主教：

> 本堂目前財政正處於極度困境：一九八四年一至十月之累積赤字已達十萬圓，估計本年底用罄儲備金之僅有餘款後，須鼓勵教友勉力奉獻，始能達至財政上收支平衡，遑論向教區借款而按期歸還本息。
>
> 基於上述情況，本堂擬懇請教區代補地價港幣六十九萬圓正，而本堂則將該中心七樓之一較大牧宅單位（參附件三），歸為教區所有，由教區安排使用。教區既設辦事處於該中心，能得一牧宅以供使用，不無方便之處……[84]

十二月九日，鄺廣傑主教出席聖三一堂的一九八五年度首次牧區會議。剛上任不久的陳衍昌牧師記述當日會議的情況：

> 十二月九日下午，在本堂白普理中心會議室，發生了一件令人難忘的事……我們作過開會禱告後，便恭請鄺主教訓勉。他為甚麼出席牧區議會，要向我們說些甚麼，當時乃是一個謎。原來鄺主教的蒞臨是為了表示讚賞聖三一堂的教友弟兄姊妹，多年來熱愛教會，奉獻金錢、時間、才能擴展聖工。現在白普理中心經已落成，本堂由於在向政府補納地稅上失卻預算，財政出現困難，因此他決定在主教基金分期撥出款項，代本堂向政府清付六十九萬元地稅，以表示教區的關心和支持。

> 當主教再三表明他是無條件幫助本堂解決補納地稅問題之後，各位議員都不約而同的鼓掌表示最衷心的感謝，因為這無疑是今年聖三一堂收到最大的一件聖誕禮物了。相信每一位議員和我一樣，都會感到那實在是一個難忘的時刻。事後，有一位議員對我說：她感動到流出眼淚呢！[85]

教區及主教無條件的支持，為備受地稅問題困擾的聖三一堂上下，釋除重擔，事件得到圓滿的解決。

小結

經過戰後三十多年的發展，八十年代的香港已蛻變成一個跟五十年代截然不同的社會。七十年代以降，香港的經濟迅速增長，救濟福利工作的開展，亦紓解了因難民衍生的各種迫切問題。不過，許多低下階層其實並未分享到經濟增長成果，貧富差距以及殖民地制度下的種種不平等問題，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兩次暴動表露無遺。[86] 香港繁華，並不足作整體的寫照。[87] 早在一九六六年暴動前一年，世界信義宗社會服務處施同福牧師已指陳出香港真正的情況：

> 我們志願團體所談的是真正的香港，換言之，話題不是少數人的高水準生活，而是大多數人僅謀溫飽的情況。不是巍峨璀璨的酒店和公寓，而是山邊和市區的四十四萬五千的木屋居民，露宿街頭或樓梯底的十三萬五千人，棲身於破船和天台者，蝸居於日漸〔擁擠〕的徙置區中的五十萬人，人數不明的生活於破舊樓宇中者。我們所談的是已在醫院登記等候診治而入院無期的大群人，他們所患的不是急性疾病，但他們需要留醫，而醫院卻沒有空病床。我們也談那些排長龍的門診病人，他們要一小時又一小時地等候會見當值醫生，而工作繁重的門診醫生平均只能為一個病人化三分半鐘的時間；要確定病情，三分半鐘的時間實在太短了。我們關懷流浪街頭的兒童，他們之中有許多（只九龍方面就有一千二百名）是居無定所的，他們在停

> 泊着的貨車上歇宿，或睡於樓梯間和天台。如果沒有人救助他們，他們就參加三合會和歹徒集團。在香港，大部分人居住得不好、喫得不好、教育不好、薪金微薄，而在許多方面來說，是自生自滅，缺乏照料。[88]

在經濟發展的大氣候裏，社會的陰暗面仍是鐵一般的事實。

進入七十年代，香港教會並沒有滿足於現狀，反倒積極尋索基督教在社會的角色與使命。基督教協進會在回顧一九六九年的工作時，指出香港社會不論在政治及經濟生活方面皆有改善之必要，「以求對更多人更富於人道」，但教會卻忽視向社會多作貢獻和服務的召命。[89]

一九七零及七一年，基督教協進會以「香港教會的使命」為主題，連續兩年召開諮詢會議，共一百二十多人代表各宗派參加。[90] 會議重申「傳福音、教育、服務」為香港教會在社會應負的使命。不過，天主教的區成賢神父在會上批評，不論在天主教徒或基督徒中，信仰只不過關乎個人道德，與工作生活、社會問題以至香港前途無關。教友很少在教會中獲得將信仰應用於工作環境的指導與鼓勵。[91] 聖公會陳佐才牧師亦不滿基督教對社會的關懷，只不過通過個別機構（如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表達出來，大多數教友不論在經濟上或行動上均缺乏承擔。[92]

一直以來，香港聖公會對宣教使命的理解，不僅局限於建立教堂、領人歸主，更包括學校教育與社會福利服務。誠如港澳教區首位華人主教鄺廣傑，在慶祝教區成立一百三十五周年紀念時說：

> 教區過去一百三十五年來透過教堂、學校和社會福利機構服務港澳市民，是足以證明我們忠誠肩負基督交託我們的使命。但這並不表示教會現在可以放緩對社會的關懷和責任，相反地，我們既生於斯，更具有中國傳統的精神，為着參與建設一個新社會而應當繼續肩負起更重大的責任。[93]

聖三一堂是聖公會在九龍歷史最長的教會，她的故事在在突顯出牧區對教會使命的詮釋與實踐。

總結前文可見，在一九五零至八四年間，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與堅持，包括宣教牧養（聖三一堂）、學校教育（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社會福利服務（白普理中心）的「聖三一牧區」業已建立。毋庸置疑，傳道、教育及福利服務是港澳教區的核心使命，不過，從聖三一堂的歷史可見，興辦教育及福利服務工作，並非教區由上而下的指令，而是牧區由下而上推動完成的。不論是小學、中學及社會福利服務，均由牧區主動醞釀及籌備，再盡牧區全力籌措經費，並且由牧區管理運作。

聖三一的故事與經驗，固然源於其優良傳統，正如本書所言，聖三一牧區一直關懷貧苦大眾，早於二十世紀初，宣教牧養、教育和服務，已是牧區不可分割的使命。到戰後，聖三一堂並沒有忘記社會的需要，適切地回應各種需求，更積極尋求牧區的變革與更新，且與政府政策相配合，最終得以發展教育及社會福利事業。

一九八零年六月一日，白約翰主教在聖三一主日那天，親臨聖三一堂主持堅信禮，他在講道時說：

> 在這些歲月中，我們經歷了不少風浪：急劇的社會變遷、戰亂、內地政治革命巨潮及其近年異常之發展。雖然，我們的周遭在急劇地變遷，但感謝上帝，因着列任承先啟後的牧者、熱誠歷年不減的平信徒、健全的團契生活，使聖三一牧區能在萬變中穩步直線向前。[94]

在跨進八十年代的門檻之際，聖三一牧區在九龍城已默默服事了九十年，還有十年，就迎向建堂百周年的重要時刻。如何承先啟後，在劇變社會中為上主作見證，仍是牧區上下不敢或忘的使命。

聖三一白普理中心開幕禮時，謝博文牧師撰寫了〈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再去耕耘吧！〉一文，抒發他對聖三一堂的期望，茲徵引如下，作為本章的總結：

當我們細心再察看這八層樓的大廈卻強烈的提醒我們，每一寸上帝的家園都是要服務人群的。九十四年來，聖三一牧區沒有為少撮的團契而求謀私己的福利，都是不斷的服侍為人。自一九零七年鄺日修牧師以退休高齡的餘力還有開創天國學校、青年中心、老人院和基督教墳場作為傳道崇拜的外展服務。聖三一堂雖然局處九龍城，是市郊和鄉村的濃郁鄉土長出來的村姑碧玉，但這純樸實幹的堂風，有前任十位牧者和眾多熱心信徒的流淚撒種，撒出落在好土結果的種，我們值得歡呼喜樂。一九三三年我們已領取了這塊堂園，我們分別建成了聖殿（1938）、小學（1952）、副堂和牧宅（1955），又在愛民邨建立中學（1980），今天中心建成了，但是這中心的建築雖然落成，正如嬰孩剛誕生，怎樣成長，怎樣培育，怎樣結果呢？今天我們的「主賜平安」大壁畫未完成，很多設備未購置，事工拓展未開拓，社會服務中心在籌劃中，閱覽室、研究室、牧養中心、聾啞佈道、照顧輪椅孩童、幼稚園、老人康樂中心，還有……很多異象。

中心，不是這八層大樓，不是僵化的機構，是活生生的有機體，是有人情味的大團契，是人碰到人而成為朋友的牧場，是教友向將會是教友相聚的匯點，是人人可見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的中心，是鄺日修牧師先賢乃役於人的精神重現，是白普理先生，是李成義夫人、唐寶坤女士、賴景清校長的愛心延續，是弟兄姊妹信心的禱告，打開了天窗，上帝將豐盛的恩典倒灌給我們！我們要登上雅各的天梯！接受上主的使命！我們大家因為多奉獻了而更豐足和喜樂！誰能否決信心受託管家奉獻的祝福呢？

為上帝天國在地上的聖工，救贖，服侍，努力再耕耘！[95]

注：

1 "A Problem of People,"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6*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7), 2.

2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0*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1), 10. "A Problem of People," 3.

3 呂大樂：《唔該，埋單—— 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閒人行，1997），83。

4 Edvard Hambro,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Leyden: A. W. Sijthoff, 1955), Chapter 6.

5 編輯部：〈貧困待援的戰後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四十周年紀念特刊，1947–1987》（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1987），16。

6 Tang Kwong-leung, *Colonial State and Social Policy: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1842–1997*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 45–49.

7 邢福增：〈延續與斷裂——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香港〉，氏著：《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4），139–63。另有關住屋方面，可參邢福增：《願你的國降臨——戰後香港「基督教新村」的個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2）。

8 Paul R. Webb, "Voluntary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收《廿五年來之香港（1951–1976）——崇基學院廿五周年校慶紀念學術講座演講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77），133。

9 L. Stumpf, "A Changing Philosophy," *LWF Hong Kong Quarterly Report I, 1968*, 1.

10 呂大樂：《山上之城——香港紅十字會的故事，1950–2000》（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0），33。

11 呂大樂、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香港：三聯書店，2003），37。

12 華元博（Paul R. Webb）：〈海外基金來源之目前與未來趨勢〉，《社聯季刊》45（1973 年夏）：23。

13 同上。公益金於一九六八年開始運作，另一重要資金來源是成立於一九六五年的政府獎券基金（Lotteries Fund）。

14 S. H. Pang, "From the Chairman,"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Annual Report, 1967*, 1.

15 〈信義宗社會服務處併入基督教協進會〉，《基督教周報》594（1976 年 1 月 11 日）。另〈世界信義宗社會服務處歸併入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信息》(1976 年 11 月)：1。

16 周永新：《香港社會福利的發展與政策》（香港：大學出版社，1980），36–37。

17 何輝錐：〈七十年代本港社會福利發展之回顧〉，《社聯季刊》74（1980 年秋）：4–7。另周永新：〈志願機構的角色與貢獻〉，《社聯季刊》100（1987 年春）：20–22。

18 龐德明：〈港澳教區發展委員會五年計劃書（續）〉，廖翼顯譯，《港澳教聲》204（1970 年 9 月）：6；205（1970 年 10 月）：6。

19 徐碧霞：〈教區福利協會會員機構簡介〉，《港澳教聲》732（1973 年 6 月 30 日）。*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 Macao, 1849–1974: A Brief History and the 1974 List of Church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ocial Welfare Centres* (Hong Kong: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1974), 16–24.

20 《聖公會港澳教區一百三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849–1984》（香港：聖公會一三五周年慶典中央籌備委員會，1984），12、89。

21 〈聖三一堂發動募捐，擴建學校臨時副堂〉，《港澳教聲》20（1954 年 11 月）：4。

22 "Y. W. Penn, MBE to Superintendent, Crown Lands and Survey Office, Public Work Department," 24 April 1962, 聖三一堂文件。

23 "Bishop Hall to the Superintendent, Crown Lands and Survey Office, Public Work Department," 25 February 1963, 聖三一堂文件。

24 "Vicar Peter Y. C. Peng to Bishop," 18 November 1963, 聖三一堂文件。

25 〈籌建聖三一堂中學序言〉，1969 年 8 月 31 日，《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70），43。

26 曾貫穀：〈聖三一堂教育事業及建校工作〉，《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42。

27 "Jane Hwang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29 October 1968, 聖三一堂文件。

28 "Deaconess Hwang Hsien-yuin, Chairman, Church Council to Director of Education," 16 September 1968, 聖三一堂文件。

29 "J. P. Stocks, for 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Supervisor, Holy Trinity Church," 20 September 1968, Ref. No. E.D. (GR) 3/3197/68, 聖三一堂文件。

30 "Bishop of Hong Kong and Macao, Gilbert Baker to Rev. Deaconess Jane Hwang, Holy Trinity Church," 21 November 1968, 聖三一堂文件。

31 "Bishop of Hong Kong and Macao, Gilbert Baker to Hon. Director of Education attn J. P. Stocks, Esq.," 31 January 1969, 聖三一堂文件。

32 朱文偉：〈聖三一堂中學建校史略〉，《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80），118。

33 "Government Press Release: New Cattle Lairage at Kwai Chung, No Unnecessary Delay in Making it Available," 8 July 1970, 聖三一堂文件。

34 "Au Wai-sum, Chairman, Building Committee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30 November 1971, 聖三一堂文件。

35 "Au Wai-sum, Chairman, Church School Building Committee to Lee Seng Gee, Esq. Director, Lee Foundation," 30 July 1970, 聖三一堂文件。一九七五年八月，李氏基金會再致函黃羨雲牧師，表達對建校進度不如理想的關注。〈李成義致黃羨雲〉，1975 年 8 月 25 日，聖三一堂文件。

36 "Au Wai-sum, Chairman, Building Committee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30 November 1971；另見 "Au Wai-sum, Chairman, Building Committee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4 February 1972, 聖三一堂文件。

37 "Au Wai-sum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4 February 1972, "Jane Hwang to Gilbert Baker," 16 November 1972, 聖三一堂文件。

38 "A. Fok, for 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25 January 1973, 聖三一堂文件。

39 "W. F. Li, for 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Rev. Paul Tsang, Holy Trinity Church," 8 June 1973, 聖三一堂文件。

40 朱文偉：〈聖三一堂中學建校史略〉，118。

41 同上；另見陳宗抗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42 鄧慶年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鄧慶年：〈在聖三一堂的第一次〉，《聖公會聖三一堂一百一十周年堂慶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2000），28。

43 蘇以韜：〈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簡報〉，《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121。

44 一九八零年六月二日本港各大報章，報導及評論聖三一堂中學之揭幕啟用禮，〈報導及評論本堂中學之揭幕啟用禮〉，《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122。

45 鄧慶年：〈寓傳道於教育〉，《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112。另鄧慶年：〈點點往事情懷〉，《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二十周年校慶特刊，1978–1998》（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1998），164。

46 例如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日，聖三一堂中學中四 A、B、C 三班同學便參加午堂崇拜。《聖三一堂周刊》，1982 年 5 月 30 日。

47 鄧慶年：〈教會、學校與校牧〉，《教聲》533（1986 年 5 月 25 日）：6。

48 "M. T. Ma, for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Rev. Deaconess Hwang," 5 November 1969, 聖三一堂文件。

49 曾潔芳編：《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會所及工作區發展史》（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1992），31。

50 曾潔芳：《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會所及工作區發展史》，37–38。《香港教會名錄，1969》（香港：基督教文藝，1969），244。

51 有關女工晚上苦讀的心聲，參蔡寶瓊、江瓊珠編：《晚晚六點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香港：進一步，1998）。

52 鄧慶年：〈寓傳道於教育〉，111。

53 曾潔芳：《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會所及工作區發展史》，32。

54 "Bishop of Hong Kong and Macao, Gilbert Baker to Rev. Deaconess Jane Hwang, Holy Trinity Church," 21 November 1968, 聖三一堂文件。

55 "Rev. Deaconess Jane Hwang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20 April 1971, 聖三一堂文件。

56 "Paul Tsang Kai-choy (curate) to Very Rev. J. W. Foster, the Dean, St. John Cathedral," 12 May 1972, 聖三一堂文件。

57 "Rev. Jane Hwang to Mr. A. P. Bennett, C. D. O. (K. C.)," n.d., 聖三一堂文件。

58 "Bishop Baker to Rev. Jane Hwang," 28 June 1972, 聖三一堂文件。

59 〈聖三一堂籌建中心，白普理基金會支〔資〕助〉，《港澳教聲》345（1982 年 6 月 6 日）：6。

60 〈聖三一堂牧區擬在堂內園地擴建新廈，呈請研究可行計劃〉，1981 年 9 月 21 日，聖三一堂文件。

61 郭書謙：〈聖三一堂史略〉，《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90 年），32。

62 白普理（Bertram Walter Bradbury）一八八五年生於英國，後來港加入香港牛奶公司工作，在港生活超過六十年，直至一九七零年才去世。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其投資範圍包括印刷業、物業及股票。白普理慈善基金是香港最大的私人創立慈善基金之一，由香港匯豐銀行信託基金公司管理，目標是透過經濟支持本港及英國註冊慈善團體，為有需要者提供服務。

63 "Chu Man-wai, Project Committee Chairman & Rev. Edmund B. Der, Parish Cicar to Mr. Dennis B. Minns, Managing Director / Trustee of Bradury Trust," 3 December 1981, 聖三一堂文件。

64 "M. B. Leung (for 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Edmund B. Der," 5 January 1982, 聖三一堂文件。

65 "W. Yeung, Senior Trust Officer (HSBC) to Mr. Chu Man Wai, Project Committee Chairman, Holy Trinity Church," 9 January 1982, 聖三一堂文件。

66 〈聖三一堂牧區聖三一中心籌建委員會及主任牧師謝博文致聖公會港澳教區鄺廣傑主教暨張紹桂會吏長函〉，1982 年 1 月 16 日，聖三一堂文件。

67 〈聖三一白普理中心之進度情形〉，《聖三一堂主日周刊》，1982 年 5 月 30 日。

68 〈聖三一堂籌建新廈，傳播團契演《武陵人》〉，《港澳教聲》339（1981 年 12 月 20 日）：14。

69 〈建白普利〔理〕中心，少年部小義賣〉，《港澳教聲》346（1982 年 7 月 4 日）：4。

70 《聖三一堂主日周刊》，1983 年 7 月 10 日。陳衍昌：〈主賜平安大壁畫〉，《聖三一堂主日周刊》，1986 年 3 月 2 日，1。

71 〈聖三一白普理中心，預料本年底可落成〉，《教聲》391（1983 年 9 月 4 日）：1。「主賜平安」的壁畫，由於工程及其他問題，最後延至一九八七年底，仍未完工。原定安裝大壁畫的白普理中心外牆，最後選用與該大廈相同的紙皮石及其他宗教圖案代替。參陳衍昌：〈主賜平安大壁畫〉，《聖三一堂主日周刊》，1986 年 3 月 2 日，1。另〈牧區議會決議摘要〉，《聖三一堂主日周刊》，1987 年 11 月 15 日，3。

72 謝博文：〈聖三一中心幼稚園十周年紀念〉，《聖三一中心幼稚園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聖三一中心幼稚園，1994），5。

73 "Leung Ka-kui, for 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the Supervisor, Holy Trinity Centre Kindergarten," 14 July 1986, 聖三一堂文件。

74 "Information Needed for Applying for Nursery Premises," "Rev. H. C. Chan to the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30 December 1986, 聖三一堂文件。

75 鄧慶年：〈溫故知新〉，45。

76 周伯明：〈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之展望（上）〉，《聖三一堂周刊》，1984 年 5 月 27 日，1。

77 周伯明：〈白普理中心之展望（下）〉，《聖三一堂周刊》，1984 年 6 月 3 日，1。

78 〈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74。一九九零年七月中心舉行開幕禮。〈聖三一堂服務中心七月初舉行開幕禮〉，《教聲》745（1990 年 6 月 17 日）：6。

79 〈聖三一白普理中心教區新九龍辦事處〉，《教聲》469（1985 年 3 月 3 日）：4。

80 "Edmund B. Der to Rt. Rev. Peter K. K. Kwong, Bishop, Chairman, Diocesan Standing Committee," 30 May 1984, "Edmund B. Der to Diocesan Welfare Council," 31 May 1984, 聖三一堂文件。

81 "Proposed Partnership Scheme for Holy Trinity Church Social Service Centre between Diocesan Welfare Council (DWC) and Holy Trinity Church Parish (HTC)," n.d., 聖三一堂文件。

82 "District Land Officer M. L. Fung to Messrs. Debenham Tweson and Tam," 26 October 1984, 聖三一堂文件。

83 陳衍昌：〈堂慶牧函——焚而不毀〉，《聖三一堂周刊》，2007 年 6 月 3 日，13。

84 〈聖三一堂牧區議會主席陳衍昌、牧區議會義務書記郭書謙、補地價委員會主席黃啟榮致教區常備委員會主席鄺廣傑主教〉，1984 年 11 月 21 日，聖三一堂文件。

85 陳衍昌：〈實在集——難忘的時刻〉，《聖三一堂主日周刊》，1984 年 12 月 16 日。

86 呂大樂、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25。另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太平洋世紀，2000），11–16。科大衛（David Faure）指出，一九六六年暴動標誌着殖民地政府認受性出現危機。參 David Faure, ed., *Society: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285.

87 L. Stumpf and Carl F. Nielsen, "Facing a Dilemma," *LWF / DWS Bi-Annual Report, January-June 1970*, 1.

88 施同福：〈香港社會的現況和問題〉，《社聯季刊》13（1965 年春）：8、13。

89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一九六九至七零年代年報的概論〉，《基督教周報》319（1970 年 10 月 4 日）：2。

90 〈基督教協進會主辦教會使命諮商會議〉，《基督教周報》281（1970 年 1 月 11 日）：1。

91 〈核心討論——今日的香港社會〉，收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七十年代香港教會的使命——「路向與計劃」指南》（香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1971），6。

92 陳佐才：〈香港教會的一般現狀〉，收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七十年代香港教會的使命》，63。

93 鄺廣傑：〈前言〉，《聖公會港澳教區一百三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849–1984》，3。

94 白約翰：〈「風隨意而吹」〉，《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12。

95 謝博文：〈前言——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再去耕耘吧！〉，《聖公會聖三一堂九十四周年堂慶，聖三一白普理中心開幕典禮，小聖堂（寶坤堂）祝聖禮》，1984 年 6 月 14 日。



1950年代的聖堂外貌



1960年代的馬頭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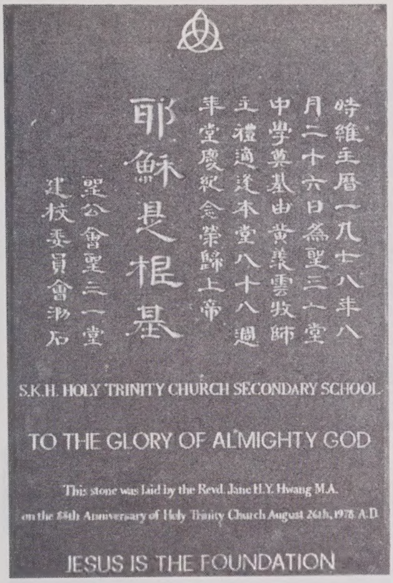


籌建中學委員會



1978年8月26日
聖三一堂中學
奠基禮





1978年8月26日聖三一堂中學奠基石







1979年聖三一堂中學校舍平頂禮





聖三一堂中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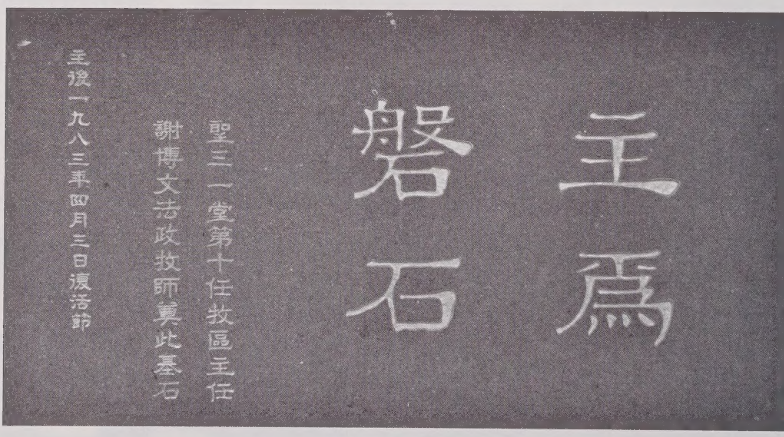
1982年8月28日聖三一堂白普理中心動士禮



1982年12月27日白普理中心百萬行



1983年4月3日白普理中心奠基禮



白普理中心奠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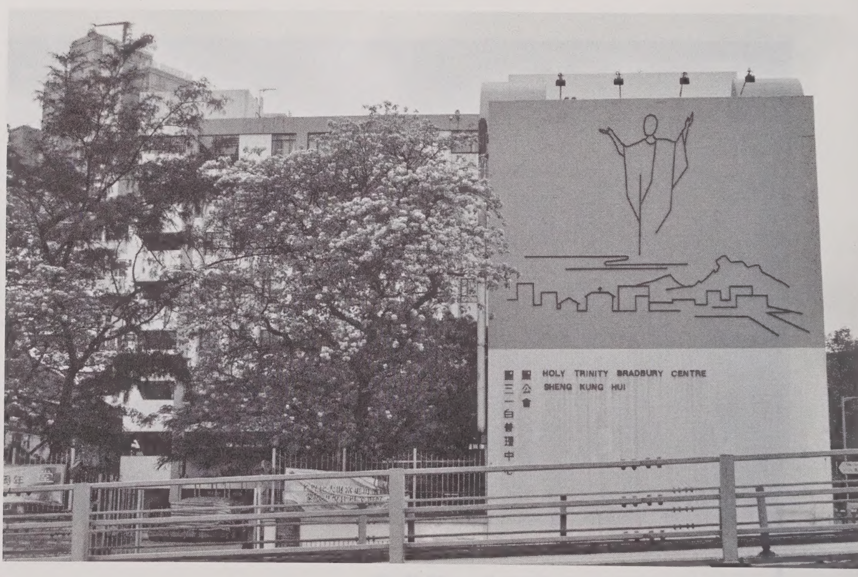
1983年8月27日白普理中心平頂感恩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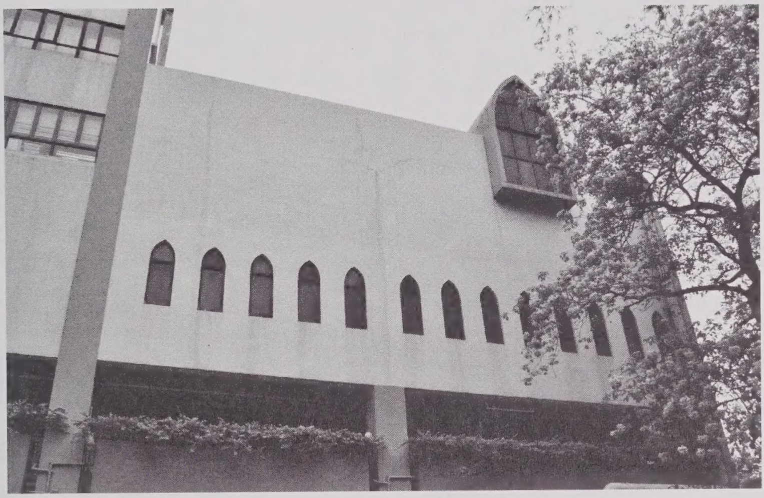
1984年6月17日白普理中心開幕禮



白普理大樓外貌（20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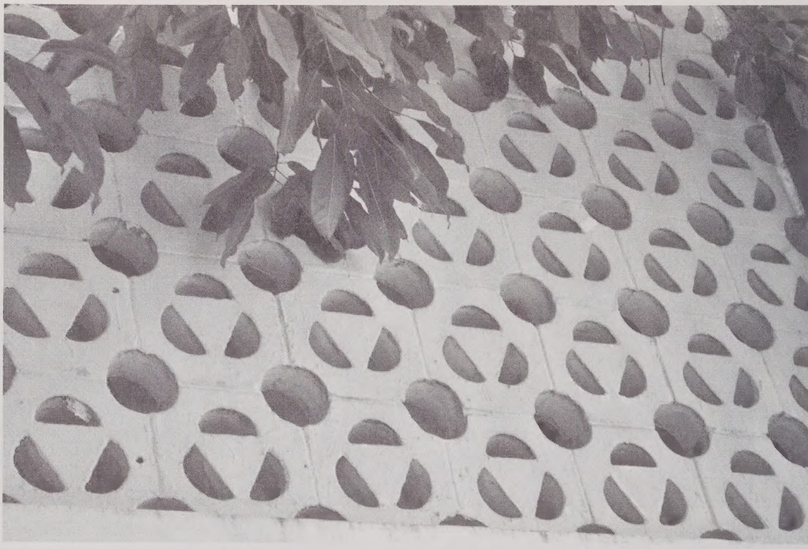
「主賜平安」大壁畫



十餘個圓拱設計喻表合手祈禱



大樓入口指示



大樓外牆三位一體圖案



聖三一中心幼稚園



聖三一中心幼稚園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入口指示



小聖堂

8

迎向挑戰，重尋使命
1984–1997

充滿挑戰的年代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英兩國政府草簽《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聯合聲明規定，中國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英國政府於同日將香港交還給中國。自一九八二年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開始以來，中英雙方出現不少爭拗，最終達成協議，香港正步入長達十五年的過渡期。

香港前途雖然已塵埃落定，而基本法的諮詢及起草工作亦在一九八五年展開，但港人普遍陷入「信心危機」，擔心無法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悲觀者甚至把「九七」視為「大限」。據統計，《聯合聲明》草簽三年後，香港移民潮達到高峰。一九八七年，申請良民證者多達五萬人。[1]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港人對前途的信心跌至谷底，移民潮亦同時加劇。港府估計，一九八九年的移民人數達四萬二千人。[2] 自一九九零至九四年，每年平均逾六萬

人移民。亦有估計自一九八四到二零零一年底，合共五十萬港人離港他遷。[3]

進入九十年代，基本法正式頒布，香港進入「後過渡期」。不過，在後過渡期間，中英關係因雙方對香港推行政治改革的步伐持不同立場，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香港不同政見人士亦呈現分化。香港社會在一片政治爭論聲中迎向九七回歸。

回顧整段過渡期（1984–1997），如何回應「九七」成為香港教會的實存挑戰。與香港社會一樣，教會深受「移民潮」衝擊，反映不少教牧與信徒對前景缺乏信心。儘管如此，香港教會並沒有忘記反省自身使命。基督教協進會在一九九零年召開的「九十年代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提出以「貫徹歷久不變的使命，忠於上帝所託、回應時代挑戰，使危機化為轉機」的精神，迎向九十年代這個關鍵的時代。[4]

聖公會為香港主流宗派之一，同樣在迎向挑戰中不斷尋索教會的使命。[5]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港澳教區以「教會增長」為主題，召開第三十六屆教區議會。鄺廣傑主教指出，教會增長不僅是指教友數字增加，也是質素的增長。惟有在質素方面有改善，量的目標才可達到。[6] 如何藉着社會服務及學校教育來表現基督的愛，改變社會及人心，成為教區探討與關注的重點。

一九八四年十月，教區福利協會特別舉辦同工進修營，探討如何結合福傳與社會服務。協會執委會通過「牧養計劃」（Chaplaincy），目的是使教堂與服務機構的關係更緊密。[7] 福利協會福利幹事劉惠靈承認，教區對服務與傳福音的關係缺乏全盤思考，因而在發展計劃及資源運用方面，未有層次地作全面計劃。

> 服務的增多，組織的龐大，政府政策的限制，津貼條例的更改，我們漸漸失去方向。……漸漸地我們忘記教會辦服務的目的與功能，雖然我們十分努力地工作，我們沒有因社會變遷、環境改變去檢討及重估我們的服務，界定服務範圍去改善服務的質素。[8]

辦學方面，鄺主教曾指出，聖公會在香港辦學雖有百多年的歷史，但卻容易迷失，「為辦學而辦學」，只重視傳遞知識，忽視培育人格與生命；「未能真真正正的透過主耶穌基督的真道，去將人培育成為祂心目中的公民」。[9]

一九八八年，教區總幹事徐贊生牧師指出，教區未來的方向，應加強傳道的擴展工作，使傳道的使命能與教育及社會福利的擴展並駕齊驅。[10] 為配合發展，教區自一九八八年十月開始分為六區（香港西區、香港東區、九龍西區、九龍東區、新界西區及新界東區），期望區內的牧區、傳道區、學校及社區中心加強聯繫互助。[11]

一九八九年五月，因應北京學運局勢，港澳教區特別在五月十一日在聖約翰座堂舉行為中國前途及中華民族整體幸福祈禱會，並呼籲中國政府「絕對不可使用武力處理學運事件」，「從速尋求和平解決之途徑」及「立即恢復新聞自由」。當日出席的牧師及教友約六百多人，鄺廣傑主教致詞時認為中國學生「發出正義的呼聲是愛國愛民的行動」，祈求「上主賜中國領導人有智慧、忍耐及克制」。[12] 同時，鄺主教向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及諮詢委員會呈辭。[13] 教區又在五月二十八日在港九新界及澳門四所教會舉行主愛中華禁食祈禱會。[14]「六四」事件後，教區發出「沉痛哀悼」聲明，對「北京當局以暴力鎮壓學生運動，濫殺同胞」，表示悲憤，並於六月十一日假聖約翰座堂舉行追思禮拜。[15] 教區各禮拜堂更於六月七日中午十二時為哀悼死難學生及市民鳴鐘一分鐘。[16]

十月，鄺廣傑主教在九龍東區分區會議上展望教區的未來時，勉勵教區不要憂慮移民潮，在風暴來臨的日子，海面雖有波瀾，但海底卻仍然平靜。他說：「現在正是我們事奉的最好時機。宣教、牧養、服務等方面必須加倍努力，因為會有越來越多人依靠神。」在談及教會面對的「隱憂」時，他指現時聖公會約有二萬名教友，但在未來的日子，「相信會有相當的教友離開」。他們留下事奉崗位，將為教會帶來危機。他勉勵眾人，即使將來人力

及資源兩者都減少，仍要合力應付一切需要，為上主多多作工。展望未來，教區會積極發展，興建聖堂，期望將來牧區遍及全港各區。同時，教區亦會在辦學及福利服務上努力。[17]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鄺廣傑主教在第三十九屆教區議會中，再呼籲教區「務要傳道」。[18] 後來，他在九龍東區教友座談會上，指聖公會在港有很多建樹，辦有百多間學校及三十多間福利中心，但牧區的發展在過去二十年來，卻出了問題，官方統計教友人數一直維持二萬多人，而實際上只得萬多人。「在福利工作上發展太大太快，在牧區的發展卻太小太慢」，因而出現「本末倒置」的情況。鄺主教指出，教會的主要工作是牧養，而福利和教育工作只是「我們本着上帝的愛，透過我們作出建設和參與社會」。

> 可是現在我們學校的學生團契找不到聖公會教友作主席，校方找不到聖公會教友為老師；甚至最近請校長時也可能出現要聘用非聖公會、非基督徒作校長的危機。為甚麼我們在社會前線的事工，沒有後勤的人力資源支持呢？如果這一切事工完全假託專業人士，那麼我們怎樣藉着教育及福利工作令人看見上帝的福音呢？[19]

鄺主教強調，教區在九十年代的重點是宣教。[20] 後來（1991 年），他在第四十屆教區議會又重申教區的宣教任務。[21]

一九九六年，港澳教區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禮拜堂的數目已達四十二所（牧區 26 個，傳道區 16 個），較一九八四年增加十三所。相對而言，在學校方面，一九九六年教區共有中學三十三間、小學四十八間及幼稚園四十五所，僅較一九八四年微增（32 所中學及 49 小學）。至於福利機構則有五十八間（其中老人服務 18 間，一般社會服務中心 40 間），較一九八四年的二十九間增加一倍。[22]

迎向百年
使命重尋

一九八四年九月，陳衍昌牧師正式就任聖三一堂主任牧師，並於一九八五年二月二日舉行就職禮，由鄺廣傑主教主持委任禮。[23] 就職禮翌日，傳播團契公佈去年七月在「傳播主日」進行的全堂問卷調查報告，是項調查旨在了解會友對教會的認識、個人靈修生活，以及對教會的期望。[24] 報告有以下六方面值得注意：

一、 教友對堂務不熱心，六成以上填表者參加聖三一堂超過五年，「但能確定自己清楚本堂之事者卻不超過兩成」；

二、 「大部分教友在金錢、時間及奉獻參與方面均偏低，且不積極向外傳福音」；

三、 「少數人經常靈修」，參與全堂活動以「聯誼、康樂性質居多」；

四、 一般教友認為「培育教友靈性長進是聖品人主要的職務」；

五、 半數教友不熟悉牧區議員；

六、 問及「對聖工發展重點」的意見時，不填寫者是填寫者的兩倍，「顯示教友多未曾關注聖工發展」；填寫者的關注依次序為：培靈奮興、關懷探訪、門徒訓練。

報告最後總結：「教友普遍對教會不熱心，冷淡原因在於缺乏對信仰本身追求之熱誠、對屬靈豐盛生命之渴望。」[25]

我們該如何理解報告所反映的負面狀況？填寫問卷者以青年及中年佔大多數，並且均已接受洗禮及堅信禮，且多為參與教會多年的「固定教友」。因此，報告確實反映出教會隱藏的危機。再者，會友對聖工發展重點的期望，也是偏重「內向」而忽視「外展」使命的，情況確教人憂慮。

經過九個月觀察後，陳衍昌牧師對聖三一堂得出兩個印象：第一是「教友對教會普遍認識不夠」；第二是「教友在信仰和靈程上進取不夠」。關於後者，他特別指教區及牧區先後舉辦四種不同性質和類型的信仰研討會和退修會，教友反應冷淡，「令人喪氣」。[26] 為改善上述問題，一九八五至八七年的教會主題，分別是「在基督裏成長」[27]、「愛主更深」[28] 和「為主而活」。[29]

一九八六年，由於聖堂外牆損壞，加上殿頂需修補，牧區議會決定為修葺聖殿募捐，金額為十三萬元。[30] 八月，乘着九十六周年堂慶，藉教友的奉獻支持，又改建了聖袍室，供聖壇服務團及司禱員使用。同時又在白普理中心設立閱覽室，供聚會、研討及以法大團契使用。陳牧師指出，聖袍室是敬虔崇拜的象徵，閱覽室是靈裏長進的象徵，而以法大團契則是竭誠宣道的象徵，「提醒了聖三一堂三方面最重要的事」。[31] 這三件重要的事，反映出陳牧師對牧區的期望，就是兼顧內在的靈命、敬拜，與外在的宣道實踐。七月開始，周伯明牧師奉教區調派，再回到聖三一堂任助理聖品，襄理堂務。

一九八七年，陳衍昌牧師銳意強化各部事工，先是安排各部在主日周刊撰文介紹部務，增進會友對各部事工的認識。其次，傳道部又肩負「對外傳福音的責任」，以聖三一堂屬校的學生、家長及教會鄰近居民為對象，分別計劃在七月及十一月舉辦佈道會。為配合佈道會，又主辦陪談員、栽培員訓練及祈禱會。[32] 陳牧師在牧函中指出，隨着九七臨近，廣傳福音更有「特殊的時代價值」。他決定在聖三一堂迎向百年之際，多舉辦佈道會。他預期籌劃中的青少年社會服務中心（參下文），也可成為牧區實踐傳福音的媒介。[33] 結果，七月的佈道會，有三十多位教友參加陪談訓練，另五十多人作接待，當晚合共五百五十人出席。[34] 同時，教會又安排聖三一堂中學的同學及老師分批參與主日崇拜。[35] 一九八八年，中學舉辦信仰生活周，共有六十五名學生在佈道會決志，

二百四十餘人慕道。[36] 一九八九年七月，教會更舉行兒童佈道會，對象為附屬幼稚園和小學五至十歲的學生。[37]

為讓傳道部專責推動傳道事工，牧區議會決定把原屬傳道部推動的教友培育工作，交由新成立的培育部負責。[38] 陳衍昌牧師十分重視培育工作，他在一九八四年仍任教區宗教教育幹事時，曾指出教會增長與培育關係密切。[39]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開始，培育部在原有周三下午的祈禱研經班外，又在晚上新增研經祈禱聚會，供在職教友及青少年、學生參加。[40]

經過數年的探索與實踐，聖三一堂確定以傳道宣教與信徒培育為兩大目標，重整事工方向，邁向百年堂慶。

百周年紀念白普理大樓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的牧區議會，通過重建聖三一堂副堂，為百周年大樓的決定。建百周年大樓之議，始於成年部一次聚會。當時，一些會友建議趁聖三一堂百周年的大日子推動建設，既可鼓動教會士氣，又能增加活動空間。經與陳衍昌牧師商量後，乃交付牧區議會討論跟進。牧區議會決定成立擴建副堂研究委員會，由徐添福任主席。[41]

對於重建副堂一事，有部分會友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過去十多年來，聖三一堂已多次大興土木，工程相當頻密。陳衍昌牧師特別在牧函回應這種憂慮：

> 不能夠把全部精神和力量花在房屋設施或辦學盈利之上，而把福音工作置之不理或有所忽略。這並不是抽象的理論問題，而是具體的實際問題。
>
> 試想想，我們曾花費數百萬開辦本堂中學和白普理中心，因此而到〔本〕堂慕道加入教會的人有多少？相反地，一些友堂沒有那麼多房舍建設，但因為聘請了一位熱心愛主的同工（月

薪三數千元）協助牧者推動堂內與屬校的福音工作，在教會增長的質與量都獲得驕人的成果。

他重申，「基督信仰的中心是人，福音的重點是向人傳遞拯救的好消息。……屋宇建設只是手段和方法，福音和新生命才是最終目的」。[42]

研究委員會經過三次會議後，確認重建副堂的建議，並交由重建副堂籌委會跟進，籌委會於一九八七年九月召開首次會議，選出陳宗抗為主席，至一九八八年四月，共舉行七次會議。[43] 籌委會整理出推動重建計劃的三個主要原因：一、慶祝開基百載，讓教友有機會共建愛心信心里程碑；二、舊副堂不符教育署要求及建築條例（堂頂建築材料為石綿瓦），應予拆卸重建；三、本信仰精神回應社會需要，擴大傳播福音接觸範圍。具體的項目包括：全日制小學學位、全日制幼稚園學位、教育研究需要、聾人服務、傷殘人士需要、學生溫習室服務需要。整項工程分兩期進行，總預算為二千一百一十萬元。[44]

關於重建副堂如何回應社會的需要，無疑是整個項目的核心，成為牧區上下積極探索的方向。這涉及三方面的構思：[45] 首先，在教育方面，當時首要的考慮是擴建幼稚園，以回應區內迫切需求。蓋聖三一堂幼稚園的決定深受家長歡迎，但因空間及設備限制，新校學額只能滿足五分之一申請者的需求。同時，教育署開始討論推行全日制小學教育，聖三一堂小學日後的發展，亦需要更大的空間。

其次，是進一步完善對聽障人士的服務。自白普理中心落成後，以法大團契一直運作良好。同時，聖三一堂又與香港聾人團契緊密聯繫，提供各種支援。兩個團契在聖三一堂白普理中心，每周最少聚會四次，而以法大團契又成立了香港聾人劇團。除團契聚會外，聽障人士亦參與主日崇拜。平均出席人數達五十至六十人，聖餐主日的出席人數更倍增，即使聖三一堂最大的會議室

也容不下。要深化對聽障人士的服務，重建副堂是惟一可行的方案。

最後，除回應本堂的需要外，重建副堂亦希望顧及社區需要，為區內非牟利機構提供合適的活動場地。

重建副堂的初步計劃，是興建一所樓高八層，每層面積三千平方呎的大樓。首三層是課室及特別室，以應全日制非牟利幼稚園的需要。三樓另設特別室，供兒童道德及靈性發展的縱向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之用。四樓是聽障人士服務場地。五樓及以上各層主要供教會日後發展事工，但興建與否將視乎籌款進度而定。此外，大樓側是個四千五百平方呎的有蓋操場，是教會及幼稚園辦公室、幼稚園廚房及接待處所在。有蓋操場上將興建一個達六千平方呎的多用途禮堂，可容納五百至六百人。[46] 在開支方面，初步估計，連建築費、設備及傢具在內，第一階段的總開支為七百萬至八百五十萬元。

整個百年大樓的項目，涉及龐大財政支出，牧區及教區也曾考慮能否承擔。向外尋求財政資助雖為解決之道，動員全體牧區信徒認同及支持事工，更是關鍵一步。一九八八年開始，聖三一堂正式啟動籌款工程，先是在二月七日舉行羽毛球籌款挑戰賽，由教會女子羽毛球單打冠軍戴德麗對陳衍昌牧師，結果籌得二萬六千元。四月三日又舉辦感恩嘉年華會，籌得四萬八千元。[47] 四月三日，牧區代表趁着聖堂小斜坡剪綵禮及大壁畫亮燈禮舉行時，向白普理基金信託委員會代表文思（Dennis Minns）介紹重建副堂計劃。[48] 四月十一日，聖三一堂正式致函白普理基金會申請資助，五月收到基金會撥款資助五百萬元。白普理基金的支持，是整項重建的強心針。同時，牧區又從曾肇添家族、佘光棠伉儷遺產及何宅得到合共一百八十八萬元的捐款。[49] 一九八八年六月，教區常備委員會議決原則上同意副堂重建項目，但提醒牧區須了解補地價及通脹的問題。[50] 一九八九年，教區確認副堂新開設的幼稚園，命名為「聖公會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

計劃雖然獲得大額撥款及捐獻，但距離重建預算尚遠。當時，有人建議向賽馬會申請資助，但陳衍昌牧師以「信仰精神及基督徒應有美好的見證」為理由反對。最後牧區議會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通過在其他申請努力失敗後，方向馬會申請資助。而數位牧師一致認為要避免向馬會申請，必須盡力尋求其他資源。[51] 其中教友的募捐，更須達到一百五十萬的目標。

一九八八年十月九日的午堂崇拜，特別舉行重建副堂募捐出發禮，由彭榮昌會吏長講道，他以路加福音的窮寡婦為例，勉勵眾人以感恩奉獻回報上帝的愛。陳牧師在差遣禮致詞中指出：不要問「受託的使命是否艱巨？」但必須清楚：「那使命是否符合上帝的旨意？」「祂是否垂顧憐憫？」他希望眾教友同心協力，努力完成上帝的工作。重建委員會主席陳宗抗致詞時表示：

> 感謝上帝的恩典，籌備經年的百周年紀念副堂重建計劃終於排除萬難，在今天舉行出發禮。多年來，「五餅二魚」的神蹟不斷在本堂重演。因為教友不斷的虔誠奉獻，熱心勸募，目前本堂已設有中學、小學、幼稚園和社區中心。在眾志成城的情況下，深信聖三一堂在百周年紀念的時候，將有一座新的百周年紀念樓（內包括一所新副堂、第二家幼稚園、各部部室、聾啞中心、傷健人士室等）。獻呈上帝，以表示我們感恩的心。本人謹在此呼籲各位教友，照以往一般按本分奉獻，讓我們的禱告能化為行動，聖三一堂教友的光，再一次照在香港居民之前，榮耀上帝的名。願上帝與我們同在。[52]

從各人分享可見，如何鼓動會友投入，成為牧區籌款工程的重點。一九八九年六月，婦女部推出「二四運動」，即每月二十元，一年就有二百四十元，期望集腋成裘，為重建副堂盡一分力量。[53] 籌款活動的高潮，是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舉行的「百萬行」。這次步行籌款假聖三一堂中學開步，經山谷道村，上佛光街，沿忠孝街返回中學。當日參加者眾，曾任聖三一堂主任的黃

羨雲法政牧師亦為善不甘後人，為籌款盡力。[54] 是次「百萬行」共籌得捐款二十四萬餘元。[55]

百年大樓於一九八九年七月動土，建築工程順利進行。一九八九年十月，重建副堂委員會會議通過新百年樓命名為「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紀念白普理大樓」(Holy Trinity Church Centenary Bradbury Centre)。[56] 一九九零年一月七日，陳衍昌牧師主禮奠基，基石上題文為：「先賢之信，主愛為基」。[57] 平頂禮於一九九零年六月三十日舉行。[58] 一九九零年十月六日由鄺廣傑主教為百周年紀念大樓及曾肇添幼稚園主持奉獻禮。大樓啟用後，聖三一堂增添了五萬餘平方呎的使用面積，包括曾肇添幼稚園及室內遊戲室、教堂辦事處、社區會堂（可容 600 人）、傷健人士室、聽障人士室、牧區會議室、自修室及各部部室、天台運動場等。[59]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為籌募白普理大樓內部裝修及設備費，舉行百周年嘉年華會，雖然當日下着毛毛細雨，但會場內各人仍熱烈參與各個攤位遊戲。共籌到款項二十五萬餘元。[60] 八月，重建副堂委員會及牧區議會正式發動百年樓最後一次募捐運動，為副堂籌集裝置設備費，目標是一百萬元。[61]

從一九八六年開始，歷時四年的重建終告完成，重建副堂籌委會主席陳宗抗難掩其興奮的心情，為上帝在聖三一堂成就的「神蹟」獻上感恩：

> 上帝大能的手，在聖三一堂再次顯出五餅二魚的神蹟，繼聖三一堂學校、聖三一堂中學、白普理中心之後，又再成全了聖三一堂眾教友的願望，帶領我們完成了這個近二千萬元的工程……[62]

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

聖三一白普理中心按照規劃，在落成後開展青少年服務。青少年中心是社會福利署資助項目，但由於政府財政不敷，四年後才批出資助。最後，到一九八九年八月，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始正式投入服務。[63] 中心面積四千多平方呎，成立初期有八位全職職員，其中四位是專業社會工作者。至一九九零年六月，已有會員一千人，以中、小學生為主，亦有不少在職青年。

服務中心的口號是「劃破生活界限，接觸時代脈搏」，啟發青少年人跳出自己的局限，參與和創造自己的生活空間。目標包括三方面：一、提供更自由、更有創作力的空間，讓青少年人尋找根源、突破現在、發揮真我；二、培育青少年人在將來承擔香港社會的心志；三、鼓勵青少年投入社群，參與創造更理想的社會環境。[64]

社會服務中心擬定的綱領是：

> 我們相信，青少年時期是一個包含着許多「可能」的時期：此時他的生活可能過得多采多姿，也可能一無所有；此時，他可能學到許多，也可能讓時間白白的逝去。要怎樣才可「對青春無悔」呢？我們相信，惟有青少年劃破自己的生活界限，將眼睛稍稍從個人比較狹窄的小天地放開，嘗試多接觸、多嘗試，「接觸」一下「時代」的「脈搏」，看看自己周遭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為甚麼會發生這些事，作為一個青少年又可怎樣面對這些事。[65]

一九九零年七月七日，中心假聖三一堂側之亞皆老街球場舉行開幕典禮，由鄺廣傑主教及社會福利署長主持。開幕禮有兩項特別儀式，其一是由社會服務中心青年會員宣讀青年宣言，表達他們關心社會、願意承擔。宣言大意是他們這一群青年與社會和社區關係密切，希望透過年青人的努力，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另一個儀式是由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約四十位會員集體簽署捐腎

卡，表示他們關懷社會上不幸的一群，和體現年青人互助互愛的精神。[66]

「九龍城青年會議」於開幕禮晚上假服務中心舉行，由中心與區內五所青年服務機構合辦，以「九十年代青少年成長的挑戰」為題，邀請九龍城的青年工作者、青年領袖、青年中心會員等，交流九十年代青少年人的需要及轉變，以及青少年中心應如何回應這些需要，提供切合時代的服務。[67]

中心成立後，即執行一九八四年間與教區達成的共識，按「相互合作之伙伴精神及關係」共管服務中心，組成管理委員會，成員包括主教代表一人、牧區主任牧師為當然主席、聖三一堂及教區福利協會各派相同數目的成員，而中心主任則列席委員會。牧區議會又通過以三年為期，試驗這模式的績效。[68] 不過，教區福利協會到一九九零年九月仍未委派代表加入管理委員會，牧區乃致函協會，反映「中心自開辦至今仍由其籌備委員會在欠缺有效會章之情況下管理及推動事工」的困擾。[69]

同時，教區福利協會在一九九零年七月又發出〈會員機構章則指引〉，其內容與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按伙伴計劃精神訂定的憲章（章則）內容有抵觸，引起聖三一堂牧區議會的「憂慮」。[70] 針對牧區的憂慮，協會最後修改指引，特別增加了牧區管理的福利機構的內容與安排。一九九一年六月，牧區議會通過聖三一堂服務中心憲章，轉呈教區福利協會及教區常備委員會審議及通過。[71] 常備委員會後來接納有關憲章。[72]

中心主要向九龍城區內六至三十歲的青少年及婦女提供五方面的服務：

一、 社會關懷：如「龍本多情」民主民族教育課程、「都市脈膊」時事社區論壇、「紫荊情」中港關係課程；

二、 個人成長：為聾人擴闊自己眼界的「分享靜默」、服務和親炙弱智人士的「齊來做個有意義的聖誕老人」、旨在培養兒童自信心及表達能力的「話我知」和「小朋友講話」；

三、 功課輔導：為兒童、少年及青年提供中、小學各級的學業輔導；

四、 家庭關係：舉辦「風箏飄揚大澳門」、「米埔觀鳥遊」、「親情洋溢在鶴藪」、「家庭日營」、「家長講座」等；

五、 文娛康體：主辦各種適合不同年紀人士、不同興趣的青年、兒童興趣班、旅行、兒童玩具閣服務等。

據統計，中心成立一年，已舉辦超過三百多項活動。[73] 在五周年紀念時，一位會員分享他對中心的印象：

> 其實我發現中心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與家庭、社會、學校不同，這裏沒有太多的制度，人與人之間永遠存在着信任、坦誠。就是大家有甚麼不滿意的地方，都可以毫無保留的說出來，試想想，假若我們在學校或家庭做着同樣的事情，你想會有甚麼後果呢？但在這空間中生活，我相信每一個人都需要有一定的自律，其實在中心生活亦遇上過不開心或犯過錯誤的時候，但從每一次別人的原諒以及自己的反省當中，便會有長大。在中心生活就是這樣，毫無束縛的，每樣事都去試，失敗了、跌低了，回想一下，爬起來，如是者每次也是這樣，這不正是成長嗎？[74]

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由於接受社署資助，發展自然受政府的青少年政策影響。一九九四年，政府發表〈兒童及青年中心服務檢討報告書〉，認為要有效地滿足青少年不斷轉變的需要，必須採用綜合和全人服務的模式。報告書指出用全人、全面服務的模式可避免提供零碎不全的服務，有助各項服務互助配合和切合青少年多方面的需要，服務效益亦會相應地提高。報告書建議成立「青年綜合服務隊」，藉此結集兒童及青年中心、學校社會工作服

務及外展社會工作服務的資源。[75] 針對社署的新政策，陳衍昌牧師以服務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身分，表達憂慮：

> 社會福利署公佈的〈兒童及青年中心服務檢討報告書〉，似乎仍未能給予青少年中心在社會服務上應有的重視和支持，以致如果這些中心未能覓得「青少年中心綜合服務隊」加以配合，將會面臨極大的困難，嚴重影響服務質素。這實在是極為不智的政策。我們深切盼望，懇切呼籲有關當局在釐定青少年中心政策時，認真考慮其價值和貢獻，讓它們可以調整方向，繼續成長，完成社會使命。[76]

政府的政策，並沒有因陳牧師的呼籲而調整，他的憂慮最後亦成為事實。踏入千禧年，香港政府按青少年中心資源調配政策，推動成立「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77] 為配合政策，聖三一堂青少年服務中心在二零零零年八月十四日正式轉型為「香港聖公會九龍城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聖公會福利協會透過結合其於區內青少年中心服務的資源，為九龍城區的青少年和家庭提供更多元化及全面的服務。綜隊的辦事處仍設於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舊址。[78] 在新安排下，中心完全隸屬於聖公會福利協會，聖三一堂不再參與其管理運作，原隸屬牧區議會下的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管理委員會亦於二零零零年八月解散。牧區計劃研究以非政府資助形式在社區中繼續「愛鄰如己」的社區服務見證。[79] 不過，牧區決定維持「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的名字及登記，期望在將來仍可承擔對社區的服侍。[80]

為提升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的吸引力及服務環境，社會福利署在二零零三年起，分兩個階段撥款予不同機構的七十多間中心，以獎券基金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讓各中心進行「現代化工程」。二零零六年七月，在香港賽馬會信託基金撥款下，九龍城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賽馬會青年幹線（Youth Express）舉行啟用禮。[81]

百年紀念活動

一九九零年是聖三一堂成立百周年的大日子，全年的主題為「百年感恩虔奉獻，事主愛人盡己心」。但在那年，一九八九年「六四」後的恐慌瀰漫，加上面對一九九七年回歸的不確定氛圍，香港社會及教會均蒙上層層陰影。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聖三一堂舉行全堂退修會，陳衍昌牧師提及今日香港教會面對移民潮的挑戰，及缺乏下一代接棒人的問題，他呼籲各人一起承擔教會傳福音的責任。[82]

職是之故，陳衍昌牧師在一九八九年聖誕的牧函，便以「危機」為主題，指堂慶既是「危機」，也是「機會」。危機包括四方面：[83]

一、 面對九七，港人的移民潮加劇了教友的流失。他指出，在過去三年，聖三一堂移居海外的教友達百多人，估計未來三數年離開者亦將不少於這數目。「因移民導致的教友流失是個令人擔憂的危險燈號」；

二、 多姿多彩的百周年活動，容易使人迷失方向，「忘記了教會的本質和福音的使命」，更會把負責的信徒弄至筋疲力盡。堂慶高潮後，「教會或許會進入長時期的下坡期」；

三、 教會的牧養如何回應移民潮及教友流失？「去」與「留」的不同意見，會否影響弟兄姊妹間的關係？

四、 移民潮或將減退教會的「中產特色」，教會可否藉此機會超越中產，成為「眾人之家」？

他勉勵會友，雖然身處危機的時代，但仍可同心協力，尋求聖靈的幫助，「把一切危險化為機會」。聖誕節是救主降臨，帶來盼望的日子，他藉着聖堂正門張貼的對聯，表達牧區預備迎向挑戰的心聲：

將臨百載普世高歌揚主愛

聖誕重經信徒善行證神恩

一九九零年五月，聖三一堂「傳福音及培育事工專責小組」召開會議，商討牧堂牧區日後的事工方向。會議總結了四方面的挑戰：一、政治不穩引發的移民潮；二、「六四」後，香港人正徬徨於現實與理想之間；三、基督徒對上帝失卻信心；四、聖三一堂會友在靈性栽培上的缺乏。因應上述挑戰，小組認為牧區更應加強福音擴展工作，研究適切策略，重視「整全福音」。[84]

除百周年紀念大樓平頂禮及社會服務中心開幕外，百周年堂慶的高潮就是十月十二及十三日的百周年培靈會。培靈會由培育部及傳道部舉辦，主題分別是「九十年代靈修生活挑戰」及「九十年代事奉與見證的挑戰」，由堅道浸信會主任劉少康牧師及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主任盧龍光牧師主講。[85]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四時，聖三一堂百周年紀念感恩崇拜假聖堂舉行，由鄺廣傑主教主持。鄺主教感謝上主在百年來的帶領，使歷任牧者與信眾努力耕耘，在九龍城區扎根，傳揚主道，牧養群羊。他以昔日弟兄姊妹承擔主工的精神為例，勉勵當下的信徒要對主有信心，為擴展教會事工努力。他形容聖三一堂是個「富建設性的牧區」，在過去一百年來從沒停止擴展的步伐。白普理中心及百年大樓的建設，標誌着牧區不斷成長，恩典越大，責任便越大：

> 今日的建設，更應肩負起未來的重任。沒有人知道九七年後，機場一帶會否發展成住宅用地，但無論怎樣人口是不斷膨脹的，有很多人等着救恩，等着福音；今天上帝賜恩給我們，最終目的不是只擴建教堂範圍，而是要利用此來傳福音，去關懷、容納更多的人，使更多人能利用這地來參與崇拜，接受教育與社會服務。[86]

同日，百年樓、曾肇添幼稚園舉行奉獻禮。而曾肇添夫人陳式如亦出席主禮。

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除夕守歲崇拜後，陳衍昌牧師及十二位信徒代表全堂教友，在聖堂及百年樓間的空地，種植一棵長青柏樹，以表達百年樹人的理想和象徵——為上帝的國度和基督的教會另一個百年樹立人才。[87]

跨越千禧

宣教與培育

百年堂慶過後，陳衍昌牧師接連在牧函中，向會友發出挑戰：

> 從最早的時候，聖三一堂便秉承了聖公宗的特色，在宣教的事工上，「愛心見證的社群服務」和「真誠無偽的宣講福音」，兩者並重。本堂的服務社群工作，始自本世紀初開辦的「廣蔭院」、「廣愛院」和「安居舍」窮人院，經過近百年的發展，我們的服務範圍已經包括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青少年兒童社會服務和聾人的照顧。百年紀念樓落成後，更多的愛心工作將要展開。然而，我們還要同心祈求上主，讓本堂的工作不要停止於這些「服務」之上。

陳牧師認為，服務工作是聖三一堂「廣大的宣教對象」，牧區更有「受託的宣教使命」。[88] 他檢討過去福音事工「年復一年成為空中樓閣」的原因，是教友「不贊成聘請曾受神學訓練的同工全職推動」，有關問題已交專職小組跟進討論。[89]

除宣教使命外，陳牧師又期望強化培育工作，他認為會友參與教會事奉的比率頗低，「有事奉的只佔經常到堂崇拜者百分之二十以下」。如何裝備及推動信徒參與事奉，成為牧區另一個重要關注。[90] 後來，牧區委任了七人小組，深入檢討聖三一堂的傳道及

培育事工，並於一九九二年九月完成報告。[91] 一九九二年開始，牧區新設宣教培育幹事，專責推動相關工作。

聖三一堂的五年計劃(1991–1995)，便是為針對宣教及培育這兩大目標而制訂：

年份	主題	口號
1991	讀經年	勤奮讀經，燃點生命； 人人讀經，教會振興
1992	互愛年	遵行主命愛父神，兄弟姊妹共相親
1993	栽培年	接受培訓，靈命更新
1994	宣教年 (後改為增長年)	人人盡心，廣傳福音
1995	關社年	關心社群，榮神益人

表一：聖三一堂五年計劃主題及口號(1991–1995)

五年計劃反映牧區的期望：藉此深化信徒的根基(讀經)及肢體關係(互愛)；並經進深的培育後，信徒踐行宣教及關社兩大使命。從上帝的話語開始，然後是實踐聖經教導的責任與行動。

「讀經年」從大齋期開始，特別推介研經靈修書籍。而三月舉行的教友退修會，主題則為「聖經的亮光——如何研讀聖經」。四月又在主日中堂崇拜試行「成人主日學」，舉行系統研經講道，幫助會友深入認識聖經。[92] 至於「互愛年」，則旨在改變教會「地方越大、事工越多、人數越眾、人際關係就容易轉趨疏離，聚會氣氛變為冷漠」的情況。最終目的，是鼓勵信徒「人人入部，參與事奉」，並在事奉及團契中建立關係，在愛中成長。[93]

經過兩年的凝聚及討論後，教會進入「栽培年」。陳衍昌牧師以「磨亮的箭」來勉勵信徒，廣傳福音。[94] 一九九三年一月舉行的牧區議員及義工人員退修會，便以「社會轉變中堂會的使命」為題，由鄺廣傑主教及陳佐才法政牧師分別主講「宣教十年」及「平信徒的裝備」。鄺主教指出，社會分工日趨細密，教育、醫療

和福利工作都交由專人負責，結果信徒很容易失去了關心社會的任務及關懷別人的工作。他希望眾人所傳的福音及宣教的核心，都在宣告上帝的愛。不僅以物質助人，也回應人的心靈需要。而陳法政牧師則以九七回歸為背景，一方面爭取作一些將來可能受政治影響而不能做的事，如傳福音及植堂，另方面亦勉勵信徒與所有香港人一起，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教會不要忘記盡力去實現真理與公義。最後，他提出香港因政治而產生分裂，教會可如何宣講合一的信息來向眾人發出挑戰。[95]

「栽培年」專注於對「大使命」的培育，在這原則下，牧區決定以屬校為中心開展事工。陳牧師明確提出「要加深向學生和家長的福音工作」：

> 在附設學校為家長舉行生活和家庭的專題講座時，我們卻進一步邀請他們去認識信仰給予基督徒和諧喜樂婚姻生活的祕訣；在舉辦聚餐時、聯誼茶敘和旅行時，我們也適切地安排福音和培靈的環節，好讓教友和他們未信的親友在靈性上有所得着。[96]

傳道部為讓屬校學生及家長增加對教會的認識及歸屬感，為日後的佈道工作鋪路，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晚假百年樓副堂舉辦「創造奇功九三音樂會」。當晚參與演出者包括聖樂部、青少年部、主日學詩班、聖三一堂中學歌詠團、小學歌詠團及轄下兩所幼稚園的全體高班學生。當晚出席者眾，人數高達八百人。[97]

牧區亦檢討傳道策略，認為佈道會雖有成效，但始終未如理想。相反，牧區應更多著重現有的附屬組織，以及會友的個人佈道。為幫助信徒（特別是大專教友及慕道者）探討及反省信仰上的問題，及面對社會問題衍生的倫理思考，一九九三年初成立思道團契，每月聚會一次。除對內的培育外，團契亦有宣教使命，邀請非信徒參加，讓他們對基督教信仰有更深入的了解。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組主任陳佐才法政牧師，更擔任團契顧問。[98]

在培育及事奉方面，陳牧師提出「群體牧職」(team ministry)的理念，意思就是每位信徒都拿出自己的時間和才幹，肩負建設天國、廣傳福音和牧養萬民作主門徒的天職，實現「全民皆兵」的理想。「『群體牧職』乃是教會增長的大關卡，教會要增長就不能不越過此關」。[99]

為落實「群體牧職」，陳衍昌牧師把教會各部和團契區分成「事務」和「宗教」兩大範疇。具體分類如下：

一、 事務：行政諮詢會、財務委員會、各管理委員會，保養維修小組（考慮中）；

二、 宗教：

1. 崇拜：司禱部、聖壇侍從部、聖壇服務部、音響部；
2. 培育：培育部、主日學、青少年部、思道團契；
3. 牧養：松柏團、成年團、探訪部、慈惠部；
4. 宣教：傳道部、傳播團契、附設學校及社會服務中心。

上述事工性質的分類，目的是讓教友明白教會的使命在推動福音和靈性事工，事務和組織只是完成使命的途徑而已。每一位牧區議員盡量參與「事務」和「宗教」兩方面的事奉，教友若掌握教會的使命，便會更樂意和積極地投入事奉，以福音及靈性作為首要的關懷。[100]

一九九四是「增長年」，教會於三月舉辦短宣訓練，題目為「如何向親友傳福音領人歸主」，並於十月舉行佈道會。[101] 十月開始，又舉辦「生活與信仰小組」，協助有興趣認識基督教信仰的人士，幫助他們更了解信仰。小組每主日早上舉行，由高俊鎮校長主領，一直維持至一九九八年七月。[102] 成人主日學部以「教會增長與我」為總題，並在十一月二十日早禱崇拜中，邀請鄺廣傑主教主講「香港聖公會的將來（未來的挑戰）」。[103]

一九九五是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陳衍昌牧師在檢討時，指出計劃只是「由上而下的學術創作，紙上文章」，如果不能「由下而上地由基層開始」，將無法取得良好果效。他總結計劃面對的最大問題，是教會因移民潮導致「屬靈領袖流失很快，接班的弟兄姊妹需要時間在事奉崗位上熟習和長成」。同時，「願意委身承擔聖工的人數又不足夠」。所以，他展望未來數年，將「強化信徒培育的工作」，讓他們的靈命成長，教會便可以真正增長。[104]

在這個背景下，一九九六年至九九年的教會主題分別是：「渴慕年」、「奮興年」、「信仰實踐年」及「裝備年」。在這數年間，聖三一堂仍以培育及宣教作為兩大實踐使命的方向。在培育方面，教會首先在一九九六年一月開始，推出每月第一主日崇拜後的「天倫樂」家聚，期望能建立肢體間的坦誠團契，進而提升及更新靈命。[105] 一九九七年九月開始，在早堂崇拜前推出「早餐研經會」，幫助參加者系統地研經，[106] 目的是「要讓教會復興，信徒在靈性和信仰上長進成熟，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107] 初期參加者有二十多人，但後來出席人數只維持十人以下。

在宣教實踐方面，牧區鋭意強化學校宣教工作。高俊鎮校長指出，中學、小學及幼稚（兒）園，合共有二千五百多名學生，每天尚有四百多位家長進出校園（小學及幼稚園），是個很好的禾場。他形容：「我們不斷播下種子，有好的土壤、時間，欠缺的是足夠的農夫（包括全職人員及義工），依時候澆水、施肥、除蟲及收割。」[108] 他藉聖三一堂小學重建工程落實的時機（參下節），呼籲更多會友起來承擔：「我們深信在未來的日子（九七年後），在津貼學校傳福音的限制將會越來越大，只有在私立的教會學校，仍然有非常大的空間。」[109]

一九九六年，傳道部以「人人盡心，廣播福音」為口號，推出支援屬校福音工作的計劃，包括：[110]

一、 曾肇添幼稚園圖書室：藉福音書籍及影音教材向家長傳福音，逢周一至五，在上下課前後各開放兩節，每節一小時。由年長教友向家長分享經驗及信仰。

二、 聖三一中心幼稚園：開辦暑期聖經班及家長佈道會。

三、 小學家長團契：招聚家長參與聚會，希望在信仰及教養兒童技巧方面支持家長。[111] 團契以講座形式進行，例如介紹兒童疾病、兒童心理等。聚會在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下午舉行，聚會前有唱詩祈禱。不過，團契因人手不足，維持數年後便停辦。[112]

四、 小學畢業生暑期補習班及團契

五、 中學生夏令營

為裝備更多福音使者，讓他們向屬校家長及鄰近街坊傳福音，教會在一九九七年開始，在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舉行「短歌日」，對象是不用上班的年長教友。[113] 據悉，從一九九七至九九年間，有超過十位小學家長、學生及三位教職員同工在聖三一堂領洗。[114]

重建小學

小學擴展的需要，早在討論副堂重建計劃時已提及。事實上，聖三一堂小學建於五十年代，經過四十多年的使用已頗為陳舊，加上校舍細小，已無法滿足當前需求。據謝博文牧師憶述，在其任內（1976–1984），是小學最低潮和困難的時候，多次有人建議把資源及精神集中在幼稚園及中學，而停辦小學。[115] 百年大樓落成後，小學擴建項目很自然便提上討論議程。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七日，校董會會議通過了校舍擴建計劃，並於二月二十日獲聖三一堂牧區議會接納。由於原校址在航空線範圍內，地契上註明地段內建築物的高度限制為二十八英呎，故擴建計劃須先向政府部門申請修改地契。[116] 擴建校舍計劃隨即呈

交教區常備委員會審議，並在三月的會議討論。陳衍昌牧師代表校董會列席會議，並陳述擴建計劃。陳牧師交代整個計劃曾三易構思，原初整體重建的想法並不可行，除因經費龐大外，加上重建期長，期間學生上課地方難覓，恐會導致大量學生流失。後又考慮先建近富寧街一翼，但卻不能解決期間學生活動空間不足的問題。最後決定分三期進行：第一期（近百年樓翼）：拆去現有廚房及廁所，興建一座六層高校舍。擴建可增加六間課室及兩間特別室。又在三樓及六樓建通道連接百年樓禮堂及天台操場；第二期（近富寧街）：拆去現有教員休息室及廁所，興建一座六層高校舍；第三期：改建現有的校舍正門，成為學生活動場地。同時考慮將操場加建為陰雨操場或室內運動場。首期工程施工需一年多，完成後可善用聖三一堂百年紀念樓低座天台操場作學生活動地方，使小息及上課前的室外活動空間大增一萬餘平方呎。[117] 一九九五年，小學最後落實分兩期重建，重建期間，聖三一堂借出百年紀念樓四至七樓作課室及活動室，百年樓的禮堂及球場亦供同學活動及休憩。[118]

三月三十一日，教區常備委員會通知牧區，有關修改地契的申請已獲接納，至於所需費用則由牧區承擔。[119]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一群家長乘四十四周年校慶，發起賣物會為重建校舍籌款，兩小時內營業額達三萬一千元，扣除成本後，共籌得一萬五千元。[120]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九日，牧區為重建小學校舍，假聖三一堂中學舉行步行籌款。[121] 一九九七年四月，開始拆卸部分舊校舍，六月一日舉行動土禮，十一月奠基，以「傳道授業，繼往開來」為基石題字。[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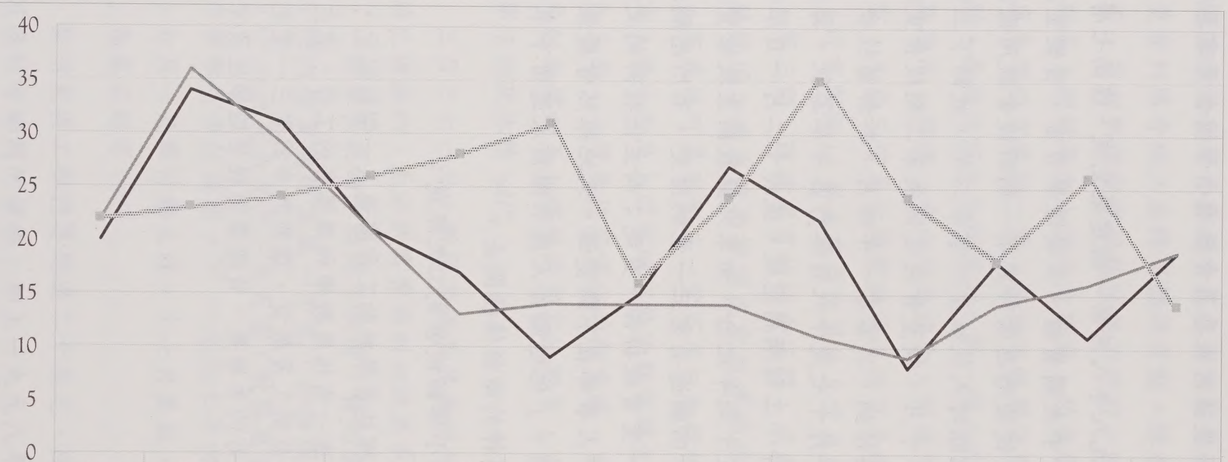
整項重建工程預算超過二千萬元，校舍重建委員會預計，堂內及屬校可動用的儲備，加上一九九八年八月底前可籌得款項，及出售教友捐贈物業收益，應可支付全部費用。惟在一九九七年間出售物業時遇到困難，故牧區議會決定向教區申請低息貸款二

百萬元。[123] 同年十二月，教區財務委員會批准小學校舍重建籌委會貸款的申請。[124]

工程順利進行，一九九八年八月第一期建築完成，樓高七層，設有十八個課室、廚房、中央圖書館、多媒體學習室、音樂室及輔導室等。十二月二十日校慶感恩崇拜與第一期新校舍啟用禮同時舉行。由於屋宇署批准臨時入伙紙至二零零二年，故餘下工程須儘快開始。二零零零年十月，校董會決定開展第二期校舍重建工程，並得牧區議會通過接納。二零零一年四月，拆卸舊校舍，五月致函家長募捐，十一月十七及十八日舉行嘉年華籌款，籌得二十萬元。[125] 二零零二年，工程順利完成，並於十二月一日舉行校舍奉獻禮，適逢創校五十周年紀念，由東九龍教區主教徐贊生主禮。徐主教在證道時，回顧過去聖三一堂的歷史，有所感觸地說：「在這些年頭，聖三一堂曾經拆卸、重建；而主任牧師的更替變換、教友間的聚散等，人事都在不斷變遷。天地雖然會廢棄，神的話語卻是永遠不變的。」他勉勵各人應承繼前人遺留下來信心的見證，繼往開來，將神的話語傳揚開去。[126]

高俊鎮校長在聖三一小學新校舍完工之際說：

> 小學重建工程完成，標誌着學校的工作將進入一個新紀元。我們將以全新的面貌，進一步拓展教學和傳福音的工作。求主賜我們信心，奮興每一位同工及教友，讓我們步武聖三一堂先賢的腳蹤，在學校這美好的禾場裏，負起廣傳福音給學生及家長的使命。[127]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成人洗禮	20	34	31	21	17	9	15	27	22	8	18	11	19
孩童洗禮	22	36	29	21	13	14	14	14	11	9	14	16	19
堅信禮	22	23	24	26	28	31	16	24	35	24	18	26	14

表二：聖三一堂洗禮及堅信禮人數（1985–1997）

小結

聖三一堂經過八十年代的「建設」後，從九十年代開始，即在宣教及培育兩方面為牧區重新定位。那麼，我們該如何評檢聖三一堂在期間的發展？從統計數字能否看出端倪？左頁表二整理了聖三一堂從一九八五至九七年間的領洗及堅信人數，明顯地看見一九八六至八九及九零年間，領洗人數呈現下降的情況。這時期正值全堂上下全力籌建百周年紀念白普理大樓，領洗人數下降未嘗不反映出各事工的消長：以建樓為焦點，相對忽視了宣教工作的結果。

事實上，整個八十年代，聖三一堂均全力投入白普理中心及百年大樓的建設項目，教會內部對投入大量資源出現不同意見及爭論。陳衍昌牧師如此形容當時的情況：

> 本堂於一九八四年建成白普理中心，一九九零年建成百周年紀念樓，由籌建到善後歷時十年，堂內爭議不絕。
>
> 支持和反對的教友各持己見，待至兩項工程完成之時，堂內兄姊在信仰的熱誠竟然大受影響，越來越少願意事奉委身的兄姊。「屬靈」派不屑參與教會活動，「活動」派對培靈聚會又不感興趣，「中庸」派則左支右絀、努力支撐，直至精疲力竭，油盡燈枯。[128]

可以說，八十年代聖三一堂在「量」方面的停滯，跟這種「精疲力竭，油盡燈枯」以及缺乏方向關係密切。同樣，出席崇拜人數在一九八五至九零年間，也呈現「負增長」的情況。表三整理了一九八五至九七年間出席主日崇拜及領聖餐的平均人數，可見人數從一九八五年的最高峰，逐年下調，其中尤以一九八九及九零年的跌幅最大。進入九十年代，崇拜聚會人數開始緩步上升，但到一九九四年後又出現下降。據統計，聖三一堂的教友自一九八

四至九一年間，移民離港者達二百人，其中不乏資深教友。[129] 換言之，「九七」及「六四」的因素，確實對牧區帶來衝擊。

	主日崇拜（人）	增長率 %	領聖餐（人）	增長率 %
1985	634		269	
1986	585	–7.7	276	+2.6
1987	570	–2.6	271	–1.8
1988				
1989	510	–10.5	251	–7.4
1990	453	–11.2	228	–9.2
1991	435	–3.9	199	–12.7
1992	444	+2.0	226	+13.6
1993	457	+2.9	232	+2.7
1994	420	–8.0	213	–8.2
1995	391	–6.9	189	–11.3
1996	378	–3.3	174	–8.0
1997	366	–3.2	190	+9.2

表三：聖三一堂出席主日崇拜
及領聖餐平均人數（1985–1997）[130]

雖然移民潮導致教友流失，但九十年代開始，牧區藉着五年計劃，重新校正發展方向（宣教及培育），特別是聚焦於校園福音及信徒靈命基礎兩大事工，為牧區日後發展奠下重要根基。有關工作當然不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卻在往後數年，漸次發揮影響。與此同時，牧區在重建聖三一堂小學時，亦十分重視日後的校園福音工作，堂校一體的路線及宣教策略沒有停留在口號及表面層次，而是藉不同的措施，具體地實踐出來。

除學校教育外，一九八九年落成的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亦成為牧區實踐使命的重要途徑。服務中心的獨特之處，在於牧區的參與角色。中心不僅是教區社會福利服務的單位，也是牧區

的組成部分。正如前述，服務中心在青少年服務方面，取得相當成果。但它既為一所具基督教背景、又隸屬牧區管理的服務中心，如何整合信仰與服務，便是值得關注的課題。

中心是社會服務單位，維持專業及優質的服務，是其存在的主要使命與目的。至於其基督教特色，或可從機構使命宣言中按基督精神來服侍、見證基督等信念反映出來。中心的宗旨是「透過社會服務，以具體行動，至誠地貫徹信仰，服務鄰舍、造福人群，彰顯基督的愛心」。[131] 在中心成立之初，牧區領袖對中心的期望是「讓更多人認識主、認識福音」、「中心應有濃厚的宗教氣氛，培養青年人對信仰的興趣」、「期望中心與教會合二為一」、「中心服務應有宗教信仰的基礎，並多與教會辦的中、小學、幼稚園聯繫」。[132]

那麼，究竟牧區領袖的期望能否實現？基本上，牧區與中心除在組織管理上有聯繫及溝通外，雙方亦合作舉辦活動，例如中心曾與聖三一堂中學合辦新移民適應小組、中三及中五就業輔導服務。又與聖三一堂小學及幼稚園合辦聖三一家長團契，為學生家庭舉辦親子工作坊、講座及活動。[133] 中心的《年報》，亦有專項提及其與牧區的關係。在早期的《年報》仍可見有關基督信仰精神的表述，例如：

> 中心作為聖三一堂的其中一個服務單位，自然與教會保持密切聯繫。一方面，中心希望在社會服務上，實踐及履行聖三一的基督信仰精神；另一方面亦希望透過活動，讓社區人士更多機會認識及接觸教會。[134]

但後來，涉及宗教的內容有明顯淡化的趨勢：「透過服務，中心將基督開放容納的心懷在社區上實踐出來，建造一個溫情的空間，讓青少年在基督精神的眷顧下反省及成長」；[135]「中心透過服務，亦將聖三一堂牧區之開放容納精神在社區上體現出來，以中心作為一個場所，協助青年人培育出反省人生及關懷世間的基督情

懷」。[136] 一九九五年，中心亦曾與牧區青年部「商討合作事宜及有關與牧區的聯繫工作」。[137] 不過，有關商討似乎沒有具體結果。一九九六年以後的《年報》，更連上述涉及基督精神或情懷的陳述也沒有了，只強調兩者的溝通。[138] 這情況反映出基督教背景的社會服務單位在整合服務與宗教信仰方面的困難。一方面，專業的社會服務單位，其目的與使命就是提供服務，宗教信仰的位置，往往只是一種精神與理念的表達。服務中心能夠主動跟牧區合辦個別活動，已是「合作」的最大可能。

另方面，牧區自然期望可以藉與中心合作來結合宣教牧養與社會服務。不過，這種結合純粹是場地或建築物（硬件）方面的偶然關係，還是真箇在事工上促進兩者的聯繫，特別是牧區內的會友是否也視服務對象為實踐召命的群體，往往成為問題的核心。如果牧區不能把社會關懷意識向信徒傳遞，並且具體地透過相關的服務單位作服侍與實踐，則所謂見證基督、服事社會，或結合宣教牧養與社會服務，便很容易成為泛泛清談的口號或理想。

同時，基督教接受政府（社會福利署）撥款來提供社會服務，在財政上對政府的倚賴，最後導致教會在服務方面無法自主。政府藉着資助機制主導及控制服務模式，所謂政府「伙伴」，只不過是政府服務系統的一部分，在政府已有的資助範圍內開展服務。如果政府不資助某項服務，而機構不能另闢財源，有關服務便無法維持。在這種情況下，探索新服務模式的空間便越來越小。二零零零年，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脫離牧區管理，轉型為「香港聖公會九龍城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便得從這背景來理解。

無論如何，聖三一堂發展到一九九七年，已成為一個兼具宣教牧養、學校教育及社會服務的牧區。經歷八十至九十年代的外在社會變遷及衝擊後，牧區仍須不斷探索如何進一步強化宣教及牧養工作，並結合教育及服務來實踐使命。

注：

1 徐珍妮：《回應九七——基督徒群體的見證》(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1992)，17。

2 陳昕等主編：《香港全記錄》卷二(香港：中華書局，1998)，368。

3 梁家麟：〈「九七應變」——香港教會的社會及神學討論(1982–1997)〉，氏著：《少數派與少數主義——中港教會評論集(二)》(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2)，67–68。

4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編：《合一承擔牧萬民——九十年代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香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1990)，29。

5 Deborah Ann Brown, *Turmoil in Hong Kong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Rule: The Fate of the Territory and Its Anglican Church* (San Francisco: Mellen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s, 1993).

6 〈第三十六屆教區議會，將以教會增長為主題〉，《教聲》399(1982年10月30日)：1。

7 〈福利協會同工進修會重視傳福音與社會服務〉，《教聲》449(1984年10月14日)：1。

8 劉惠靈：〈教區社會福利服務回顧與前瞻〉，《教聲》436(1985年1月20日)：3。

9 〈從教育的失敗談聖公會學校〉，《教聲》497(1985年9月15日)：6。

10 〈教區發展動向〉，《教聲》646(1988年7月24日)：3。

11 〈秉承傳統及配合發展，教區派立分區會吏長〉，《教聲》666(1988年12月11日)：1。

12 〈聖公會牧師教友發表正義聲明〉，《教聲》690(1989年5月28日)：1。

13 〈鄺廣傑主教自上周一起呈辭基本法諮委及草委〉，《教聲》690(1989年5月28日)：1。

14 〈主愛中華禁食祈禱會〉，《教聲》690(1989年5月28日)：1。

15 〈沉痛哀悼〉，《教聲》692(1989年6月11日)：1。

16 〈禮拜堂鳴鐘一分鐘〉，《教聲》692(1989年6月11日)：1。

17 〈鄺主教展望本教區之未來發展〉，《教聲》712(1989年10月29日)：1。

18 〈我們務要傳道〉，《教聲》717(1989年12月3日)：1。

19 〈教會端賴整體教友積極事奉，信徒要主動尋找教會的使命〉，《教聲》732(1990年3月18日)：1。

20 〈九十年代重點工作宣教為主〉，《教聲》745(1990年6月17日)：1。

21 鄺廣傑：〈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教聲》823(1991年12月15日)：1。

22 〈港澳教區有廿六個牧區〉，《教聲》1061(1996年7月7日)：1。

23 〈本堂主任牧師就職禮〉，《聖三一堂周刊》，1985年1月13日，2。

24 〈傳播團契舉辦全堂教友問卷調查〉，《聖三一堂周刊》，1984年7月8日，3。

25 傳播團契：〈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傳播主日)問卷調查報告〉，《聖三一堂周刊》，1985年2月3日，1–2。

26 陳衍昌：〈努力的方向〉，《聖三一堂周刊》，1985年6月9日，1。

27 陳衍昌：〈靈性上的成長〉，《聖三一堂周刊》，1985年1月20日，1。

28 陳衍昌：〈每月牧函〉，《聖三一堂周刊》，1987年1月4日，1。

29 陳衍昌：〈愛主更深(一)〉，《聖三一堂周刊》，1985年12月30日，1。

30 陳衍昌：〈修葺聖殿(一)〉，《聖三一堂周刊》，1986年4月27日，1。

31 陳衍昌：〈「聖袍室」、「閱覽室」、「以法大團契」〉，《聖三一堂周刊》，1986 年 8 月 23 日，1–2。

32 傳道部：〈佈道會〉，《聖三一堂周刊》，1987 年 3 月 29 日，1。

33 陳衍昌：〈每月牧函〉，《聖三一堂周刊》，1987 年 6 月 7 日，1。

34 陳衍昌：〈令人鼓舞的佈道會〉，《聖三一堂周刊》，1987 年 7 月 12 日，1–2。

35 〈牧區消息〉，《聖三一堂周刊》，1987 年 11 月 29 日，3。

36 〈聖三一堂中學信仰周〉，《教聲》622（1988 年 2 月 7 日）：4。

37 傳道部：〈佈道會〉，《聖三一堂周刊》，1989 年 6 月 11 日，1。

38 陳衍昌：〈每月牧函〉，《聖三一堂周刊》，1987 年 6 月 7 日，1。

39 陳衍昌：〈培育——教會增長的心臟〉，《教聲》433（1984 年 6 月 24 日）：2。

40 培育部：〈新園地——星期三晚研經班〉，《聖三一堂周刊》，1987 年 11 月 8 日，1。

41 〈附件一：聖三一堂擴建副堂研究委員會資料〉，〈聖三一堂牧區議會致教區常備委員會〉，1988 年 5 月 11 日，聖三一堂文件。

42 陳衍昌：〈校正信仰的焦點〉，《聖三一堂周刊》，1987 年 7 月 5 日，1。

43 〈附件二：聖三一堂重建副堂籌備委員會資料〉，〈聖三一堂牧區議會致教區常備委員會〉，1988 年 5 月 11 日，聖三一堂文件。

44 〈附件三(a)：聖公會聖三一堂重建副堂計劃〉，〈聖三一堂牧區議會致教區常備委員會〉，1988 年 5 月 11 日，聖三一堂文件。

45 Chan Hin-cheung, "附件三(d1): Holy Trinity Church Centenary Building: Some Brief Information on the Project," 31 March 1988,〈聖三一堂牧區議會致教區常備委員會〉，1988 年 5 月 11 日，聖三一堂文件。

46 同上。

47 郭書謙：〈聖三一堂史略〉，《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33。

48 〈附件三(b)：聖公會聖三一堂重建副堂籌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1988 年 4 月 7 日，〈聖三一堂牧區議會致教區常備委員會〉，1988 年 5 月 11 日，聖三一堂文件。

49 〈附件三(a)：聖公會聖三一堂重建副堂計劃〉，〈附件三(b)：聖公會聖三一堂重建副堂籌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1988 年 4 月 7 日，〈聖三一堂牧區議會致教區常備委員會〉，1988 年 5 月 11 日，聖三一堂文件。

50 〈教區總幹事徐贊生致聖三一堂主任陳衍昌牧師函〉，1988 年 6 月 10，聖三一堂文件。

51 陳衍昌：〈感恩不盡，勇毅俱增〉，《聖三一堂周刊》，1994 年 10 月 16 日，4。

52 〈彭會吏長勉勵教友，應該熱誠奉獻身心物質金錢〉，《教聲》658（1988 年 10 月 16 日）：1。

53 陳王幸然：〈二四運動〉，《聖三一堂周刊》，1989 年 6 月 18 日，1。

54 〈聖三一堂百周年紀念籌建白普理大樓，舉行百萬行盛況〉，《教聲》725（1990 年 1 月 28 日）：4。

55 鄧慶年：〈溫故知新〉，《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46。

56 〈新副堂〉，《聖三一堂周刊》，1989 年 10 月 29 日，3。

57 鄧慶年：〈溫故知新〉，46。

58 〈聖三一堂百年樓平頂禮〉，《教聲》748（1990 年 7 月 8 日）：1。

59 陳宗抗：〈聖三一堂白普理百周年紀念樓〉，《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36–37。

60 〈聖三一堂慶百周年嘉年華會，籌募白普理大樓內部設備費〉，《教聲》788（1991年4月10日）：6。鄧慶年：〈溫故知新〉，49。

61 〈「是的，上主為我們成了大事！」〉，1991年8月25日，聖三一堂文件。

62 陳宗抗：〈聖三一堂白普理百周年紀念樓〉，36。

63 "Helena To, The Architects' Mission to Holy Trinity Bradbury Centre," 20 December 1990，聖三一堂文件。

64 〈陳衍昌牧師致鄺廣傑主教函〉，1990年6月1日，聖三一堂文件。

65 〈聖三一社會服務中心〉，《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90），74。

66 〈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開幕，服務他人就是見證基督精神〉，《教聲》749（1990年7月15日）：6。

67 〈聖三一堂服務中心七月初舉行開幕禮〉，《教聲》745（1990年6月17日）：6；〈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開幕，服務他人就是見證基督精神〉，6。

68 〈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籌備委員會會議記錄〉，1989年3月29日、1989年7月26日，聖三一堂文件。

69 〈聖三一牧區議會主席陳衍昌牧師致聖公會教區福利協會主席莫耀光先生函〉，1990年9月17日，聖三一堂文件。

70 〈聖三一堂主任陳衍昌牧師致教區常備委員會主席鄺廣傑主教函〉，1991年1月7日，聖三一堂文件。

71 鄧慶年：〈溫故知新〉，49–50。

72 〈聖公會聖三一堂牧區議會一九九一年度第五次會議——牧區主任報告〉，1991年，聖三一堂文件。

73 〈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74。

74 李美玲：〈繼往開來——努力見證上帝的愛與關懷〉，《聖公會聖三一堂一百一十周年堂慶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2001），85。劉肇邦：〈我在中心的一些精彩深刻的經歷〉，《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五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1994），27。

75 〈青年社會福利服務政策及方向背景資料〉，青年事務委員會網頁，http://www.coy.gov.hk/chi/report/mee4.htm。

76 陳衍昌：〈調整方向，繼續成長〉，《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五周年紀念特刊》，8。

77 關於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簡介，參香港特別行政區社會福利署網頁，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young/sub_centreserv/id_integrated4/。

78 李美玲：〈繼往開來——努力見證上帝的愛與關懷〉，86。

79 〈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二零零零年度牧區議會及員工一覽表〉，《聖公會聖三一堂一百一十周年堂慶特刊》，114。

80 "Email from Rev. H. C. Chan to Ying Fuk-tsang," 24 February 2010.

81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九龍城青少年中心賽馬會青年幹線暨馬鞍山中心賽馬會青年幹線聯合啟用禮〉，香港聖公會 Online News，2006年7月16日，http://www.anglicancommunion.org/provincialnews/hkskh/client/news/client_news_detail.cfm?naid=873。

82 〈聖三一堂退修會，主教勉勵多作主工〉，《教聲》714（1989年11月12日）：1。

83 陳衍昌：〈危機〉，《聖三一堂周刊》，1989 年 12 月 25 日，2。

84 黎仲芬：〈如何釐訂日後的傳道事工〉，《聖三一堂周刊》，1990 年 7 月 8 日，2。

85 〈聖三一堂舉辦百周年培靈會〉，《教聲》763（1990 年 10 月 21 日）：1。

86 〈聖三一堂百年紀念感恩崇拜〉，《教聲》772（1990 年 12 月 23 日）：1。

87 鄧慶年：〈溫故知新〉，48。

88 陳衍昌：〈宣教的呼聲，行動的時刻〉，《聖三一堂周刊》，1991 年 4 月 7 日，2–3。

89 陳衍昌：〈面對轉變〉，《聖三一堂周刊》，1991 年 10 月 6 日，2。

90 陳衍昌：〈面對轉變〉，2。

91 〈七人小組消息〉，《聖三一堂周刊》，1992 年 9 月 27 日，4。

92 鄧慶年：〈溫故知新〉，49。

93 陳衍昌：〈遵行主命愛父神，兄弟姊妹共相親〉，《聖三一堂周刊》，1992 年 1 月 5 日，2。

94 陳衍昌：〈磨亮的箭〉，《聖三一堂周刊》，1993 年 2 月 7 日，2。

95 〈聖三一堂牧區議員義工人員退修會〉，《教聲》882（1993 年 1 月 31 日）：1。

96 陳衍昌：〈如鷹展翅邁向明天——教友周年大會主任牧師報告及展望〉，《聖三一堂周刊》，1993 年 1 月 3 日，5–6。

97 〈聖三一堂九三音樂會〉，《教聲》927（1993 年 12 月 12 日）：6。

98 〈聖公會聖三一堂〉，《教聲》894（1993 年 4 月 25 日）：5。

99 陳衍昌：〈從「尷尬牧函」想到「教會增長」〉，《聖三一堂周刊》，1993 年 8 月 29 日，3。

100 陳衍昌：〈如鷹展翅邁向明天——教友周年大會主任牧師報告及展望〉，6。

101 〈宣教培育〉，《聖三一堂周刊》，1994 年 3 月 13 日，4。

102 〈信仰與生活小組〉，《聖三一堂周刊》，1994 年 7 月 5 日，6。當時的公佈是暑期暫停，開課時間另行通知。

103 〈鄺主教在聖三一堂主講教會增長與我〉，《教聲》978（1994 年 12 月 4 日）：6。

104 陳衍昌：〈「更新教會、關心社群」願望您也有份！〉，《聖三一堂周刊》，1995 年 1 月 1 日，3。

105 〈我和第一主日有個約會〉，《聖三一堂周刊》，1995 年 12 月 24 日，13。

106 〈尋求聖經啟迪，共享早餐團契〉，《聖三一堂周刊》，1997 年 9 月 7 日，6。

107 〈早餐研經，徵求義工〉，聖三一堂「早餐研經會」資料，1997 年 4 月至 2001 年 11 月。

108 高俊鎮：〈傳道部〉，《聖公會聖三一堂一百一十周年堂慶特刊》，93。

109 高俊鎮：〈又有落在好地裏的，就結實，有一百倍的……。〉，《聖三一堂周刊》，1995 年 10 月 22 日，5。

110 〈人人盡心，廣播福音〉，《聖三一堂周刊》，1996 年 3 月 17 日，7–8。

111 高俊鎮：〈聖三一堂小學——全人教育，廣播福音〉，《聖公會聖三一堂一百一十周年堂慶特刊》，64。

112 高俊鎮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113 陳衍昌：〈一九九七——信心的跳板；一九九八——委身的召命〉，《聖三一堂周刊》，1998 年 1 月 4 日，6。

114 陳衍昌：〈跨越世紀的禱告——信徒皆祭師的落實〉，《聖三一堂周刊》，2000

年 1 月 2 日，6。

115 謝博文：〈金禧校慶感言〉，《聖公會聖三一堂小學五十周年校慶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小學，2003），26。一九七八年，蘇以韜接任聖三一堂中學校長，便就任小學的「義務」校長。他憶述，當時新中學校長的行政及教學工作十分繁重，沒有空餘時間執行小學方面的事務，自覺對小學有很大的虧欠，直至一九八四年校董會委任陳恩帔為小學校長。蘇以韜：〈點滴的回顧〉，《聖公會聖三一堂小學五十周年校慶特刊》，28。

116 〈聖三一堂學校（小學）校舍擴建計劃〉，日期不詳，聖三一堂文件。

117 陳衍昌：〈聖三一堂學校擴建校舍計劃〉，1994 年 3 月 1 日，聖三一堂文件。

118 高俊鎮：〈聖三一堂學校重建計劃〉，《聖三一堂周刊》，1995 年 10 月 29 日，3–4。

119 〈常備委員會義務書記徐贊生致聖三一堂牧區議會主席陳衍昌牧師函〉，1994 年 3 月 31 日，聖三一堂文件。

120 〈聖三一堂小學〉，《聖三一堂周刊》，1994 年 11 月 27 日，8。

121 〈聖三一堂小學重建校舍，下月九日舉辦步行籌款〉，《教聲》1077（1996 年 10 月 27 日）：6。

122 〈創校史略〉，《聖公會聖三一堂小學五十周年校慶特刊》，74–75。

123 〈聖公會聖三一堂主任牧師致聖公會港澳教區主教鄺廣傑主教函〉，1997 年 11 月 11 日，聖三一堂文件。

124 〈教區財政委員會主席盧健明致聖三一堂主任牧師陳衍昌函〉，1997 年 12 月 29 日，聖三一堂文件。

125 〈周年事記（2001 年 6 月至 2002 年 5 月）〉，《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5 月 26 日，7。

126 〈聖三一堂小學校舍奉獻禮，徐贊生主教主禮及講道〉，《教聲》1396（2002 年 12 月 8 日）：3。

127 高俊鎮：〈傳道授業，繼往開來〉，《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10 月 20 日，9。

128 陳衍昌：〈新里程、新希望？〉，《聖三一堂周刊》，1995 年 10 月 1 日，3。

129 陳衍昌：〈面對轉變〉，《聖三一堂周刊》，1991 年 10 月 6 日，3。

130 有關出席主日崇拜及領聖餐人數，主要整理自歷年的《聖三一堂周刊》合訂本。但一九八八年由於周刊合訂本遺失，故從略。一九八九年的增長率，是對比一九八七年得來的。另一九九七年上半年的周刊合訂本亦不存，其平均數乃從六至十二月中得來的。謹此說明。

131 〈中心服務簡介〉，《員工手冊》，1.2，日期不詳，聖三一堂文件。

132 〈教會領袖眼中的中心〉，《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開幕紀念特刊》（香港：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1990），32–33。

133 李美玲：〈繼往開來——努力見證上帝的愛與關懷〉，85。

134 《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一九九零至一九九一年度年報》，7。

135 《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度中心工作報告》，4。。

136 《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度中心工作報告》，8。

137 《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度年報》，5。

138 中心之協調主任及中心主任均有出席牧區議會，而協調主任亦出席行政管理會議，以加強區內各單位的協調。《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度工作報告》，6。



1985年2月2日陳衍昌牧師派立聖三一堂主任就職禮
後與鄺廣傑主教及牧區議員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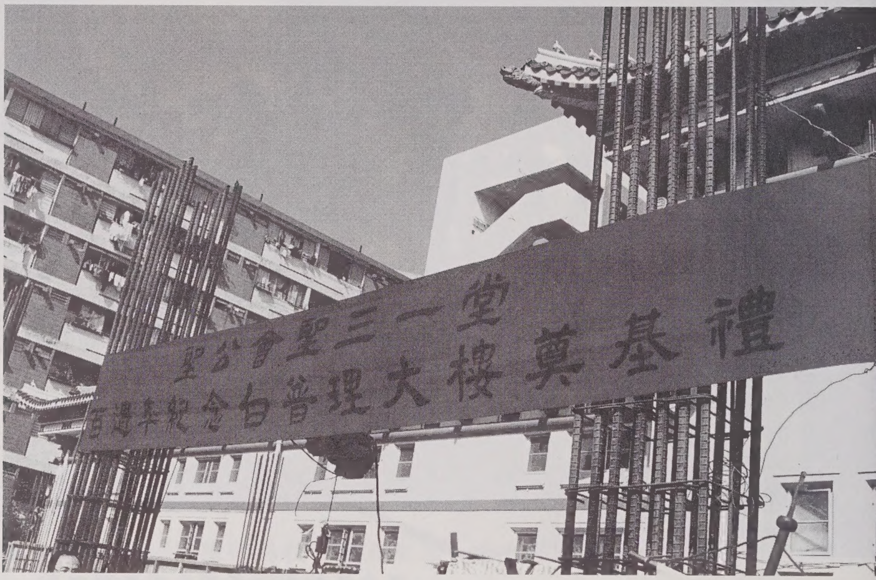
周伯明牧師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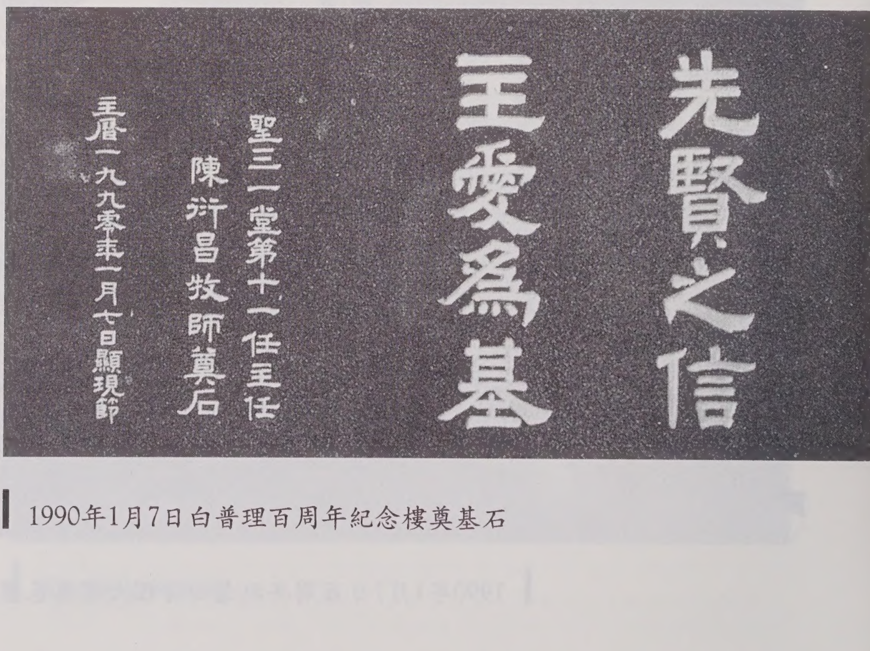
1989年12月26日百萬行籌款開步禮



1990年1月7日百周年紀念白普理大樓奠基禮



1990年1月7日百周年紀念白普理大樓奠基禮



1990年1月7日白普理百周年紀念樓奠基石



1990年12月16日百周年紀念白普理大樓奉獻禮紀念碑



百周年紀念白普理大樓外貌



1990年慶祝百周年堂慶期間的聖堂外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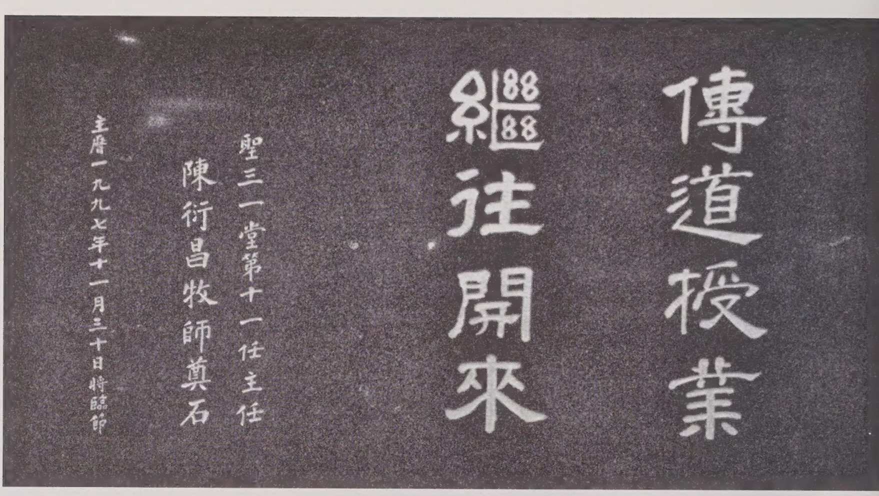
百周年堂慶植樹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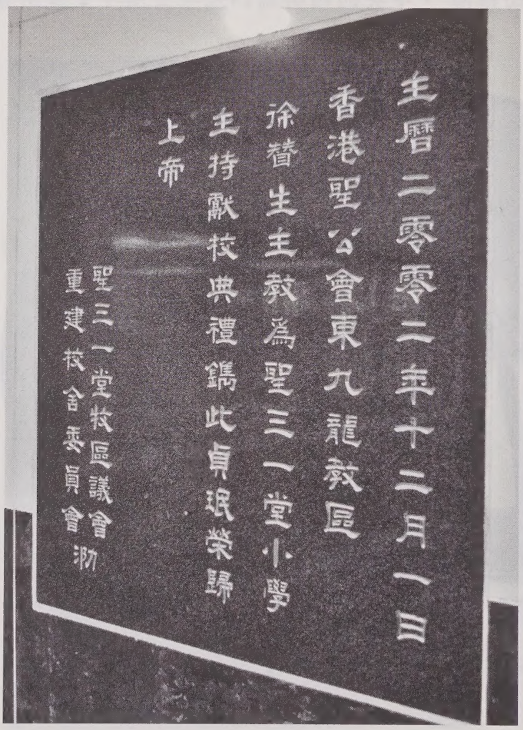
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中央的柏樹為1990年百周年堂慶所種



小學校舍重建動士禮



小學新校舍奠基石



小學新校舍奉獻禮紀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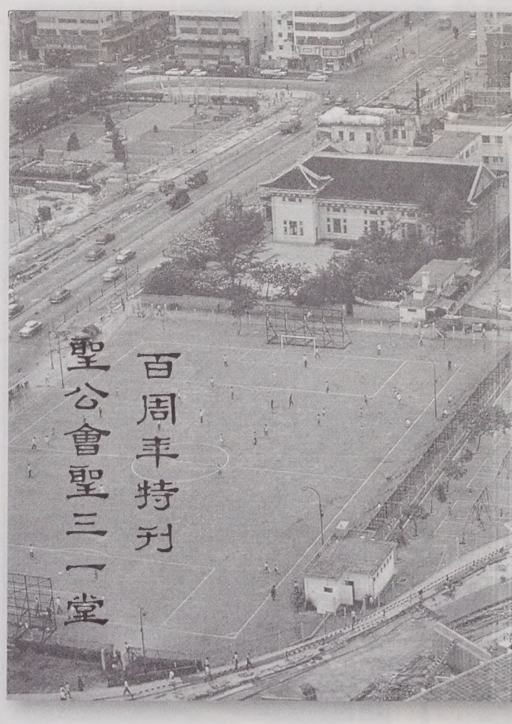
小學禮堂



小學圖書館



徐贊生主教



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1990年）

9

與時俱進，益顯主榮

1998–2009

「九七」後的香港與教會

「九七」後的危機

如果「九七」前香港社會壓倒性的關注是政治問題，那「九七」後面對的嚴峻考驗，毫無疑問來自經濟及社會方面。一九九七年底的亞洲金融風暴，引發香港股市及房地產泡沫爆破。樓價及股市急瀉，造成大量「負資產」人士，加上失業率持續上升，[1] 衍生出各種經濟及社會問題。社會學家呂大樂指出，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開始，香港社會這台「機器」失靈了。香港人在八十年代構想、用來保持現狀的制度安排，差不多百分之一百失效。[2]

經濟持續疲弱、社會矛盾劇化，暴露了特區政府施政失誤及管治無能。加上「沙士」危機及「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問題，五十萬港人終於在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上街遊行，表達對特區政府的不滿。隨後「董〔建華〕落曾〔蔭權〕上」，港人尋求改變的訴求得到中央初步回應。中央政府又推出多項優惠香港的經濟政

策與措施，香港經濟遂逐步回升。但二零零八年的環球金融海嘯，徹底突顯本地經濟的結構問題，貧富懸殊日益嚴峻。與此同時，隨着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香港無可避免地要與華南經濟體系融合，由此觸發香港會否被「邊緣化」的憂慮與討論。

除經濟及社會矛盾外，踏入二十一世紀，香港亦面對如何落實港人治港及民主政治的挑戰。政改的爭論，反映出中央政府與香港「泛民主派」仍缺乏互信。「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仍潛存着張力。

「九七」後，香港教會對於宗教自由與教會空間受威脅的憂慮不再，更大的挑戰反倒來自教會「負增長」的警號。一九九九年，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公佈其普查結果，顯示本港堂會的數目達一千一百二十九間，較一九八九年增加二百六十七間，增幅達百分之三十點六。但整體會眾及平均崇拜人數，較十年前僅有輕微增長。如果把一九九九年與一九九四年的調查比較，各項會眾人口數字更出現下跌，例如九九年出席崇拜人數（175,571 人）較九四年減少百分之九點七。報告提出「教會必須正視信徒流失的現象及反省現今牧養信徒的問題」。[3] 普查運動主席陸輝牧師不諱言，這是「教會失卻發展方向（亦可說教會正在尋找新的方向）的結果」。[4]

聖公會港澳教區在九十年代以後，積極策劃及推動植堂及廣傳福音事工，宣教工作迅速發展。同時，教區亦繼續以教育及社會福利工作來服務社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底，鄺廣傑大主教榮休。二零零七年一月，鄺保羅牧師接任香港島教區第二任主教，其後再當選為香港教省主教長。[5] 總結此階段香港聖公會的工作重點，主要環繞兩方面：其一是籌組成立教省，其二是檢討宣教路線與策略。

從教區到教省

從普世聖公宗的體制而言，教省乃為獨立自治單位。教省須由多個教區組成，各教區按照共認的憲章運作，隸屬同一最高立法機構。一九八九年初，鄺廣傑主教與坎特伯里大主教及普世聖公宗諮詢議會總幹事商議後，提出教區有必要朝教省的方向發展。自一九五一年七月港澳教區成立以來，教區從未隸屬於任何教省，卻由坎特伯里大主教，以全世界聖公會主席之職權，為教區的轄治權人。一九六二年，東南亞各教區組成東南亞教區議會（後稱東亞議會），港澳教區是成員之一。不過，東南亞地區議會的成員菲律賓的數個教區將於一九九零年成立教省，而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地亦預備成立教省，台灣方面亦可透過美國聖公會繼續參與普世聖公宗的活動。東南亞區內新教省陸續成立，進一步突顯港澳教區的「孤立」處境。[6]

面對這種情況，港澳教區可選擇的路向包括：

一、 組織教省；

二、 要求坎特伯里大主教管理教區，但卻有違「九七」後香港回歸中國的方向；

三、 加入其他教省，但因語言、文化、政治、經濟上的差距，有許多不便；

四、 與香港其他宗派合併，有關建議以往曾作嘗試，最後胎死腹中；

五、 參加中國大陸的教會；

六、 自行獨立，不屬於任何組織。

以上各項可能，以成立教省最為合理。[7]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教區議會通過成立小組研究將港澳教區擴展為教省的可行性。[8] 一九九三年，教省委員會公佈報告書初稿，建議教省下轄香港、東九龍及

西九龍三個教區。[9] 有關成立教省的議案，最後於同年十二月的四十一屆教區議會通過。[10] 一九九五年七月，立法局通過〈香港聖公會條例〉、〈香港聖公會基金條例〉及〈香港聖公會管業委員會條例〉，為邁向成立教省跨前一大步。[11] 十月，蘇以葆及徐贊生當選為西九龍及東九龍教區主教。[12] 十一月三十日，教區為兩位新主教舉行祝聖禮。[13]

一九九八年四月，鄺廣傑當選香港聖公會教省大主教。十月二十五日，香港聖公會教省正式成立，新成立的教省提出「宣教服務弘主道，同步邁向新世紀」為口號。[14] 這時，教省共有四十五所禮拜堂（包括牧區 26 個及傳道區 19 個），較一九九六年增加三所。學校教育方面，共有四十八間津貼小學、三十三間中學及四十多間幼稚園，維持一九九六年的數目。至於社會福利工作則趨向多元發展，有超過一百八十個服務單位。[15]

教省在成立後即著手研究推行五年計劃，並於二零零零年初推出指導教省發展的文件：《香港聖公會廿一世紀遠象——五年計劃政策文件》。其中指出教會應傾盡全力，「向港人及澳門市民彰顯上帝的國度，〔運用〕所有資源，傳揚福音，使他們的生命得以轉化，歸向我主」；又強調「教會所辦的教育和社會服務，亦應體現上帝的道，使受服侍的人感受到祂的慈愛，並受到聖靈感動，做基督門徒」。[16]

宣教、教育與服務

二零零二年九月，鄺廣傑大主教在十二屆聖公宗諮詢會議發表演説，談及香港聖公會面對的挑戰。他指出，香港聖公會已建立完整的運作架構，致力推動教會事工。聖公會在宣教以外已發展得很好，特別在教育及社會服務方面，承擔及支援了不少原本屬於政府的工作，但卻出現失衡的傾向。[17] 鄺大主教所指的「失

衡」，主要指教會在宣教工作方面，未能追上教育及社會服務的發展。這亦是九十年代後聖公會強化宣教傳道的原因所在。

對聖公會而言，宣教傳道工作從來不是孤立的事工，而是跟教育及服務工作息息相關的。但「九七」後，由於特區政府的教育改革，以及社會福利資助政策的改變，一次又一次衝擊辦學團體及社會服務單位，基督教會及天主教會這些長期伙伴也不例外。其中，教育改革的爭議最為激烈。有關爭議，亦迫使香港教會反思其在教育及社會服務方面的角色與使命。[18]

針對港府教育改革的步伐及教育規劃的失誤，聖公會教育幹事夏永豪指出，昔日教會與政府在教育工作方面建立的「伙伴」關係，業已受到衝擊。[19] 二零零四年五月，聖公會管業委員會就教育修訂條例發表意見，批評新條例破壞教會這辦學團體與政府的伙伴關係。[20] 二零零六年六月，鄺廣傑大主教於聖公會小學監理會暨校長會周年聚餐致辭時，批評新教育條例，限制辦學團體直接管理學校，凡事必須透過立案法團校董會。換言之，辦學團體「無權管理學校，卻要負法律責任」。他認為，修例後教會最佳的選擇，就是以「宗教團體」身分和學校聯絡或做事，或在學校做彰顯上帝愛心的工作。[21] 二零零七年四月，鄺保羅大主教在聖公會小學一百三十周年中強調：

> 不論學校數目是增或減，都不能失卻聖公會小學的質素——生命的質素。辦學的目標乃是要幫助青少年人在學習、工作、生命中尋找真正的意義，故教學不是為了生存而生存，而是提供屬靈生命的培育。[22]

二零一零年一月，聖公會中學宗教教育研討會上，夏永豪以大主教教育顧問身分發言，指聖公會的學校亦是教會牧養的範圍，學校應有自己的校牧。他又不諱言外界批評聖公會學校予人宗教氣氛平淡的印象，「教會本身亦需負上責任」。「假若學生在校的六、

七年間都沒有人向他提出認識信仰的邀請，就是聖公會學校的全然失敗」。[23]

在社會福利服務方面，教省宣教專責委員會在二零零四年三月舉辦「堂與社服宣教模式研討會」。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系主任阮曾媛博士在會上指出，聖公會在本港社會福利服務方面，角色吃重，擁有二百多個服務單位，一千五百位員工，服務人次達一百萬以上，成為全港三大服務機構之一。但她同時指出，聖公會社服與教會的關係「明顯分割，各自為政」。她希望兩者可以整合，伙伴關係可以加強，好以基督為主帥，以同一異象，全人關懷，接觸生命。[24] 二零零七年，聖公會教省社會服務專責委員會與聖公會福利協會合辦「關懷的教會」計劃，目的是透過牧區或傳道地區推行先導計劃，推動聖公會成為關懷的教會，並推動教友熱心關懷弱勢社群。社會服務專責委員會主席徐贊生主教指出，地方教會必須成為真正的「牧區」，關心其社區和區內的人。教會可以運用自身資源，在政府資助服務未能迅速回應社會急劇轉變的需要時，從事一些「實驗的社會服務工作」。[25]

在教省成立十周年時，鄺保羅大主教強調，在未來的十年或更長的日子，香港聖公會宣教的重點和教友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傳開」，使人得着他們需要的愛與關懷，「叫他們不但能看見目前變幻的事物，更能有遠象，認識和信靠賜永恆食物的主」。[26]

使命十年

五年計劃（2001–2005）

自二零零零年教省推出「五年計劃」後，香港島、東九龍及西九龍三個教區及各牧區紛紛成立小組，商討及跟進五年計劃的落實。二零零一年二月，東九龍教區舉行第二屆教區議會，提出教區五年計劃發展大綱。徐贊生主教在致辭時指出，東九龍教區有數十所學校，這些前人留下的資源，是教區有責任牧養的群

體，亦是宣教的渠道，可以充實教區的福傳工作。[27] 五年計劃特別提出教省、教區、牧區及傳道區的角色，及其與學校和機構的配搭。[28] 後來，徐主教出席東九龍教區暨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假聖三一堂舉行的「為誰而作——社會服務在堂校發展中的角色研討會」時，再次指出「堂、校及社會服務三位合而為一的模式是最佳的宣教模式，可以說是一個夢—— 一個理想」。他進而表示：

> 這一個模式可以在和而不同、求同存異、互相支援及各顯特色情況下，互相合作，互補不足，又各自精彩，三者皆獲成就之下，達至教會的使命——也就是耶穌基督交託的使命。

教省的五年計劃以「天國降臨，教會增長」為目標，而東九龍教區則以培育牧職、群體牧職及宣教工作為重點，期望可實現教省的目標。徐主教期望，東九龍教區的教堂及座落教區的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能對教省計劃作適切回應。[29]

二零零零年四月，聖三一堂牧區議會決定回應教省及東九龍教區的籲請，委任由各部部長和團長組成的部長會、聯同牧區議會代表張裕邦，組成五年計劃專責小組，深入研究聖三一堂在宣教、培育及牧養關顧等方面的教會使命核心工作，並草擬計劃書，向牧區議會報告。從二零零零年四月至零一年二月上旬，專責小組召開四次會議，擬訂初稿，於一百一十周年堂慶感恩崇拜中獻呈後，廣泛諮詢全堂教友。二零零一年一月召開教友大會，收集意見。專責小組綜合各方意見後，於同年二月四日，完成《尋求啟迪·恭行主道·五年計劃》改革文件初稿。文稿經二月十一日牧區議會接納修訂後，正式成為聖三一堂二零零一至零五年的發展政策文件。[30]

五年計劃開宗明義地指出改革的背景：

> 危機已經出現，若未能及時地適當處理，處境必定每下愈況，人力、物力、財力迅速流失，景況堪虞……然而，從信仰和聖經的角度看，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改革和更新的道路已再刻不

容緩。否則，我們的教會將會步外地不少聖公會及其他教會的後塵，終有一天，成為沒有青年人的「老大教會」。[31]

毋庸置疑，聖三一堂迎向未來挑戰的態度是儆醒的，她呼籲會眾「提高警覺、虛心學習、創造空間、突破傳統」，把過往「從上而下」的科層架構模式，轉移到緊密相連，彼此支援的「網絡互聯」形態。同時，五年計劃又列出重點關注的課題：面對世界挑戰、正視社會問題、肩負時代使命、強化宣教、更新教會事工、培育年輕一代的未來接班人。

五年計劃不但有確定方向，也在體制上作相應改革：重整教會組織，減少牧區議員、精簡牧區議會運作、減少牧區議會會議次數。改革的目的，為要更新教會的管理機制，將資源集中在下列十個事工範疇上：敬拜、宣教、培育、教育、牧養關懷、社會關懷、青年、家庭、小組成長，及行政管理。

計劃書提出「群體牧職」原則，希望每一位牧區議員主動加入一個專責委員會，既能跟其他教友建立密切和健康的關係，同心事奉，亦能落實「信徒皆祭司」的理想。

為貫徹上述方向，牧區將逐步成立十個專責委員會：[32]

崇拜禮儀委員會	幫助會眾正確認識崇拜，並透過適切禮儀，把崇拜與生命連結。
宣教事工委員會	推動和發展聖三一牧區內的福音工作，除教友承擔外，更聯同牧區內的聖公會友校、社會服務中心和其他機構同工，共肩福音及宣教使命。
培育委員會	為教友、信徒領袖及慕道者提供高質素的信仰和靈性培育，除主日學外，更包括各種形式的研經班、不同年齡及性質的團契。同時籌組資訊科技團契。
教育委員會	幫助制定合乎基督教信仰精神而又不違反教育原則和條例的教育與辦學政策，在牧區屬校及友校推動基督教教育。
牧養關懷委員會	推動全堂教友回應上主在關懷牧養的愛心工作方面的呼召。

社會關懷委員會	幫助信徒及同工效法基督在世作鹽作光，藉不同行動推動社會改革，建立仁愛、正義與和平的社會。
青年事工委員會	以積極進取精神加強青少年事工，發展現有的宣教及培育工作。
家庭事工委員會	迫切回應夫婦及教育子女的問題。
成長小組事工委員會	探討在聖三一堂開展細胞小組的可行性與價值，了解細胞小組理論的優劣。
教會家事委員會	以聯席會議形式，引進在行政及財務上富有經驗和專長的教友，為各委員會提供「既分且合、合而不同、彼此配搭、相得益彰」的參考。

表一：聖三一堂五年計劃專責委員會

為確保計劃能逐步落實，牧區成立五年計劃導向委員會，按時向牧區議會提交具體方案，首次推出的重點是「關懷之旅」：[33]

個人生命的關懷	靈命培育、小組牧養、家庭關懷
教會肢體的關懷	家事聯繫、禮儀教導、領袖培育、事奉訓練、各部聯繫
社區群體的關懷	透過教育、社會服務、宣教事工建立愛的支援系統和網絡
社會/國家的關懷	關心家事、國事、天下事

表二：關懷之旅

「關懷之旅」旨在開拓信徒的視野，希望他們確立整全靈命，由內而外，推己及人，訂立實踐使命的目標，為日後的改革鋪路。另一個由五年計劃導向委員會提出的理念是「沒有陌生人的教會」，目的是鼓勵會友以好客之道接待陌生人，使他們能成為上帝家裏的人。[34]

五年計劃提出的改革構想全面而宏大，但其實並不限（亦不可能）於五年內完成。其中「崇拜禮儀委員會」是五年計劃中較早成立的委員會，一直在背後默默事奉，主要工作是為堂慶、堅信禮、教育主日、聖樂主日、聖誕日崇拜等日子，編撰和印製禮

文，讓參與崇拜的會眾可以投入和融進敬拜與讚美的喜樂之中。[35] 二零零一年，委員會探討如何更新崇拜的禮儀，針對聖公會早晚禱的重點（讀經、唱詩及祈禱）作改革，如讀經採用活讀形式，唱詩則加插《普天頌讚》以外的詩歌，祈禱不單用《公禱書》中的隨時禱文，也多了一些時事代禱事項。[36] 此外，又在二零零三年開辦為期二十四周的「崇拜」課程，內容包括「溫故知新」、「公禱書」、「聖餐禮」及「崇拜」四個單元，希望可以深化會友對崇拜禮儀，特別是聖公宗傳統的認識。[37]

其他如校園福音工作、青年事工、家庭事工及培育事工，先後漸次推行。茲分述如下：

校園福音工作

聖三一牧區內的學校眾多，除直屬聖三一堂的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外，尚包括協恩中學、附屬小學及幼稚園，以及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陳衍昌牧師指出：「校園工作的加強已是急不容緩的事」。[38] 從上文可見，牧區在八十年代已確定屬校福音工作的策略，並作多方探索。職是之故，校園福音工作成為五年計劃的重中之重。陳牧師指出，教會學校的目的必須與教會的使命結合，並發展有價值的生命教育。基督教教育工作者須重視以下使命：「廣傳福音、培育靈性、建立生命，獻身於上帝的正義和平，彰顯祂的國度、權柄和榮耀」。在當前政府的教育條例及津助制度下，加上「唯知主義」及「成績至上」的不良影響，教會要實踐上述使命，「惟一的出路就是自行提供資源，聘請同工。否則，我們實在難以有效強化校園福音工作，完成基督教生命教育和上帝使命的終極目標」。[39] 二零零零年起，牧區便增聘青年福音幹事，推動屬校中學的學生福音工作。[40] 又設有宗教主任，專責曾肇添幼稚園的事工。

五年計劃開展不久，陳衍昌牧師與屬校校長及聖公會福利協會同工，更研究訂定計劃，逐漸開放堂內更多地方，發展家長及親子教育，在工餘時間讓家長和他們的子女使用。計劃的目的是希望讓由上帝和基督信仰而來的愛，更活潑地在九龍城社區流轉，為鄰舍帶來生命的意義和盼望。[41]

二零零二年七月，牧區議會商討在重建小學第二期工程完成後重整校園福音工作，接納行政諮詢委員會強化校園福音事工的建議，增聘一位學校福音事工幹事，聯同現有的一位同工，在協恩中學、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及聖三一堂中學推動宣教、牧養及培育事工。[42] 同時，曾肇添幼稚園又聘請堂校福音幹事，專責幼稚園的家長工作。[43] 二零零五年九月，聖三一堂又增聘三位傳道及福音幹事，分別負責聖三一中心幼稚園、聖三一堂小學及曾肇添幼稚園的校園福音事工。[44]

五年計劃中構想的教育委員會，旨在全面跟進校園福音事工。為此，陳衍昌牧師呼籲有心志的信徒參加校園福音工作。[45] 二零零二年九月開始，他接任協恩學校校監，加強了聖三一堂與協恩中、小學及幼稚園的關係。[46]

中學生事工方面，二零零二年三月二日，牧區特為聖三一堂中學生設立英語團契（EIF），逢星期六下午二時半至四時聚會。[47] 一年下來，團契面對導師不足及團友出席不穩定的問題。[48] 英語團契原在聖三一堂中學活動，旨在打破學校老師與同工根深柢固的錯誤觀念，以為在傳統的團契形式以外，學生福音工作便難以開展。經過多年努力後，該團契的早期成員經已融入聖三一堂的母體，並且領洗加入教會。而團契亦已在青少年部改組時併入其他團契。[49]

聖三一堂又計劃為牧區內中學的中四至中七學生開辦學生團契，團契的特色是結合學科、人生智慧和基督教信仰，更邀請牧師和各校校長主講：「英文」（協恩中學劉李國建校長）、「科學」（銀禧中學郭始基校長）、「中國文化」（聖三一堂中學胡文明校長）、「聖

詩、聖經與翻譯」(聖三一堂陳衍昌牧師)。[50]

牧區致力加強屬校的佈道事工。二零零三年一月十六及十七日，協恩中學舉行佈道會，在聖三一堂招募信徒任陪談員，負起「群體牧職」的牧養責任。[51] 二零零六年二至三月，聖三一堂牧區三所屬校（何明華會督紀念中學、協恩中學及聖三一堂中學）先後舉辦佈道會，合共有二百二十名同學決志信主及回轉。三月十八日，三校在聖三一堂舉行重聚日「愛@主的家」，讓決志同學認識教會，建立穩固的教會生活，塑造新的屬靈生命。[52]

除佈道會外，牧區又為中五畢業同學舉辦福音營。二零零三年七月，在東九龍「教區身心健康運動」協助下，聖三一堂與聖巴拿巴堂合辦題為「新人類歷險樂繽 Fun」的聯校中五畢業營，有來自協恩中學、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聖三一堂中學及梁季彜中學共七十九名中五畢業生參加。[53]

二零零五年，聖三一堂在二零零三年畢業營的基礎上，再獲教區的支援，為牧區內三間屬校（聖三一堂中學、協恩中學及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的中五畢業生主辦福音營，主題是「3G 新體驗」。這次福音營的特色，是邀請聖公會九龍城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前身即為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參前文）社工協助。青少年中心在會考工作上已建立良好品牌，在策劃青少年大型活動方面亦有相當經驗，大大補足了堂、校的不足。而教區及牧區的參與，又彌補了青少年中心的不足，充分體現堂、校、教區及社會服務中心合作模式的好處。值得留意的是，為使營會主題更清晰，大會突顯了「福音營」的字眼，聖三一堂亦招募教友任義工。[54] 是次福音營，共有七十多位同學參加，除在三所中學任教的五位聖三一堂會友外，亦得到不少其他信徒協助。結果，有十二位同學決志。聖三一堂在營會後一連七個星期六下午為這批決志者安排信仰初探課程，以鞏固其信仰根基。[55] 後來，青年中心與約書亞團又舉辦歷奇訓練營，多位曾參加 3G 營的同學亦有參與。[56]

二零零六至一零年，聖三一堂與牧區中學繼續聯合舉辦中五

畢業生營會，主題分別是：「碌 Look 捉捉」(2006)、「友營有品」(2007)、「建構」(2008)、「型營役翼」(2009)、「謎．籮．明陣」(2010)。二零零七年的畢業生福音營，有四位學生決志信主，另多位願意追尋信仰。[57] 二零零九年福音營，更有參加過去數屆夏令會的同學擔任組長及總務，體現了「薪火相傳」的精神。[58]

三一牧區又為屬校策劃「福音月」。例如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至二十一日，聖三一堂中學舉辦「福音月」，主題是「1:99」。[59] 二零零八年一月四至十八日，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主辦題為「活着有祢多好」的福音月。[60]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聖三一堂中學以「你有幾多個十年」作福音月主題。[61] 福音月期間推出多項宗教活動，讓學生藉不同機會認識信仰。

校園福音工作的另一重點是學生家長。牧區與校方合作舉辦講座，希望可以接觸更多家長。二零零七年開始，由於有屬校的幼稚園老師及校長在聖三一堂任教主日學，事工更具專業水平，吸引了很多家長帶同子女參加主日學，主日學學生人數激增，早午堂共約八十人，同時又為家長開設家長班。內容方面，初階家長班先從家長重視的「子女教育」入手，再加入「培養美滿夫妻關係」主題，最後是「追求豐盛人生」。每個主題均導入信仰元素。可以說，各方都一同為「堂校一體化」及「優質基督教家長教育」努力。[62] 例如，在二零零八年十月其中兩次主日學家長班的主題是：「家有暴躁兒怎麼辦？」及「勤有功，戲亦有益？」(早堂由高俊鎮校長、謝麗華校長，午堂由謝麗華校長、陳笑蓮老師、江映珠姊妹負責)[63] 二零零九年，家長班更針對夫妻關係問題，開辦「建立幸福家庭之婚姻系列」主題講座。[64]

二零零九年，聖三一堂小學、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及聖三一中心幼稚園．幼兒園，獲聖公會東九龍教區教育及培育基金資助，推行「三一愛．成長樂」家長計劃，期望每個家庭在三位一體上帝的愛和恩典中，學習真理，在個人、子女、家庭及靈命這四個範疇均得以成長。教會和學校把原有的家長班、家長團契及

家長講座統一名為「三一家長學堂」，在堂校和家庭中凝聚一股互相支持的力量，在育兒路上尋找同路人。

牧區在兒童主日學時間舉辦家長班，凝聚家長，推行優質家庭教育。聖三一堂小學及兩所屬校幼稚園每周二舉行「家長學堂」聚會，藉着不同的主題，讓家長深入分享教養兒女的心得，彼此鼓勵。又每月定期舉行合團，邀請不同的講者主領聚會。學校會不定期於周五晚上或周六下午舉行講座，讓家長有更多途徑學習基督教家庭教育。因着校長、主任和福音幹事的參與，「家長學堂」可以凝聚來自不同學校的家長，加強他們對聖三一堂的歸屬感。[65]

另一個與校園福音有關的事工是聖三一兒童合唱團。合唱團早於一九九九年成立，目的是加強「福音外展工作」。合唱團的意念，源自一九九八年詩班與各校歌詠團合作錄製的《三一頌》第二輯。其中兩位聖三一堂中學的歌詠團學生成員先後接受洗禮及堅信禮，啟發了以合唱團作福音事工的構想。合唱團亦可配合小學新校舍，開拓新的傳福音途徑。[66]

合唱團的宗旨，是藉音樂引導兒童認識基督教信仰，建立美好人生。同時也藉音樂演出向外界傳福音，藉音樂聚會向家長傳福音。職是之故，合唱團由傳道部與聖樂部支援及監管，確保團務發展不會「脫離正道」。[67] 合唱團於一九九九年七月開始逢星期六下午練詩。十月的牧區議會確認成立管理委員會，並正式對外招募。[68] 十二月十八日舉行成立典禮，由徐贊生主教主禮。成立初期，共有六十多名團員、四位導師及多名義工。[69] 二零零三年，舉行第一次「樂韻悠揚音樂會」，反應甚佳，管理委員會決定每年舉行。到二零零五年，團員人數已增至一百五十多人。[70] 至二零一零年，團員仍維持有一百五十人，其中不乏來自東九龍教區，甚或來自聖三一牧區的幼稚園和小學，如聖三一中心幼稚園、聖三一幼兒中心、曾肇添幼稚園、協恩幼稚園、聖三一堂小學及協恩中學附屬小學等。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三日，舉行十周年音樂會，成績美滿。[71]

合唱團義務執行幹事由陳衍昌師母擔任。隨着團務發展，二零零五年起增聘半職音樂行政主任。[72] 二零零九年七月，陳師母退休，遂新聘兩位同工出任執行幹事及音樂顧問之職，使分工更清晰，團務有更穩定的發展。[73]

青年事工

與學生工作緊密相連的是青年工作。

二零零四年一月，牧區成立青年事工委員會，由青年部部長、青年部各團契團長和導師組成，[74] 並在主日崇拜，特別舉行差遣禮。[75] 青年事工委員會計劃成立高中學生團契，[76] 經呼籲後，有四位信徒願意擔任導師，於是在牧區三所中學招募中四以上同學參加。首次團契在二月二十一日舉行，初時稱「高中學生團契」，後來由團友及導師以不記名方式投票，選出「約書亞團」的團名，別名 Fellowsheep，逢周六下午聚會。[77] 至此，聖三一堂共有五個學生團契：提多團（小學學生）、路加團（初中學生）、EIF 團（屬校中學生）、約書亞團（高中學生）及馬可團（中七學生）。

四月，委員會推動青年人參與閱讀屬靈書籍獎勵計劃「靈食蜜語」。[78] 二零零四年閱讀的書籍為：《標竿人生》、《屬靈生命的素質》，二零零五年是《飛躍心靈——禱告的動力與更新》、《聖經中的領導者》。通過屬靈書籍閱讀分享，信徒更重視禱告對建立個人及教會生命的重要作用，決定在聖三一堂推動禱告生活，乃於二零零五年八月成立禱告生活推動小組。九月先在個別團部聚會中分享小組的異象和計劃，十月及十二月通過全堂禱告主題，鼓勵會眾實踐禱告生活。[79]

二零零五年一月，籃球事工開始，[80] 聖三一堂籃球隊正式成立，目的是聯合一群有志於籃球事工的青年人，通過籃球活動引領更多年青人認識信仰。參與球隊者大部分來自約書亞團、提摩太團、安德烈團和詩班，由呂利武會吏任隊牧。[81]

家庭事工

家庭事工委員會是二零零四年另一個新設的委員會，由陳衍昌牧師任團牧，成立的使命是「建立基督化家庭，使上帝的愛能在家庭裏展現」。家庭聚會首次在十一月舉行，逢每月第二個星期六晚上聚會，期望以輕鬆和互動方式進行，「以家庭影響家庭，以家庭服侍家庭」。由高俊鎮校長借出宿舍作聚會地點。[82]

家庭聚會的牧養模式，其實早在一九九六年間便嘗試，當時陳牧師有見教會中年輕伉儷明顯增加，為加強有關教友及慕道朋友的牧養，便在黃埔區發起家庭聚會，假當時伉儷團長陳筱玲姊妹家中進行。[83] 黃埔家聚後來便改組為挪亞團。[84]

二零零六年，家庭事工委員會展開以家庭為重心的栽培，通過閱讀《擁抱耶穌的心》來建立家庭團契，隔周五晚上聚會。[85]

二零零七年，委員會的重點是「家庭團契」，旨在建立「以家為本、以主為基、以愛為證的團契」，按弟兄姊妹居住區域組成或自由組合。聚會內容包括敬拜讚美、夫妻相處、教養子女、代禱代求、靈修查經、事奉服務、人際處世、教養子女等。[86] 經過籌備後，首年成立了五個家庭團契：哈拿團、以色列團、雅比斯團、亞伯拉罕團 [87] 及約瑟團。[88] 二零零八年，又有拿俄米團、挪亞團、迦勒團、[89] 但以理團、[90] 所羅門團。[91] 二零零九年，再新增撒母耳團。[92] 自二零零七年以來，合共成立十一個家庭團契。

培育事工

二零零五年九月，培育部推出成人主日學課程，期望有系統地培育成年信徒的靈命。課程以聖經書卷為中心，第一期研讀腓立比書，主題是「做個喜樂的信徒」。[93] 第二期於同年十一月開始，主題是「同作得勝的信徒」，研讀以弗所書。[94]

二零零七年十月開始，培育部舉行為期一年的「全情起動讀聖經，港澳信徒讀經運動」。[95] 二零零八年開始，培育部推出「三一信徒神學課程」，以三年為一個單元。[96] 陳衍昌牧師指出，整個課程的設計，除了認識神和活像基督外，更希望超越學術研究，讓信徒的生命得改變。開課前，已有六十位「學神」報名。[97]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徐贊生主教建議在聖三一堂成為座堂（參下文）後，可以開放三一神學課程，讓教區其他堂會的會友參加。[98]

二零零八年，培育部與家庭事工委員會合辦新教友重聚分享會，對象為近年接受洗禮的信徒及其教父、教母。[99]

培育工作的另一重點是「聖樂藝術培訓基金」。基金於二零零六年由聖樂部設立，籌款七十萬元。目標包括：一、有系統地栽培人才，提升聖樂水平，讓聖三一堂的崇拜更趨優美；二、更換電子風琴。[100] 二零零七年一月，聖樂藝術培訓基金籌款音樂會假尖沙咀文化中心舉行。至二零零七年初，基金已籌得七十萬元。[101] 最後，整個募捐運動共籌得捐款一百零二萬餘元，音樂會門票收入七萬九千元，扣除音樂會開支，餘下九十九萬三千元。購買新風琴後，餘款約五十萬八千元撥入「聖三一堂李仲堅醫生聖樂藝術培訓基金」，並成立臨時工作小組（後改組為管理委員會），商討培訓基金的運用。[102]

二零零九年，在基金的資助下，聖三一堂聯誼部開辦「敬拜樂隊樂器培訓班」，旨在培訓樂手，為座堂成立敬拜樂隊之用。同時，基金又資助聯誼部主辦、九龍城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賽馬會青年幹線協辦的「小提琴培訓小組（初級）」。[103]

為幫助信徒檢視自己生命，培育部在二零零八年推出「信徒成長歷程檔」，收集各人出席各項教會活動的記錄，並於六月及十二月分發中期及年終報告。藉有關檔案，信徒既可回顧感恩，亦可許願立「約」。[104]

社會關懷

社會關懷是五年計劃的另一個關注點。因應回歸後香港在經濟及社會方面出現種種問題，牧區決定按五年計劃，籌組社會關懷委員會，不僅鼓勵信徒關心社會，更期望以實際行動回應。

二零零二年三月，培育部與籌組中的社會關懷委員會主辦「自家人的異鄉客」座談會，邀請爭取居港權的朋友，和關注有關課題的講者分享，希望幫助會友從信仰及福音的角度認識和關懷這一群。[105]

牧區亦積極關注香港經濟轉型下的貧富懸殊現象，以及所衍生的各種社會問題。二零零二年，委員會以「助失業者解困，有賴你施援手」為題，希望通過聖三一堂在社區的關係網，特別是學校老師與家長的層面，配合教友的專長，凝聚各方力量，培育義工，強化各類社區及家庭支援服務，幫助區內失業者和有需要家庭，早日擺脫困境，重拾自信。[106]

未幾，政府因應香港失業率攀升及申領失業綜援數字創新高的情況，提出「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有見及此，社會關懷委員會呼籲教友積極回應。基金的構想是充分利用「社會資本」，結合社會上各種制度及個人才能，團結各界，推動社會發展。社會關懷委員會的代表指出：

> 本堂教友中，既有大批在不同領域擁有專業資格和經驗豐富的成年，也有幹勁滔天的青年，更有熱誠奉獻的婦女，正屬一個典型的服務社群組合，如能凝聚力量，相信不假外求，已能為我們所屬的社區——九龍中及南區，發揮無比的「社會資本」力量，從而建立一個體諒關懷和團結共融的社區。我們計劃向基金申請資助，就是要藉此機會，把積藏既久的信徒愛心與事奉精神，投向社區內數以萬計飽受生活煎熬的「弱勢」和「邊緣」社群，協助他們提升自助能力，甚至把這種義工服務精〔神〕

> 繼續向其所屬社區推廣出去，以示基督的教會沒有遺忘了他們。……每當唸到「願父的國降臨，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之時，我們就不能只「願」而沒有「行」。莫再猶疑，我們期待你們今天的行動，以示向上帝作出堅實的承諾。[107]

不過，基金構想最後並沒有落實，相信與有關行動實踐涉及龐大的資源有關。雖然無法實踐上述計劃，牧區仍致力喚醒青少年人關懷社會。二零零二年七月，聖三一堂與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合辦「願你的國降臨」關社課程，對象是堂內十八至二十五歲的青年人。[108]

社會關懷的另一個焦點是整合現有的社會服務。雖然聖公會九龍城青少年綜合中心不再隸屬聖三一堂，但牧區仍積極尋找相互合作機會。例如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便在東九龍教區教育及培育發展基金資助下，合辦「家．愛——品格培育計劃」，合作伙伴包括：聖三一堂小學、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聖三一中心幼稚園及幼兒園、聖三一兒童合唱團、協恩中學附屬小學及幼稚園。計劃為期七個月，目的是通過品格培育，提倡「鼓勵、表揚、讚美」的文化，建立家庭、學校、社區、人與人之間的關愛文化。計劃以基督教精神（屬靈果子氣質）為核心，建構品格教育。[109]

五年牧民計劃（2006–2010）

五年計劃完成之際，牧區馬上檢討已有工作，並制訂另一個五年計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一百一十五周年堂慶感恩崇拜裏，徐贊生主教為牧民計劃啟動奉獻。[110] 奉獻禱文提及：

> 在聖三一堂慶祝創立一百一十五周年的慶典中，感恩之餘，我們更立志，效法祢的愛子耶穌基督的聖範，更新牧養模式，回應社會及時代的需要，在信、望、愛中，榮耀祢的聖名。[111]

五年牧民計劃指出，按二零零一年的五年計劃設立的十個專責委員會，順利更新改進的主要有崇拜禮儀委員會、青年事工委員會及家庭事工委員會。而宣教事工委員會及培育事工委員會，則因原來的部委工作能繼續發展而得到美好成果，故不用重組。

至於成長小組、牧養關懷、社會關懷、教育及教會家事委員會，則考慮到與其「揠苗助長地勉強於限期內成立」，倒不如「懇切祈求上主帶領，按照自己的旨意和時間完成，讓祂得着應有的榮耀」。[112]

展望未來五年，陳衍昌牧師提出應盡量投放資源、人力和時間，在「基本信仰培育和領袖訓練」兩個層次上，培育優質信徒和訓練門徒，並以成立「牧民中心」作為重點。[113] 第二個五年計劃提出「牧民」的理念，其實，早於二零零二年，陳衍昌牧師已醞釀提出「牧養中心」(Pastoral Centre) 的異象，希望藉此服侍牧區的學生和家長，以至區內居民。[114] 二零零四年，正式籌備牧民計劃，由鄧翊匡任召集人。五年牧民計劃明確指出：

> 在不斷更新的社會狀況下，社會上大多數人士，不論年紀，都不容易或不願意，進入教會接受照顧和服侍。在這情況下，成立牧民中心將是適切行動，可以幫助教會在現代社會中，延續主耶穌基督的牧民理想，完成上帝託付的使命。

陳牧師指出，「當一切條件成熟，我們應當務實地訂定計劃、彙集資源、匯聚人材成立牧民中心」[115] 不過，第二個五年計劃，基本上仍是順着上一個五年計劃的方向，特別在宣教及教導方面，拓展已有的成果。

二零零七年，徐贊生主教確定以聖三一堂作為東九龍教區的主教座堂，從此，籌組座堂的工作成為牧區的主要關注。牧民計劃的推展及牧民中心的籌設，因而與座堂的新使命融合協調。

從牧區到座堂

東九龍教區主教座堂

一九九八年，香港聖公會成立教省，下轄香港島、東九龍及西九龍教區。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日，聖公會東九龍教區成立暨首任主教授職禮假聖三一堂舉行，由鄺廣傑主教主禮，並把東九龍教區管轄權交予徐贊生主教。[116] 十月十二及十三日，東九龍教區第一屆教區議會，在東九龍教區辦事處禮堂舉行。[117]

東九龍教區成立初期，由於「步伐急速，未便考慮設立座堂」，但從歷史角度而言，教區沒有座堂在體制上是十分罕見的。二零零七年，在教區常備委員會中，徐贊生主教分享設立座堂的意義。委員一致認為聖三一堂在規模、歷史、傳統及空間方面均具備座堂的條件，而教區主教亦在此祝聖，教區重要活動也在聖三一堂舉行，故選定聖三一堂為東九龍教區座堂。二零零七年八月三日，教區設立的「座堂」工作小組召開首次會議，初步選定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教區成立十周年感恩聖餐崇拜中舉行主教入座禮（enthronement）、座堂主任就任禮、聖品及法政團就任禮及祝聖聖三一座堂禮。[118] 隨後在九月十三日的小組會議上，把成立座堂的日期改至二零一零年底前。[119] 小組又正名為「籌設『座堂』委員會」，由陳衍昌牧師任主席，並設憲章與體制、培育及資訊、建築與事務、崇拜禮儀四個小組。十一月六日，委員會正式議決，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聖三一主日舉行座堂奉獻暨聖三一堂開基一百二十周年感恩崇拜。[12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八日，陳衍昌牧師在教區第五屆議會第四次會議上，建議按「主教領導」及「議會管治」傳統，先由主教在其管治教區內通知某牧區將改為主教座堂的意願，待有關牧區同意，並獲教區常備委員會支持後，主教可向全教區宣布。然後，由常備委員會向教區議會提出提案，待提案獲通過後，主教聯同

常備委員會委派規章委員會處理有關規章事宜。[121] 按有關程序，十一月十三及十四日，成立座堂一事正式在東九龍教區第六屆教區議會第一次會議上討論。徐贊生主教指出，設立座堂有助教會承擔更大的福音使命，以回應上主的呼召。他強調座堂首要重視的是「軟件」而非「硬件」，希望在籌組過程中能喚起弟兄姊妹承擔座堂的功能和未來發展，「讓座堂成為教區的一股力量、一個象徵」，在傳道與發展上起更大的作用。最後，會議通過全力支持徐主教在聖三一堂設立東九龍教區座堂。[122] 十一月二十三日，徐主教正式致函聖三一堂牧區議會，表示東九龍教區設立座堂時機業已成熟，考慮到聖三一堂「乃本教區內最早成立的牧區，在宣教、培育、牧養、社會關懷各方面的工作，皆有卓越的表現」，故決定指定聖三一堂為「準座堂區」，並計劃於籌設程序完成後，公佈聖三一堂為東九龍教區座堂。[123] 十二月九日，牧區議會經深入討論後，全體議員一致接納主教建議，樂意承擔座堂的使命。[124]

按憲章與體制組的建議，是先立「準座堂」(pro-cathedral)，以作準備。[125] 後來，徐主教認為直接宣布成立座堂的方案更合宜，遂確定由常備委員會發出通告，宣布主教指定聖三一堂成為主教座堂，並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聖三一主日舉行奉獻禮。[126]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東九龍教區召開第六屆第三次會議，徐贊生主教在會上宣布：

> 藉上帝聖恩，奉上主之名，我等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主教徐贊生按上主所授神聖之職分，現謹此當眾公開宣告，座落香港九龍城之聖三一堂，於今天主曆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成為東九龍教區之主教座堂；主教座堂之名稱定為「聖三一座堂」(Holy Trinity Cathedral)。[127]

上行之旅

為迎接從牧區到座堂的轉變，聖三一堂需要在三方面作準備。首先，是改動聖堂，使其符合座堂規格。整個改動的意念，旨在加強「三一」意識：[128]

一、 三一主殿：位於原來聖壇的聖所高牆，滿佈雲紋暗花，表徵上主聖父從創造到供應與眷祐的大能；牆上的巨大十架表明聖父甘願讓獨生子道成肉身的犧牲大愛；聖殿中央會眾座位部分的八根柱子（信德之柱）和聖所兩側懸掛的全堂主題，提醒會眾，聖靈時刻的引領和教導。

二、 慕主小堂（Apagé Chapel）：提醒會眾聖子基督的犧牲；通往堂前的聖堂內壁置有「苦路十四站」，幫助信眾思念基督和學習基督的仁愛、信德和寬恕。

三、 景華小堂（Chapel of the Great Commission）：提醒會眾聖靈的工作，於唐代差遣先賢景淨首次來華傳福音，今天也要回應廣傳福音的呼召；堂內又有教區內各教堂堂徽。

改動工程主要包括：一、聖所向前伸展一點八米，會眾座位亦同時後移一點八米；二、設立主教座位及座堂主任牧師座位；三、拆除聖所兩旁的閣樓；四、打通聖所與聖袍室的牆壁，與原有音響控制室對稱（音響控制室遷往閣樓），改建為紀念基督犧牲救贖的基督小聖堂和感化人心的聖靈小聖堂（後命名為「慕主小堂」及「景華小堂」），並在兩邊各安放兩張法政座椅；五、進入聖所的石階會加裝活動扶手，方便年長及有需要教友上前領聖餐；六、詩班座位增設臺階；七、聖禮盆改置於聖堂入口。除聖堂外，亦擴建辦事處，並增設書室。同時又計劃於日後興建鐘樓、鼓樓及在白普理中心工友宿舍及牧師車位位置興建牧民中心。[129]

聖堂的修建工程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開始，聖三一座堂特別在十一月一日（諸聖日）舉行「邁向新紀元感恩聖餐崇拜」，惜別聖堂原貌。徐贊生主教特別出席，並與全體教友拍攝大合照。陳衍昌牧師在講道時說：

> 座堂是有資源的，但仍需要接班人承接使命；聖堂的修建是為着上主給予的責任而向前推進，聖堂的建設是紀念着耶穌基督的救恩與工作，日後的修改仍需配合教會傳統。

他又指聖三一堂成為座堂後仍會面對各種困難，但教友「要存謙卑的心，與上主同行，盡心竭力回應上主的呼召」。[130]

為應付各項擴建開支，聖三一座堂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舉行座堂擴建工程募捐運動差遣禮及啟動禮，籌款目標為八百萬元。除翻新及復修聖堂，設立慕主小堂及景華小堂外，亦會增設鐘樓、鼓樓、牧民中心、書室及座堂花園，「展現三一信仰、關愛及服務人群的座堂特色」。[131]

另一工作是訂定座堂的架構及憲章。按教區常備委員會通過的《聖三一座堂規條》(Regulations of Holy Trinity Cathedral)，座堂將成立理事會（Council）及聖工團（Chapter）。理事會有責任促進及支持座堂的靈性、牧養、傳道、社會、教育及普世教會的工作，並據聖工團提交的座堂整體方向及使命作建議。教區主教為理事會的視察者（Visitor），成員包括主教任命的主席、座堂主任（Dean）、所有法政牧師（Canon）、由教區常備委員會任命的教區聖品、由聖三一座堂牧區議會任命的聖三一堂代表及每牧區（聖三一座堂外）自行任命的一名註冊教友。理事會每年須召開至少一次會議。聖工團則處理座堂日常行政，代表由教區主教委任，成員包括：座堂主任為當然主席、座堂所有全職聖品、由教區常備委員會任命不超過三名的教區聖品及由聖三一座堂牧區議會任命不超過五名的聖三一座堂註冊教友代表。[132]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確立座堂的使命。「邁向新紀元感恩聖餐崇拜」中，特撰禱文如下：

聖哉、聖哉、聖哉，三位一體之主，永生的上帝，
我們同心感謝主的深恩及慈愛，感動先賢不畏勞苦，
在九龍城區廣傳福音，興建聖堂，建立教會，
讓信徒在信仰生活中不斷成長。
現今本堂承擔東九龍教區主教座堂的使命，
懇求上帝賜予我們智慧及愛心，
繼續持守基督的教導，努力為主作見證，在生活中愛人如己，
並善用上帝賦予各種恩賜，在新的階段中，
在聖靈引領下努力傳揚天國的使命，
榮耀主的聖名，奉主耶穌基督之名而求。阿們。[133]

聖三一座堂將兼備牧區及座堂的雙重角色，兩者「並存而共融」。陳衍昌牧師在闡述座堂日後的使命時，強調必須回應社會和時代的挑戰，肩負受託的使命，讓上主得榮耀。一方面，他認為聖三一必須「不像座堂」，因為一般人對座堂的認識是，座堂好像不大熱衷於傳福音。所以，聖三一座堂要堅持宣教培育的使命，讓更多人不斷加入這信仰的群體。另方面，聖三一座堂也要盡心竭力，在教會的牆垣外，作世界的光，讓上主的仁愛、正義與和平，展現在人間每一角落，「在人間建立天國」。[134] 徐主教在座堂的擴建運動啟動禮證道時，勉勵教友，硬件的改建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友在未來的日子要彼此建立，「在心態上從牧區提升至座堂的形象，對教會、社區及對世界有更大的承擔，建立宏觀普世的教會觀」。[135]

陳衍昌牧師以座堂主任的身分，把從「牧區」到「座堂」形容為「奇妙萬分的『上行之旅』」。因此，他認同籌委會為一百二十周年堂慶和座堂元年所選定的主題為「上行之旅」，並期望會友可以勉力上行，超越時間，飛昇超拔，迎向上主。[136]

東九龍教區出版的《E 期》二零零八年五月號，從四方面闡釋聖三一座堂的使命：

一、「聖哉！聖哉！聖哉！」: 座堂肩負保留優美敬拜楷模的重任，並繼續探索禮儀的發展，回應不同時代的文化；

二、「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座堂有助教區發展神學及宗教教育，提供深度的信仰栽培，回應社會及時代的各種挑戰；

三、「道成了肉身」: 教會與社會息息相關，聖堂以崇拜為中心，是生命的泉源；兩旁的聖三一白普理中心和百周年紀念大樓，包括幼稚園、幼兒院、特殊學校及社會綜合服務中心，標誌教會生命的延展，實踐基督「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教導，為人群帶來愛與盼望；

四、「使萬民作我門徒」: 主動進入人群，宣講天國的福音，領人歸回天父的家，並發展多元化的宣教模式，喚起教區的宣教精神。[137]

為落實有關使命，座堂將設立四個專責部門：崇拜及禮儀部（Department of Liturgy and Worship）、教育及培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Nurture）、宣教及福傳部（Department of Mission and Evangelism）及牧養及社會關懷部（Department of Pastoral and Social Servi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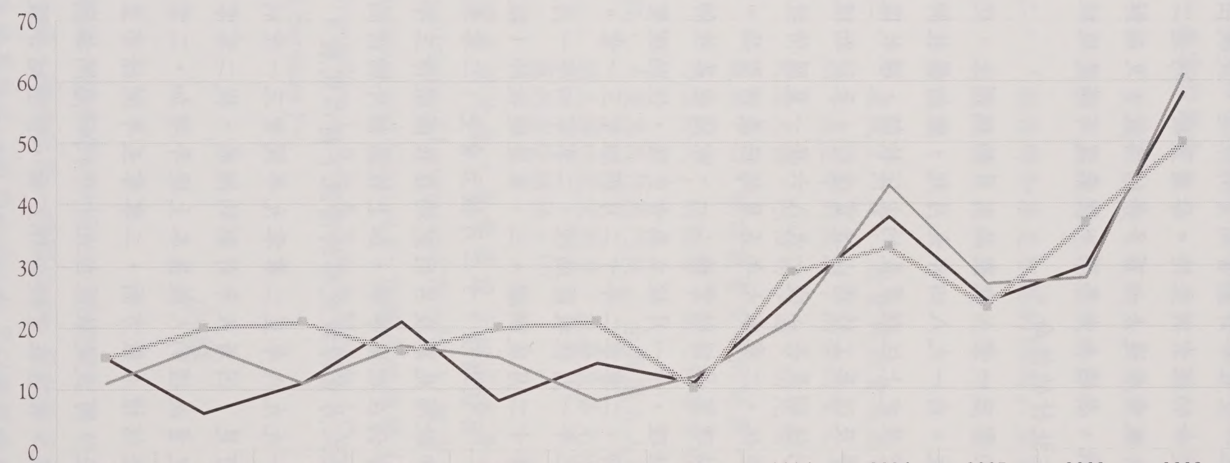
小結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努力，我們雖已像登上山巔，但是難免筋疲力竭，舉步維艱。環顧四方，景物依然，卻又變化萬千；雖未致桃花猶在，面目全非，也足以喚醒教會信眾遠離靈性上的踞傲怠懶，信仰上的抱殘守缺，福音使命上的墨守成規。[138]

以上一段文字，是聖三一堂五年計劃書開首的陳述，反映出牧區在危機意識中對教會使命的探索與堅持。毋庸置疑，跨過二十一世紀門檻的聖三一堂，既秉承過去一百多年的傳統，又面對着成為座堂的新使命及挑戰，在過去十年間，從來沒有滿足現狀，反倒致力更新，尋索上主託付的使命。

一九九八年迄今的聖三一堂，在聖品人員的編制上，仍以主任牧師及助理聖品為主。自一九八四年九月起，陳衍昌牧師即主理堂務，成為聖三一堂歷史上任期最長的主任牧師，讓牧區免受頻繁調派影響，使領導及改革工作得以連貫進行。至於助理聖品方面，以周伯明牧師的任期最長，從一九八六年一直服侍牧區，至二零零八年十一月退休，二零零九年五月起任義務聖品。除周牧師外，先後有三位助理聖品協助堂務：一、歐陽兆基牧師：一九九九年九月任牧區助理，十一月按立為會吏後，任助理聖品，二零零一年按立為牧師，二零零二年十二月調離聖三一堂。二、呂利武會吏：二零零三年一月任牧區助理，二零零四年一月按立為會吏，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底調離。三、葉慶璇牧師（歐陽兆基師母）：二零零六年一月任助理，十二月按立會吏，二零零八年一月按立為牧師。其中歐陽兆基及呂利武均在牧區服侍三年始調職，而葉慶璇牧師迄今仍在牧區事奉，加上牧區額外聘請的福音及傳道幹事，讓聖工在人力資源較充裕的情況下得以開展。

下頁表三整理了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九年間聖三一堂的洗禮及堅信禮人數。我們可見，因着五年計劃的推展，從二零零二及零三年開始，成人及兒童洗禮的人數基本上逐年增加，二零零九年更達近年的高峰。堅信禮人數方面，二零零五年開始亦呈現增長。這些「量」的增長，可說是牧區自九十年代銳意開拓與經營培育及傳道工作的成果。牧區在堂校合作方面，緊密結合教育與傳道，樹立了很好的典範。聖三一堂的經驗，適切地回應了教區以至教省的使命與重點。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成人洗禮	15	6	11	21	8	14	11	25	38	24	30	58
孩童洗禮	11	17	11	17	15	8	12	21	43	27	28	61
堅信禮	15	20	21	16	20	21	10	29	33	23	37	50

表三：聖三一堂洗禮及堅信禮人數（1998–2009）

至於出席主日崇拜人數方面，從表四可見，二零零四年後亦在穩步攀升。雖然二零零九年的數字仍無法超越「九七」前的水平，但亦是一九九五年來的高位。可以說，聖三一堂正式走出「九七」移民潮及各種社會經濟困局的陰霾。

	主日崇拜（人）	增長率 %	領聖餐（人）	增長率 %
1998	358	–2.19	206	+8.4
1999	340	–5.00	219	+6.3
2000	338	–0.59	212	–3.2
2001	336	–0.59	211	–0.5
2002	343	+2.00	213	+0.9
2003	316	–7.90	190	–10.8
2004	350	+10.80	211	+11.0
2005	374	+6.90	223	+5.7
2006	378	+1.00	246	+10.3
2007	376	–0.50	243	–1.2
2008	387	+2.90	265	+9.0
2009	390	+0.70	256	–3.0

表四：聖三一堂出席主日崇拜
及領聖餐平均人數（1998–2009）

「量」的增長，在在反映出「質」的優化與提升。其中的核心關鍵，是對教會使命的堅持，並藉着各項事工把異象傳遞，動員信徒委身，更新靈命，進而帶來教會的復興。正如徐贊生主教在聖三一堂一百一十五周年堂慶感恩崇拜中，提醒牧區不能忘記教會是為「福傳」而存在：

> 教會不能忘本，不能忘記她的存在是為了甚麼，教會的存在是為別人而活，教會的存在，是為完成主耶穌交付的大使命……生存下去。[139]

同時，培育工作的開展，不僅深化信徒的靈命根基，亦孕育他們對牧區的歸屬感。例如二零零四年堂慶籌備委員會以「薪傳」為主題，便反映出一群以聖三一堂為家的信徒，對「聖三一兒女」身分的傳承與認同。[140]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剛上任不久的陳衍昌牧師，曾表達對聖三一堂的期望：

> 本堂有悠久的歷史、深厚的根基、廣泛的事工，眾多的教友，這一切都是我們要感謝神的。
>
> 然而，我們千萬不能夠自滿，我們還要不斷更新，天天在主裏作新造的人。否則我們便會變成沒有靈魂的空殼，一切成就都是徒然，我們的教會將不配稱為上帝的家，祇是一座外表輝煌、內裏破敗的廟宇。我們切不可忘記主基督對青年財主所說的話:「如果你要達到更完全的地步，你得去賣掉你所有的產業。」(馬太福音 19:21)[141]

四分一個世紀過去了，聖三一堂確在許多方面有所更新。其間面對着不同挑戰，經歷了不少喜樂與眼淚，但同時亦見證全堂上下對上主的委身，及上主豐厚的恩典與慈愛。對迎向未來的聖三一座堂，當年的期許仍是我們的祝禱。時代在變，環境在變，聖三一座堂仍然堅守不變的使命，與時俱進，在九龍城、東九龍以至香港社會彰顯三一上主的榮耀聖名。

日期	課程範疇	講題	講員
2月3日	一、認識上帝和祂的世界	上帝和祂的世界 世界變，上帝也在變？	龔立人博士
4月6日	二、認識你的聖經	聖經是甚麼？	盧龍光牧師
4月13日		從舊約到新約	劉榮佳牧師
6月1日	三、認識你的生命和責任	人與上帝、人與自己	楊國強博士
6月8日		人與鄰舍、人與世界	楊國強博士
8月3日	二、認識你的聖經	聖經對世界的影響	張楊淑儀女士
8月10日	四、認識你的教會	教會的誕生和發展	劉子睿會吏
10月5日		中國和香港的教會	邢福增博士
10月12日		教會的現況	陳劍光博士
12月7日		教會的未來（一）	徐贊生主教
12月14日		教會的未來（二）	陳衍昌牧師
	五、認識你的崇拜	教會的責任和使命：座堂	

表五：聖三一堂 2008 年神學課程大綱

日期	課程範疇	講題	講員/閱讀材料
2月1日	教會	蒙喜悦教會的見證	溫偉耀博士
2月15日		蒙喜悦信徒的生命	溫偉耀博士
4月5日	崇拜禮儀	崇拜和禮儀撐起生命	陳衍昌牧師
4月19日		聖餐：基督徒最重要的崇拜	林振偉牧師
5月3, 10日		聖餐崇拜禮讚和實踐	《聖餐崇拜禮文》
5月31日	聖經	現代人怎樣讀聖經？	李熾昌博士
6月14日		舊約與我何干	蔡定邦博士
6月21日		舊約專書選讀（一）	蔡定邦博士
8月9日		舊約專書選讀（二）	陳南芬博士
9月6日		新約精粹	陳龍斌博士
9月13日		新約專書選讀	陳龍斌博士
10月11日	教會	蒙喜悦教會與信徒	啟示錄 1–3 章 亞細亞七教會
11月1日		三自精神：中國教會的歷史啟示	邢福增博士
11月8日		香港教會的挑戰	盧龍光牧師
12月6日		回顧、感恩與展望 （愛筵、分享、聖餐）	徐贊生主教 葉慶璇牧師 林衛星先生 其他學員代表

表六：聖三一堂 2009 年神學課程大綱

日期	課程範疇	講題	講員
2月7日	教會	認識聖公會： 聖公會神學傳統及路向	范晉豪牧師
2月21日		認識聖公會： 聖公會神學與教制	徐贊生主教 范晉豪牧師 陳衍昌牧師 鄒小岳律師
3月21日		認識教會： 教會面向中國的挑戰	陳劍光博士
4月11日	生命培育	突破傳統的靈修（一）： 現代人的靈修	譚沛泉博士
5月2日		突破傳統的靈修（二）：流水歲月老少同行──盧雲神父教你圓滿人生的秘訣	陳佐才法政牧師 謝健泉醫生
5月9日		突破傳統的靈修（三）： 武俠靈修	陳佐才法政牧師
6月6日		跳出傳統的培育： 座堂大使	周惠賢博士
8月1–3日	教會與社會	全堂退修會：上行之旅── 先求他的國	陳衍昌牧師
9月12日	聖經、教會與社會	世界之光（一）：社會服務	賴錦璋先生
9月19日		世界之光（二）：社會服務	劉惠靈牧師
10月3日		世界之光（三）：教育事工	夏永豪校長 洪麗婷女士
10月10日		世界之光（四）： 現代基督徒的挑戰	龔立人教授
11月7日	聖經與社會	聖經與今日家庭	陳龍彬教授
11月14日		聖經與今日社會	陳龍彬教授
12月5日	崇拜禮儀	2008–2010 學神課程感恩畢業禮（崇拜、愛筵、授憑、分享）	徐贊生主教 陳衍昌牧師 葉慶璇牧師 林衛星先生 全體學員

表七：聖三一座堂 2010 年神學課程大綱

注：

1 香港失業率從一九九七年的百分之二點一，逐年增加至二零零二年的百分之七點六。參呂大樂、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香港：三聯書店，2003），68。

2 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130。

3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編：《廿一世紀教會牧養與挑戰——九九香港教會普查報告及回應》（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02），9、13。

4 陸輝：〈香港教會未來發展反省〉，《廿一世紀教會牧養與挑戰》，36。

5〈香港島區第二任主教陞座禮崇拜〉，《教聲》1610（2007年1月14日）：1；〈鄺保羅大主教當選後致辭〉，《教聲》1614（2007年2月11日）：1。

6〈鄺主教展望本教區之未來發展〉，《教聲》712（1989年10月29日）：1。

7〈鄺主教在九龍東教友交流會致詞〉，《教聲》712（1990年3月18日）：1。

8〈通過小組研究成為教省之可行性〉，《教聲》717（1989年12月3日）：1。

9〈教省委員會諮詢牧區文件（一）〉，《教聲》896（1993年5月9日）：4。

10〈第四十屆教區議會已順利完成〉，《教聲》926（1993年12月5日）：1。

11〈立法局三讀通過教省條例草案完成立法程序〉，《教聲》1013（1995年8月6日）：1。

12〈教區特別議會已順利選出分區主教〉，《教聲》1021（1995年10月1日）：1。

13〈鄺主教主持分區主教祝聖禮講道〉，《教聲》1031（1995年12月10日）：1。

14〈香港聖公會教省今日成立〉，《教聲》1181（1998年10月25日）：1。

15〈宣教服務弘主道，同步邁向新世紀〉，《教聲》1181（1998年10月25日）：3–4。

16〈香港聖公會廿一世紀遠象——五年計劃政策文件〉，《教聲》1225（1999年8月29日）：2–3、10–12。

17〈香港聖公會面對的挑戰〉，《教聲》1386（2002年9月29日）：8。

18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辦的回歸十周年諮詢會議，主題是「教會對香港發展承先啟後的貢獻——我們當走的路」。參《教聲》1646（2007年9月23日）：6。

19〈「聖公會應繼續辦學嗎？」（上）〉，《教聲》1438（2003年9月28日）：3。

20〈香港聖公會管業委員會對教育修訂條例發表意見〉，《教聲》1472（2004年5月23日）：1。

21〈聖公會小學周年聚餐會鄺廣傑大主教致訓辭〉，《教聲》1583（2006年7月93日）：1。

22〈聖公會小學特色是提供優良宗教教育〉，《教聲》1621（2007年4月1日）：1。

23〈教省重視學校宗教教育〉，《教聲》1769（2010年1月31日）：1。

24〈探討教會與社會服務的關係〉，《教聲》1464（2004年3月28日）：1。

25〈「關懷的教會」計劃〉，《教聲》1617（2007年3月4日）：2。

26〈教省成立十周年，實踐遠象，宏揚福音傳愛心〉，《教聲》1704（2008年11月2日）：2。

27〈東九龍教區第二屆教區議會〉，《教聲》1304（2001年3月4日）：1。

28〈東九龍教區將繼續探討教區五年計劃發展策略〉，《教聲》1304（2001年3月4日）：1。

29〈九龍東研討會探討最佳宣教模式〉，《教聲》1315（2001 年 5 月 20 日）：1。

30〈附錄：諮詢過程及接獲意見〉，2001 年 2 月 12 日，〈後記〉，均收於《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五年計劃》（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2001），i–iv。

31《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五年計劃》，3–4。

32 同上書，7–9。

33 陳衍昌：〈堂慶牧函〉，《聖三一堂周刊》，2001 年 6 月 10 日，8；〈三一更新綱——關懷之旅〉，《聖三一堂周刊》，2001 年 5 月 6 日，18。

34 歐陽兆基：〈再思「沒有陌生人的教會」〉，《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7 月 21 日，8。

35 陳衍昌：〈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二零零二年教友大會〉，《聖三一堂周刊》，2003 年 1 月 6 日，2。

36〈關懷之旅〉，《聖三一堂周刊》，2001 年 7 月 29 日，6。

37〈崇拜禮儀知多少？〉，《聖三一堂周刊》，2003 年 4 月 6 日，22。

38 陳衍昌：〈聖三一堂二零零二年教友大會牧區主任報告〉，《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1 月 6 日。

39 陳衍昌：〈校園福音受託者的反思〉，《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6 月 23 日，7。

40〈大事記（2000 年 8 月至 2001 年 5 月）〉，《聖三一堂周刊》，2001 年 6 月 10 日，9。

41 陳衍昌：〈堂慶牧函〉，《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5 月 26 日，6。

42〈會議消息〉，《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7 月 14 日，8。〈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二零零二年度牧區議會第三次會議記錄〉，2002 年 7 月 7 日，2。

43〈學校消息〉，《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7 月 14 日，9。

44〈宣教培育〉，《聖三一堂周刊》，2005 年 8 月 28 日，10。

45 陳衍昌：〈本堂牧區學校、校園福音工作新紀元〉，《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7 月 21 日，9。

46〈學校消息〉，《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8 月 25 日，9。

47〈周年事記（2001 年 6 月至 2002 年 5 月）〉，《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5 月 26 日，8。

48〈團契生活〉，《聖三一堂周刊》，2003 年 3 月 23 日，11。

49 由陳衍昌牧師提供，謹此致謝。

50〈宣教牧養〉，《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12 月 29 日，12。

51〈宣教牧養〉，《聖三一堂周刊》，2003 年 1 月 5 日，17。

52〈三次佈道會逾二百同學決志，並作跟進塑造新的屬靈生命〉，《教聲》1587（2006 年 8 月 6 日）：8。

53〈聖三一堂與聖巴拿巴堂合辦聯校中五畢業營〉，《教聲》1429（2003 年 7 月 27 日）：4。

54 鄧翊匡：〈聖公會聖三一堂主辦「3G 新體驗」中五聯校畢業生福音營〉，《教聲》1540（2005 年 9 月 11 日）：2。

55 鄧翊匡：〈夢想，搏一鋪——聖三一堂中五聯校畢業生福音營〉，《聖三一堂周刊》，2005 年 6 月 26 日，11–12。

56 鄧翊匡：〈小伙子的「神」「奇」遭遇〉，《聖三一堂周刊》，2005 年 8 月 28 日，9。

57 林衛星：〈傳道侍奉的喜樂〉，《聖三一堂周刊》，2007 年 6 月 10 日，10。

58 林衛星：〈薪火相傳——記聯校中五福音營〉，《聖三一堂周刊》，2009 年 6 月 14 日，10。

59〈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福音月〉，《聖三一堂周刊》，2007 年 12 月 9 日，18。

60〈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福音月〉，《聖三一堂周刊》，2007 年 12 月 30 日，18。

61 胡文明：〈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校務報告〉，2010 年 2 月 28 日，聖三一座堂牧區議會二零一零年度二次會議文件，2010 年 2 月 28 日。

62 江映珠：〈有優質家長，才有優質子女〉，《聖三一堂周刊》，2008 年 9 月 21 日，17。

63〈主日學家長班〉，《聖三一堂周刊》，2008 年 10 月 19 日，14。

64 江映珠：〈讓愛火永續加溫〉，《聖三一堂周刊》，2009 年 1 月 25 日，15–16。

65〈三一家長學堂〉，《聖三一堂周刊》，2009 年 10 月 4 日，17。聖三一堂小學高俊鎮校長提供資料，謹此致謝。

66 陳衍昌：〈一九九七——信心的跳板；一九九八——委身的召命〉，6。

67〈聖三一兒童合唱團〉，《聖三一堂周刊》，1999 年 7 月 4 日，8。

68〈聖三一兒童合唱團〉，《聖三一堂周刊》，1999 年 10 月 17 日，7。

69〈聖三一兒童合唱團〉，《聖三一堂周刊》，1999 年 12 月 5 日，14。

70 陳師母：〈聖三一兒童合唱團〉，《聖三一堂周刊》，2005 年 9 月 4 日，18。

71 聖三一兒童合唱團團長梁靄雯校長提供資料，謹此致謝。另參《聖三一兒童合唱團十周年音樂會》（特刊）（香港：聖三一兒童合唱團，2010）。

72 陳師母：〈聖三一兒童合唱團〉，《聖三一堂周刊》，2005 年 9 月 4 日，18。

73 聖三一兒童合唱團團長梁靄雯校長提供資料，謹此致謝。

74 許子斌：〈青年人是教會的幹細胞〉，《聖三一堂周刊》，2004 年 1 月 11 日，9。

75〈青年事工委員會奉獻禮〉，《聖三一堂周刊》，2004 年 1 月 11 日，8–9。

76〈宣教牧養〉，《聖三一堂周刊》，2004 年 1 月 11 日，14。

77〈高中學生團契通訊〉，《聖三一堂周刊》，2004 年 8 月 1 日，11。

78〈大事記要（2003 年 6 月至 2004 年 5 月）〉，《聖三一堂周刊》，2004 年 6 月 6 日，9。

79〈回歸根本，以禱告將生命擺上〉，《聖三一堂周刊》，2005 年 9 月 11 日，12。

80〈聖三一堂籃球事工奉獻及差遣禮〉，《聖三一堂周刊》，2005 年 1 月 30 日，5。

81〈青年事工委員會——籃球事工〉，《聖三一堂周刊》，2005 年 1 月 30 日，16。

82〈家庭事工委員會〉，《聖三一堂周刊》，2004 年 11 月 7 日，23。

83 陳衍昌：〈忘年之師〉，《牧情——溪水旁的呼喚》（香港：基督教文藝，2006），180。

84〈家庭團契簡介〉，《家庭事工委員會特刊》，2008 年 5 月 11 日，1。

85〈家庭事工委員會消息〉，《聖三一堂周刊》，2006 年 12 月 17 日，18。

86〈家庭事工的願景〉，《聖三一堂周刊》，2007 年 5 月 20 日，25。

87〈家庭事工委員會消息〉，《聖三一堂周刊》，2007 年 7 月 8 日，19–20。

88〈家庭團契〉，《聖三一堂周刊》，2007 年 11 月 11 日，12。

89〈家庭團契〉，《聖三一堂周刊》，2008 年 1 月 6 日，15–17。

90〈家庭團契〉，《聖三一堂周刊》，2008 年 2 月 24 日，14–15。

91〈家庭團契〉，《聖三一堂周刊》，2008 年 5 月 11 日，16。

92〈家庭事工委員會消息〉，《聖三一堂周刊》，2009 年 5 月 10 日，16。

93 林衛星：〈屬於您的信徒培育，您會參與嗎？〉，《聖三一堂周刊》，2005 年 9 月 25 日，9。

94〈成人主日學〉，《聖三一堂周刊》，2005 年 11 月 13 日，23。

95〈大事記要（2007 年 6 月至 2008 年 5 月）〉，《聖三一堂周刊》，2008 年 5 月 18 日，9。

96〈二零零八年三一信徒神學課程〉，《聖三一堂周刊》，2008 年 1 月 13 日，19–20。

97 陳衍昌：〈神學・學神〉，《聖三一堂周刊》，2008 年 2 月 3 日，11–12。

98 陳衍昌：〈聖三一堂二零零九年神學課程〉，《聖三一堂周刊》，2009 年 1 月 4 日，27。

99〈培育部及家庭事工委員會消息〉，《聖三一堂周刊》，2008 年 4 月 20 日，17。

100 陳衍昌：〈讓我們接受挑戰，一起完成聖樂信心之旅〉，《聖三一堂周刊》，2006 年 9 月 24 日，24。

101 楊靜嫻：〈聖樂藝術發展基金籌款音樂會前感——信心之旅〉，《聖三一堂周刊》，2007 年 2 月 11 日，9–10。

102〈聖樂藝術發展基金報告〉，《聖三一堂周刊》，2007 年 3 月 11 日，13–14。

103《聖三一座堂周刊》，2009 年 12 月 27 日，18–19。

104 林衛星：〈給我們一個向上主感恩言謝的機會——「信徒成長歷程檔」〉，《聖三一堂周刊》，2007 年 12 月 16 日，22。

105〈自家人的異鄉客〉，《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3 月 3 日，16。

106〈助失業者解困，有賴你施援手〉，《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3 月 10 日，7–8。

107 陳錦培：〈「愛的教育」的呼召——父啊！我在這裏，請差遣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你我齊參與〉，《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9 月 15 日，11。

108〈「願你的國降臨」關社課程〉，《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7 月 14 日，18。

109〈七色力量——品格培育計劃〉，《聖三一堂周刊》，2008 年 11 月 23 日，18–20。

110〈聖三一堂一百一十五周年堂慶〉，《教聲》1557（2006 年 1 月 8 日）：6。

111《聖三一堂一百一十五周年感恩崇拜》，2005 年 12 月 31 日，11。

112 陳衍昌：《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五年牧民計劃（2006–2010）獻議》（小册子），2。

113 同上書，3–4。

114 陳衍昌：〈更美麗的「美麗新世界」〉，《聖三一堂周刊》，2002 年 8 月 18 日，8。

115 陳衍昌：《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五年牧民計劃（2006–2010）獻議》，4。

116〈鄺主教將東九龍轄權授予徐主教〉，《教聲》1177（1998 年 9 月 27 日）：1。

117〈東九龍教區首屆教區議會〉，《教聲》1180（1998 年 10 月 18 日）：1。

118〈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設立「座堂」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2007 年 8 月 3 日，聖三一堂文件。

119〈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設立「座堂」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2007 年 9 月 13 日，聖三一堂文件。

120〈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籌設「座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2007 年 11 月 6 日，聖三一堂文件。

121 陳衍昌：〈關於設立主教座堂——一些個人省思及建議〉，2007 年 11 月 23 日定稿，聖三一堂文件。〈東九龍教區議會專責委員會正積極研究設立主教座堂〉，《教聲》1654（2007 年 11 月 18 日）：2。

122〈東九龍教區議會支持聖三一堂升格座堂〉，《教聲》1707（2008年11月23日）：1。

123〈徐贊生主教致聖三一堂牧區議會函〉，2007年11月23日，聖三一堂文件。

124〈陳衍昌牧師致徐贊生主教函〉，2007年12月11日，聖三一堂文件。

125〈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籌設「座堂」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紀錄〉，2008年6月3日，聖三一堂文件。另 Chan Kim-kwong, "Report on the Ecclesial Designation of Pro-Cathedral in the Catholic Traditions," 26 February 2008，聖三一堂文件。

126〈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籌設「座堂」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紀錄〉，2009年1月9日，聖三一堂文件。

127〈徐主教宣布聖三一堂為座堂〉，《教聲》1755（2009年10月25日）：3。徐贊生：〈宣布成立聖三一座堂證書〉，2009年10月15日，聖三一堂文件。

128 陳衍昌：〈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聖三一堂周刊》，2009年6月7日，8。陳衍昌：〈上行之旅——憑大愛，共闖新天；並肩行，宣揚聖道〉，聖三一堂文件。

129〈座堂消息〉，《聖三一堂崇拜周刊》，2009年3月15日，29–30。另陳衍昌：〈在基督裏重構生命〉，《聖三一堂崇拜周刊》，2009年4月12日，14。

130〈修繕工程月內展開，聖三一堂邁向新紀元〉，《教聲》1757（2009年11月8日）：2。

131〈聖三一座堂募捐運動，目標八百萬〉，《教聲》1770（2010年2月7日）：1。

132《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聖三一座堂憲章》（討論稿），2009年10月15日；另〈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籌設「座堂」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紀錄〉，2009年9月11日，聖三一堂文件。

133〈邁向新紀元禱文〉，《聖三一座堂周刊》，2009年11月1日，4。

134 陳衍昌：〈主教座堂，前面的挑戰〉，2009年，聖三一堂文件。

135〈聖三一座堂募捐運動，目標八百萬〉：1。

136 陳衍昌：〈上行之旅——憑大愛，創新天；並肩行，揚聖道〉，《同心奉獻——擴建聖三一座堂工程及增加設施》（籌款單張），日期不詳。

137〈教區新里程——座堂透視〉，《E期》14（2008年5月）：10–11。

138《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五年計劃》，2。

139〈聖三一堂壹百壹拾五周年堂慶〉，《教聲》1557（2006年1月8日）：6。

140 黎美嫻：〈薪傳〉，《聖三一座堂周刊》，2004年6月6日，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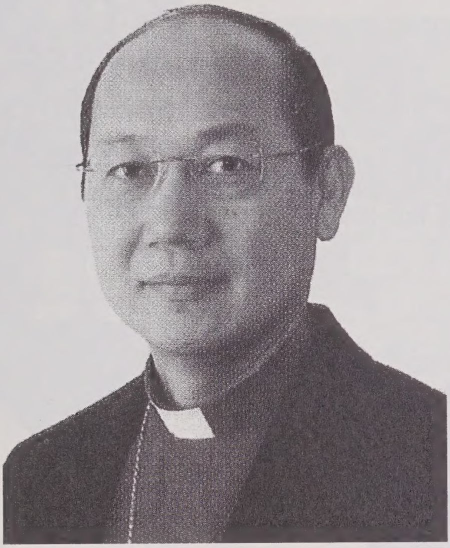
141 陳衍昌：〈在基督裏成長〉，《聖三一堂周刊》，1984年12月30日，3–4。



110周年堂慶感恩聚餐（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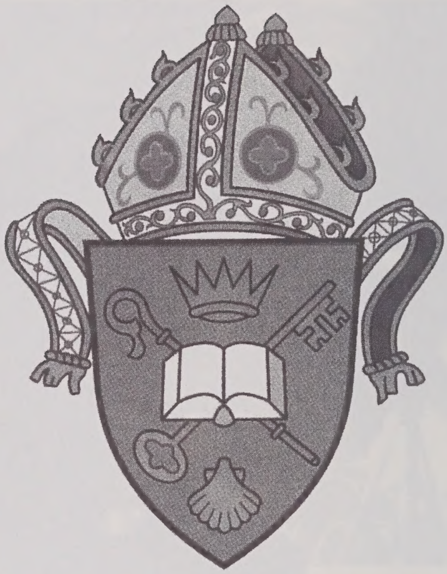
聖三一堂一百一十周年堂慶特刊（2000年）



廓保羅主教



香港聖公會會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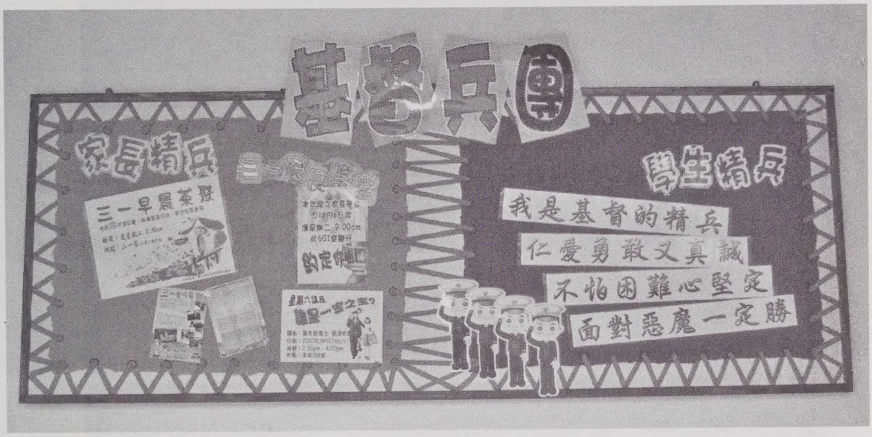
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區徽



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區徽



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區徽



家長學堂告示



兒童合唱團



兒童合唱團入口指引



2007年聖樂藝術培訓基金籌款音樂會



座堂壁報裝飾



2009年11月1日邁向新紀元感恩聖餐崇拜



2009年11月1日邁向新紀元感恩聖餐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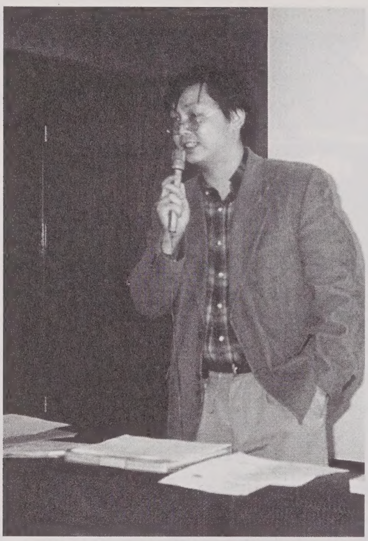


裝修期間的崇拜禮堂設置





裝修期間的聖堂



歐陽兆基牧師



呂利武會吏



葉慶璇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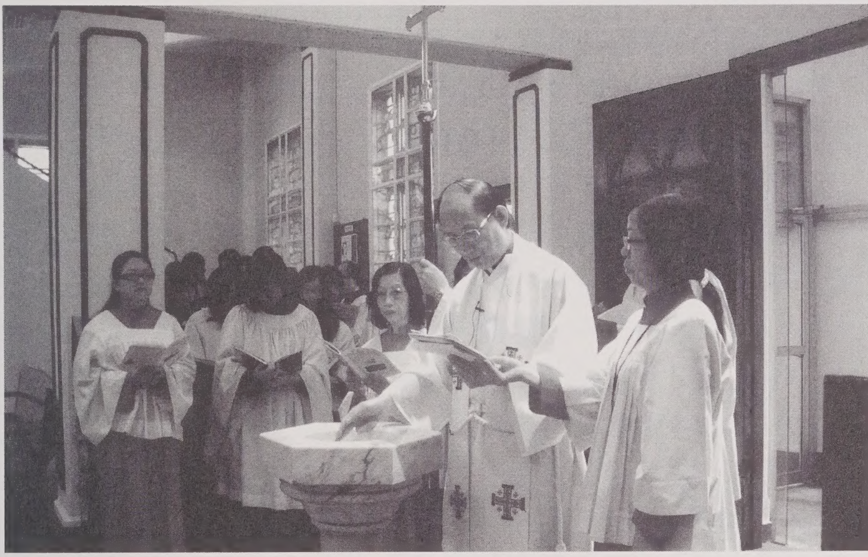
裝修後的聖堂：三一主殿



慕主小堂



景華小堂



聖堂裝修完畢後，於2010年5月9日首次舉行崇拜，
陳衍昌牧師為洗禮盤聖水祝聖



早堂崇拜詩班合照



10

結語

天國·龍城

從一八九零年到二零一零年，聖公會聖三一堂巍立在九龍城區，已踏入第一百二十個年頭。聖三一堂不僅是聖公會在九龍半島成立的首個牧區，也是現存九龍區歷史最悠久的基督新教教會。

時代的巨輪如常滾動，人類歷史向十九世紀揮手告別後，轉瞬間又迎向新的千禧。百多年來，中國及香港社會亦經歷了急劇的變遷：從大清皇朝到民國肇建，再經歷新中國的誕生與成長；香港也從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成為「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同樣，隨着都市化的步伐，九龍城也不再是昔日的鄉郊村落，發展成人口密集的繁華社區。

歷史的發展確實不隨人的意志而轉移，但對基督教會而言，不管在任何環境與時代，其身分卻始終如一。如何在變動的時代中與時俱進、傳講耶穌基督的福音，仍是教會不變的使命。一百二十年前由英國聖公會傳道會傳教士及華人牧者建立的九龍城傳教支站，歷經時代的洗禮歷練，今天已經蛻變成聖公會香港教省

東九龍教區的主教座堂。不管其體制與規模如何，教會的核心價值及角色，仍然沒有改變。

本書的主題是「天國」和「龍城」(In Kowloon City as it is in Heaven)，寓意聖三一牧區在九龍城地區，肩負着傳揚天國福音的使命，並追求在地上建設「天國」。「天國」福音既是整全的福音，也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福音。百多年來，在歷任牧者及信徒群體的共同努力下，聖三一堂從沒有忘記社會的需要，在不同時代藉傳道、牧養、教育、社會福利服務等工作，回應人身、心、靈的訴求。聖三一堂的歷史，有血有肉地為天國福音賦予具體內容，為基督道成肉身作有力見證。

在基督教傳統裏，「天國」雖有濃厚的「終末」取向，也同時具備「現世」意義。耶穌基督在主禱文中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在反映出這種「在地若天」(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的理想與訴求。聖公會背景的神學家司托德(John Stott)指出，上帝的國既是上主神聖與絕對主權的體現，故耶穌教導信徒「願祢的國降臨」，意思是希望教會藉信徒的委身見證，在地上參與上帝國度的開拓。「在地若天」即是要求信徒在地上崇敬上帝聖名，參與在祂的國度中，並踐行祂的旨意。[1] 從終末的角度看，「天國」與「地上」間，仍有着各種實存的張力與矛盾，但這並不代表教會因此揚棄建設天國的目標，反倒是藉着教會與信徒群體堅毅不屈的實踐(praxis)，在「既濟」與「未濟」(already but not yet)之間，在「地上」逐步彰顯「天國」的榮耀。

早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列蒲祜牧師在聖三一堂以「新天新地」為題講道，勉勵會眾要具備「天國」視野，以及為實現有關使命而擺上的心志。他說：「基督教對於世界的貢獻，是建設天國於人間；基督徒最大的希望，是天國的實現，所以基督徒最大的使命，是努力建設天國。」基督教信仰的「天國」，並不只是屬於將來，而是以「現實的人類良善生活為基礎」。門徒的使命，就是以「不

屈不撓的精神，破釜沉舟的氣概」來建設天國。列牧師批評，不少信徒「把整個人間天國遷回到天上去」，只追求「一己的精神的逃避，以期獲得慰安」，卻沒有看見「現在的社會——一切的剝削、貪污、戰爭、殘殺，和一切人類壓迫等等現象」，忽略了「為他人去爭取公道和自由」，把基督的使命：「『擄者得釋，瞽者得明，受挫者得自由』等理想收藏起來」，使基督教淪為「社會的贅疣，時代為〔的〕落伍者」。他呼籲聖三一堂的信徒，要秉承基督的使命，為建設天國而努力。[2] 列牧師的肺腑之言，在六十多年後，仍然擲地有聲，向着我們說話，等待聆聽者的回應與行動。

一百二十年來，我們可以在「龍城」看見「天國」嗎？「新天新地」只是個遙遠的夢想嗎？答案並非簡單的「有」或「無」，而在於是否培育出那種在困乏與挑戰之間，仍擇善固執、堅守使命的精神。我們相信，昔日聖公會傳道會的眾傳教士，以及顧啟德夫婦，早已默默地把「天國」福音的種子撒下。鄺日修牧師多年的開墾與耕耘，藉着聖三一堂、廣蔭院、天國學校、基督教墳場，還有維多利亞女校，奠定了聖三一牧區的根基。其後李求恩會吏長、曾紀岳會吏長、李應標法政牧師、列蒲祐牧師、周夢秋會吏長、彭恩昌牧師、黃羨雲法政牧師、謝博文法政牧師及陳衍昌牧師等，在教區的支持下，偕同眾助理聖品及眾忠心門徒，在不同時代，雖然面對着各種內外挑戰，仍流淚撒種，同心澆灌，先後建立新聖堂、聖三一堂小學、幼稚園、聖三一堂中學、白普理中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百周年紀念樓等，在在從不同層面，以正行實踐天國的福音。我們相信，當不同年齡及背景的人士因「聖三一」的牧養而生命得着更新與改變，當社會眾多有需要者因「聖三一」的服務感受到被關愛及生命的尊嚴，當莘莘學子因「聖三一」的教導而得着知識與智慧，所建立的不僅是教會與牧區，而是基督的身體。正如白普理中心外牆壁畫所宣告的「主賜平安」，這一切其實已在龍城立見天國。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新生的聖三一座堂，如何在一百二十年的傳統及根基上，不斷更新，並繼續堅守其不變的使命及核心價值，去回應社區、教區及牧區的需要與挑戰？將來的歷史撰述者如何書寫及評價，端在於現在的我們如何參與。

我們都在「寫歷史」。

注：

1 John Stott, *Essential Living: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Leicester: Inter-Varsity Press, 1988), 146–47.

2 列蒲祐：〈新天新地〉，《港粵教聲》復刊 1 卷 3 期（1947 年 1 月 15 日）：2–3。

後記

雖然我不是聖公會會友，也非九龍城區街坊，但聖三一堂的名字，卻一點兒不感到陌生。猶記得早年在建道神學院開設香港基督教史時，曾為同學編排實地考察，讓他們在課堂外，也可親自進入歷史場景。聖三一堂特有的中國傳統建築風格，自然是上佳的活教材。後來轉至崇基學院神學院任教，由於聖三一堂主任陳衍昌牧師自二零零五年起就任神學校董會主席，跟他接觸的機會隨之增加，神學院師生的定期教會探訪，也曾到訪聖三一堂。坦白說，那時自己對聖三一堂（以至香港聖公會）的認識，除本色化的建築外，所知有限。直至二零零八年，陳衍昌牧師邀請我為聖三一堂「完成」堂史的撰寫工作，由是開始這次認識聖三一堂之旅。

聖三一堂史項目，本來並不在原有研究計劃內，故我一直拖延，至二零零九年九月，完成了手頭較急的項目，才能全情投入。自己寫文章常有延期呈交的陋習，甚至在學術會議報告當天早上才把論文殺清，在行內已惡名昭彰。但這次聖三一堂史的研究及

寫作，卻絲毫不敢怠慢。因為全書務必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的感恩崇拜前出版，這條死線對我構成極大的壓力。半年間，自己幾乎只作一件事，終於在本年三月下旬完成全書初稿。

其實，早在十多年前，聖三一堂為迎接一百一十年堂慶，已把堂史編寫工作交給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劉紹麟負責。紹麟兄在中神任職期間，先後完成多部本地教會及學校史著，由他來主理此事，確是深慶得人。他在浸會大學基督教在華文獻部、英國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及英國伯明罕大學特藏組等地，搜集及翻查埋沒於聖公會差會英國海外傳道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簡稱 CMS）的檔案文獻中關於聖三一堂的資料，擬定全書結構大綱，並訪問了多位聖三一堂教友，把口述歷史記錄下來。最後，紹麟兄「從無到有」，完成了逾五萬字的初稿後，重返香港中文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不過，由於各種原因，書稿錯過了在一百一十年堂慶出版的時機。十年後，陳牧師及牧區議會各人，甚願在一百二十年堂慶完成這件未了心願；加上聖公會東九龍教區主教選立聖三一堂為教區主教座堂，堂史的修訂及續寫工作，便落在我身上。

記得在讀畢紹麟兄的初稿後，我曾考慮是否保留他的內容，把時間及精神集中在聖三一堂近十年的發展。最後，幾經掙扎，我決定循着他搜集的資料，重新閱讀、整理及修改。這並非因為初稿有任何問題，而純粹是個人研究及寫作的喜好。知我者均曉得，我作研究喜歡親力親為，絕少假手研究助理。我享受翻爬史料的過程，雖苦亦甜。我跟紹麟兄認識多年，他雖是社會學訓練出身，但其史學造詣一點兒不遜色，讓我們這些治史者無不感到汗顏。他治學勤奮，尤其關注基督教及香港社會發展的互動關係，在開墾香港基督教史這片園地方面，作過重要的貢獻。如果沒有他奠定的基礎，尤其是整理 CMS 檔案及訪談記錄口述歷史，我要在半年內完成有關工作，絕對是不可能的任務。

半年間，極大的壓力轉化為研究動力，讓我對聖三一堂（以至香港聖公會）的發展有更全面的認識。在此感謝陳衍昌牧師的信任，把撰寫堂史的工作交予我。在整個研究及寫作的過程中，再一次體會到研究本地教會史的重要及困難，在搜集資料過程中面對挫敗，毋庸贅言，卻再次突顯保存本地教會史料的逼切需要。十年前從事戰後香港基督教新村研究時經驗的複雜感受，再次湧現心頭。能夠如此近距離及深入地檢視聖三一牧區的過去與現在，特別是在時代變遷下反省教會的使命，使我有很深的體會，於我亦是一次深刻的屬靈之旅。這再一次證明，嚴謹的學術研究也可帶來深邃的靈性經歷。

捧讀着十四萬字的書稿，該是表達感恩的時候。謝謝聖三一座堂牧區議會的信任，同時為本研究的進行及出版提供資助。陳衍昌牧師多次親自把資料送到中大，並解答我許多疑問。陳牧師、協恩中學附屬小學梁靄雯校長、聖三一堂小學郭書謙校監，仔細閱讀每章書稿，並提供意見。梁校長更不辭勞苦，為本書搜集照片，特別是從劉筱基校長處，借來其已故父母（劉元乂先生及李徽嫄女士）的珍貴舊照，令本書生色不少。青山聖彼得堂劉子睿牧師在百忙中閱讀書稿，也在此一併感謝。

本書能順利完成，亦有賴下列機構、人士在資料搜集方面提供協助：聖三一堂辦事處吳淑玲小姐，在籌備堂慶及感恩崇拜的百忙中，為我預備資料；新加坡三一神學院亞洲基督教研究中心潘乃昭牧師，在網上分享部分聖公會珍藏史料文獻；中國神學研究院楊慶球博士協助尋找存於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關於聖三一堂的複印資料；現於美國 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 攻讀博士的崇基學院神學院黃慧賢校友，協助我在該院圖書館複製 CMS 縮卷；還有香港聖公會教省辦事處祕書長管浩鳴牧師及辦事處林妙玲女士、《教聲》編輯部、大主教神學及歷史研究顧問魏克利牧師（Philip L. Wickeri）、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等，謹此致以衷心感謝。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陳劍光博士提供戰前江漢章在聖三一堂的事

蹟，雲南省基督教協會及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江祝林先生提供其父親的照片，補充了一段被遺忘的歷史，彌足珍貴。香港史資深學者高添強兄提供其珍藏照片，使本書生色不少。還有香港聖公會鄺保羅大主教、鄺廣傑榮休大主教、蘇以葆主教；徐贊生主教及陳衍昌牧師惠賜序言。在後期製作方面，感謝文稿編輯莫鉅智先生，在極短時間內為書稿潤飾文字；崇基學院神學院李萃婷同學協助拍攝聖三一堂內外照片；更重要的，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編輯吳秀麗女士，為出版本書所作的專業貢獻，特別是後期的編輯、排版及照片處理等，忠心服事。由於書稿延至三月下旬才完成，我的「解放」卻成為她的「重擔」。末了，仍是懷着極大的歉咎向妻子葳妍述說感恩，二零一零年是我倆結婚十九年紀念，難以想像她對我的包容、忍耐與支持，除主耶穌的愛以外，實在無可比擬。農曆新年假期，我在家翻爬聖三一堂近二十多年的周刊合訂本，唸中二的灝志及小三的逑志，對爸爸手不釋卷閱讀這些沉悶的資料，感到極度疑惑。盼望日後他們也可找到令其投入熱誠的志向。

邢福增

二零一零年四月廿五日

附錄

聖三一堂歷任聖品

堂主任

第一任	鄺日修牧師（1902–1917）
第二任	李求恩會吏長（1917–1918）
第三任	曾紀岳會吏長（1918–1920, 1921–1935）
第四任	李應標法政牧師（1935–1941）
第五任	列蒲祐牧師（1946–1950）
第六任	周夢秋會吏長（1950–1955）
第七任	李應標法政牧師（1955–1960）
第八任	彭恩昌牧師（1960–1967）
第九任	黃羨雲法政牧師（1967–1976）
第十任	謝博文法政牧師（1976–1984）
第十一任	陳衍昌牧師（1984–）

傳道幹事及助理聖品

顧啟德先生（1902–1903）

梁國芳先生（年份不詳）

林懷光先生（1915–1918）

吳錦堂先生（1918–1922）

陳乃文先生（1922–1935）

江漢章先生（1939–1941）

曾繼才牧師（1968–1971, 1972–1973）

張紹培牧師（1971–1972）

佘德信牧師（1973–1974）

林彼得牧師（1974–1975）

區玉君牧師（1974–1977）

陳衍昌牧師（1976–1977, 1981–1982）

招練俊牧師（1977–1978）

周榮富牧師（1978–1980）

蘇以葆牧師（1978–1980）

黃德榮牧師（1978–1980）

劉周勝牧師（1980–1982）

范尚謀會吏（1982）

鄺保羅牧師（1982–1986）

周伯明牧師（1983–1984, 1986–2008）

龐得餘牧師（1985–1997）

歐陽兆基牧師（1999–2002）

呂利武會吏（2003–2005）

葉慶璇牧師（2006–）

引用書目

一、檔案

1. 英國國家檔案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Apply of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Further Grant of Land," CO 129/136, 435.

Gascoigne. "Gascoigne to Chamberlain," 16 May 1900, CO 129/299, 172.

Victoria, J. C. "J. C. Victoria to Governor," 17 March 1900, CO 129/299, 174.

2. 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Public Records Office, Government Records Service)

Banister, W. "W. Banister to D.P.W.," 18 March 1907, HKRS 58–1–39(66).

"Bishop's Letter," 7 September 1903, HKRS 203–1–25–63.

Chamberlain. "Chamberlain to Blake," 16 July 1900, HKRS 58–1–15(30).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Archdeacon William Banister and the Government. HKRS 58–1–17(36).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to Bishop of Victoria," 30 December 1933, HKRS 58–1–15(58).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to the C.S.," 30 July 1935, HKRS 58–1–15(58).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to the Colonial Secretary," 26 March 1907, HKRS 58–1–39(66).

Hall. "Bishop Hall to the Colonial Secretary," 19 March 1935, HKRS 58–1–15(58).

———. "Bishop Hall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30 March 1936, HKRS 58–1–15(58).

———. "Bishop Hall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4 July 1935, HKRS 58–1–15(58).

Hall, Ronald. "Bishop Ronald Hall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9 April 1937, HKRS 58–1–15(58).

"The Humble Petition," August 1903, in Cemetery for Christian Chinese, Petition for–at Pa Mui Shan, HKRS 203–1–25–63.

"Land Officer to Bishop of Victoria," 28 December 1933, HKRS 265–11B–1792(2).

"No. 18 of 1902, An Ordinance to Provide for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hurch Body of the Chinese Anglican Church in Hongkong," 4 July 1902. Hong Kong Government.

"A Peep into the Past, Victoria Home, Kowloon." *Bishop Scrapbook*, Joseph C. Hoare, 17, HKMS 94 1/5.

"Protestant Chinese Cemetery Kowloon City, Grant of Land, Proposed Extension," HKRS 58–1–90–28.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to Rev. W. Banister," 2 February 1898, HKRS 265–11b–1792 (1).

"A Short History: Kowloon Almshouse." *Bishop Scrapbook*, Bishop Joseph Charles Hoare (1898–1906), 67, HKMS 94 1/5.

"The Victoria Home of Orphanage, Reminiscences by M. J. Ost." *Bishop Scrapbook*, J. S. Burdon, 73.

"Yamen Buildings Kowloon City," HKRS 58–1–15(36).

3. 倫敦會檔案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Chalmers. "Chalmers to Thompson," 17 December 1883.

———.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District from 1870 to 1880," n.d..

4. 聖三一堂文件

〈中心服務簡介〉。《員工手册》，1.2，日期不詳。

〈早餐研經，徵求義工〉。聖三一堂「早餐研經會」資料，1997 年 4 月至 2001 年 11 月。

李成義。〈李成義致黃羨雲〉，1975 年 8 月 25 日。

〈附件一：聖三一堂擴建副堂研究委員會資料〉。〈聖三一堂牧區議會致教區常備委員會〉，1988 年 5 月 11 日。

〈附件二：聖三一堂重建副堂籌備委員會資料〉。〈聖三一堂牧區議會致教區常備委員會〉，1988 年 5 月 11 日。

〈附件三(a)：聖公會聖三一堂重建副堂計劃〉。〈聖三一堂牧區議會致教區常備委員會〉，1988年5月11日。

〈附件三(b)：聖公會聖三一堂重建副堂籌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1988年4月7日。〈聖三一堂牧區議會致教區常備委員會〉，1988年5月11日。

〈「是的，上主為我們成了大事！」〉，1991年8月25日。

胡文明。〈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校務報告〉，2010年2月28日。聖三一座堂牧區議會二零一零年度二次會議文件，2010年2月28日。

〈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設立「座堂」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2007年8月3日。

〈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設立「座堂」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2007年9月13日。

〈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籌設「座堂」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紀錄〉，2009年1月9日。

〈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籌設「座堂」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紀錄〉，2009年9月11日。

〈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籌設「座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2007年11月6日。

〈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籌設「座堂」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紀錄〉，2008年6月3日。

〈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二零零二年度牧區議會第三次會議記錄〉，2002年7月7日，2。

徐贊生。〈宣布成立聖三一座堂證書〉，2009年10月15日。

———。〈徐贊生主教致聖三一堂牧區議會函〉，2007年11月23日。

———。〈常備委員會義務書記徐贊生致聖三一堂牧區議會主席陳衍昌牧師函〉，1994年3月31日。

———。〈教區總幹事徐贊生致聖三一堂主任陳衍昌牧師函〉，1988年6月10。

陳衍昌。〈上行之旅——憑大愛，共闖新天；並肩行，宣揚聖道〉，日期不詳。

———。〈上行之旅——憑大愛，創新天；並肩行，揚聖道〉。《同心奉獻——擴建聖三一座堂工程及增加設施》(籌款單張)，日期不詳。

———。〈主教座堂，前面的挑戰〉，2009年。

———。〈陳衍昌牧師致徐贊生主教函〉，2007年12月11日。

———。〈陳衍昌牧師致鄺廣傑主教函〉，1990年6月1日。

———。〈聖三一牧區議會主席陳衍昌牧師致聖公會教區福利協會主席莫耀光先生函〉，1990年9月17日。

———。〈聖三一堂主任陳衍昌牧師致教區常備委員會主席鄺廣傑主教函〉，1991年1月7日。

———。〈聖三一堂學校擴建校舍計劃〉，1994年3月1日。

———。〈聖公會聖三一堂主任牧師致聖公會港澳教區主教鄺廣傑主教函〉，1997年11月11日。

———。〈關於設立主教座堂——一些個人省思及建議〉，2007年11月23日定稿。

陳衍昌、郭書謙、黃啟榮。〈聖三一堂牧區議會主席陳衍昌、牧區議會義務書記郭書謙、補地價委員會主席黃啟榮致教區常備委員會主席鄺廣傑主教〉，1984年11月21日。

〈聖三一堂牧區擬在堂內園地擴建新廈，呈請研究可行計劃〉，1981年9月21日。

〈聖三一堂學校(小學)校舍擴建計劃〉，日期不詳。

《聖三一堂學校校訊》，1976年3月15日。

〈聖公會聖三一堂牧區議會一九九一年度第五次會議——牧區主任報告〉，1991年。

〈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籌備委員會會議記錄〉，1989 年 3 月 29 日、1989 年 7 月 26 日。

盧健明。〈教區財政委員會主席盧健明致聖三一堂主任牧師陳衍昌函〉，1997 年 12 月 29 日。

謝博文。〈聖三一堂牧區聖三一中心籌建委員會及主任牧師謝博文致聖公會港澳教區鄺廣傑主教暨張紹桂會吏長函〉，1982 年 1 月 16 日。

〈籌建聖三一堂副堂學校募捐委員會通啟〉，1949 年 12 月 23 日。

"Acting Manager, HK Telephone to Bishop Hall," 6 October 1947.

Au, Wai-sum. "Au Wai-sum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4 February 1972.

———. "Au Wai-sum, Chairman, Building Committee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30 November 1971.

———. "Au Wai-sum, Chairman, Building Committee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4 February 1972.

———. "Au Wai-sum, Chairman, Church School Building Committee to Lee Seng Gee, Esq. Director, Lee Foundation," 30 July 1970.

Baker. "Bishop Baker to Rev. Jane Hwang," 28 June 1972.

Baker, Gilbert. "Bishop Gilbert Bak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Vestry, Holy Trinity Church," 3 March 1967.

———. "Bishop of Hong Kong and Macao, Gilbert Baker to Hon. Director of Education attn J. P. Stocks, Esq.," 31 January 1969.

———. "Bishop of Hong Kong and Macao, Gilbert Baker to Rev. Deaconess Jane Hwang, Holy Trinity Church," 21 November 1968.

Chan, H. C. "Rev. H. C. Chan to the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30 December 1986.

Chan, Hin-cheung. "附件三(d1): Holy Trinity Church Centenary Building: Some Brief Information on the Project," 31 March 1988.〈聖三一堂牧區議會致教區常備委員會〉，1988 年 5 月 11 日。

Chan, Kim-kwong. "Report on the Ecclesial Designation of Pro-Cathedral in the Catholic Traditions," 26 February 2008.

Chou, John M. C., J. M. Wong and Y. M. Penn. "Rev. John M. C. Chou, Mr. J. M. Wong & Mr. Y. M. Penn to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17 March 1951.

Chu, Man-wai, and Edmund B. Der. "Chu Man-wai, Project Committee Chairman & Rev. Edmund B. Der, Parish Cicar to Mr. Dennis B. Minns, Managing Director / Trustee of Bradury Trust," 3 December 1981.

"Dean and Bishop's Commissary to Director of Education," 9 June 1952.

Der, Edmund B. "Edmund B. Der to Diocesan Welfare Council," 31 May 1984.

———. "Edmund B. Der to Rt. Rev. Peter K. K. Kwong, Bishop, Chairman, Diocesan Standing Committee," 30 May 1984.

"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Bishop Hall," 5 March 1952.

"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Rt. Rev. R. O. Hall," 6 September 1954.

Fok, A. "A. Fok, for 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25 January 1973.

Fung, M. L. "District Land Officer M. L. Fung to Messrs. Debenham Tweson and Tam," 26 October 1984.

"Government Press Release: New Cattle Lairage at Kwai Chung, No Unnecessary Delay in Making it Available," 8 July 1970.

"Grown Lands & Survey Offic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to Bishop Hall," 7 September 1951.

Hall. "Bishop Hall to D. H. Blake," 3 October 1950.

———. "Bishop Hall to Mr. J. M. Wong & Mr. Y. W. Penn," 22 May 1948.

———. "Bishop Hall to Rev. Peter Peng," 11 March 1964.

———. "Bishop Hall to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22 March 1951.

———. "Bishop Hall to the Hon. Secretary, Holy Trinity Church Vestry," 12 April 1955.

———. "Bishop Hall to the Secretary, HK Telephone," 12 November 1947.

———. "Bishop Hall to the Superintendent, Crown Lands and Survey Office, Public Work Department," 25 February 1963.

———. "Bishop Hall to the Ven. Archdeacon Tsang Kei Ngok, Holy Trinity Church," 1 September 1955.

———. "Bishop Hall to To Chung Fong," n.d..

Hall, and Y. W. Penn. "Bishop Hall & Y. W. Penn to Director of Education," 9 January 1952.

"Holy Trinity Church to the Secretary, HK Telephone," 22 October 1946.

Hwang, Hsien-yuin. "Deaconess Hwang Hsien-yuin, Chairman, Church Council to Director of Education," 16 September 1968.

Hwang, Jane. "Jane Hwang to Gilbert Baker," 16 November 1972.

———. "Jane Hwang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29 October 1968.

———. "Jane Hwang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4 November 1974.

———. "Jane Hwang, Chairman of Vestry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19 July 1972.

———. "Rev. Deaconess Jane Hwang to Rt. Rev. Gilbert Baker," 20 April 1971.

———. "Rev. Jane Hwang to Mr. A. P. Bennett, C. D. O. (K. C.)," n.d..

"Information Needed for Applying for Nursery Premises," 30 December 1986.

Leung, Ka-kui. "Leung Ka-kui, for 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the Supervisor, Holy Trinity Centre Kindergarten," 14 July 1986.

Leung, M. B. "M. B. Leung (for 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Edmund B. Der," 5 January 1982.

Li, W. F. "W. F. Li, for 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Rev. Paul Tsang, Holy Trinity Church," 8 June 1973.

Lit, Po-woo. "Lit Po-woo to R. O. Hall," 23 July 1950.

Ma, M. T. "M. T. Ma, for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Rev. Deaconess Hwang," 5 November 1969.

Pang Tsang, Kai-choy. "Pang Tsang Kai-choy (curate) to Very Rev. J. W. Foster, the Dean, St. John Cathedral," 12 May 1972.

Peng, Peter Y. C. "Vicar Peter Y. C. Peng to Bishop," 18 November 1963.

Peng, Y. W. "Y. W. Peng to Major H. Misa, M.C. Sec. HK, Jockey Club, HK," 27 April 1954.

Penn, Y. W. "Y. W. Penn, MBE to Superintendent, Crown Lands and Survey Office, Public Work Department," 24 April 1962.

"Proposed Partnership Scheme for Holy Trinity Church Social Service Centre between Diocesan Welfare Council (DWC) and Holy Trinity Church Parish (HTC)," n.d..

Stocks, J. P. "J. P. Stocks, for Director of Education to Supervisor, Holy Trinity Church," 20 September 1968, Ref. No. E.D. (GR) 3/3197/68.

"Superintendent of Crown Lands and Surveys to Bishop," 15 December 1948.

To, Helena. "Helena To, The Architects' Mission to Holy Trinity Bradbury Centre," 20 December 1990.

Tsang, K. Y. "Holy Trinity Church Regular Services," 4 February 1946.

Wong, J. M., and Y. W. Penn. "Committee of the H.T.C. (J. M. Wong and Y. W. Penn) to Bishop," 28 December 1948.

———. "Committee of the H.T.C. (J. M. Wong and Y. W. Penn) to Bishop," 12 March 1949.

———. "J. M. Wong & Y. W. Penn to Bishop Hall," 19 May 1948.

Yeung, W. "W. Yeung, Senior Trust Officer (HSBC) to Mr. Chu Man Wai, Project Committee Chairman, Holy Trinity Church," 9 January 1982.

5. 聖公會差會英國海外傳道會檔案

(Church Mission Society Archives)

《香港九龍城中華基督教廣蔭院史略，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徵信錄》。

Banister. "Banister to Baring Gould," 17 October 1902, Hong Kong.

"Bishop of Victoria to V. Henn," 11 February 1862, Hong Kong, 218, C CH M3, Reel 213.

Fletcher. "Day Schools in and around Hongkong for 1913," n.d..

From Month to Month. 1900–1904.

"Hamper to Baring Gould," 8 May 1904, Kowloon.

"Minute 615: Taipo Orphanage Scheme," 31 October 1935, G1 CH 1e11, Reel 396.

No. 120, 7 April 1884, J. B. Ost.

No. 222, "Mrs Hipwell (Hong Kong) to Baring Gould," 30 May 1899, Original Papers.

No. 48, Fong Yat San 2 March 1885, Original Paper.

No. 50, 29 March 1887, J. B. Ost.

"Term of Lease of the Buildings Used as Almshouses," n.d..

"Victoria Home and Orphanage, Annual Report, 1888," n.d..

6. 口述歷史

汪玉娟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徐自強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高俊鎮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張磐生等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梁寶靈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陳宗抗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鄧慶年訪問記錄，劉紹麟整理。

二、聖三一堂出版刊物

KZER。〈我所認識的吳建中先生〉。《一百一十周年》，38–39。

〈一九八零年聖壇侍從訓練班〉。《九十周年》，90。

〈九十年來歷任傳道幹事及助理聖品〉。《九十周年》，43。

〈九十周年新生之傳播團契〉。《九十周年》，77。

小兵。〈本堂元老〉。《九十周年》，65。

———。〈聖三一堂教友委身聖職工作不甘後人〉。《九十周年》，46。

〈本堂重要統計〉。《九十周年》，41。

〈本堂第五任主任牧師（一九四六至五零）列蒲祐〉。《九十周年》，65–66。

白約翰。〈「風隨意而吹」〉。《九十周年》，12。

〈伉儷團、擴勵團、吭厲團〉。《百周年》，55。

伍德賢。〈我們的聖樂部〉。《九十周年》，87。

成年部。〈寫在九十周年堂慶大典〉。《九十周年》，97。

朱文偉。〈聖三一堂中學建校史略〉。《九十周年》，118。

老教友。〈聖三一堂初期大事年紀，1890–1935〉。《九十周年》，560。

何明華。〈序〉。《鑽禧》，6。

李有斌。〈音響部〉。《百周年》，63。

李信傑。〈早堂詩班成立四周年的感想〉。《鑽禧》，66。

李美玲。〈繼往開來——努力見證上帝的愛與關懷〉。《一百一十周年》，85–86。

李慶富。〈九十周年新誕生的康樂體育部〉。《九十周年》，109。

李鍾甜英。〈伉儷團呼籲，等待您的回應〉。《百周年》，54。

汪玉娟。〈婦女部的組織與工作簡介〉。《八十周年》，36。

〈兒童樂園〉。《少年部 1955》，51。

〈東九龍教區主教宣告本堂為教區座堂公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2009 年 10 月 25 日。

林莫如恩。〈慈善部舉辦醫藥救濟事工之經過〉。《鑽禧》，79。

〈附錄：諮詢過程及接獲意見〉，2001 年 2 月 12 日。《五年計劃》，i–iv。

〈後記〉。《五年計劃》，i–iv。

《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聖三一座堂憲章》(草稿)，2009 年 10 月 15 日。

〈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二零零零年度牧區議會及員工一覽表〉。《一百一十周年》，114。

夏永豪。〈主日學部工作報告〉。《鑽禧》，65。

———。〈與政府交涉收回堂地始末〉。《八十周年》，29–30。

夏麥恩明。〈從事探訪工作的一點感想〉。《鑽禧》，76。

容潔芝。〈我們的聖樂部〉。《八十周年》，25–26。

祝伊娜。〈聖馬太團契〉。《九十周年》，53。

高俊鎮。〈向聾人傳福音的以法大團契〉。《九十周年》，76。

———。〈傳道部〉。《一百一十周年》，93。

———。〈聖三一堂小學——全人教育，廣播福音〉。《一百一十周年》，64。

———。〈聖三一堂的聾人服務〉。《百周年》，78–79。

———。〈聖三一堂學校〉。《百周年》，71。

張紹培題字。《百周年》，15。

張榮基。〈憶涂從芳牧師〉。《鑽禧》，39。

〈教會領袖眼中的中心〉。《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開幕紀念特刊》，32–33。香港：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1990。

梁恩靈。〈聖壇侍從部〉。《百周年》，62。

梁雁群。〈伉儷團〉。《九十周年》，102。

梁德威。〈司禱員團契〉。《九十周年》，84–85。

〈終身事主的汪姑娘〉。《百周年》，39。

郭佩蘭。〈古色古香的聖三一堂〉。《百周年》，66–68。

郭始基。〈傳道部需要你的支持與代禱〉。《九十周年》，71。

郭書謙。〈聖三一堂史略〉。《九十周年》，62。

———。〈聖三一堂史略〉。《百周年》，29–33。

陳王幸然。〈我們的婦女部〉。《九十周年》，99。

陳守真。〈慈光堂——傳道的果實〉。《九十周年》，81。

陳守道。〈聖三一堂最年長的教友——陳英乾先生〉。《九十周年》，64。

陳宗抗。〈聖三一堂白普理百周年紀念樓〉。《百周年》，36–37。

陳美顏。〈兒童流動圖書閱覽車〉。《八十周年》，31–32。

陳衍昌。《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五年牧民計劃（2006–2010）獻議》(小冊子)，2–4。

———。〈調整方向，繼續成長〉。《服務中心五周年》，8。

〈喜研教義的曾貫宜〉。《百周年》，38。

〈報導及評論本堂中學之揭幕啟用禮〉。《九十周年》，122。

彭約榮。〈建校史略〉。《九十周年》，114。

曾紀岳。〈把福音興旺起來而且結實增長〉。《鑽禧》，51。

曾貫穀。〈聖三一堂教育事業及建校工作〉。《八十周年》，42。

港澳教區聖三一堂少年部。《中華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少年部年刊，1955》。香港：港澳教區聖三一堂少年部，1955。簡稱《少年部 1955》。

馮智活。〈青年部——我們是一列火車〉。《九十周年》，103。

黃林瑞娥。〈慈善部的今昔〉。《鑽禧》，78。

黃羨雲。〈主啊！我當何為？〉。《八十周年》，48。

———。〈聖三一堂與我〉。《九十周年》，15。

傳道部。〈本年來的傳道概況〉。《八十周年》，34。

〈傳道部部務概況〉。《少年部 1955》，41。

〈傳道幹事及助理聖品〉。《百周年》，26。

〈慈祥長者容師奶〉。《百周年》，40。

〈慈善部工作概況〉。《少年部 1955》，43。

〈想飛佈道會〉。《九十周年》，72。

《聖三一兒童合唱團十周年音樂會》(特刊)。香港：聖三一兒童合唱團，2010。

〈聖三一社會服務中心〉。《百周年》，74。

《聖三一堂一百一十五周年感恩崇拜》，2005 年 12 月 31 日。

〈聖三一堂少年部部歌〉。《少年部 1955》，5。

《聖三一堂周刊》。1982–1987, 1989–2009。

〈聖三一堂結婚則例〉。《九十周年》，92。

聖公會聖三一堂。《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五年計劃》。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2001。簡稱《五年計劃》。

———。《聖公會港澳教區聖三一堂九十周年堂慶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80。簡稱《九十周年》。

———。《聖公會聖三一堂一百一十周年堂慶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2001。簡稱《一百一十周年》。

———。《聖公會聖三一堂八十周年紀念特刊，1890–1970》。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70。簡稱《八十周年》。

———。《聖公會聖三一堂百周年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90。簡稱《百周年》。

———。《聖公會聖三一堂鑽禧特刊，1890–1965》。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1965。簡稱《鑽禧》。

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一九九一至九二年度中心工作報告》。

———。《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一九九二至九三年度中心工作報告》。

———。《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工作報告》。

———。《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年報》。

———。《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年報》。

———。《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五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社會服務中心，1994。簡稱《服務中心五周年》。

資料小組。〈本堂建校經過〉。《鑽禧》，40。

鄒小華。〈我的經歷〉。《百周年》，43。

漂。〈佈道在新界〉。《少年部 1955》，56。

劉元乂。〈本堂傳道部中堅——佈道團的創立〉。《八十周年》，18。

———。〈成年部的成立與現況〉。《鑽禧》，68。

———。〈我們的松柏團契〉。《九十周年》，130。

劉國藩輯。〈聖三一堂大事年譜（1890–1970）〉。《八十周年》，12。

劉肇邦。〈我在中心的一些精彩深刻的經歷〉。《服務中心五周年》，27。

歐陽澤坤、譚鄺眉珍。〈傳道部小史及近況報告〉。《鑽禧》，77。

蔡秀顏。〈回顧聖三一堂小學〉。《八十周年》，40。

談秀婉。〈婦女團工作概況〉。《少年部 1955》，40。

鄭家民。〈少年部近年部務概述〉。《鑽禧》，70。

———。〈聖三一堂七十五年〉。《鑽禧》，32。

鄭嘉德。〈聖樂部的過去與現在〉。《鑽禧》，63。

鄧黃曼玲。〈聖壇服務〉。《九十周年》，94。

鄧慶年。〈少年部之服務團契〉。《九十周年》，81。

———。〈少年部概況〉。《八十周年》，20。

———。〈在聖三一堂的第一次〉。《一百一十周年》，26。

———。〈寓傳道於教育〉。《九十周年》，110–11。

———。〈溫故知新〉。《百周年》，46。

「歷史圖片：保留迄今之洗禮名册」。《鑽禧》，25。

謝博文。〈事奉與侍奉〉。《九十周年》，14。

———。〈前言——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再去耕耘吧！〉。《聖公會聖三一堂九十四周年堂慶，聖三一白普理中心開幕典禮，小聖堂（寶坤堂）祝聖禮》，1984 年 6 月 14 日。

———。〈從建築及設計角度去看聖三一堂的生命〉。《九十周年》，83。

———編。〈聖三一堂婚前輔導班課程大綱〉。《九十周年》，93。

鄺國富。〈探訪一二三〉。《九十周年》，127–28。

鄺福志。〈成年部的回顧與展望〉。《八十周年》，16。

關伯楦。〈年輕的伯伯〉。《百周年》，41。

關艷萍。〈我們的主日學部〉。《八十周年》，23。

寶興懌（Beatrice M. Pope）。〈海外來鴻〉。《鑽禧》，59。

〈籌建聖三一堂中學序言〉，1969 年 8 月 31 日。《八十周年》，43。

蘇以韜。〈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簡報〉。《九十周年》，121。

三、期刊與連續性出版刊物

《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月刊》。1939–1940。

〈世界信義宗社會服務處歸併入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信息》(1976 年 11 月)：1。

吳志華。〈香港文藝復興的三十年代〉。《明報》，2005 年 3 月 27 日。

《社聯季刊》。1965, 1973, 1980, 1987。

《基督教周報》。1970, 1976。

《基督教培道聯愛會周刊》。1925。

〈教區新里程——座堂透視〉。《E 期》14（2008 年 5 月）：8–11。

《教聲》。1982–2010。

《港粵教聲》。1946–1948。

《港澳教聲》。1953–1982。

〈聖公會退出世界協進會〉。《天風》275（1951 年 8 月 4 日）：11。

〈聖公會港澳教區常務委員會通啟〉。《港澳聖公會月刊》創刊 1 卷 3 期（1951 年 7 月）：1。

《聯會月刊》。1950。

Administrative Report. 1905–1939.

Chinese Recorder. 1877, 1941.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1882–1883, 1902, 1904–1907.

Hayes, James. "Old British Kowloon." *Journal of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 (1966): 120–37.

"Holy Trinity Church: Laying of Corner Stone By Bishop of Cant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3 November 1936.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0, 1956.

Hong Kong Blue Book. 1899–1902, 1904–1938.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56, 1882, 1899, 1904, 1919, 1925.

"Letter from the Bishop." *The Outpost: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kong* (April 1934): 3.

The Outpost: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934–1952.

Pang, S. H. "From the Chairman."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Annual Report, 1967*.

Proceeding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1881–1912.

"Report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23 June 1902." *Hong Kong Hansard 1902*, 26.

Sessional Papers. 1889, 1905.

Stumpf, L. "A Changing Philosophy." *LWF Hong Kong Quarterly Report I, 1968*, 1.

Stumpf, L., and Carl F. Nielsen. "Facing a Dilemma." *LWF / DWS Bi-Annual Report, January-June 1970*, 1.

四、專書與單篇文章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七十年代香港教會的使命——「路向與計劃」指南》。香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1971。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 7 冊。上海：中華基督教會，1924。

〈中華聖公會中央辦事處組織條例〉。中華聖公會中央辦事處編：《中華聖公會年鑑，1949》，63、116。

中華聖公會中央辦事處編。《中華聖公會年鑑，1949》。上海：中華聖公會中央辦事處，1949。

《中華聖公會第十二屆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香港：中華聖公會，1933。

《中華聖公會第十三屆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香港：中華聖公會，1934。

中華續行委續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 3–4 冊。上海：中華基督教會，1916–1917。

〈六十年大事紀要〉。《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鑽禧紀念特刊，1935–1995》，39。香港：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1995。

〈各堂教友人數及守餐人數統計表〉。《中華聖公會第十二屆港粵教區議會報告書》，110–11。香港：中華聖公會，1933。

吳邦謀編著。《再看啟德——從日佔時期説起》。香港：ZKOOB，2009。

吳德施。〈中華聖公會〉。收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 11 冊上，13。上海：中華基督教會，1931。

呂大樂。《山上之城——香港紅十字會的故事，1950–2000》。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0。

———。《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閒人行，1997；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呂大樂、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香港：三聯書店，2003。

宋尚節。《靈歷集光——主僕宋尚節日記摘抄》。香港：恩雨，1995。

宋軒麟。〈九龍城地標之二——啟德濱與啟德機場的興建〉。收趙雨樂、鍾寶賢編：《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143–82。

李志剛。〈香港日據時期基督教會遭受苦難的探討〉。收胡春惠主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303–305。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1996。

李智梅。〈生命之糧〉。收《聖公會聖三一堂小學五十周年校慶特刊》，32–33。

邢福增。〈一九四九年前香港基督教的發展——宏觀歷史的考察，1842–1949〉。收《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1–80。

———。《此世與他世之間——香港基督教墳場的歷史與文化》。未刊稿。

———。〈延續與斷裂——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香港〉。收《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81–184。

———。《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4。

———。《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香港：道風書社，2008。

———。《願你的國降臨——戰後香港「基督教新村」的個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2。

周永新。《香港社會福利的發展與政策》。香港：大學出版社，1980。

周夢秋。《牧者心聲》。香港：基督教文藝，1970。

〈宗教教育處〉。《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二十周年校慶特刊，1978–1998》，46。

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收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上冊，157–210。香港：三聯，1997。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編。《合一承擔牧萬民——九十年代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香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1990。

《香港教會名錄，1969》。香港：基督教文藝，1969。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編。《廿一世紀教會牧養與挑戰——九九香港教會普查報告及回應》。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02。

徐珍妮。《回應九七——基督徒群體的見證》。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1992。

〈核心討論——今日的香港社會〉。收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七十年代香港教會的使命》，6。

高添強。〈二十世紀前九龍城地區史略〉。收趙雨樂、鍾寶賢編：《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59–65。

———。〈二次大戰與啟德機場〉。收趙雨樂、鍾寶賢編：《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197–98。

———。〈香港墳場發展史略，1841–1950〉。收梁美儀、張燦輝合編：《凝視死亡——死與人間的多元省思》，209–47。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開埠初期的華人喪葬〉。收冼玉儀、劉潤和編：《益善行道——東華三院一百三十五周年紀念專題文集》，83。香港：三聯書店，2006。

《執行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紀錄（昭和十九年一月份常會）》。香港：香港基督教總會，昭和 19 年 1 月 3 日。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太平洋世紀，2000。

張麗。〈抗戰時期的香港與內地〉。收余繩武、劉蜀永編：《二十世紀的香港》，135–37。香港：麒麟書業，1995。

梁家麟。〈「九七應變」——香港教會的社會及神學討論（1982–1997）〉。收《少數派與少數主義——中港教會評論集（二）》，67–68。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2。

許光蔭、余偉雄。〈九龍城崇真堂簡史〉。收余偉雄主編：《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史略》，69。香港：香港崇真會出版社，1974。

陳佐才。〈香港教會的一般現狀〉。收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七十年代香港教會的使命》，63。

陳昕等主編。《香港全記錄》，卷二。香港：中華書局，1998。

陳衍昌。〈忘年之師〉。《牧情——溪水旁的呼喚》，180–81。香港：基督教文藝，2006。

陳國煌。〈公墳部事工回顧與展望〉。《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七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15–1990》，21。香港：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1990。

陳智衡。《太陽旗下的十架——香港日治時期基督教會史，1941–1945》。香港：建道神學院，2009。

陸輝。〈香港教會未來發展反省〉。收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編：《廿一世紀教會牧養與挑戰》，35–46。

〈創校史略〉。《聖公會聖三一堂小學五十周年校慶特刊》，74–75。

曾潔芳編。《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會所及工作區發展史》。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1992。

黃國仁。《服務教會半世紀——李求恩會吏長生平》。香港：諸聖先導出版委員會，1964。

聖公會港澳教區。《聖公會港澳教區一百三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849–1984》。香港：聖公會一三五周年慶典中央籌備委員會，1984。

《聖公會聖三一堂小學五十周年校慶特刊》。香港：聖三一堂小學，2003。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二十周年校慶特刊，1978–1998》。香港：聖三一堂中學，1998。

〈聖馬提亞堂〉。《聖公會港澳教區一九六零年募捐運動報告》，74。香港：聖公會港澳教區，1960。

趙雨樂、鍾寶賢編。《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 ——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

———。《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2000。

劉瑞滔編。《港粵澳名牧生平》，第 1 集。香港：中華基督徒送書會，1975。

劉粵聲編。《香港基督教會史》。香港：香港基督教聯會，1941；香港浸信教會，1996 重排版。

〈廣蔭老人院〉。《聖公會港澳教區一九六零年募捐運動報告》，166。香港：聖公會港澳教區，1960。

編委會編。《九龍城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

編輯部。〈貧困待援的戰後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四十周年紀念特刊，1947–1987》。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1987。

蔡寶瓊、江瓊珠編。《晚晚六點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香港：進一步，1998。

〈諸聖堂史略，1890–2001〉。《諸聖堂一百一十周年堂慶紀念特刊，1891–2001》，17。香港：諸聖堂，2001。

鄭寶鴻、佟寶銘編著。《九龍街道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0。

鄧慶年。〈點點往事情懷〉。《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二十周年校慶特刊，1978–1998》，164–65。

龍炳頤。《香港古今建築》。香港：三聯書店，1992。

———。〈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收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上冊，225。香港：三聯書店，1997。

謝博文。〈金禧校慶感言〉。《聖公會聖三一堂小學五十周年校慶特刊》，26。

———。〈聖三一中心幼稚園十周年紀念〉。《聖三一中心幼稚園十周年紀念特刊》，5。香港：聖三一中心幼稚園，1994。

鍾仁立。《中華聖公會華南教區百年史略》。香港：中華聖公會會督府，1951。

———。《莫壽增傳》。香港：聖公會出版社，1972。

———。〈莫壽增會督生平摘錄，1866–1943〉。收劉瑞滔編：《港粵澳名牧生平》，第 1 集，43。

———。〈鄺日修牧師傳略，1840–1921〉。收劉瑞滔編：《港粵澳名牧生平》，第 1 集，8。

鮫島盛隆（Moritaka Samejima）。《香港回想記——日軍佔領下的香港教會》。龔書森譯。香港：基督教文藝，1971。

藍如溪、胡美林。《日治下香港的一隅》。香港：伯特利教會，2000。

〈鄺日修〉。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 6 冊，269。上海：中華基督教會，1921。

〈鄺日修牧師〉。劉粵聲編：《香港基督教會史》。香港：香港基督教聯會，1941。

鄺廣傑。〈前言〉。《聖公會港澳教區一百三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849–1984》，3。

蘇以韜。〈點滴的回顧〉。《聖公會聖三一堂小學五十周年校慶特刊》，28。

Banham, Tony.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Brown, Deborah Ann. *Turmoil in Hong Kong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Rule: The Fate of the Territory and Its Anglican Church*. San Francisco: Mellen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Register of Missionaries: Clerical, Lay and Female and Native Clergy from 1804 to 1904*. N.p.,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905.

Cressy, Earl H. *City Churches in Hong Kong: With a Supplementary Survey of All Churches in the Colony*. Hong Kong: Earl H. Cressy, 1956.

Cressy, Earl H., and Loren E. Noren. *Urban Church Growth in Hong Kong 1955–1958, Second Hong Kong Study*. Hong Kong, Earl H. Cressy and Loren E. Noren, 1960.

Diocese of Hong Kong & Macao. *The Five-Year Plan, 1970–1975: Report of the Bishop's Commission on Diocesan Development Presented October 1969*. Hong Kong: Diocesan Office, 1969.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 Macao 1849–1974: A Brief History and the 1974 List of Church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ocial Welfare Centres. Hong Kong: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1974.

Endacott, George B., and Dorothy E. She.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A Hundred Years of Church History, 1849–1949*. Hong Kong: Standard Press, 1949.

Faure, David, ed. *Society: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Gray, G. F. S. *Anglicans in China: A History of the Zhonghua Shenggong Hui (Chung Hua Sheng Kung Huei)*, with editorial revision by Martha Lund Smalley. Gwynedd, PA: Episcopal China Mission History Project, 1996.

Hambro, Edvard.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Leyden: A. W. Sijthoff, 1955.

Handbook to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924. London / Hong Kong: Victoria Diocesan Association, n.d..

Hayes, James. "Kowloon City and Kowloon Street: The Community Institutions of a Yamen, Market, and Rural Subdistrict." In *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163–80. Hamden, CT: Archon Books, 1977.

King, Doreen. *St. John's Cathedral Hong Kong*. Hong Kong: St. John's Cathedral, 1987.

MacGillivray, D.,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1907.

Noren, Loren E. *Urban Church Growth in Hong Kong 1958–1962, Third Hong Kong Study*. Hong Kong: Loren E. Noren, 1964.

Rubinstein, Murray A.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1996.

Sharpe, Eric J. *Karl Ludvig Reichelt: Missionary, Scholar and Pilgrim*. Hong Kong: Tao Fong Shan Ecumenical Centre, 1984.

Smith, Carl T.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Smith, George.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and the Islands of Hong Kong and Chusan in Behalf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Years 1844, 1845, 1846*. London: Seeley, Burnside & Seeley, 1847.

———. *Report on Hong Kong, More Especially in Reference to Missionary Facilities There and in the Contiguous Parts of Canton Province*.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House, 1845.

Stott, John. *Essential Living: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Leicester: Inter-Varsity Press, 1988.

Tang, Kwong-leung. *Colonial State and Social Policy: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1842–1997*.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

Tregear, T. R., and L. Berry. *The Development of Hongkong and Kowloon as Told in Map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9.

Tsang, Steve.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Webb, Paul R. "Voluntary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收《廿五年來之香港（1951–1976）——崇基學院廿五周年校慶紀念學術講座演講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77。

五、網上資料

李應標。〈一九二零年的諸聖堂〉。《諸聖堂七十周年紀念專刊》。香港聖公會諸聖堂網頁。http://www.allsaintschurch.org.hk/b70p05.htm。

〈青年社會福利服務政策及方向背景資料〉。青年事務委員會網頁。http://www.coy.gov.hk/chi/report/mee4.htm。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九龍城青少年中心賽馬會青年幹線暨馬鞍山中心賽馬會青年幹線聯合啟用禮〉。香港聖公會 Online News，2006 年 7 月 16 日。http://www.anglicancommunion.org/provincialnews/hkskh/client/news/client_news_detail.cfm?naid=873。

〈香港聾劇團簡介〉。香港聾劇團網誌。http://hk.myblog.yahoo.com/hktd1989/article?mid=28。

真鐸學校網頁。http://www.cts.edu.hk/index.php?part=whole&st_ page=chun_tok_school/a2-history。

〈發展簡史〉。香港聖公會網頁。http://www.hkskh.org/articleDetail.php?art_ id=120。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香港特別行政區社會福利署網頁。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young/sub_centreserv/id_integrated4/。

"History"。聖保羅書院網頁。http://www.spc.edu.hk/profile/history.php#1909。

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

香港九龍馬頭涌道 135 號
電話 (852) 2713 5221
傳真 (852) 2715 0809
網址 http://www.holytrinitychurch.org.hk
郵址 office@holytrinitychurch.org.hk

你們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民聽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香港教會系列

系列一　汪彼得牧師在香港工作之初探

潘玉娟著

本書不單簡述了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汪彼得牧師的工作成就，讓讀者了解到汪牧師帶領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從依賴外國差會支持到獨立自養之經過，以及他如何在六十年代還沒有人鼓吹「社關」時，已開始推動「社關」工作，並使中華基督教會從只有六間學校的教會，發展至一九九零年初有六十四所學校的一個主要的基督教辦學團體。作者同時以客觀角度點出了一位強勢領袖於權力移交過程可能出現的困難，希望成為華人教會發展的借鏡。

系列二　福利與信仰——香港教會推行「慈惠」之果效報告

龔立人、陳澤群著

本書採用「深入訪問」(in-depth interview) 的方法來訪問受助人以及負責管理教會慈惠之教牧及長執，從而探討和反省教會現時慈惠制度及申請慈惠者的情況，最後以基督教信仰的立場指出未來教會於慈惠工作發展的可能方向。

系列三　香港基督教使命和身分尋索的歷史回顧

盧龍光、楊國強著

本書載有兩篇文章，主要是將香港基督教的發展，安置回香港本身歷史發展的脈絡中，描繪她走過的使命實踐與身分尋索路。第一篇文章回顧了在戰後的三十多年歷史中，香港基督教如何根據自身對社會政治環境演變的反省，實踐了「宣講」與「服務」的

使命。第二篇文章則分析了香港教會領袖為了回應香港主權回歸問題所建構的國家民族論述，說明其中的困難所在，並指出此論述對整個過渡期以至回歸後的新境況的含意。

系列四　一個華南客家教會的研究
從巴色會到香港崇真會

湯泳詩著

近代中國基督教史中，華人教會自立運動為重要轉捩點。本書即以此角度集中討論從巴色會到香港崇真會之自立歷程。近世華人自立教會中，閩南長老會為中西合作自立模式的表表者。然而，閩南長老會的自立得力於自養、崇真會的自立則啟動於自傳。前者始於 1862 年，後者則在 1847 年，時間更早。從巴色會到崇真會的 150 年發展歷程中，中西合作，延續至今，最終成為伙伴，使該會終於在華落地生根。可見崇真會顯然為華人教會自立運動之重要範例。

系列五　「社會良心」抑「搞事份子」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歷史之研究

湯泳詩著

自 1959 年起，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開始關注香港教會與工業社會的關係，遂設立工業委員會，以幫助香港教會面對香港工業社會的急速變化，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可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在香港教會中的身分與位置卻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與確立，在香港教會的歷史中若隱若現。本書嘗試探討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歷史與變化，從而分析其在香港教會中「搞事份子」與「社會良心」的弔詭身分，藉此說明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是香港教會歷史的一個獨特部分，擁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與價值。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期刊

Ching Feng: A Journal on Christianity & Chinese Religion & Culture

景風系列

Double-Edged Sword: Christianity & 20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
/ Lewis Stewart ROBINSON

Taoist Tradition & Change / Bartholomew P. M. TSUI

謝扶雅百齡詩文集 / 謝扶雅

Struggling for Survival: The Experienc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1949–1970
/ CHAN Kim-kwong

尋真求全——中國神學與政教處境初探 / 葉菁華

承受與持守——中國大地的福音火炬 / 鄧肇明

開放與委身——田立克的神學與宗教對話 / 賴品超

十字蓮花——基督教與中國歷史文化論集 / 梁元生

反帝・愛國・屬靈人——倪柝聲與基督徒聚會處研究 / 邢福增

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 / 蘇精

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 / 蘇精

十年踽踽——汪維藩文集（1997–2007）/ 汪維藩

Ethical Reorientation for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Individual, Community, and Society
/ Manhong Melissa LIN

大英聖書公會與官話《和合本》聖經翻譯 / 麥金華

香港教會系列

汪彼得牧師在香港工作之初探 / 潘玉娟

福利與信仰——香港教會推行「慈惠」之果效研究報告 / 龔立人、陳澤群

香港基督教使命和身分尋索的歷史回顧 / 盧龍光、楊國強

一個華南客家教會的研究——從巴色會到香港崇真會 / 湯泳詩

「社會良心」抑「搞事份子」——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歷史之研究 / 湯泳詩

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史（1890–2009）/ 邢福增、劉紹麟

資料叢刊

中國新方志中的基督宗教資料索引（1980–1998）/ 陳劍光、龐君華

其他

Karl Ludvig Reichelt: Missionary, Scholar & Pilgrim / Eric J. SHARPE

Interpretations of Hope in Chinese Religions & Christianity
/ Daniel L. OVERMYER, LAI Chi-tim ed.

如欲閱讀以上刊物之內容簡介或本社通訊，請瀏覽 www.csccrc.org。

聖三一堂不僅是聖公會在九龍半島最早建立的牧區，也是基督教在九龍城區歷史最悠久的教會。個半世紀以來，九龍城區經歷了無數變遷，昔日的傳統村落，今天已變為繁華鬧市。隨著香港社會及聖公會的變革，聖三一堂與時俱進，致力在宣教牧養、學校教育及社會福利服務方面，傳講及實踐天國的福音。聖三一堂的故事，篇篇訴說上主的僕人如何在這裡開基立業，頁頁見證九龍城區以至整個香港社會在時代巨輪下的變遷及教會的回應。



宗文社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 CULTURE

ISBN 978-962-7706-24-3